反蒋先锋
民主斗士
抗暴旗手
启蒙大师

◉ 汪幸福／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殷海光与蒋介石

殷海光与蒋介石

◉ 汪幸福／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殷海光与蒋介石/汪幸福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6
ISBN 7-216-02879-1

Ⅰ.殷…
Ⅱ.汪…
Ⅲ.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Ⅳ.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4133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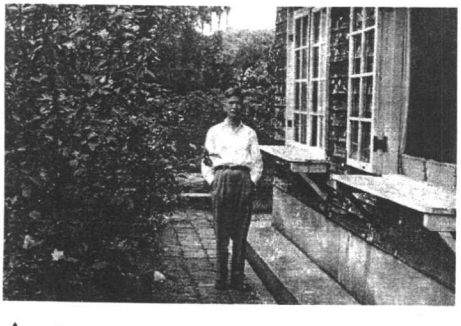
殷海光与蒋介石	汪幸福 著
出版: 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武汉市汉桥印刷厂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0.125
字数:243 千字	插页:7
版次:2000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01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3 001-6 040	定价:16.00 元
书号:ISBN 7-216-02879-1/K·314	

▲ 殷海光的目光极其锐利，他第一次见蒋介石就看穿了他的真面目。

◀ 40年代，蒋介石非常欣赏殷海光，殷海光也很崇拜蒋介石。

▲ 蒋氏父子虽然面带笑容，为打击迫害殷海光却费尽了心机。

▲ 殷海光与夏道平(左)是台湾《自由中国》最厉害、也是蒋介石最头疼的两支笔杆子。



▲ 进入60年代，蒋氏父子对殷海光恨之入骨，曾派特务日夜监视、跟踪殷海光及其家人。

▲ 陶希圣将殷海光拉入国民党阵营做蒋介石的打手，后又成为蒋氏父子迫害殷海光和《自由中国》人士的急先锋。

▲ 殷海光英年早逝，其反蒋、反独裁事业便由其弟子李敖继承下来。

▲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对《自由中国》虽然期期必看，心里却又怕又恨。

▲ 早期的《自由中国》与蒋氏父子矛盾不大。这是1952年12月殷海光(后排右二)与《自由中国》全体人员欢迎胡适(中排右五)回台的合影。

社論

論國民黨徹底改造運動

殷海光

▶ 蒋介石借“改造”为名排斥党内异己，殷海光公开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撰文批评。

▲ 殷海光的思想和理论对青年的影响太大，蒋氏父子下令将殷海光赶出台湾大学。这是殷海光被迫写给台大校长钱思亮的亲笔信。

社論

設防底基礎在人心

▲ 殷海光为国民党《中央日报》写的这篇社论，因有“政治垃圾”几个字，使蒋介石大为恼火，并要陶希圣解除殷海光的“主笔”职务。

▲ 胡虚一(右)因帮殷海光识破了蒋介石特务机关陷害的阴谋，被国民党关押七年之久。李敖很赞赏这位“义人”的骨气，特地拉他合影。

▶ 殷海光在台湾反蒋、反国民党，旨在追求自由、平等与社会正义。在他逝世三十周年时，纪念他的学术研讨会就以“自由、平等、社会正义”为主题。

汪幸福 生于1954年2月，湖北黄冈市人，现在某机关工作，业余作家。主要著作有长篇传记文学《我在港台三十年》（与陶耀华先生合作），长篇小说《浪迹台湾岛》，长篇纪实文学《台湾九大案纪实》、《林氏三兄弟》、《林家大湾轶事》、《天笑——林彪引出的故事》。除此之外，还在大陆、香港、台湾的报刊上发表了300多篇散文、杂文、报告文学。

目录

引　子 …… 1
1. 武汉念中学阶段：
　　经常攻击蒋介石 …… 3
2. 西南联大时期：
　　非常敬佩蒋介石 …… 13
3. 做编辑闲得无事：
　　撰文歌颂蒋介石 …… 25
4. 陶希圣引殷见蒋：
　　殷海光看破蒋介石 …… 39
5. 全国局势一片混乱：
　　殷海光抨击国民党 …… 51
6. 殷海光为报社写社论：
　　蒋介石当面训斥 …… 59
7. 国民党士大夫悲观：
　　殷海光撰文打气 …… 68
8. 蒋介石被迫"引退"：
　　蒋经国要殷海光去台 …… 77

目录

9. 殷海光写“设防”社论：
蒋介石破口大骂 …… 83
10. 蒋介石改造党组织：
殷海光撰文评论 …… 91
11. 殷海光名声大噪：
蒋介石极力拉拢 …… 102
12. 蒋控制各级学校：
殷海光奋起反对 …… 109
13. 国民党选举失败：
殷海光批评蒋介石 …… 122
14. 台北发生反美大事件：
殷海光公开抨击蒋介石
…… 128
15. 蒋制“反攻大陆”政策：
殷海光斗胆砸招牌 …… 143
16. 殷海光抨击台湾风气：
蒋介石大为恼火 …… 171

目录

17. 蒋介石想挖殷海光：
殷海光识其奸心 …… 183
18. 蒋介石强行三连任：
殷海光公开反对 …… 189
19. 南韩李承晚下台：
殷警告蒋不要贪权 …… 210
20. 雷震建党遇蒋阻拦：
殷海光支持雷震 …… 221
21. 雷震被蒋逮捕：
殷海光大力援救 …… 237
22. 蒋欲将殷海光排除：
同仁坚决予以抵制 …… 250
23. 雷震案落幕：
蒋介石指示抓殷海光
…… 260
24. 殷海光饭前大骂蒋：
天长日久身受损 …… 272

目录

25. 蒋搞谎责费正清运动：
殷海光拒不参与 …… 285
26. 殷海光申请离台：
蒋介石下令阻止 …… 297
27. 逝前剖析国民党：
骂蒋文字留千古 …… 307

引　子

1919年出生在湖北黄冈的殷海光，是1949年以后台湾的一位重要思想家、政论家，是与胡适齐名的“自由主义”大师。他短暂的一生，与蒋介石的恩怨、冲突，甚富传奇，又鲜为人知。

青年时代，他被国民党拉住，成为一个狂热的反共打手，是国民党宣传阵营中，最年轻的“反共理论家”，并因此受到蒋介石的喜爱和召见。

40年代末，逃往台湾的高级知识分子人数虽然不少，但没有哪一个像他那样，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维护岛上大众的利益，毅然脱离国民党，放弃特权和优厚待遇，去作一个民间杂志的主笔和普通的大学教授。

蒋介石在岛上胡作非为时，台湾的政论家、作家为了自己的利益，都噤若寒蝉，不敢

发声抗争，只有斗士殷海光，毫不畏惧，敢字当头，公开在报刊上抨击蒋介石、国民党的施政纲领和违背民众利益的言行。

在台湾，蒋介石一言九鼎，说一不二。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不曾使他脸上无光，更难使他心里不舒服。唯有殷海光的文章，因拆穿了他的西洋镜，撕开了他的伪善面孔，使他的伪君子嘴脸暴露无遗。

五六十年代，蒋介石日夜梦想"反攻大陆"，并一再夸下海口说何年何月一定能够反攻成功。蒋介石还把这一不切实际的口号，作为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基本国策"，一天到晚挂在嘴上呼喊，还将"反攻大陆"作为一块维持其独裁统治的招牌，欺骗、愚弄台湾人民。对蒋介石举得很高很高，又象征着国民党"希望"的这块"招牌"，台湾所有知识分子都不敢去碰它，只有殷海光用他那如椽之笔，斗胆砸了蒋介石的这块"招牌"，使蒋介石万分恼火。

蒋介石在台湾复职并连任一届"总统"后，贪权恋位，不愿下台，千方百计谋求三连任，国民党的大小官僚明知蒋介石此举违"法"，却仍然拥蒋连任，大多数文人也因怕得罪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不敢起来反对。殷海光却不怕，他一次又一次地在岛上公开撰文反对蒋介石违"法"三连任，蒋氏父子对他恨得咬牙切齿。

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年代里，殷海光高举民主、科学的两面大旗，长期从事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使他成为岛上最负盛名的民主斗士、抗暴旗手、驱黑"英雄"、启蒙大师。

殷海光的言论、行动，深深触犯了蒋家利益，因而为国民党所不容。蒋氏父子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并动用党、政、军、特，采取各种卑鄙手段，对殷海光进行残酷的迫害，直至将他困死在台湾。

文人殷海光与独裁者蒋介石展开的一场又一场斗争，一次又一次的较量，曲折传奇，精彩纷呈……

武汉念中学阶段：经常攻击蒋介石

1930年，殷海光有11岁了。这年8月，殷海光的伯父殷子衡从武汉回到黄冈上巴河探亲。殷子衡在老家期间，几次与弟弟殷子平谈到侄儿殷海光读书的问题。殷子平觉得，殷海光在家乡读完了小学，应该到武汉去继续念书，使他将来有个好前途。

殷子平把自己的想法对殷子衡讲了，得到殷子衡的赞同。他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小伢们，特别是农村的孩子将来要有个好出息，只有走读书之路。

当时，殷子衡住在武昌鼓架坡，主要从事

基督教的教会工作，事情不太多。

殷子平对殷子衡说："福生（殷海光原名叫殷福生）到武汉读书期间，就住在你那里，学杂费由我付，吃的粮食由我往你那里送。"

殷子衡说："我们系亲兄弟，分得那么清楚干什么呢？他住在我那里，我做伯父的照顾一下是应该的。他读书期间，吃住与我们在一起，你放心好了。"

1930年秋，殷海光在父亲殷子平的护送下，从团风镇乘船到汉口，然后过渡到武昌。

当时，离殷子衡家比较近的是武昌中学，这所中学有初中部、高中部，教学条件、师资力量都很不错。殷子平、殷子衡经过商量后，决定送殷海光上武昌中学。

殷海光从乡下一下子来到省城的中学，思想、眼界大开。

殷子衡系辛亥革命志士，武昌起义前，他被反动的清政府抓进监狱，并受尽各种酷刑。辛亥革命后，他见一些革命党人各怀私心，且争权夺利，对政治心灰意冷，信了基督教。

尽管他不再从事政治活动，但仍是一个有正义感、有是非观的人，仍十分关注国家大事。他经常向子女及殷海光讲述帝国主义侵华罪恶，清政府的腐败以及日知会的战友们当年从事反帝反封建活动的惊险故事，讲他在清政府狱中如何受苦受难的经历。有时，他讲得泪流满面。

殷子衡不仅是一位革命志士，而且还是一位学问家。他的口才、文章、书法，在武汉、黄冈甚有名气。因此，此时的殷子衡，在少年殷海光眼中，既是一位慈祥、可亲可敬的长者，又是一位伟大的英雄。可以说，他小时对伯父又崇敬、又佩服。

殷海光入武昌中学头年，因军政当局和学校害怕学生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对学生管束十分严格，学生们在校长、教师的督促下，也将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因此，1930年的整个学年中，学校风平浪静。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武昌中学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1931 年 9 月 18 日夜 10 时 20 分，驻在沈阳的日军经过精心策划，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炸毁，并反诬是中国人所为。然后，日军用猛烈的炮火轰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

事发后，因蒋介石一再电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北大营的营房。

19 日，日军继续扩大战争，马不停蹄，一鼓作气地侵占了东北重镇沈阳。

21 日，日军几乎占领辽宁、吉林两省。

日军在东北的侵略行径，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正在南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南京地区万余名大中学生包围了国民党四中全会会场，要求蒋介石政府立即下令军队抗击日寇，收复失地，并给主动抗日的军队予以支持。

学生爱国运动迅即蔓延全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武汉、上海、杭州、广州等大城市的大中学生陆续赶到南京，与南京的大中学生一道，共同发起了“送蒋介石北上抗日”的运动。

11 月 26 日，学生们又自发组织起来，到南京国民政府所在地，强烈要求蒋介石签署出兵日期，并在国民政府大门口挂起一座大钟，名为“警钟”，由学生们轮番敲打。大家一致表示，蒋介石不答应具体的出兵日期，誓死不离开国民政府大门口。

这一天，天下着雨，气温变低，要求政府出兵抗日的学生在凄风冷雨中站立一天一夜，冻病 20 余人。

27 日早上 8 点，在全国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出来见学生。他见门口难以计数的学生愤怒地盯着他，勉强地答应三天以后宣布出兵抗日。学生们怕他谈话变卦，递纸要他签字，他不签，然后借口逃脱了。

三天过后，蒋介石并未宣布出兵，他的流氓嘴脸，暴露无遗。

蒋介石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北京、广州、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的工人、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强烈要求蒋介石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

武昌中学，特别是高中部的同学和那些青年教师常常停课，与武汉大学、中华大学等学校的师生上街游行，使小小的殷海光受到鼓舞。他年纪虽然还小，但觉得高中部的那些哥哥、姐姐们的爱国行为是正确的。有一次放学回家时，他也跟在那些大同学后面游行、呼口号。

但是，学校有的负责人不主张同学们上街。其原因是湖北省教育当局奉命向学校打招呼说，为不影响社会治安，尽量不要学生们上街。学校当局的另一个理由是，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国家的事情由政府管，用不着学生操心。

有一天吃晚饭时，殷海光将学校的情况对伯父殷子衡讲了，并问同学们上街对不对，殷子衡对殷海光说："这一段时间，我天天看报纸。南京的那些学生，还有你们学校的那些大同学的行动很了不起，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个卖国政府！蒋介石不是个东西，也可说是个卖国贼！外国侵略者打进了中国，他不主动派军队抵抗，还要学生、工人向他要求、请愿出兵抗日，太不像话！一个政府，对外不能抵抗侵略，对内不能安民，这个政府就是无能，不应该存在。这次不把日本侵略者打出去，将后患无穷，侵略者还会扩大侵略，中国人民将长期受日本人的蹂躏。"

殷海光连连点头。他感到伯父对时事的分析非常深刻，听了很受鼓舞。

吃完了饭，殷子衡对殷海光说："国家一亡，一切都完了，书读得再好，也没有用。你现在虽然只有十几岁，也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不要一味读死书。"

殷子衡的一番话，给殷海光留下极深的印象。

此后，殷海光经常在同学们中骂蒋介石是“卖国贼”。殷海光所在班上，有20多个学生是达官贵人的子弟，他们受父母的影响，认为蒋介石是个“英雄”，殷海光一骂蒋介石，他们不服，围着殷海光辩论，殷海光就用殷子衡讲的话与他们对辩，毫不示弱。

有一次，常与他对辩的一个同学向老师告殷海光的状，说殷海光经常在学生中攻击蒋介石，老师得知后，特地找殷海光谈话说：“蒋先生系一国之君，全国人民很爱戴、尊敬他，你怎么随意攻击、谩骂国家元首呢？以后要注意一点。”

老师这一说，殷海光就知道是同学告的状。面对老师，他没有作声，但在心里，他仍不服。

据殷海光少年时代的一个姓杜的朋友讲，殷海光常与班上同学辩论蒋介石是“英雄”还是“卖国贼”的问题。有时，在学校未辩完，放了学就在路上辩，路上未辩完就带到家里辩。有几次，辩论激烈了，发展到与对方互骂、互打，最后由其伯父、伯母出面制止才了结。

1934年秋的一天，是个星期天，一位国民党高级军官来到了殷家。这位军官刚在庐山参加完第三期“军官训练团”下来，此次路过武汉，专程来看殷子衡。闲谈中，这位军官与殷子衡谈起了抗日问题，殷子衡问他蒋介石政府对抗日有什么新政策，这位军官说没有。

这位军官还说，他们这次到庐山受训，主要是研讨“剿共”的问题。蒋介石在庐山给他们讲过话，说日本的军事装备，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先进、充足，中国一点也没有抗日的条件，日本人只要一个号令，三天之内便可把中国的主要地区全部占领，并灭亡中国，目前无法抗日。

殷子衡听了非常气愤地说：“蒋介石作为国家首脑，怎么在会上这样讲话呢？照他这样说，中国人民只有当亡国奴了。日本侵略

者如此猖狂地侵略、杀害中国人民，东三省已被占领三四年了，蒋介石不去组织全国人民抗日，却办训练团'剿共'，蒋先生这样搞下去，就是前头追麻雀，后头丢母鸡，民心失尽。人民不拥护他，国民政府也不会长久的。"

这位军官说："依我看，蒋介石是瓜子壳喂马——不是好料。他私心很重，对国事的考虑，也从私利出发。他不抗日，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他是留日学生，对日本有感情，今后还要日本人支持他。1927 年秋，他跑到日本去寻求日本人的支持，在日本人面前低三下四，摇尾乞怜。济南惨案，日本人杀害 6 000 多名中国人，他打着北伐的旗号，眼睁睁地望着日本人杀中国同胞，不打日本人，带兵绕道而行，这哪有中国人的气味？现在日本人占领东三省这几年，他不带领中国人民抗日不说，还说这些混账话。第二，害怕共产党发展壮大后，推翻了他和他的国民党政府。所以，他这么积极'剿共'。蒋先生就没有想一想，你的政策错了，不得人心，老百姓不支持你，你'剿共'剿得再厉害，战争也会失败的。"

两位大人对话时，坐在旁边的殷海光听入了神。他伯父的话音一落，殷海光就插话说："蒋介石不抗日，老百姓可起来抗嘛。"

殷子衡连忙用眼神示意他不要插嘴。

那位军官听了殷海光的插话，指着殷海光问：

"这是……"

"我的侄儿。"

"听他说话，像个挺爱国的样子。"

"他还只有 15 岁，好多事情还不懂。"

殷海光听了，马上说："我懂，我懂！"

1935 年 5 月底，又发生了华北事变。

5 月 29 日，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借口中方支持、援助抗日的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又借口天津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是中国政府

组织的反日排日行为，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了各种无理要求，并由东北调遣大军开入关内，日军的一些重要将领也在天津开会，扬言如不接受日方的要求，就要采取“自由行动”。

何应钦将日方的要求电告了蒋介石，蒋介石此时一心“剿共”，无心抗日，电令何应钦与日方谈判，委屈求和。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意见，与日方秘密协商。7月6日，何应钦致函日天津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答应日方提出的五项要求，这就是引起全国人民愤怒的“何梅协定”。

在这之前的6月25日，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签订了出卖察哈尔人民利益的“秦土协定”。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一再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为了救亡图存，1935年12月9日，北京地区的6 000多名学生聚集起来，冲破国民党的阻挠，汇合到新华门前，向何应钦请愿，并提出公开中日之间的交涉经过等六项要求，何应钦不理，学生们就猛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要求蒋介石政府抗日”的口号。

随后，学生们不顾军警们的阻拦，冲到西长安街和东长安街游行、演讲，呼抗日口号，并与军警发生搏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迅速传到全国各地，杭州、天津、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学生立即行动起来，开展抗日图存的爱国民主运动。

12月20日，武汉三镇的54所大中专学校计1.5万余学生也行动起来。他们齐集在武昌国民党湖北省政府门口示威，然后向汉阳门方向游行，并沿途呼喊“抗日救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强烈要求蒋介石政府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

正当学生们准备渡江过汉口去游行示威时，湖北省政府建设

厅下令封锁渡口，轮渡停驶。学生们见状，非常愤怒，当即冲进建设厅，逼建设厅负责人下令恢复轮渡，并发誓不恢复轮渡，决不回校。

此时，天气很冷。爱国学生们忍饥挨冻，在建设厅门口和马路上露宿了一夜。

这时，殷海光正在念高三。20日的活动，他因有事没有参加。21日吃完早饭，他赶到学校听说参加示威的同学们昨夜未回，现在还在省建设厅静坐，急忙邀上几个同学参加到游行示威的行列中去。

游行示威的学生见省建设厅的负责人不敢下令恢复轮渡，感到问题的症结还在湖北省政府，于是又冲到省政府门口，要进入省政府院内，遭到门前站岗的军警的阻拦，学生们一怒之下，砸了军警的岗亭，并冲向省政府院内。

省政府的官员怕学生们进去闹，难以收场，只好答应22日恢复轮渡。

殷海光的个头小，不是里面的骨干，可呼喊的声音还很大，拳头也举得较高。发生在武汉的这一爱国学生运动，他毕竟参加了。此事表明，武汉学生时代的殷海光，是一个积极参加抗日爱国活动的热血青年。

22日，在武昌的武汉大学、中华大学、武昌中学等19校的3 500名师生渡江，到汉口举行抗日游行活动，殷海光参加了这一天的活动。

23日，武昌21所大中学的一万多名学生及部分青年教师又渡江到汉口，与汉口、汉阳9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汇合，然后一起沿江汉路、中山大道游行到孙中山的塑像前，举行抗日大会。殷海光又参加了这一次的活动。

当他看到同学们演讲、呼喊，又看到围观的群众泪流满面时，思想触动很大，心里对蒋介石涌起一股愤慨之情。他心里暗骂道："他娘的，当一国之君的思想觉悟还不如普通百姓，还要老百姓推

动他抗日！”

晚上，他回到家时，父亲殷子平问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他告诉父亲到汉口那边参加抗日游行示威去了。他父亲听后，赞扬他说：“蒋介石不抗日，学生们游行示威要求他抗日，说明学生的思想觉悟比他高，你们做得对！”

殷海光在高中时代，参加过反蒋抗日游行示威活动，是殷海光青少年时代的一位同学、朋友对笔者讲述的。不知何因，殷海光从不对人讲这段经历。他后来在台湾向学生陈平景口述在大陆的生平事迹时，也未谈过此事，这其中必有原因。

笔者仔细分析了他的思想后，认为殷海光不对人讲这件事，可能是他后来感到“一二·九”运动与共产党有关，提起来不好讲。不然，他不会隐瞒的。

大约在 1935 年的一天，殷海光放学回家，他的伯父殷子衡对他说：“福生，你没有事做，可练练大字嘛，你的毛笔字写得不好，要下点功夫。俗话说，不要千样会，只要一样精。字是一个人的牌面，忽视不得。”

他伯父说这话时，语气很重，而且又沉着脸，殷海光只好回到自己的房间练字。他磨好墨，展开纸，写了“打倒军阀、卖国贼蒋介石”几个大字。

他一写完，住在离他家很近的一位姓杜的朋友来了。姓杜的朋友看了他写的大字，大吃一惊，问道：“你写这种东西，不怕出问题吗？”

殷海光说：“不怕。他这个家伙只知道争权夺利，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也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我们恨死他了。蒋介石不打倒，国家领土就不完整，人民不能安宁。”

“你这是共产党的言论呀！”

“我不管他什么党，谁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我就拥护谁。”

90 年代初，笔者访问了殷海光青少年时代的这位姓杜的朋

友，与他谈到中学时期的殷海光的思想时，他说：

> 那时，我看他的思想很“左”，一与他谈起话来，他就扯到蒋介石身上，好像国家的一切，包括社会所有不好的东西，都是蒋介石造成的。我在家里多次对我父亲及舅父谈到殷海光痛恨蒋介石的事情，我父亲说，福生的思想肯定是受他伯父的影响，这个伢读书还不错，将来有可能要参加共产党。我的父亲与殷子衡既是老乡，又是朋友。非常担心殷海光出问题，多次嘱咐我说：“社会复杂得很，学校的人也不是很纯，你经常跟他在一起玩，要他不要在公共场合乱讲，以免出问题。”我根据父亲的意见，对他讲过多次，但他这个人胆子很大，天不怕，地不怕，仍然在同学、朋友中大骂蒋介石。

他的思想和观点，学校当局和老师都知道，可能是他还未成年的缘故，也没有人去追究他。他后来在台湾写的《我为什么反共》一文中，谈到他在武昌中学阶段是反共的，这与实际情况不符。

2

西南联大时期：非常敬佩蒋介石

殷海光在武汉读高中时，与我国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取得了联系，在金岳霖的帮助下，殷海光到北京求学。

在北京期间，他所接触的人，多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那时，北京地区许多高校的学生拥护、同情中国共产党，知名知识分子中，也有一些拥护国民党、蒋介石的。

殷海光交往较多的几个知名教授，特别是对他有所帮助的专家学者，在政治上一度拥护、支持蒋介石，反对共产党。

有一次，殷海光在某教授家里吃饭，谈到

东北沦陷、国共内战的问题时，他猛烈抨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由于蒋介石长时间对日本人不抵抗，致使祖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殷海光还说："如果'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政府组织东北军民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不指望'国联'调停，东北今天的局面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这位教授听了，摇头说："你说的太片面。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面，不知其里。蒋介石身为政府首脑，有他的难处。他考虑事情，要全面、通盘，不能简单从事。中国是个大国，内部不统一，军令、政令不一，怎么去抗日呢？日本人是那么好打的？这样一场战争，要有一个准备过程。没有准备的仗，是打不胜的。你们年轻，很多事情没有搞清，就随着别人人云亦云。容易激动或感情用事，是青年人的大病，也是通病。对国家大事，不要随意评说。希望你多看报道，多作思考，多听其他教授们的意见。"

"蒋介石卖国，这是铁的事实呀！"

这位教授摇头道："不能这样说。据我所知，蒋先生上任以来，虽然因力量太弱未守住东北，却未向外国割让一寸土地，这怎么能说是卖国呢？他未当政之前，国内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内战不断。他上台后，军阀一个个地被他消灭，国家统一了。这对国家、民族是一个不小的贡献。"

殷海光又问："你对西安事变怎么看？"

"这当然是张学良、杨虎城错了。他们是下级，怎么可以犯上作乱，扣留、关押领袖呢？"

这位教授还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说得一塌胡涂。

当时，与殷海光接近的几位学者，除著名哲学家熊十力先生外，他们大多持此种看法。年轻的殷海光由于对国家上层内幕了解不多，对蒋介石、共产党及其红军知之甚少。加之知识不够，没有足够的事实、理由去反驳那些他很崇敬的专家、学者。

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殷海光在几位专家、学者的影响下，反

蒋、恨蒋的思想渐渐发生了变化。他对伯父殷子衡以前讲的一些反对蒋介石的言论，也渐渐忘了。

此时，殷海光还只有十七八岁，可塑性很大，在别人的影响下，思想容易发生变化，也不足为奇。

1937 年 7 月 7 日下午，驻丰台附近的一个日军中队，在卢沟桥以北一公里的龙王庙一带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时，蓄意向中国驻军挑衅。晚 23 时，日军诡称因听到宛平县城方向发射的枪弹声，使部队发生混乱，在纷乱中一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县城搜索，遭到中方拒绝。后经双方协商，决定各派出代表一同前往宛平城内调查。

双方代表正在宛平城协商此事时，8 日早晨 5 时，日军突然向守卫在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起攻击，中国驻军在第一一〇旅长何基沣、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的指挥下，拼死抵抗，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

“七·七”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卢沟桥事变，是蒋介石集团长期推行投降、卖国政策的结果。

到这时，蒋介石才感到，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发动的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已对以他为首的四大家族在中国的统治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七·七”事变的那一段时间，殷海光除常与金岳霖等教授谈论时局外，还天天去找报纸看，他想通过报纸了解华北局势，也想看看南京蒋介石政府对日政策有无变化或有什么大动作。

7 月 17 日，蒋介石在江西庐山举行全国各界人士谈话会。会上，蒋介石发表了谈话，对卢沟桥事变，蒋介石提出了四项要求：其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其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改变；其三，南京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其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在地区，不得受任何约束。

蒋介石说：“至于战端既开之后，则因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

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的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的最后胜利。”

蒋介石还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之决心。”

蒋介石作了上述表示的同时，又说：“准备应战，但不求战，在和平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和平解决。”

蒋介石的这个谈话，很快被全国各报刊刊登。殷海光在天津的《大公报》上看到了这一谈话，而且连看了几遍。他觉得，蒋介石的这个谈话比较硬，像个大国之君的样子。

他不知，蒋介石此次能发表这个讲话，是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内一些有正义感的高级将领们逼得他没有退路，才表态抗战的，其骨子里并不想抗日。

1937 年 7 月底，殷海光随其他人一道逃离北京回到湖北，住在鄂城姐姐殷启慧家。殷启慧的家在鄂城乡下，但离县城很近。他虽然不在大都市了，对抗战形势却十分关注，时常进城去买报纸看。

12 月底的一天，他又到街上去找报纸看，发现 12 月 17 日的《大公报》第二版头条有蒋介石的《告国民书》，立即买了一张。

蒋介石在《告国民书》中说了两大问题：一、此次抗战，为国民革命过程中必经之途径；二、既明抗战到底为本务，则目前形势无论如何转变，唯有向前迈进，事无中途屈服之理。

蒋介石还说：“中国持久战，……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国之民心。……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 4 千万里之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致敌于死命，……最后胜利必属于我。”①

---

① 1937 年 12 月 17 日《大公报》。

殷海光看了这个《告国民书》，心里十分激动，他称赞蒋介石这个《告国民书》写得好，认为中国抗战有希望了。他的姐夫是个知识分子，姐姐也识字。他对姐夫说："中国抗战，有蒋委员长领导，必胜无疑。通过这个《告国民书》，可以看出蒋委员长已认识到，要争取抗战的胜利，必须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有钱出钱，无钱出力。"

他的姐夫是国民党员，思想与他一样，自然同意他的看法。

有趣的是，殷海光还把蒋介石的《告国民书》贴在姐姐家堂屋的墙壁上，每来一个客人，便把蒋介石的《告国民书》讲给别人听。只是，平民百姓对蒋介石的言论不感兴趣。

1938 年 1 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合并而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又从湖南长沙西迁昆明，称西南联大学。

这一年 3 月，著名哲学家、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金岳霖写信给殷海光，叫他到昆明去报考西南联大哲学系。殷海光接到金岳霖的信后，喜出望外，立即赶往昆明。

路上，他节衣缩食，吃尽苦头。

一个月后，他到达昆明，住在流亡学生团，准备大学考试。

1938 年秋，殷海光考入西南联大哲学心理系哲学组。当时，西南联大哲学心理系的教师队伍阵容相当强大，名家甚多。教哲学史、伦理学的有冯友兰、任继愈；教逻辑学的有金岳霖、王宪钧、张荫麟、任华等；教哲学概论、西洋哲学史的有贺麟、冯文潜、郑昕、石峻等；教印度哲学史的有汤用彤；教形而上学的有沈有鼎。

哲学心理系的师资虽然一流，他们的思想却很复杂，支持各种党派的人都有，他们的思想对学生有相当大的影响。

1938 年 9 月，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及三青团西南联大分团筹备处成立，由姚从吾任筹备处主任。不久，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正式建立，联大区党部书记长由姚从吾担任，三青团分团主任由教育学系主任陈雪屏担任。

党团办公室设在联大师范学院，有专人办公。三青团在联大新

校舍还布置了以蒋介石名字命名的“中正室”，专门陈列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中央周刊》、《文艺先锋》等数十种反共报刊。“中正室”每天中午对学生开放，有时去的人太少，三青团便派人员到各院系去动员学生到该室阅读反共报刊。

除此之外，三青团还在“民主墙”办了《青年》壁报，组织了右派群众团体“明社”，明社的壁报有《明报》、《青年》。《青年》、《明报》刊登的文章，常与左派学生团体群社的壁报《群声》、《腊月》针锋相对。

那时，中国共产党虽然也在学校建立了组织，却从未公开。他们的活动，便通过学校的群众团体——群社去组织。

群社虽是群众团体，因人员精干，组织周密，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国共两党在该校建立了组织，党派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教师、师生、学生之间，经常就两党的方针、政策展开辩论。

西南联大南端校门东侧一带有个围墙，围墙的内侧，原来是张贴各种启事、海报的公告栏，由于该地比较集中，来来往往的人较多，左右两派的学生经常在此张贴相互攻击、辩论的文章、标语，学校师生便叫这座墙为“民主墙”。

殷海光虽然不是三青团员，也不是国民党员，却是西南联大右派学生中的代表人物。他除积极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组织的活动外，经常与左派学生展开辩论，还在民主墙上写歌颂蒋介石的文章。三青团的“中正室”，他每两天就要去一次。对那些颂扬蒋介石的文章，他看得既认真，又仔细，少数段落，他还能背下来。

有一次，他到校图书馆翻阅旧报纸，发现 1937 年 5 月 4 日的《大公报》第一版的左上角，刊登了上海文化编译馆的一则《蒋介石全集》出版的广告，广告上有 4 句标语：新中国巨人的巨著！千百万民众的读物！篇篇都是活的史料！处处可作公民课本！

广告的正文是：

蒋介石先生是新中国的最高领袖，同时是现世界的一个伟大政治家。我们崇仰领袖，我们就得了解领袖的伟大人格。而蒋先生人格的直接表现，莫过于他自己的弘论懿行。蒋先生以多方面的成就随时随地都曾发表过宝贵的意见，但求不易，至今还找不到一部比较完备的集子，这实在是一件憾事。兹由吾党先进贝华先生主持之文化编译馆，穷经年之力，广事搜集，把蒋先生自投身黄埔军校以至最近之言论文章，网罗几遍，取经用宏，汇为大观，分为党义、政治、教育、修养、军事、新生活运动、文艺杂著等篇，一百余事言，卷首并刊与蒋介石自述及略传各一篇，铜版手迹多幅，并由于右任先生题眉。在编制上更新颖活泼，每篇冠以提要，既便阅读，亦裨翻检，印刷装订，力求清新美观。凡我国民，均人手一篇，党政学校机关，更不能不备！①

这则广告，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一位文章高手所拟，虽全是骗人的假话、空话，却写得颇为动人，也很有吸引力。尤其是对那些不知国民党上层内幕及蒋介石底细的人，对那些涉泄不深的青年学生，诱惑力就更大。

殷海光看了这则广告，十分激动。他心想：以前未看到这个广告，也不知文化编译馆出版了《蒋介石全集》，要想办法去借一套看看。

第二天，他跑到金岳霖、沈有鼎老师那里去借，他们都说没有此书。他又去学校图书馆打听是否有《蒋介石全集》，图书馆的一职员告知说有，他当即借了一套。

---

① 1937年5月4日《大公报》。

《蒋介石全集》分上、下两册，共1 300页。殷海光利用空余，极其认真地阅读。他不知蒋介石是个言行不一、表里不同的阴险政客、政治流氓，光凭书上的字句，感到蒋介石很了不起。所以，他越读《蒋介石全集》，对蒋介石越崇拜，越觉得蒋是"英雄"，越觉得蒋介石"伟大"。

他还觉得，他读《蒋介石全集》后，对蒋介石的生平、思想、"业绩"了解得更多了，以后与那些左派学生辩论时，反击他们也会更加有力。

西南联大附近的文林街有一家新式茶馆，既卖茶又卖咖啡，老板是个有文化的人，茶馆十分整洁卫生。每天下午4点之后，到图书馆去找不到位子借不到书的学生，尤其是文学院的那些学生，就到此茶馆看书、喝茶、闲聊。

有一天，殷海光从"广发茶社"出来，见相熟的几个同学在新式茶馆里面看书，便进去了。他走过去一看，发现同班一个同学正在看哲学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他跑拢去接过书，然后往地上一扔，并对他说："你是大学生了，怎么还看这些浅显低劣的东西？"

对方不服，反问道："不看这，看什么呢？"

殷海光说："你去看看《蒋介石全集》，那里面的文章，博大精深，很值得读。"

对方一听说叫他读蒋介石的书，马上火了，批评殷海光说："萝卜白菜，各人所爱。你喜欢他的书，你去读嘛，不要强加于人。我喜欢艾思奇写的文章和著作，你不要干涉我！"

殷海光见对方发了火，便不作声了。

殷海光除自己读了《蒋介石全集》外，还动员了一些右派同学去读蒋介石的书。

大约在1939年秋的一天，殷海光与另一个同学到联大工学院去玩。工学院在昆明城东的拓东路，离联大校本部有四五公里。此时，西南联大的工学院的右派学生办了一个壁报《熔炉》，极力主张

“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该壁报的一篇文章还说：如果中国不能做到这“四个一”，就不成其为国家，对抗战事业必将造成损害。蒋介石先生应使用一切手段，使国家达到“四个一”。

殷海光看到这个壁报，拍手叫好。

当时，土木工程学系的一个左派学生见殷海光为这篇文章叫好，心里不服，走到他面前问道：

“你说这个壁报好，好在哪里？”

“有了这‘四个一’，国家就能达到真正团结，能真正一致对外！”

“你们鼓吹的‘四个一’，实际是鼓励、歌颂个人独裁。它不但对抗战无益，而且害处很大。”

殷海光说：“以蒋委员长为首的国民党一心为国，并强有力地领导着全国的抗战，这怎么能说是个人独裁呢？”

站在一旁的中文系的一个学生反驳他说：“从 1927 年 4 月 12 日起，蒋介石就不是一个爱国家、爱人民的人。他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实际是一个家族政府，与历史上的封建王朝没有什么区别。”

“明明是国民政府，怎么是家族政府呢？”

“你看，”中文系的学生反驳道，“他是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党权、军权都被他掌着；他太太的姐夫孔祥熙为行政院长，掌着行政大权；他太太的哥哥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国银行董事长，国家的钱财都控制在他的手里。蒋介石和他的亲戚通过控制的党、政、军、财权，为所欲为，这不是家族式的独裁政府是什么？他和他的亲戚掌握、控制国家大权后，便千方百计地维护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1928 年 4 月初，日本人在济南屠杀无辜平民 6 000 人，他视而不见，带兵绕道而行；1930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他不积极抵抗，致使上海失守；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不要东北军民抗日，导致东三省沦陷，无数东

北同胞惨遭日军屠杀。他作为国家总负责人，看到自己的国土一省省地被外国侵占，不去收回，却一天到晚叫喊'攘外必先安内'。外国侵略者不打，对自己的同胞大肆屠杀，这叫爱国爱民么？"

殷海光说："国家不统一，没有准备好，力量不集中，无法打败日本人。蒋委员长制定这一政策，是迫不得已。"

殷海光的说法，难以说服在场的左派学生。

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辩，互不相让，直到吃饭的时间到了，才各自离开。

1944年，中国抗战处在极关键、严峻的时刻。日本侵略者为解救困在东南亚及缅甸边境的军队，急需打通从中国到越南的交通线，故集中大批兵力，在河南、湖南、广西、贵州一线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贵阳、昆明受到威胁。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他大力加强缅甸萨尔温江一线的军事力量，并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罗斯福还在电文中威胁说，如果中国方面贻误此次战机，一切责任由蒋介石承担，美方以后也将断绝蒋介石政府的一切援助。

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决定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从军运动，大量招兵，并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金"的宣传口号。这样，10万青年从军活动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

重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为完成蒋介石交给的征兵任务，一再向西南联大发电催促，要求联大尽快在大学生中进行第三次征兵。

联大为完成任务，决定再次召开全校动员大会，请几位名教授，如钱端升、冯友兰、闻一多、周炳琳等人在会上作动员讲话。

1944年12月8日，西南联大的200多名学生应征入伍，并编入国民党青年军二〇七师炮一营。

本来，学校是号召大学生，特别是应届毕业生入伍，殷海光被蒋介石的号召所感动，加之他的爱国热情及冯友兰不同意他留校任教等原因，便报名应征，成为此次入伍的第一个研究生。

1945年1月，殷海光随部队进入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密支那附近的兰伽军营，学习汽车驾驶技术。

二〇七师一营，虽是国民党军队，因学生都是抱着抗日救国的愿望应征的，因此，此次入伍的200多名新兵中，左派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由于政治上的分歧较大，两派学生常在军营中发生激烈的论战。

其中，蒋介石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是他们论战的一个重要内容。殷海光是研究生，年龄比他们大，读蒋介石的文章和著作也最多，对蒋介石也最崇拜。

有一天休息，殷海光与左派士兵发生论战，左派士兵说蒋介石抗日不是出自内心，是被迫的。如果不是西安事变，不是共产党一再呼吁，人民一再要求，他直到今天也不会抗战。他心中真正的敌人不是日本人，是自己国内的共产党及其八路军、新四军，他的国家、民族观念，连一般老百姓也不如。

殷海光听了不服，反驳说："日本经济发达，军队装备精良，中国军队根本无法抗击。蒋委员长是个很英明的军事统帅，考虑问题站得高，看得远，不到时候，他当然不会轻易宣布抗战，不存在被迫不被迫的问题。中国现在的形势，对蒋委员长来说，是痨病人生恶疮，内忧外患一齐来。你们这些人不懂军事，也不知委员长的难处，一天到晚瞎胡说。"

一左派士兵听了殷海光的言论，很生气，驳斥他说："国家遭受外国人的侵略，就是国难。御敌安民，是国家领导人之责。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蒋介石作为一国之君，理应抛弃一切私心杂念，领导全国军民，把侵略者赶出去，以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可蒋介石不是这样，他是保权位第一，保家族之利第一。'九·一八'事变后，他还不出兵抵抗，导致全国大中学生云集南京总统府举行大规模的请愿，全国各大城市的工人举行游行示威，要求蒋介石政府出兵收复失地。可蒋介石不闻不问，仍在凶狠地倾全国的军力、物力、

财力围剿共产党及其红军，国民党内的一些爱国军官实在难以忍受，才发动西安事变，将他扣压起来，逼他抗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同意联合全国各党派抗日，才有庐山谈话以及《告国民书》的发表，这不是被迫的吗？西安事变之前不能抗日，之后就可以抗日，有这样的站得高，看得远吗？这是什么英明？”

殷海光不同意这位左派士兵的说法。他认为，全国学生在南京请愿也好，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也好，都是共产党在背后策动的，学生及张、杨两将军被共产党利用了。

左派士兵们见殷海光睁着眼不认输，非常气愤，骂他是“扭筋子”、“睁眼说瞎话”，是“蒋介石的小爪牙”。殷海光不服，骂他们是共产党的“小喽啰”。

结果，左派士兵要动手打他，他势单力薄，怕吃亏，只有逃跑。吃饭的时候到了，他不敢回到连队，只好在营长家里吃饭。幸好，营长要他教英文，他在营长家里吃饭，营长也不反感。不然，他在部队还要饿肚子。

无论左派士兵怎样攻击、讥笑他，他崇拜蒋介石的立场、观点，依然难以改变。

3

做编辑闲得无事：撰文歌颂蒋介石

1945年秋，殷海光从印度回到昆明。随后，他离开部队到重庆。

不久，他在重庆独立出版社任编辑。

那时，出版社出书不多，他便有时间作文著书。

此时，抗战刚结束，国共关系虽然还未破裂，磨擦却不断发生，国民党内的反共之声不绝于耳，反共内战政策，正紧锣密鼓地制定。

殷海光认为，中国的内乱，都是共产党造成的，抗战胜利，对蒋介石政府造成威胁的仍然是共产党。为了维护蒋介石政权，必须打败

共产党，而要战胜共产党，又必须让人们认识、了解共产党。

基于上述想法，他花很大的精力写了一篇长文《中国共产党的气象学》。此文根据国民党书报杂志上刊登的一些资料和一些反共要员提供的不太真实的材料，对共产党作了全面的分析、诋毁，对蒋介石有诸多赞扬。

《中国共产党的气象学》一文写好后，由殷海光的同乡、蒋介石侍从徐复观推荐到反共专家黄少谷主办的《扫荡报》。

据曾在《扫荡报》任职的原"国大代表"雷啸岑说，他收到殷海光的长篇理论文章《中国共产党的气象学》后，很认真地阅读了，并认为此文是一篇反共"力作"，建议发表，相信见报后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在雷啸岑的努力下，此文被采用，并分期连载。

这是殷海光步入社会后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文章发表后，真的在国民党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气象学》被连载，殷海光信心大增，接着又写了一本反共著作《光明前之黑暗》。此书于 1945 年 12 月由光明出版社出版，印数颇大。

殷海光的《光明前之黑暗》一书的内容，除了反共外，就是歌颂蒋介石，号召全国人民拥护蒋介石，并坚定地跟着蒋介石走。

他在谈到抗战胜利的原因时，颂扬蒋介石说：

> 我们也应该认识清楚，这个胜利不是轻易得到的。这个胜利，从我们自身着想，是委员长艰苦卓绝的领导和全国军民努力牺牲奋斗到底的结果……①

殷海光写的这段话，就不太真实客观了。"七·七"事变后，蒋

① 《殷海光全集》第 1 卷，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0 年版，第 125～126 页。

介石领导抗战，为抗战做了一些事情是事实，但那是被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军队内的一部分有正义感的军官，如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等用呼声、哭声，包括武力手段逼迫他干的。在八年抗战中，蒋介石指挥的正面战场，除打了很少的几个像样的仗外，多数部队遇到日军一退千里，溃不成军，哪里谈得上"艰苦"、"卓绝"呢？

在谈到蒋介石1927年背叛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大肆屠杀与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员时，殷海光极力为蒋介石辩护说：

> ……革命势力到达武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受第三国际代表鲍罗廷的指使，欲乘机将"国民革命转化为社会革命"，以武力夺取政权，赤化全中国。共党利用时机，组织工会农会，扩大声势，鲍罗廷心目中以委员长为政敌，欲除之而后快，他深恐，委员长攻取东南，声望益高，设法阻挠他的计划。委员长不顾，1927年2月，挥兵前进，鲍氏阻挠计未成，希望东下的革命失败，可是事实和他的希望相反，于是鲍氏转而组织上海工人来对抗委员长。酝酿所及，形成宁汉分裂，国民革命的整个阵营为之破坏，北伐大业几乎为之断送。
>
> 中华民族在这存亡绝续之交，国民革命的大业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委员长为了把中华民族的革命命运从第三国际的阴谋里挽救过来，为了把即将中断的革命大业继续完成，于是对于阴谋攘窃的共产党，断然予以清除，在中国国民革命的主流冲击之下，第三国际的阴谋不旋踵而冰消瓦解。
>
> 历史往往在事后才为一般人所了解。决断、刚胆、机智、沉着，才堪与匹敌，而且又拥有强大的实力。如果蒋委

员长除掉了，其余的人不足为虑。……这样一来，中国就是鲍氏一人之天下了。鲍氏是哪一国的人？所以，照现在看来，当时如果不是委员长实行清除共产党这一非常措施，那么我们中国早已在18年以前通过共产党之手而灭亡了。①

殷海光写的这一段材料不知从何处而来，如果不是从国民党的宣传品中找来的资料，那就是他在研究历史方面下的功夫不够。只要翻开当年北伐部队构成人员表就可以看出，几乎所有能打硬仗的部队，都是共产党的党代表起了关键作用，在基层连队，最能攻坚作战的也是共产党员。当年的国民党军官、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先生在《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也说："共产党员在北伐初期之宣传及组织民众工作的实效，有目共睹。"②

可以说，当年的北伐战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帮助、支持，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北伐胜利后，蒋介石认为中国统一了，共产党再没有利用的价值，又怕共产党发展、壮大后反对他的独裁统治，便勾结上海滩的地痞、流氓和恶势力，突然对共产党及工人组织骨干进行了大肆屠杀。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因蒋介石的叛变和"清党"而夭折。蒋介石此举，不仅使国家和共产党丧失了一大批极其优秀的人才，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的灾难，也给蒋介石自己种下失败的因子。也可以说，蒋介石1927年搞的大屠杀，使共产党猛醒，并被迫拿起武器，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推翻蒋介石独裁政府的道路。

所以，黄仁宇先生说："国民党并未因清党而解决一切问题，中

① 《殷海光全集》第1卷，第125～126页。

② 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2页。

共也并未清党而被整个的埋没”，“中共虽在国民党‘清党’期间受到打击，实际上也经过一段严峻的考验”①。

对这个问题，殷海光的弟子、台湾知名政论家孟绝子在《万岁评论》第23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他说：“清党”的结果，也产生一个副产品，那就是共产党开始建立军队，武装自己，这副产品演变发展，到了1949年冬，把原来享受“清党”胜利成果的国民党完全打败，使之完全退出大陆。当初国民党以消灭的方式“清党”时，做梦也没想到22年后会被“清掉的党”赶出大陆。

原台湾“国防部长”、“行政院长”郝柏村，是国民党的老军人，经历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1999年4月，他以平民身分到大陆祭祖。4月4日，他在南京参观中山陵时，感慨万千地说：“如果中山先生晚一点去世，或许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他言下之意，就是说孙中山先生不死或晚死，就不会有“清党”，没有“清党”，国共就不可能分裂。中国共产党也不会走武装反抗国民党之路。

郝柏村这句话，言简意赅，说到点子上了。这位跟随蒋氏父子一生并出生入死的老军人，能在晚年画龙点睛地说出这句真心话，实际上是否认了蒋介石当年的“清党”运动。此话出自他的口，非常难得。

至于鲍罗廷的问题，殷海光说的也不准确。因为他当年来中国，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邀请来的，也不是他要来中国的。他在中国期间，“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曾请他帮助中国革命。他为国民党和北伐做过一些工作。后来，他看不起蒋介石的为人，对蒋的政客手段不满，并屡与蒋介石发生分歧。北伐快要胜利时，蒋介石从自己的一己私利出发，极力排挤、攻击、丑化鲍罗廷，并企图

① 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77、70页。

把他赶走。

总之，孙中山先生生前制定的重要政策和信任、重用的人，待他死后，蒋介石统统不要了，只在口头及形式上，为了需要，把孙中山的旗帜举着，以欺骗国民党人，欺骗全国民众。

对30年代初中期，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日寇，专打共产党及红军的反动政策，殷海光对其进行了辩护，他说：

>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步步逼进，人心悲愤。中央以准备未周，责任重大，不能轻动。委员长站在政府的地位负着民族存亡大责，在未正式开战以前，当然不能扬言抗日。而那时内部纷乱，南北割据如故，政令军令没有统一，力量意志都不集中。在此情况之下，如何堪与强敌周旋？这是凡有常识有良心的国民都可判断的事。然而，人民阵线的分子，尤其是救国会诸君子，却利用这一点来难政府，窘辱当局。他们一口咬定中央不抗日，"南京政府"为"亲日汉奸政权"；报章杂志，攻击不遗余力。今日接受日本投降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尤为众矢之的。委员长一方面要敷衍这些受人利用不知就里的天真学生，一方面要费尽心血对日本虚与委蛇来争取准备的时间，另一方面又要应付内部不测之变，真是苦不堪言。反对准备，催促早战，声遍南北。中央政府，日在飘摇之中。①

上面这段话，与当时国民党的一些大员在公开场所所讲的言论，几乎差不多。

殷海光不知，蒋介石不抗日的真实原因，既不是他感到"责任重大"，也不是"准备不周"，真正的原因，是他要打内战，要消灭反

① 《殷海光全集》第1卷，第148～149页。

对他独裁统治的共产党和红军。正像美国著名学者布赖恩·克罗泽所说："在日本人挑战面前，蒋介石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爱国者。在他的军事战略中，摆在首位的敌人总是共产党，其次才是日本人。"①

布赖恩·克罗泽还说：

> 事变发生时，少帅正在打内战，但他决不是没有力量对付日本人，事实上，他拥有四十万军队，大大超过了入侵日军的人数。
>
> 但蒋介石命令禁止动用任何武力。蒋决定对日本的进攻不予抵抗。②

> 我们可以确切地指出，蒋介石曾在某一天，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③

> 他的失算在于他使人民——这里面包括知识分子、农民及士兵——感到失望，结果他那无可争议的自诩的民族领袖的地位受到了削弱。
>
> 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大多数人认为中国人打中国人是不应该的。④

美国另一著名学者厄巴纳·伊利诺斯大学教授易劳易先生也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作了述评，他说："蒋介石曾长期力图避免敌对行动。自从1927年国民党人执掌政权以来，尽管日本曾多次进行干涉和侵略，他却始终奉行和解政策……因此，他曾默认日本

---

①②③④ 布赖恩·克罗泽著：《蒋介石》，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41、138、139页。

侵占东北三省，缔结消除国民党在华北影响的停战协定，并屈服于日本的压力，镇压反日的学生运动。然而，从1935年晚些时候开始，反日情绪已经变得如此强烈，致使国民党政府觉得对日反应非强硬不可。于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才开始了战争准备。"①

对蒋介石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问题，说得非常清楚、明白的，还有著名爱国将领、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他在《我所知道的蒋介石》一书中说，蒋介石曾对张学良讲，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国民党军队奉行的是不抵抗主义。蒋还对张学良说，这话是他说的，不许对别人说。当时，张奉蒋之命，未抵抗日本侵略者，全国舆论都攻击张学良，张学良为蒋介石背黑锅，有苦说不出来。冯玉祥将军在书中还说，日本侵略者侵占了辽宁省城后，接着疯狂地在各地烧杀，很多青年学生的手被日本人砍了，有的腿被砍了。就在那两个星期里头，日本人杀害中国人有一二百万，如同切瓜菜一样。这种惨痛的情形，有人报告了蒋介石，蒋总是不闻不问。

从"九·一八"事变后到"七·七"事变，尽管日寇得寸进尺，步步进逼，杀害无数中国同胞，使无数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蒋介石全然不顾。他除电令张学良不要抵抗外，还通过与日方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将东北、华北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

尽管中华民族到了灭绝种族的危急时刻，蒋介石却不当回事，仍四处奔波召开各种反共、剿共会议，下令特务机关封闭要求抗日的报刊，捕杀主张抗日的进步人士，大张旗鼓地在庐山举办剿共军官训练团，亲自组织编写《剿匪手本》、《剿匪要诀》、《剿匪训练要

① 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29页。

点》，准备在军官训练团上作的反共报告。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组织百万大军对共产党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他的精力、物力、财力，全用在剿共灭共的战争上，压根儿未想到收复东北、华北失地，这哪里是"准备未周"呢？

我们再看蒋介石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几种说法。通过他的言论，看看他对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是什么态度，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

1932年1月11日，蒋介石在浙江奉化溪口武岭学校纪念周发表演讲时说："以中国国防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24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于绝交宣战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与内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①

蒋介石这段话的意思是：中国太弱，日本很强大，如一宣布抗日，中国就完了。

3月6日，蒋介石与其舅兄宋子文一同乘飞机抵达汉口，当夜又乘火车北上。在途中，蒋介石向各将领下令："有言抗日者杀无赦。"②

蒋介石这个命令告诉人们：日寇侵略中国，没有什么事。要求抗日，宣传抗日是有罪的，而且有杀头之罪。

1933年3月23日，蒋介石跑到北平，在居仁堂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大谈"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及步骤。4月6日他又跑到南昌，部署对中共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围剿，并发表《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重弹"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并说："外寇不

---

①② 李勇、张仲田编著：《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209页。

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无心御外侮……"①

4月10日，蒋介石再次在南昌发表谈话，又说要讲抗日，须先剿"匪"，在"匪"未肃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

5月初，蒋介石带领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等至江西崇仁，召集国民党军队副团级以上军官开军事会议，蒋在会上说："中国的大患不在东北而在江西"，"江西的共'匪'是中国的心腹之患，如不剿灭，将死无葬身之地"，"如再侈言北上抗日者，即以抗命论罪"②。

蒋介石的上述电文和谈话清楚地说明：他不抗日，并不是日本人太强大，也不是中国国防力量太弱，而是中国内部的共产党及其红军部队未消灭。对他来说，中国内部的共产党及其人民武装力量，比日本人还坏，还可怕。真正的敌人不是日本侵略者，而是共产党。

1934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作了《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报告，谈到抗日问题时，他说："我一定有高明的策略可以打败这小小的倭寇。老实讲，他们那一班骄妄愚蠢的军人，完全不在我的眼中，我一定有办法可以战胜他们。"

这一段话又告诉人们，1932年把日本人说得强大无比，中国根本无法与日本打的蒋介石，只两年多时间话就变了，他说他根本不把日本侵略者放在眼中，而且日军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只要他一言抗日，日本人必败无疑。

以上事实说明：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根本没有想到要抗日，他们的政策是剿共大于抗日，重于抗日。他们真正要打、要消灭的，是共产党及其军队。根本不是殷海光所说的"准备未周"、"责任重大"、"虚与委蛇来争取时间"。

---

①② 李勇、张仲田编著：《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213页。

再说，“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间隔了七年，时间够长的了。在这七年当中，日本军队只占领了东北和华北局部地区，其他地区均控制在蒋介石及其政府手中，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线都畅通无阻，运输方便，根本不存在“准备未周”，更不需要七年“虚与委蛇来争取时间”。

由于蒋介石及其政府骨子里根本未想到抗日，也未准备抗日，西安事变爆发了，他被张学良、杨虎城及全国人民逼得无路可走，只好答应抗日。又由于国民党军队在过去的数年内只顾剿共，不作抗日训练和准备，加上内部的腐化堕落，抗战打响后，他们一遇日军便望风而逃。

所以，原国民党军官、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先生在《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说：“我们可以断言，蒋介石对日作战无全盘计划，只有一般概念。”①

在谈到中国今后怎么办时，殷海光在书中又说：

> 我们不要东倒西歪，最可靠的办法只有听委员长的话，拥护他的政策，跟着他埋头苦干，国家才有出路。……委员长伟大，那么他最伟大的地方倒不是这些有形的功业，而是他具有强烈的意志力和责任感。多少年来，他为了国事，忍辱负重，不避艰辛。他一直把国家存亡兴衰的千斤重担毅然放在双肩之上。在任何艰危的情形之下，他从来不肯放弃他的职责。他有40年的经验，他对于中国现实政治环境有极敏锐的感觉。他对于我们中国今后应走的道路大体上有着健康的判断。他一定会领导我们走上光明之路。②

---

① 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188页。

② 《殷海光全集》第1卷，第190页。

殷海光写的上述言论，有些来自蒋介石自己的讲话，有些来自国民党其他人员的言论。这一段话与蒋的实际情况显然不符，是溢美之词，贴金之语。

后来的事实说明：国民党的大小官僚，越拥护蒋介石的上述反共消极抗日政策，越跟蒋介石埋头苦干，越没有出路，败得越快，输得越惨。

殷海光不知，他写此书时，蒋介石正在干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事情。如承认《雅尔塔协定》，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照会》，结果造成外蒙古脱离中国。

蒋介石干了上述勾当后，长期秘而不宣，国人一直蒙在鼓里。蒋介石卖国，空前绝后，这哪里是"把国家存亡兴衰的千斤重担毅然放在双肩上"呢？哪有什么"强烈的意志力和责任感"呢？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不图国共继续合作，建设新国家，而是仗着军事上的优势，积极准备内战，残酷打击、迫害呼吁停止内战的进步人士，把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重新推向苦难的深渊。中国共产党无法，被迫应战。三年内战中，国民党的数百万军队被人民解放军歼灭，蒋介石一败涂地，在大陆无处立足，带领少数残兵败将逃往台湾。

蒋介石的做法和悲惨结局，完全不是殷海光所说的"对于中国今后应走的道路大体有着健康的判断"，更未领导国民党及其政府"走上光明之路"。相反，他使国民党走上了一条失败、灭亡之路。

殷海光在《光明前之黑暗》一书中，还说到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忠实继承者，对蒋的"业绩"作了不实的粉饰：

> 委员长建都南京，一方面逐步完成中国的统一，另一方面积极从事于现代化的建国运动，努力改革内政，实行关税自主，裁撤厘金，改革体制，兴建道路，创设空军。日

本军阀认为中华民族的这种发展妨害其大陆政策的实现，于是由出兵济南而出兵东北，由出兵东北终于演成七·七的全面侵略。当着中华民族面临着这种重大的危机之时，中央政府毅然领导全国军民起来抵抗，一直到今年的胜利。①

这一段内容，稍有中国现代历史知识的人们看了，就知完全不是事实。蒋介石从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的第一天起，除完成北伐外，其主要精力用在保位、保权、党争、政争和军事争斗上，再就是"剿共"，根本就未开展过像样的现代化的建国运动。至于抗日，前面已经作了叙述，读者已经明了，这里不再赘述。

对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的蒋介石，美国厄巴纳·伊利诺斯大学历史系著名学者易劳易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

这个政权是个独裁政权，建立在军事实力之上，并靠军事实力来维持。这个政权的领导人唯恐失掉他们的权力，不愿与他人分享权力和随之而来的额外所得；对于政敌和批评者则采取压制的态度。在一个现代化的民族主义愈益增强的政治形态中，公民必然变得更有政治觉悟，这种大权独揽的作法，一般地说是自我毁灭。②

此时的殷海光，因与蒋介石没有直接接触，国民党政权的内幕，他知道得不多，加上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再加上他还年轻，故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无法作较深的观察和比较客观的评价。

---

① 《殷海光选集》(政论篇)，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88 年版，第 5～6 页。

② 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 186 页。

可以说，殷海光这一阶段写的歌颂蒋介石、为蒋介石辩护的文章和著作，是他青年时期的一大失着。他到台湾后，对此一字不提，别人问他，他也回避。他对此事的态度，说明他对自己当年的做法作了否定，而且很后悔，不然，他不会不提。

4

陶希圣引殷见蒋：殷海光看破蒋介石

殷海光一生与蒋介石虽颇多恩怨，与蒋介石却只见过两次面。而专门召见，只有一次。有意思的是，就因这次召见，使他看破了蒋介石。

要说清殷海光被蒋介石召见一事，得先从陶希圣其人说起。

陶希圣原名汇曾，笔名方峻峰，1898 年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西乡（此地 1954 年划成新洲县），早年入北京大学法律系读书，1923 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1925 年后，成为上海学生会顾问，并主编《独立评论》

杂志。1927年，陶希圣先后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军校宣传处处长、《党军日报》主编等职。1928年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同年12月因参加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辞去军校职务，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任职，同时在复旦大学兼任教职。1931年春，陶希圣到南京大学任教，后又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抗战爆发后，陶希圣南下，任国民党政府国防参议会参议，1938年任艺文研究会研究组总干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年12月追随汉奸汪精卫，逃离重庆国民政府。1939年8月，陶出席汪伪国民党六大，并任所谓的中央宣传部部长。1940年1月，陶希圣逃到香港，披露了汪日签订的"密约"内容，1942年背离汪伪政权，又回重庆，再次受到蒋介石的信任与重用，出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五组组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主笔、"立法委员"等重要职务。1949年12月，陶去台湾，历任台湾当局总裁办公室第五组组长、《中央日报》董事长、"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委员、常委等职。陶希圣一生著述甚丰，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他除自己著书立说外，还为蒋介石捉刀了大量文章和著作，如蒋介石名噪一时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就是他代的笔。

由于陶希圣文笔好，理论功底硬，又听话，蒋介石对他十分器重、信任、厚爱。

40年代中期，殷海光在重庆独立出版社任编辑期间，除了编书外，还写了不少政论文章和反共理论著作，引起一些国民党要人的注意。

那时，蒋介石的秘书徐复观住在重庆南岸黄角桠，殷海光的岳父夏声也住在此地。

一个偶然的机会，殷海光在黄角桠结识了徐复观。徐复观是鄂东浠水县团陂乡人，团陂与黄冈搭界，距殷海光的老家回龙山殷家

楼不过25公里。因是同乡，加上观念相近，他们便建立了很亲密的关系。

徐复观虽在军政界任职，学问却做得不错，文章也写得很好。两人在一起，无话不谈。

徐复观见殷海光爱写文章，而且又很年轻，对他颇器重。他除帮殷海光推荐文章给《扫荡报》等报刊外，还请他参加一些不涉及保密性的政界、文化界的活动。这样，殷海光在重庆认识了不少国民党要人。

一天，徐复观在南京新街口碰到陶希圣时，两人谈起了国民党的宣传工作。陶希圣对徐复观说，蒋介石多次对他讲，要把宣传，特别是反共宣传很好抓一抓，由于找不到会写理论文章的人，致使反共宣传工作长时间难有大起色。从去年至今，蒋介石多次为这事发他的脾气，还骂人，说他们是饭桶，责问他们的宣传工作为什么搞不赢共产党，蒋介石训得他们无脸见人。

徐复观听后，马上对陶希圣说："共产党的优秀人才搞宣传，国民党内稍为强一点的人做了官，宣传工作当然不及共产党。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下力气寻找人才。最近，我发现了一个青年人才，而且还是你们黄冈县人。"

陶希圣听说是家乡人，而且很会写文章，眼睛一亮，兴奋地问道："现在在哪里？"

"就在南京，以卖文为生。"

"多大年龄？"

"二十几岁。"

"什么学历？"

"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毕业的。"

"那还是研究生？"

"嗯。"

"他写过什么东西？"

“中宣部的部长梁寒操先生很清楚。也是我向他介绍的。你可问问他。”

陶希圣当即要徐复观把殷海光叫来，他要认识一下这个年轻的老乡并顺便考察一下，看能否拉到国民党阵营中来，并为国民党所用。

徐复观还告诉陶希圣，梁寒操已有意延揽殷海光，不知道现在定了没有。

由于徐复观有急事要处理，不能马上叫殷海光来，答应在三五天内，一定将殷海光叫来，并介绍与陶相识。

过了几天，在徐复观的联络下，陶希圣与殷海光见面了。见面时，殷海光还把自己写的书和文章送了一些给陶希圣，陶希圣很高兴地接受了。

经过交谈，陶希圣觉得，殷海光的相貌虽然一般，个头也不高，但很会讲话。他的思维敏捷，反应很快，是做宣传工作的好料子。

他问殷海光是否愿意到中央日报社工作，殷海光告诉他，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已经决定要其到宣传部去。

那时，陶希圣在中央宣传部还是个副部长，梁寒操要殷海光去宣传部，觉得不好向梁寒操争夺人才。同时，他还认为，殷海光能离开出版社到中央宣传部，说明国民党已经争取到了殷海光。

殷海光到中宣部后，梁寒操安排他任编辑。他干了一段，感觉这个工作既无聊，又没什么意义，写作特长也难以发挥出来。他很想离开中宣部。

陶希圣得知殷海光的想法，如同跛子上树——巴(爬)不得。他马上找到殷海光，并对殷海光说：“来吧，到我们中央日报社，我不会亏待你的。”

俗话说：亲不亲，故乡人。年轻的殷海光经不住陶希圣这一说，当即答应到中央日报社。这样，殷海光终被陶希圣拉到了身边。

没过几天，陶希圣就把《中央日报》主笔的聘书送到了殷海光

手上。他是当时中央日报社最年轻的主笔。那时，报社内有些人年纪比他大，而且已干多年，还未做上主笔，他一人报社就做了主笔，旁人羡慕不已。

他年轻得志，又有大后台，社内有不少人妒嫉他，并常在陶希圣面前嘀嘀咕咕，陶希圣就批评那些人说："这有什么不服的？人家殷海光有研究生学历，文章写得那么好，来得又快，是我们好不容易挖来的，不厚待人家行吗？"

陶希圣这样一说，那些不服的人再不敢作声了。

殷海光进入中央日报社后，吃住条件大为改善，干劲很大。

陶希圣见殷海光表现不错，又很卖力，加上又是家乡人，对他十分关心。陶除时常到办公室去看他外，还常到他住的宿舍去问寒问暖。

陶希圣比殷海光年长二十多岁，名气又大，学识文笔又好，殷海光对他十分尊敬，陶交办的任务，殷海光总是很快地完成。因此，殷海光进入《中央日报》的初期，与陶希圣合作得非常好。

为了鼓励殷海光为国民党做更多的宣传，写更多的反共文章，陶希圣心里滋生出一个想法：让蒋介石接见一次殷海光。

一天，陶希圣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殷海光，问他有什么想法。那时，殷海光很年轻，从一个出版社的普通编辑，一步登进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社，并做了主笔，可说是春风得意。他听说要受一国之君接见，自然十分高兴。

陶希圣见他很希望见蒋介石，对他说："你好好干吧，我再向蒋委员长请求，他一同意，我就带你去。"

殷海光初入国民党阵营，上进心颇强，对蒋介石也很崇拜，希望能早日见到蒋介石，并听听他的"教诲"。他当即点头同意，并连连向非常关心自己的这位上司表示感谢。

陶希圣还给他点拨说："蒋委员长非常伟大，他不仅在中国国内有很高的威望，在世界上的威望也很高，你如能见到他，那是你

一生的幸福和光荣。蒋委员长也很关心、爱护青年人，对有才的青年更是喜欢。你见到他后，一定要向他表示效忠，愿为'党国'献出自己的一切。他听了你的表态会很高兴的。他一高兴，并喜欢上你，你将来就前途无量。"

陶希圣的这些话，殷海光认为很知己，都听进去了。他同时还感到，自己很年轻，应该有所作为，为社会作点贡献。

后来，陶希圣真的几次在蒋介石面前美言殷海光，说中央日报社聘了一位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的高才生做主笔，此青年对逻辑和西方哲学颇有研究，反共理论文章也写得很好，是个有培养前途的理论才俊。他还多次对蒋介石说，他与此青年作过几次交谈，感觉很有抱负，是难得的人才。

陶希圣还将殷海光写的反共理论著作《光明前之黑暗》和普及逻辑知识的《逻辑讲话》送给了蒋介石。

陶希圣说多了，便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一天，蒋介石突然对陶希圣说："你说的那个殷海光，我已知道。徐复观早些时候也向我谈过这个青年人。《扫荡报》上连载的《中国共产党的气象学》就是他写的，我看过他的文章和著作后，感觉这个青年人是很不错。过去，我多次对布雷先生讲，侍从室的人员有些不懂逻辑，说话办事不分是非、先后、主次，并常发生混乱，我叫他请个逻辑专家给侍从室的人讲讲课，我也参加听。他一直未办这件事。殷海光对逻辑有研究，那很好，以后就叫他给大家讲讲逻辑。"

陶希圣见蒋介石已知道了殷海光，乘机说："能写出好的反共理论文章的人很少，总裁是否召见一下他，以鼓励他为党国写更多的反共理论文章。"

蒋介石思索了一下问道："殷海光今年多大年龄？"

"26岁。"

"好年轻，很好培养一下。"

"总裁如能召见一下他，对他一定是个很大的鼓励。"

“好吧，我安排一个时间。到时，我叫人告诉你。”

1947 年 7 月的一天，蒋介石处理完了公文，想起陶希圣原来跟他讲过的召见殷海光的事，叫侍从室的人员告诉陶希圣，现在有点时间，可叫殷海光来。

陶希圣接到电话，连忙派人找到殷海光，要殷海光换一下衣服，把头发梳理一下，跟他一起去见蒋介石。

此时正值夏天，会客室内已坐了一些国民党大员，他们都是在此等候召见的，徐复观也在此。

殷海光过去与国民党大员们打交道不多，也未染上官场上的那些虚情假意，点头哈腰的习惯。他一进去，不跟任何人打招呼，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等候蒋介石的召见。

他的举动，使在场的那些集团军总司令、行营主任、省主席等大员们感到十分惊奇。大家都用奇异的目光盯着他，好像都在说：“这是哪来的青年小伙子，怎么这样没有礼貌，进来连个招呼也不打，而且还把脸板着。”

陶希圣见大家都打量着殷海光，便站起来向在场人介绍说：“这位青年同志，是我们《中央日报》主笔殷海光先生。”

然后，陶希圣向殷海光介绍了在坐的国民党大员，殷海光这才勉强地起身与他们一一握手。

蒋介石接见殷海光的时间到了。他被人带到另一间小会客室里去。此会客室大约 30 平方米，室内摆了四张沙发和几张茶几。正面墙上挂着孙中山、蒋介石的画像，有趣的是，此会客室的窗子开得很上，外面射进的光线，正好对着被召见的人。不论何人，一进入此会客室，就感到蒋介石能很清楚地看到被召见人，被召见的人看蒋介石的面孔，则是模模糊糊的。殷海光一走进此会客室，就感到一种极不平等的感觉。心想：这个窗子是特开的。召见和被召见的人身份虽然不同，人格都是平等的。蒋介石如此对待被召见人，这不是对别人的一种侮辱么？

殷海光坐下不一会，陶希圣也进来了。

蒋介石问殷海光："你老家是湖北黄冈吧？"

殷海光答道："是。"

"与希圣先生系同乡吧？"

"嗯。"

蒋介石又问："那里有个东坡赤壁吧？"

"有，在县城黄州。"

"离你家有多远？"

"大约 15 公里。"

"那很近嘛。"

"是不远。"

谈到这里，蒋介石面带微笑，得意地说："民国 18 年(1929 年) 4 月初，我乘楚有舰到过黄州，记得上岸时，天已很黑。我在黄州住过三天，游览过东坡赤壁。我看那里面有很多苏东坡的手迹石刻，觉得很珍贵，还下了一个保护东坡赤壁与文物的布告。"

蒋介石说的这件事，殷海光早就知道，他跟随父亲殷子平到黄州赤壁游览时，还见过此布告。他连忙说："我知道。"

谈到这里，蒋介石又问："你成家没有？"

殷海光说已订了亲，还未结婚。

蒋介石又问了几句家常方面的话后，谈到了哲学。

蒋介石问道："听希圣、复观二先生说，你是学哲学的，是吗？"

"是的。"

蒋介石又问："你学哲学很好，读过王阳明的书吗？"

殷海光说："读过，但没有研究。"

蒋介石谈的王阳明，是明代哲学家、教育家，浙江余姚县人，曾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自幼好学，聪明过人，一生又文又武、又官又民，曾任兵部主事，一度被谪为贵州龙场驿丞，后又历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左佥都御史、兵部尚书等职，镇压过江

西等地的农民起义，平定过宸濠的反叛，因功封新建伯，卒谥文成，是陆王学派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理论，形成了阳明学派，对明以后的思想界影响很大。王阳明的主要著作有《大学问》、《传习录》等。

蒋介石过去虽读了一些书，但读得并不精。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成千上万，他最佩服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王阳明，一个是曾国藩。被他召见过的专家、学者，他几乎都要谈这两个人。他后来逃往台湾，仍然如此。蒋介石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与人谈王阳明、曾国藩，主要原因有四：一是这两个人确系天才学者，学问做得极其出色；二是蒋介石确实读了一些他们的书，并下了一定的功夫，懂点他们的学问与思想，与人谈谈王阳明、曾国藩的学问，可给人知识“渊博”的印象；三是他的思想与王阳明、曾国藩的思想有些相合；四是王阳明、曾国藩两人都曾毫不留情地镇压过农民起义，而且镇压得很成功，值得他及其他国民党人学习、效法。

蒋介石听殷海光说看过王阳明的书，兴趣来了。他又向殷海光问道：“你对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怎么看？”

殷海光没有料到蒋介石要向他问900年前的一位哲学家提出的认识论命题。过去，他在西南联大哲学系读书期间，主要钻研逻辑，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后，主攻西方哲学，对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他未下功夫钻研，对王阳明的哲学及思想也不感兴趣。好在，他过去看过王阳明的书，对王阳明哲学略知一二。他说：“我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其实就是强调道德动机与结果、过程、目的要统一，反对朱熹读书穷理、光知不行，而突出道德的实践。我赞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理论。”

殷海光一说完，坐在旁边的陶希圣插话拍马屁说：“委员长对王阳明哲学研究得很深，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30年代，委员长大力提倡的‘力行哲学’，就是对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理论及学说的最好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当今研究王阳明哲学的最大成就。”

其后，蒋介石又对王阳明的“致良知”、“心即理”、“性即理”作了一番“阐述”。他说：“格物，就是‘格心’、‘正心’，使不正之心，归于‘正’；这是最简易、最直接的修养方法，无论是读书人还是为官为民者，都应当注重道德修养。王阳明先生是一位博学深思、卓然独立的大儒，他的思想和主张，正为国家、民族迫切需要，你们做宣传工作的青年人，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大力宣传王阳明的学说。”

谈着、谈着，半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了。由于蒋介石还要召见别人，时间一到，殷海光起身走到蒋介石面前，向蒋介石告辞。

这时蒋介石也站起来说：“殷海光，你很年轻，要好好为党国工作。特别是要多写反共文章，你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殷海光点头道：“好。”

他从小会客室出来时，徐复观问殷海光：“怎么样？委员长与你谈了些什么？”

殷海光笑了笑说：“主要谈了王阳明哲学。”

徐复观举起大拇指说：“海光先生，祝贺你受到委员长的召见！”

殷海光对蒋介石召见，看得不像别人那么重。徐复观向他“祝贺”时，他未做声，只轻轻一笑。

随后，他回到了中央日报社。

报社的官员、职员听说蒋介石召见了他，对他又羡慕、又钦佩。《中央日报》创刊以来，蒋介石很少单独召见过一个主笔。一个 26 岁的青年小伙子，而且进报社不到一年，就凭自己的著作和文章得到如此“殊荣”，十分罕见。

他一进自己办公室，那些得到消息的同事纷纷跑来打听蒋介石给他讲了什么，送了东西给他没有。还有几个相好的同事说，这是他一生的“光荣”，逼着要他请客。殷海光没有法，只好答应他们的要求。

俗话说：远是香，近是臭。过去，蒋介石是殷海光心中的“英雄”、“楷模”、“伟人”、“民族救星”，自从这次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后，蒋介石在他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他从蒋介石的谈话，看出蒋介石并无真才实学。蒋介石看了一点王阳明的书，感到王阳明的思想与自己的思想相合，就把王阳明说成是圣人、完人，什么都好，其他思想家一钱不值。一国之君，怎么能这样对待历史，这样对待古人？王阳明的思想真的能解决一切问题，真的能治好中华民国么？

他还想：虚伪是一种无能的表现，凡是虚伪的人，十有八九难成大业。从蒋介石的学识、思想、境界看，此人并无大智大勇，国共即使将来不打内战，国家在他手上，不一定能治理好。

可能是哲学家的眼光太锐利。殷海光见蒋介石同著名学者梁漱溟见蒋介石一样，第一眼就看破了他。30年代，梁漱溟被蒋介石召见后，出来就对人说：“第一次见面，蒋介石留给我的印象很坏，觉得这个人很虚伪。”

有趣的是，殷海光对王阳明的哲学及思想不感兴趣，他的伯父殷子衡却很感兴趣，并有很深的研究。

后来，他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对与自己关系特别好的同事讲了，得到他们的赞同。

1994年4月，殷海光夫人夏君璐到台湾时，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生简明海在台北市YMCA餐厅访问了夏君璐。夏君璐谈到了殷海光在蒋介石那里回来后的思想与感受：

> 他（指殷海光）说，蒋有独裁者的气质，每个来见蒋的人都毕恭毕敬，气氛显得很希特勒（Hitler），没有一点自由的气氛。两人话不投机，与先前认知的形象相去甚远，对蒋有些失望。原来在蒋相片后写着“中华民族的救星”的殷海光，来台后写信以Formosa称台湾，表示反蒋的

意思。①

殷海光在大陆受到蒋介石的召见，使他提前看破了蒋介石。他后来在文章及著作中，不再像先前那样歌颂蒋介石，与此次受蒋介石召见有极大的关系。

① 简明海著：《救亡与启蒙的困境——殷海光思想转变之研究》附录，第20页。

5

全国局势一片混乱：殷海光抨击国民党

1948年春夏，在毛泽东及中央军委的指挥下，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向国民党军队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与此同时，国民党占领区，特别是大中城市的工人、学生开展的各种反对蒋介石黑暗统治的运动如火如荼。1月底，上海同济大学数百名学生上街游行，反对国民党对各界人士的政治迫害；4月9日，四川成都地区的大中学生千余人走上街头，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军粮”的请愿游行；4月11日，南京中

央大学一批学生为反饥饿，开展绝食斗争；5月22日，上海大中学生2万余人集会抗议美国扶植的日本侵略势力复活；随后，北京、昆明、武汉的大中学生也开展了类似的抗暴及爱国民主运动。

蒋介石政府内外交困，焦头烂额。

尽管国民党军队在前线被打得一败涂地，《中央日报》却对此一字不登，反而登些捏造的假新闻，如"山东我军击退匪军进攻"、"东北林匪万余人被歼"，以欺骗全国民众。

东北战场作战连连失败，蒋介石在北平怄得吐血，回南京后又连吐几次，国民党高层人士得知这一情况，无不担忧。

殷海光是个文人，对军事问题研究不多，但对国共两党的决战极为关注。国民党大部分精锐在东北被歼灭，他感到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淮海战役一打响，他决定以"慰问"的名义，在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邀几个教授，到淮海前线去实地了解一下作战的情况，看看国民党军队是如何与共产党作战的，并给国民党官兵作点宣传，鼓点劲。

1948年11月上旬，他到了运河西岸。

此时，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黄伯韬的人马刚刚到达，共产党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十余个纵队正沿陇海铁路急进，将黄伯韬兵团包围在运河西岸。

黄伯韬兵团被南北对进的解放军截断了去路，被迫钻进了纵横只有十余里的碾庄圩至曹八集地区。

在碾庄圩，殷海光作了两次鼓动演讲，与部队官兵作了一些交谈。通过接触官兵，殷海光得知了国民党部队的很多内幕。

部队官兵谈的情况，有三点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其一，蒋介石直接指挥了国民党部队的作战，各战场的主要指挥官对其部队并无指挥权，也无什么军事才能；其二，国民党部队的士兵大多系穷人子弟，是抓壮丁入伍的，对与共产党军队作战并无积极性；其

三，部队军官贪污、虐待士兵的情况十分严重。

11月15日，华东野战军向碾庄圩之敌发起攻击。殷海光一行无法在部队呆下去，提前离开了硝烟弥漫的战场，转到苏北重镇徐州。

没过几天，黄伯韬兵团的4个军在碾庄圩被歼，黄伯韬身陷绝境，自杀身亡。殷海光得到这一消息，十分震惊。他想：那么多军队，武器又比中共好，怎么一与中共军队交手，就溃不成军，一塌糊涂？"精锐国军"成为不堪一击的"豆腐军"，不从内部好好找一下原因，这个仗就再无打的必要了。

没有想到，他回到南京不久，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战斗又打响了，受困的国民党军队被解放军打得焦头烂额。

殷海光上了一次前线，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戡乱"有了比较深的了解。他感到，这场"戡乱"如继续由蒋介石指挥下去，很难取胜。实际上，国民党的官兵都是跟蒋介石个人卖命，打糊涂仗。甚至还可以说，蒋介石组织的"戡乱"是维护豪门财阀的利益和他个人的独裁统治，所以他天天叫喊的"戡乱"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结果"乱"未"戡"，自己反而被"乱"击倒了。

他还感到，蒋介石如此无能，国民党如此不得人心，下坡路走得如此之快，这是古今中外所罕见的。

他还认为，国民党之所以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是因为内部能说直话、真话的人太少了。他决定在外报外刊写一些批评蒋介石、国民党的文章。

1948年下半年，他在《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了一篇《我们走哪条路？》的长文。在此文中，他除攻击共产党外，对国民党、蒋介石也进行了猛烈的、毫不留情的抨击，他说：

> 国民党不是正在从事"戡乱"以消弭中国当前的动乱吗？我们能否跟着这个样子的国民党跑呢？

国民党的作风是这样令人憎恶，国民党的领导是如此错误，跟着这个样子的国民党跑，会有什么前途？谁都可以知道，中国国民党在过去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政治引擎。可是，现在称国民党员而又得势的这群人，无疑成为中国历史前进的绊脚石，他们靠着孙中山先生起家，掌握了国民党的政权，等到他们掌握了国民党的政权以后，像历代藉武装力量推翻前朝而自行建立王朝的人一样，凭着政治上的便利，满足一切的物欲！子女玉帛、汽车洋房，予取予求。他们早已将孙中山的"遗教"抛到九霄云外了。现在表面上是"行宪"，骨子里政权还是操于极端少数人之手，国家政治大事，依然习惯地决定于"手谕"、"官邸"、"会报"、"请示"。在经济方面，自称国民党的显要人物，藉着"国有"、"国营"这些幌子，将国家经济转为私人经济，少数豪富宰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

二十年来的演变，这个样子的国民党几乎完全扬弃了革命的内容，而变为一落后的保守集团。显然得很，国民党的政权是建立在党阀、军阀、财阀和政阀这四大阀之上。这四大阀的利益是与广大人民的利益冲突的，于是建立在这四大阀之上的政权也就与人民对立，与人民对立的政府的措施或决策，自然也就常常不顾及人民的利害了。

以国民党为支柱的现在政府目前是领导"戡乱"，它怎样"戡战"呢？藉着什么"戡乱"呢？"戡乱"之所需，除了"美援"以外，便是取之于劳苦贫困的广大人民。政府一方面呼吁"美援"，另一方面私人在美的大量存款逍遥如故，以种种借口而不予征用。政府对于在京沪等地的豪门巨富似乎特别爱护——对于他们的生命财产，不敢动其毫末；可是，政府却去对抗力最弱的老百姓下手——拼命榨

取人民，征粮征实，向老百姓要钱要命，雷厉风行，毫不宽恕。这些行径，无可避免地给予人民以一种印象：这个政府是保护特权阶级之利益的政府，因而"戡乱"也不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的安宁与福利，而是为了维护少数特权阶级的利益。这样的"戡乱"，利益未见，而灾害先降，自然使得大家不感兴趣；于是"反内战"的言论也自然易于发酵。既然如此"戡乱"不能使得大家感到兴趣；也就不能激发大家拿出真正的力量。老老实实说，现在无论文人武人，凭着真正的认识和内心的迫切要求以从事"戡乱"的，真是寥若晨星，少得可怜。现在的所谓"戡乱"，既不是社会运动，又不是政治运动，只是奉行政府的功令而已，既是奉行政府的"功令"，所以"戡乱"变成少数公务员以及军警的"公事"。一切"公事"都是不得不做的而且没有生气的事，这样的"戡乱"，完全裸露于社会力量之外，得不到社会力量和舆论的掩护，甚至于被保护的豪门财阀都不愿拿出一文来帮助"戡乱"。这样一来，"戡乱"几乎为孤行权力的斗争，而不能发生大的力量。不能发生大力量的"戡乱"，尽管这样以错误的方法戡下去，还能有光明的前途吗？还能必然结束中国当前的动乱吗？①

对蒋介石把持的国民党党组织状况，殷海光也作了入木三分的剖析与严厉的批评，他说：

国民党没有支配力的意识形态。虽然，在1928年以后若干年月，国民党标尚三民主义，可是，在大部分的情形之中，这种标尚不是作为一种形式的党教，便是作为获

① 《殷海光全集》第11卷，第7～9页。

取团体或个人利益的护符。到了现在，连这种形式上的党教也不能维持，这种护符给许许多多人的实际行动拆穿以致失灵了。实际说来，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更没有作为基本出发点的具支配力的观念形态，论组织呢？更不知从何说起。在表面上，国民党是有组织的，在实际上，这种表面上的组织并不起组织作用。在国民党内，稍起作用的，是些小派小党，这些小派小党，无政治理想之差别可言，似乎是纯然以私人为中心的利害结合。这些利害结合，表面上挂起一个共同的招牌，表面上"服从"一个共同的领袖。是之谓"国民党"。①

随后，殷海光在香港《民主评论》杂志上写了一篇《中国的前途》一文，对国民党又进行了抨击：

新起的政治势力为要巩固政权，与江浙金融资本家结合，于是种了豪门的恶因。抗日战争期间，这一政权为了巩固在四川的地位，与地主豪绅结合，于时加深地主在豪绅政治实际中的作用。国大代表与立法委员选举则将豪门政治与绅权政治的结果表露无遗。所以，品类不齐，光怪陆离，无奇不有。这种短视的现实主义的政治作风，和因革命阵营分裂，力量互相抵消而迟滞了中国社会依照计划的改革二十余年，而且由于二力相激相荡，加上日本军国主义者之侵袭所造成的社会动乱与经济破产，使得中国潜藏的宿疾一齐爆发。于是，中国陷于目前的大混乱中，人民痛苦已极，一切价值标准，道德律令，都失去了

① 《殷海光全集》第11卷，第20页。

约束力。国家好像是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境地！①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完全是用德国、意大利法西斯那一套办法统治人民。无论是国民党内，还是党外人士，只要在公开场合反对他和国民党，他就要进行打击、残害。1933年6月，蒋介石下令军统特务机关暗杀原东南大学工学院院长、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1934年11月13日，又指使戴笠秘密枪杀报业资本家、爱国民主人士史量才；1946年7月11日、15日，他再次指使特务在昆明谋害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

殷海光身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主笔，竟公开在报刊上批评、指责蒋介石、国民党的错误和问题，公然与蒋介石集团唱反调，其勇气和胆量，令人钦佩。

尽管现在没有资料证明殷海光当年是怎么写，又怎样将这些文章发表出来的，他写这些犯上文字，肯定冒了很大的风险，并作了掉头的准备。不然，他不敢用如此尖锐、激烈的言论公开批评蒋介石和国民党。

当然，殷海光此时批评、指责蒋介石、国民党，还是从关心、爱护国民党政权出发的，希望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在政策、方法上有些改进，并狠狠打击那些巧取豪夺的豪门巨富及混入国民党内的"不良"分子，以减轻人民的怨恨。

在此时刻，他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是行路问哑巴——白费口舌。因为蒋介石本身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是一个投机政客，是靠豪门巨富、地痞流氓和黑社会势力支持、帮助爬上权力顶峰的，他是他们的总代表，怎么可能又去打击他们呢？

他不具备孙中山先生那样的"领袖"素质、才能，自然不可能把

① 《殷海光全集》第11卷，第39页。

国民党领导成为一个老百姓拥护的党，也不可能把“中华民国”治成“太平盛世”。

6

殷海光为报社写社论：蒋介石当面训斥

1948年10月底，国民党政权在人民解放军的猛烈打击下，摇摇欲坠，南京城内，人心惶惶，人们普遍对国民党失去信心。

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的大小官员见此情景，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在此关键时刻，蒋介石及其国民党高官们应在各方面作些改进，并采取非常措施，凝结人心。不然，人心一散，如堤溃口，不可收拾。

当时，报社内的几个主笔都想就此问题写一篇社论和专论，但又觉得话不好讲，说轻

了，不起什么作用，说重了又怕遭受蒋介石或国民党的训斥、处分。

大家在一起议论了几次，没有一个人敢写。

一天，他们又议论起这件事时，殷海光火了，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人，口头上说关心国事，到真的要关心国事时，又怕这怕那。如果你们要是怕中华民国在大陆上消失了，就应鼓起勇气，壮着胆子写一篇《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

大家见殷海光那么认真，而且又生那么大的气，忍不住笑了。

过了一会，一个老主笔对殷海光说："殷先生，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一致推举你执笔，看你敢不敢写？"

"我敢写！"

"你如敢写，我们就推你写。"

大家一致鼓掌同意殷海光写。

殷海光想了一下，作为报社主笔写一篇社论，不费什么大力气。问题是社论写起来，报社的主要头头同不同意发，如不能发，就是石头上钉钉子——白费劲。

他将自己的想法，对各位主笔讲了。大家都说，社论写起来后，再一起向总头目讲，争取发出来。

为了"救国"，年轻气盛、"满腔热血"的殷海光真的动笔写起了《赶快收拾人心》。此社论不长，他只用了几个小时就拿出了初稿。

大家很快聚在一起讨论《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稿。殷海光向同事们念了两遍，大家除了在少数字句上提了一些意见外，一致称赞写得好，说出了大家想说又不敢说的心里话。

殷海光把稿子抄好后，又送给《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审阅。《中央日报》社的社论，是代表国民党说话。因此，陶希圣对社论稿子审查极严。陶希圣看了《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也感到写得很好，但又怕发出来惹麻烦，不敢签发。

陶希圣正在犹豫之际，几个主笔相约来到了陶希圣的办公室。陶希圣见主笔们都来了，问他们看过这篇稿子没有，大家都说看

了。陶希圣又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几个主笔说，此文是主笔们的一致意见，现在“国家”面临危亡，人心散了，大家十分焦急，故聚在一起商量写了这篇社论。当时，大家都怕写，殷海光说，为了“国家”，他什么也不怕，所以此社论由他执笔。这篇社论的语言虽然有些重，但重有重的好处，只有重才能促人猛醒，不痛不痒的话，说了没有用。大家都在舆论单位工作，又系书生，在这危难时刻，只有用舆论“救国”，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希望总主笔同意发表此社论。

陶希圣仍然有些犹豫，但主笔们一致要求他同意发表此社论。他反复考虑后，感到国民党政权已江河日下，如再这样发展下去，不仅仅是蒋介石的地位难保，自己的位子也难保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保住了“国家”，自己才有权位。为了“国家”说几句重话，也许能起些作用。

基于上述考虑，陶希圣将社论中几处太刺眼的文字作了修改后，签发了《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

平心而论，陶希圣平时非常谨慎小心，对蒋介石的任何指示，都很认真地执行，而且不敢越雷池半步。他这次签发了《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其用心不是攻击蒋介石、国民党，而是抱着治病下猛药的心态同意的。他认为，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1948 年 11 月 4 日，《中央日报》在显要位置上刊出了殷海光执笔的社论《赶快收拾人心》。此社论一面世，影响巨大。

为使读者了解、“欣赏”全文，现将这篇只有 1 700 字的社论抄录如下：

> 近来东北战事失利，政府当局也不再讳言，而变相的物价高涨，更是每个升斗小民所切身感受到的事实。广大人民陷入恐惧情绪和生活煎逼之中；这些真真实实的情形，真实得不是少数人爱听或不爱听所能抹煞，更真实得不是任何粉饰之词所能粉饰的了。

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奈何。靠着私人或政治关系而发横财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对于这般人民公敌，共产党的最大助手，不用说到现在还没有人替老百姓施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们捐输资财以戡乱救民，甚至不曾用指甲轻弹他们一下。人事上也偏私如故，似乎没有国人置喙的余地。国家弄成这个样子，老百姓人人装着一肚子闷气，我们该将怎么作呢？若不再为四万万国家主人翁抒发这股闷气的万分之一，何以对毕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国父在天之灵？何以对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生命的千万烈士之魂？更何以对全国受苦受难的同胞们？

在戡乱过程中，许多人只知道注意装备对付共产党的方法——总之，只知注重有形的物质条件，毫不注重精神条件，特别是政治改革。“军事是政治的延长”，这是人人应该明了的常识。没有健全的政治，怎么会有健全的军事？没有有生命有内容的政治，军事又怎么满意呢？国事发展到现在，应该使人痛切觉悟，欲求戡平共产党“祸乱”，挽回目前军事上不利的形势，固然不可不从注重加强军队之有形的装备着手，而更重要的则是由军事力量所从的政治改革着手。

19世纪中叶以后，共产党在德国具有相当势力。德国怎样应付这种局面呢？孙中山先生已经说过，德国首相卑斯麦毅然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而将藉以猖狂的题目从共产党手中夺过来，结果共产党在德国不复能有所作为。这证明了卑斯麦不愧为一手腕灵活的政治家。今日中国正遭受太平天国之变以后最大的变乱。固然这一变乱有国际阴谋为之助长扩张，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归根究底还

是由于中国社会内部毛病太多。共产党的主要目的虽是夺取政权，但是在表面都利用这些社会毛病号召人民。这就说明为什么戡平共产党是这么艰巨的事业。若是我们要戡平"赤祸"，我们必须效法卓斯麦对付共产党的办法，把题目从共产党手中夺过来。目前少数人这样享有一切特权，他们的生活骄奢淫逸，一文钱也不肯出，没有一个人去当兵，却完全要穷苦老百姓抽丁纳粮。这如何能使人心平气服，如何不令反对者有所借口？

国事演变到这个地步，势必牺牲极端少数的人来挽救最大多数的人。只有这样作才能将这个局势扭转过来。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就看是走多数派的路线还是走少数派的路线。如果走少数派的路线，只顾全少数人的利益权势，那么尽管口里喊革命，事实上是反革命。如果走多数派的路线，顾恤多数人的利益，即使口里不标榜革命，老百姓还是知道他是革命的。假若吾人能天下为公，用人唯才，疏远小人，罢黜一切害民之官，严办豪强特权之辈，减轻人民负担，将千千万万人民的负担放在极端少数豪门巨商身上，那么人民面目必然为之一新，前方军心立即因之而大振。区区共党部队，不足平也。

退一百步说，长江以南地区尚足可抵欧洲十余国，人口有两亿以上，出海便利，物资富饶，交通发达，较之北伐时代的凭藉，其优厚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要悲观？根本毛病就在自身。如果吾人能确实掌握并动员这一广大地区的人力物力，那么消灭共产党实绰有余力，而确定动员这一广大地区的人力物力，最根本的关键是收拾人心，而收拾人心，绝对不能靠一纸公文命令，必须靠政府负责先作几件大快人心之事，振奋沉闷已久之人心，示天下以无私，拿事实证明戡乱剿赤并非保卫特权阶层的利益，而确

系为保卫领土主权之完整，为保卫人民之自由平等，为保卫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若是吾人能作到此点，形势会为之一变。

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①

此期社论一出，立即在全国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据说，过去南京城内的《中央日报》不大好销，而这一天的《中央日报》，半天就销售一空。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的群众也纷纷争阅这天的《中央日报》。

国民党统治区的各阶层人士都为此社论拍手叫好。

全国各民间大报也分别在11月5日、6日、7日的显要版面上转载了《中央日报》上的这篇社论。

殷海光到《中央日报》任主笔后，社论、评论、专论写了不少，但在全国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要数此篇。

他写了这篇社论后，报社内就有人称他为"政论家"了。

不过，殷海光在文中写的一些内容，特别是向蒋介石、国民党提的一些建议、要求，太天真、太书生气了。如他在文中建议蒋介石政权要用人唯才，疏远小人，罢黜一切害民之官，严办豪强特权之辈，减轻人民负担等，蒋介石不可能这样做，也根本做不到。

先说用人问题。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叹鲁》一诗中说："由来富与权，不系才与贤。"这两句诗的意思是，富贵与权位，自古以来就不同才干和德行相联系。白居易的这两句诗，细细咀嚼，确是如此。蒋介石自当上国民党的总头目后，用人的标准，就是对他忠不忠，听不听话，是不是家乡人，不讲有无才干。中国的真正人才，都跑到共产党阵营里去了。因此，在蒋介石政权和他身边，大多系奴才、小人或平庸

① 1948年11月4日《中央日报》。

之辈，现在要他去用人才怎么可能呢？

再说“罢黜一切害民之官，严办豪强特权之辈”的问题。

此事对蒋介石来说，可说是要命的问题。因为蒋介石从不以天下为公，他本身就是个害民之官，是靠豪强特权的支持、帮助爬到权力顶峰的，又靠豪强特权生存，他是豪强特权的总代表，又怎么可以去罢黜“豪强特权”呢？

至于殷海光说到长江以南地区可抵欧洲十余国，人口有两亿以上，国民党退一步可以长江为界，在南部生存的问题，是更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他太低估了共产党、毛泽东的智慧和力量。毛泽东虽然没有显赫的学历，却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饱学之士，旷世奇才。他既能领导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绝不会允许蒋介石盘踞江南的。

殷海光未料到，《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发表的第二天，蒋介石就看到了，而且发了大脾气。他拍着桌子骂道：“这是什么屁社论？这是帮共产党打我们！《中央日报》成了共产党的工具了！”

他发过脾气之后，又叫侍从人员打电话给陶希圣，要陶希圣马上到总统府，他要追问《赶快收拾人心》是谁写的，又是怎么发表出来的。

陶希圣接到总统府的电话，心里就想到是《赶快收拾人心》出了问题。他当即对殷海光说：“走，我们一起到总统府去一趟。”

到了总统府，蒋介石的秘书将陶希圣、殷海光带到蒋介石的会客室。

此时，蒋介石余怒未消。

陶希圣见蒋介石的脸色不好，心里很紧张。殷海光胆子大，一点不害怕。

殷海光见陶希圣那么紧张，心里想：心底无私天地宽，这有什么怕的？

陶希圣与殷海光一坐下，蒋介石就问：“《赶快收拾人心》的社

论是谁写的?"

"我们……"

坐在一旁的殷海光见陶希圣吓得很厉害,又吞吞吐吐地不敢答话,便主动说:"这篇社论是我写的。"

蒋介石用手在桌子上一敲,很恼火地说:"谁叫你写的?"

"没有哪个叫,是我自己要写的。"

"你们是为共产党帮忙!这篇社论破坏了当前正在进行的戡乱剿'匪',损害了我的威信和形象,你们把《中央日报》办成了共产党的报刊!人心被这篇社论搞散了!"

陶希圣低着头一言不发。

殷海光见蒋介石发了大火,也只好不作声。

蒋介石又嚷了一阵,对陶希圣、殷海光说:"你们回去,今后再不要发这类不像话的文章,如再出这类事情,我要追究你们的责任!"

陶希圣连连点头。陶希圣是蒋介石面前的大红人,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蒋介石对陶希圣也很尊重,而且从未发过脾气。这一次,他发了火。可见,蒋介石对此社论是多么恼火。

陶希圣从蒋介石处出来,心情甚为沉重。

除开会外,殷海光这是第二次见蒋。以前,他写的反共文章、著作,蒋介石很欣赏,还专门接见、鼓励过他,认为他是国民党阵营中一位很有希望、很有培养前途的理论家,没有想到,只两三年的时间,他的思想就有了变化,竟写出这样的文章。

殷海光受了蒋介石的这次训斥,对蒋介石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他认为,国事坏到这种地步,蒋介石应该很认真地听取大家的意见,而且好话坏话都要听,并改过自新,做几件振奋人心的事。想不到,《中央日报》发了这篇说真话的社论,蒋介石发这么大的火。局势如此糟糕,蒋介石还听不进真话,不要人说真话。此事说明,蒋介石的品质、人格大有问题,不是那些吹牛拍马、阿谀奉承分

子们吹捧的那样“伟大”、“英明”，国民党由这样的人掌舵，焉有不败的？

自此之后，殷海光再也不在《中央日报》上写歌颂蒋介石、国民党的文章了。

《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自在《中央日报》发表后，一直成为批评国民党、蒋介石的经典之作，美国、香港、台湾出版的许多政论文集都收录了此文。

祖国大陆的一些党史资料、参考书，也收录了这篇社论，199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政论文集《国民党怎样丢掉了中国大陆》，也收录了此社论。只是此文发表时，是以《中央日报》社论的形式出现的，读者不知是政论家殷海光所写，也不知作者还为此事受过蒋介石的斥责。

7

国民党士大夫悲观：殷海光撰文打气

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取得了巨大胜利。国民党军队在全国各战场连连大败，使蒋介石政权惊恐万状。11月9日，蒋介石为挽救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特地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去电报，乞求杜鲁门发表一个坚决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宣言或声明，并称，国民党政府及作战官兵如见到这样一篇宣言，将可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也可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利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

蒋介石在电报中，还乞求美国政府迅速

增加军事援助。

11月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举行联席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通报了近年来与中共军队作战的情况，要求与会人员要有长期"剿匪"的精神准备，他还说："抗战打了8年，'剿匪'也需8年。"

这一天下午，国民党在中央党部举行"总理逝世纪念周会"，蒋介石出席了会议。殷海光以《中央日报》记者身分，也参加了此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大发脾气，愤怒指责主张与共产党求和的一些国民党人是书生之见，求和是丧失了民族精神，完全是"投降主义者"。蒋发誓说："一切和平论调绝不影响我们战斗到底的决心"。

谈到在东北战场的接连失利时，蒋介石说："最近东北重要据点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这一次东北战役是我们最大的教训，也是我们最大的挫折，我们永志不忘。"①

蒋介石还吹嘘说："各位可以相信我一定有转危为安的把握。"②

这两次会议，殷海光只参加了后一次。他从去过会场的记者口里得知，蒋介石在会上的话虽然讲得很硬，听讲的人却无什么信心，散了会后大家唉声叹气，情绪低落，感到国民党今后没有出路。

11月至12月上中旬，殷海光在工作之余，经常与南京新闻、文化、教育界的一些名人、学者聚谈。殷海光在与他们的接触过程中，发现他们的心情很不好，对"国事"完全失去信心。殷海光问他们有什么好主张、好建议、好办法没有，很多人说："有办法的没有权，有权的又没有办法；党权、军权、政权都握在蒋介石一人手中，他又无回天之术。我们系一介书生，无权无势，无钱无枪，有何用呢？"

---

①② 李勇、张仲田编：《蒋介石年谱》，第360、361页。

更使殷海光吃惊的是，蒋介石的一位秘书对时局也失去了信心。

有一天，两人谈起时局时，殷海光告诉他，国事已到崩溃的边缘，南京城内的上上下下很着急，大家又感到没有什么好办法，再不想法子，"中华民国"就完了。殷海光希望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大小官员，利用与蒋接触较多的机会，给蒋介石出些好点子、高计谋，并从政策到用人，帮助蒋介石作些反思。这位秘书听后摇头说："我们的心情与大家是一样的，但无能为力。"

殷海光惊异地问他："为什么呢？"

蒋介石的秘书说："这一段时间，有很多人士给总统府来信来访，内容多是给蒋委员长提建议、出点子，以挽救危局。这些来信来访的人士谈的建议都很好，他们的出发点也是好的，我选了一些呈给蒋委员长。蒋委员长从北平回来后，因东北战事接连失利，心情一直不好，没有心思看。依我之见，他即使看，也看不进去。"

"你们作秘书的也可直接向他提建议呀。"

"提过了。"

"蒋先生能接受吗？"

蒋介石的秘书又摇了摇头，很灰心地说："古人讲了，百无一用是书生，有什么办法呢？挽救危亡，打败共产党，是蒋委员长和那些军人们的事。"

殷海光虽然对蒋介石、国民党极其不满，但又不愿看到这个政权马上垮台，更不希望共产党夺取政权。他听了蒋介石秘书的言论，又见他连连叹气，不满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且，知识分子的责任还大些，你们在蒋先生手下做事，责任就更大了。"

蒋介石的秘书见殷海光沉着脸，又很不高兴的样子，直接了当地对殷海光说："殷先生，你在国民党阵营干了这么多年，难道还不知国民党和政府的运作过程？国民党的大小事情，包括政务、军事，都是蒋委员长一人说了算。在这种情况下，书生们能起什么作用？"

蒋介石的秘书说完，掉头走了。

此后，殷海光又碰到政界的几个文人，与他们一谈到时局，他们都说虽然身在高位，却系文弱书生，满腹经纶无益于世，也帮不了蒋介石及其政府什么忙，对每况愈下的局势无可奈何。

听了这些言论，殷海光认为，这些士大夫，或者说是知识分子，都是胸无大志，眼光近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遇挫折，灰心丧气。一个国家，如果知识分子对国事失去信心，无所作为，是最可怕的。因为，知识分子，特别是上层知识分子，是社会最敏感、最先进、最有智慧的一个阶层，其思想和言行，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知识分子，不仅能服务社会，还能改造、变革社会，怎么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呢？如果任凭知识分子的这种失望、灰心的情绪发展下去，国家真是没有希望了。

恰在这时，国民党高层又发生了一件令殷海光十分震惊的事情——蒋介石的文臣、幕僚陈布雷服药自杀了。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笔名曰彦，浙江省慈溪县人，生于1890年，少年时代在慈溪、杭州读书，青年时代当过记者、教师、编辑，1912年加入同盟会，1927年2月由蒋介石、陈果夫介绍加入国民党，历任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浙江省教育厅长，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特别外交委员会委员，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从1934年2月起，陈布雷被蒋介石调到身边，为蒋起草文件、电文、讲话、文章，并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

陈布雷对蒋忠心耿耿，任劳任怨，蒋介石对陈也很信任。大约从1943年起，陈布雷见国民党内政治腐败，民怨沸腾，十分焦急。他多次向蒋介石建议，要蒋很好地根治党、政、军中的腐败问题，不然将危及政权。那时，蒋介石一天到晚总在想怎样消灭共产党的问

题，对党、政、军内存在的腐败充耳不闻，致使国民党内的腐败和争权夺利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为此，陈布雷非常难过、失望。

此外，陈布雷在蒋介石身边工作期间，见蒋喜怒无常，出尔反尔，加上工作太忙，事情太多，长期超负荷运转，致使其身体日益衰弱，特别是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常弄得他食而无味，夜不能眠，痛苦异常。

辽沈战役之后，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大部被歼，陈布雷见蒋军连连失地丧师，心急如焚。他抱着努最后一把力的想法，力劝蒋介石罢兵休战，与共产党谋和，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蒋介石的态度，使陈布雷饱受刺激，感到再跟蒋介石干下去，没有什么好结果。

1948 年 11 月 13 日早晨，极度痛苦的陈布雷在绝望中服安眠药自杀。

陶希圣得到消息后，马上赶到陈家去看望。下午 1 点左右，蒋介石到陈家来看时，陶希圣将陈布雷的遗书送给蒋介石看。蒋看后，流了眼泪。随后，陶希圣叫人将陈布雷的遗书和给蒋介石的信抄一份带回中央日报社。

陶希圣将陈布雷自杀的情况告诉了殷海光，殷吃了一惊，当即问道："陈先生的遗书和给蒋先生的信，可否给我看看？"

"可以。"

陶希圣当即从衣袋里掏出陈布雷的遗书和信，然后递给殷海光，并嘱咐道："暂不要对别人说，《中央日报》是否发个消息，怎样发布布雷去世的消息，要请示委员长才能定。"

陈布雷给蒋介石的信中，有一段话引起了殷海光的注意，这段话是：

> ……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无丝毫可以效命之能力，

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个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毫无价值之一生。……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自解也……①

殷海光看了陈布雷的遗书及给蒋介石的信后，既为陈布雷自杀感到惋惜、难过，又觉得陈布雷不应走自杀之路。陈布雷在信中说的"书生无用"，是很不对的，也可说是谬论。

11 月 19 日，天津《民国日报》等报在显要位置上刊登了陈布雷的遗书及给蒋介石的信。

陈布雷的自杀及他给蒋介石的信在社会上公开后，在蒋介石政权内部，尤其是高层震动很大，很多官吏都认为，陈布雷跟蒋介石卖命一生，又是蒋的贴身官吏，连他都感到蒋介石、国民党无药可救，再没有任何希望，那还有什么干头呢？

殷海光感到，蒋介石政府除了要在战场上扭转不利战局外，当务之急是要树立人们的信心，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的信心。自己作为《中央日报》主笔，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针对社会上流行及陈布雷说的"书生无用"，他决定写一篇《书生之用》的文章，论述知识分子在"救国"中的特殊作用。

1948 年 12 月中旬，他将自己的想法对国民党大员陶希圣讲了，得到陶希圣的赞同与支持。

他的文章很快写起来了。

12 月 29 日，殷海光的文章《书生之用》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发表。殷海光在文中说：

---

① 1948 年 11 月 19 日天津《民国日报》。

“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是常听到的批评书生的话。

目前的局势看，有心之士，均了解国家病象之所在，徒则难不作救，只有嗟然叹息，这种现象，更使人觉得“百无一用是书生”，而书生对于这种批评，似乎只有默默承诏。

这是国家、民族至上的危机，书生亟应重新认识自己。

在中国的传统里，对于读书人的看法，向来以“士为四民之首”。这种看法，不是没有相当理由的。从经济的观点看，一般读书人是社会的中小资产阶级……

作为“四民之首”的读书人，无论在实际上或非实际上，对于国家民族都有巨大功能。

孔仲尼是一书生，他藉集大成而创建的说教，无论是好是坏，影响甚至于支配了中国的政治两千多年……

研究医学的书生，从事革命，革命居然成功了，辛亥革命的成功，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两千多年来最大的事，这一运动推翻了几千年的专制政体，使远东出现了一个民主共和国政体。

书生的功用实际大得很。当着统治阶级腐败无能，小人当道，弄得政治败坏，民不聊生的时候，挺身而起，与恶势力搏斗的，常常是书生；当着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势阽危的时候，不计成败利钝，奋起救亡图存的，常常是书生。这样的事例，至少在中国历史上是太多了。

……

这些读书人之所行之事，成或不成，或显或隐，那是抱着一个理想而前进的，他们这些书生，达固然可以兼天下，不达也可以使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内在精神得到潜伏的发展，这一内在的精神之潜伏的发展，是中华民族不

灭亡的重要因素，而促成这一精神发展的，不是急功好利之徒，而是被人视为迂腐无用的书生。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世界没有读书人，人类永远停留在原始状态。

中国没有顶天立地的读书人，民族早已灭亡了。

只有不尊重智者的国家才轻视书生，尊重智者的民族，一定尊重书生，而尊重书生，必须从书生自我尊重开始。而在这一苦厄的时代，书生自尊的出发点是：

"任重而道远，士不可以不宏义"。①

"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话，来自清代著名诗人黄景仁的《杂感》一诗，全诗原文是：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黄景仁系江苏武进县人，生于1749年，死于1783年，只活了34岁。他是个饱学之士，诗作得很有名。他成人后，踌躇满志，想有所为，并将自己的知识贡献社会，服务民众。可惜，他生不逢时，雄心大志难以实现，甚至连温饱问题也难以解决。由于他学的知识无处可用，便在家里写诗泄愤。他的诗作，多是表达自己穷愁不遇，寂寞凄怆、哀叹无能为力和无奈的思想。

殷海光写这篇专论的目的，显然是为国民党的士大夫打气。他要告诉大家，"国家"快要亡了，知识分子不要悲观，不要认为自己是书生，就放弃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更不能走陈布雷的路。书生有很大的作用，而且智慧、作用发挥出来，能量巨大，既可救亡图存，也可使蒋介石及其政权改弦更张。

不过，殷海光写此文的用意虽深，却又太不识时务。也可说是

① 1948年12月29日《中央日报》。

一厢情愿。因为，此时的局势，是由共产党内的一些优秀书生开展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运动，此运动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洪流滚滚，势不可挡，蒋介石无法改变，国民党阵营的其他任何书生也无法改变。

8

蒋介石被迫“引退”：蒋经国要殷海光去台

1949年1月1日，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发表了一个数千言的《元旦文告》。在此文告中，蒋介石声称愿与共产党和议，并说和议无害于国家独立完整，有助于人民休养生息，但又说不愿放弃国民党的统治权。

毛泽东看透了蒋介石的心机，马上以新华社的名义写了《评战犯求和》，拆穿了蒋介石想用议和来保持政治、军事实力，继续维持其法西斯统治的阴谋。

过了5天，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淮海战役第三阶段胜利告捷，国民党第二、十三两个

兵团被全歼，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活捉。至此，震惊中外的淮海大战结束。

蒋介石"戡乱"的精锐部队大部被人民解放军消灭后，国民党内要求蒋介石下台的声音不绝于耳。蒋介石感到，他的"总统"再难以当下去了，决定"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1月21日，蒋介石正式发表"引退公告"，全文如下：

>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因决定自然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爰依据"中华民国宪法"49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之和平。中正毕身从事国民革命，服应三民主义，自15年由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现民主、康济民生为职志；同时即认定必须确保和平，而后一切政治经济之改进，始有巩固之基础。故先后20余年，只有对抗日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牺牲一切，忍让为国，往事斑斑，世所共见。假令共产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蒋中正。①

22日，殷海光看了这个"引退声明"，心里好不高兴。看了两三

① 1949年1月21日《中央日报》。

遍后，他又对这个声明作了细致的分析。他心想：国家的事情坏到这种地步，全是蒋介石的独裁造成的。“戡乱”以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并无领导国家的才干，为人也很有问题。在此时刻，他应退下来，以负失败之责。“中华民国”政府的名声已很不好，“总统”应换个新面孔，收拾乱摊子。不然。国民党及其政府没有任何希望。

他从蒋介石的“引退”，似乎看到了一点希望。

他不知道，蒋介石的这个“引退声明”，不过是个推卸责任，以退为进的政治手腕，骨子里，蒋是不愿“引退”的。

1949 年 2 月，中央日报社接到撤退台湾的通知。

此时，他的心情很矛盾。去吧，看不到什么希望，共产党军队将来打到台湾，再往哪里去呢？不去吧，自己混到“主笔”地位很不易，今后再到哪里去找如此重要的工作呢？再说，自己过去写了那么多反共文章和著作，大陆解放了，共产党能轻饶吗？

一天，他与报社另几个主笔谈到这一想法时，大家都主张到台湾去。他们的看法是，《中央日报》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宣传阵地、喉舌，不去台湾将落入共产党之手，日子不会好过。

他将自己的想法又向一位很知己的朋友说了，这位知己摇了摇头说：“到台湾恐怕也没有什么希望。”

殷海光问他：“为什么呢？”

这位知己说：“蒋介石虽然在 1 月 21 日正式宣布引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却在 1 月 24 日又向全国各直辖党部发了一个机密文件，题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蒋总裁引退对全国同志指示文》的文件，该文件的第二条就说，无论总裁之行止何在，全党同志均应竭诚尽力，接受领导，继续奋斗。这就是说，他把‘总统’职位暂交给了李宗仁，实际上，他仍可以‘总裁’的名义，领导国民党、李宗仁、国民政府。他是丢位不丢权，任什么职，什么权最大。国民党的一切大权仍握在他的手中。你跟随他到台湾，能有什么前途？我跟你说实际话，我准备去香港或美国。”

这位知己的话，使殷海光去台湾的思想又有所动摇。

一天，殷海光去找陶希圣，意外地碰到了蒋经国。

蒋经国与殷海光很熟，他问殷海光："你什么时候走？"

殷海光说："我们报社的人马上就要动身，我怎么走，还未正式定。"

蒋经国见殷海光还在犹豫，劝他说："过去，你为反共事业作了很多宣传工作，总裁对你很不错，我对你也很信任。在这决定国家和你个人命运的关键时刻，你不要犹豫。今后，国家还需要你这样的理论人才。我们在大陆的军事失败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你也要看到，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在军事上的失利，是暂时的挫折，到台湾再干。要不了多久，我们就可重新打回大陆的。你过去那么积极地反共，如果留在大陆，共产党不会轻放你的。你千万不要留在大陆，不然，你后悔莫及。"

殷海光没有表态，只好点点头。

蒋经国怕殷海光留在大陆，临走时，又重重地叮嘱道："你一定要去台湾！"

殷海光见他说得很认真，便说："我知道。"

蒋经国走后，对殷海光放心不下，又打电话找陶希圣，告知今后国民党很需要殷海光这样的宣传人才，要陶希圣赶快找殷海光谈一次话，力劝殷海光到台湾去。陶希圣接电话后，立即找殷海光做工作，希望殷海光听蒋经国的，坚定地跟蒋介石走。在此关键时刻，不要三心二意，一定要随报社到台湾去。

殷海光思前想后，觉得也只有到台湾去。他的计划是：去了之后，如果蒋介石仍像在大陆一样施政，自己感到不适合在国民党阵营时，就离开《中央日报》或到第三地去。

殷海光作出的这一决定，后人对此评价不一。有的说，他不该去台湾；有的说，他应该去香港、澳门或美国。如果他不去台湾，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么多波折和苦难，也不会英年早逝。

笔者认为，对殷海光是否应该到台湾，不能作简单的评判。他当初如不去台湾，后来也许不会有“重要思想家殷海光”了。因为他去香港、澳门或美国，极有可能做个纯学者。依他的为人与个性，他能否在非常平静的环境里，在学术领域做出很大的成就来，也很难说。所以，他的弟子、著名作家李敖说，用学者的尺度来衡量殷海光，是一种浅见。

国民党没有料到，这位青年理论家被他们劝到台湾后，不但未给他们做什么有影响的宣传工作，反倒成了他们最为头痛的一支笔，最痛恨的大敌。

大约在3月初，殷海光的女友夏君璐到了南京。他再无什么牵挂，决定与女友一起到台湾去。

1949年3月，《中央日报》在台湾复刊。此后，殷海光任了五个月的主笔即辞去职务，到台湾大学任教。

他辞职，除了对《中央日报》的国民党官僚不满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再不愿为私心很重、权迷心窍、声名狼藉的蒋介石及其政权歌功颂德了。

自此，他与蒋家分道扬镳，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后来，蒋介石父子还想拉拢他，他看透了蒋氏父子，拒不与他们合作。

50年代初期，殷海光在台湾大学一面教学，一面在《自由中国》和香港《祖国》周刊上写了大量政论文章，引起台湾、香港广大读者的强烈共鸣，因而名声大噪。

他的文章、思想、言行也引起美国方面的注意。1954年，美国国务院通过台湾大使馆向他发出“请柬”，邀请他去美国作考察研究。

1955年春，殷海光以“访问学者”的名义，去美国作考察、研究工作半年，同年6月回到台湾。

他从美国回台后，不遗余力地在台湾鼓吹罗素哲学和自由民

主理论，希望通过传播海外的新思想、新潮流，改变台湾现状，结束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

殷海光此举，又为蒋家所不容。因此，殷海光与蒋氏父子的矛盾越来越大，越来越尖锐。

9

殷海光写“设防”社论：蒋介石破口大骂

1949年3月12日，迁到台湾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开始在台北出报并发表社论《我们的信念》。

当时，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及部分军人，通过各种途径，陆续涌到台湾，岛上一下子加了这么多人，各方面都十分混乱。

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虽然有了一处暂时的落脚地，仍觉得台湾难以守住。他们认为，要不了多久，共产党军队就要向台湾进军。

当时的台湾因政局不稳，导致物价飞涨，

黑势力猖獗，人心惶惶。有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到台后，见台湾人心不定，而且大家都是临时打算，又想方设法往香港、澳门及美国跑，还有一些高级军政人员将刚刚迁到台岛的家属、子女转往第三地。

为了安定人心，巩固台岛的安全，蒋介石指示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迅即采取设防措施。

2月26日、27日，陈诚下令在台湾全省进行户口总清查。为防止共产党员进入台湾和无户口人员躲避清查，陈诚下令清查户口期间，进出台湾的海陆空交通一律停止运行，岛内交通也暂行停止。

3月26日，陈诚在台北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不准大陆人进入台湾，并强调此举是为了维护台湾地方的安全。

在军事上，蒋介石下令撤退到台湾的军队一边整顿、训练、购置各种武器、装备，一边日夜在沿海修建碉堡、战壕和其他防御工事。在修建军事设施期间，台湾的所有机关、团体、学校及家属都要为军事设防出力、让路。除此之外，大中学校师生、机关的职员，还有工人、农民，不停地展开防空、救护演习，《保卫大台湾》的歌曲，响彻全岛。

对蒋介石集团的设防措施，殷海光颇有看法。他认为，台湾在军事上防止人民解放军的进攻是必要的，但主要是动员军民从心理上设防，军事上的设防应由军人去做。人民的生活太困苦，设防不应搞形式主义，更不应劳民伤财，无端耗费工人、农民、学生的时光和钱财。

他将自己的想法与报社的负责人及同事讲了，得到一些人的赞同。还有一些人建议殷海光就此问题写一社论。

那时，殷海光年轻耿直，又无私心，大家一鼓励，他就答应了。至于这社论是否为高层所接受，蒋介石是否有意见，他没有怎么去考虑。

1949 年 5 月初，殷海光为《中央日报》写了社论《设防的基础在人心》，此社论发表在 5 月 12 日的《中央日报》显要位置上，社论说：

一谈到设防，许多人容易联想到军事设防：修炮台，建机场，兴海军。其实，军事设防只是设防的一方面，设防的方面很多，除军事的设防以外，尚有政治设防、经济设防、文化设防等等。台湾在这些方面都以设防为中心旨趣，才算完备的设防，而这各方面的设防之真正基础何在？在台湾 700 万人心。

从过去战例说来，自古无不可摧破的军事防御工程，如果其他方面不能配合军事防御，那末军事防御工程终必归于无用。法国马奇诺防线是赫赫有名的世界伟大防御工程。德法两国是积世深仇，常常以兵戈相见，法国国防部长马奇诺将军，计划建立一永久性的防御工程，藉以阻止德国军队的侵袭，而奠法国国防于永固之基，用意不可谓不善。这条防线自 1927 年开始建造，至 1935 年才大体完成，防线的建造前后费时八年，并且于建成后随时加添现代化的设备以增强它的防御能力。防御体系中，所包含的炮垒多至以千计，有完整的地下铁道，地下城市，以及动力站等等，耗资巨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有恃而无恐，法军高级司令部都说此线不可逾越，咸以为“固若金汤”，战事虽已爆发，大小政党依然躲在防线后面勾心斗角，掀动政潮，大闹磨擦。等到德国机械化部队猛烈进攻，法人倚若长城的马奇诺防线，不旋踵而肢解寸断，国都巴黎陷落，被迫作城下之盟。与马奇诺防线平行的，是德国的齐革飞防线，德军为建造这一条防线动员民众达 40 万以上。然而，大战日久，德国社会内部矛盾一天

加深一天。在西欧第二战场开辟，联军登陆，德军节节败退以后，齐革飞防线的命运，正如马奇诺防线一样，被突破扫荡，德国因此败亡。

长江古称天堑，界分南北，历代自北方南下的侵略，一到江边当望江兴叹。北方异族更视渡江为畏途。强秦苻坚大败于东晋。从自然地理形势看来，长江应该可以坚守……

军事设防，诚然是必不可无的，但只是一方面的，更严峻地说，只是表面的。设防的真正基础，在乎人心。……万众坚强团结的长城，再着以坚强的军事设防，那么便真正坚不可摧了。

现在台省700万人心，是否团结一致呢？事势之紧迫，不容我们自欺欺人了。而且万一恶运临头，小百姓更为遭殃，所以不容我们再不痛切呼吁了。台省人民，自光复以来，生活情况是一日不如一日，在物价方面，人为操纵，以致觉得这么高，压得人民透不过气来。机关则多如牛毛，养闲人以万计，增加人民负担，人人装着一肚子闷气。内地腐毒的政治因素，随着政治垃圾之大批入口，作用于台省每一个角落，使台省发生腐蚀现象。如此下去，不要多久，台省也会随着内地而下沉的。这种情形存在，如何可以团结人心。人心不能团结，纵有金城汤池，何能免于内溃？

今日欲团结台省人心，从根本上坚强台省防务，必须赶快消除使台胞痛苦闷气的因素。要消除这些因素，必须火速痛下决心，清除政治上一切腐毒败恶的势力，挽救濒于崩溃的边沿的经济，改善人民生活。①

① 1949年5月12日台湾《中央日报》。

由于这篇社论中有“政治垃圾”一词，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这四个字成为台湾人们的日常用语，并成为一些人攻击他人的口头语。

殷海光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这篇社论时，蒋介石正在浙江舟山策划东南地区的防御作战。到5月28日，蒋介石乘飞机离开马公岛再返台湾冈山，然后转到高雄寿山。

在寿山，他与一帮心腹又重新拟定了台湾的防守计划，决定以舟山、马祖、金门潮湖为前哨，并将上述三地作为“反攻复国”的桥梁。

当时，因交通不便及时局又太紧张，在台北出版的《中央日报》无法运到大陆，蒋介石未看到5月12日的报纸。

他在台北住下来后，想起有一段时间未看报纸，便吩咐身边人员弄来了近一个月来的《中央日报》。翻着翻着，5月12日的社论《设防的基础在人心》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他刚刚在高雄寿山研究、决定了台湾的防务计划，这篇在一个多月前论述台湾设防的社论，自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蒋介石看完社论，顿时火冒三丈，大骂道：“娘希匹，这哪是我们的报纸？这社论与共产党骂我们的话一模一样！”

他立即叫人打电话找来主管宣传的陶希圣，并很生气地问道：“5月12日的社论你看了没有？”

陶希圣说：“看了。”

“那篇社论是谁写的？”

“殷海光。”

“又是他！”

“是的。”

蒋介石仍火气冲冲地说：“这篇社论写得很坏，比共产党骂我们的话还厉害。这样的社论是怎么发表的？他说跟随我到台湾来的党‘国’军政人员是‘政治垃圾’，这是什么话？殷海光也到台湾来

了，他是不是'政治垃圾'？从现在起，要对《中央日报》进行彻底整顿！再不能要殷海光在《中央日报》做主笔！"

蒋介石又骂又发火，陶希圣心里紧张极了。心想，蒋介石正在气头上，现在有话也不好讲，只有答应按蒋的意见办。他连连说："是，按总裁的指示办，按……"

陶希圣从蒋介石处出来后，连忙赶到《中央日报》，将报社的负责人、总主笔、主笔找来开会，传达了蒋介石的批评意见。对解聘殷海光的问题，陶希圣未向报社传达。

陶希圣未将解聘殷海光的意见作传达，其原因有二：第一，殷海光的一支笔，对国民党很有用，他如离开《中央日报》，再很难找到他这样水准的主笔；第二，陶希圣与殷海光同系黄冈县人，当年又是他要到《中央日报》社的，两人之间有些感情，舍不得他离开。

会议开完之后，陶希圣私下找殷海光谈话，向他告知，蒋介石为《设防的基础在人心》社论大发脾气，还骂了人，希望以后注意一点，再不要写这类社论和专论。

陶希圣还对殷海光说："蒋总裁要中央日报社解聘你，我考虑他是在气头上说的话，本党的宣传事业及《中央日报》不能没有你，故未向《中央日报》传达总裁的意见，我准备在近几天内找个机会再与总裁谈谈，说你对5月12日的社论已做了认真的反思，并认了错，而且很后悔，只在党内给予适当处分，同时，也希望总裁谅解。这样，可使你继续在中央日报社做主笔。"

殷海光听了陶希圣谈的情况，感到很惊奇。《设防的基础在人心》那篇社论虽然有几句批评的语言，那是好心说直话，希望蒋介石在组织台湾的防务时，要注意发生的问题，团结人民大众，共同设防，不要搞单纯的形式上的军事防御，以免台湾又蹈长江防线的覆辙。没有想到，蒋介石领导的"戡乱"大业，败到如此程度，还听不进良言，还不要人讲真话，这是什么总裁？

他望着对面的陶希圣，感到不好说什么，只有苦笑。

陶希圣见他一脸无奈的样子，看出他心里很痛苦。过了好一阵，陶希圣对殷海光说："我知道你心里很不好受。但你也要知道，我也很难。那边是总裁，是我的上司，他的脾气那么大，又说一不二，你这边是我的同乡，我想来想去，觉得只有这样处理。"

殷海光深知陶希圣的个性与为人，他的一生，一切都以蒋介石的意见为准则，没有原则，没有是非。蒋介石为《设防的基础在人心》骂人、发火，他主管宣传，自然有责任，希望他为自己挑如此重的担子，那是不可能的。

想到这里，殷海光对陶希圣说："蒋总裁高高在上，我只不过是一个主笔，他要怎么处理我，我也毫无办法，现在只有听天由命了。你既是我的上司，又是我的同乡，我希望不要为我的事，弄得你不好在蒋先生面前做事。"

此后，国民党是怎么处理殷海光的，因殷海光从未对人讲过，不得而知。后来的事实是，过了两三个月，殷海光再未在《中央日报》做主笔，并离开了报社。

近十年来，台湾一些研究殷海光的专家、学者，论及殷海光离开《中央日报》到台湾大学屈就"讲师"时，说这对殷海光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事，他从思想到行动，与国民党、蒋介石作彻底的决裂，这里面必有内因。

笔者研究殷海光多年，对这个问题作过探讨，但一直找不到证据。我还为此问过殷夫人，她也说不清楚这件事。直到 1998 年，笔者在台湾友人、企业家陈宏正先生的帮助下，弄到一套《雷震全集》，才找到了这个问题的一些证据。

据雷震日记中记载，1960 年 4 月 17 日，殷海光的同事雷震约请"国大代表"、《香港时报》负责人雷啸岑、民社党负责人夏涛声吃饭。在席上，他们谈到了《自由中国》杂志与殷海光。雷啸岑说，他与殷海光系老熟人，又系同事，对殷的情况很了解。殷海光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影响很大。《中央日报》上的"政治垃圾"

(指《设防的基础在人心》)一文是殷海光写的,因为那篇文章,殷海光被蒋介石骂了一顿,并免去了《中央日报》主笔之职。当天,雷震将雷啸岑的这些话记到了日记中。

雷啸岑长期在国民党阵营主持新闻工作,也曾在《中央日报》任主笔,后被国民党派往香港办《香港时报》。他当时与殷海光同在中央日报社,所讲之事,比较可信。

但他讲的此事又有两点错误:一是殷海光的《中央日报》主笔之职不是免的,而是辞的。如果是免职,陶希圣1949年8月8日不会写信劝殷海光继续留在《中央日报》,了解殷的另一些国民党大员也不会极力挽留他;二是蒋介石未当面骂他,蒋介石骂殷海光,是陶希圣等人后来转达的。

依以上情况分析,笔者认为,殷海光当时系国民党员,根据该党过去惯例,党员犯了错误,违了纪,先多半是进行党纪处分。殷海光当时极有可能是在党内受过某种处分。受处分后,他不服气,加之他在《中央日报》的人事关系也很紧张,一气之下,辞去了中央日报社的所有职务,并与国民党一刀两断。

殷海光离开《中央日报》后,地位虽然低了,待遇也差了许多,但这对追求自由民主的殷海光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解脱。因为,他只有离开《中央日报》这口大酱缸、大是非窝,才有真正的自由和清白,才成为对台湾社会有过重要影响的斗士、旗手、学者、思想家。

10

蒋介石改造党组织：殷海光撰文评论

1949年1月21日，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回到浙江奉化。

他不在位了，便在老家静心对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作了反思与检讨。他认为，国民党表面失败在军事上，实际失败在党务上。国民党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派系林立，没有战斗力，所以国共内战一开，军队不堪一击，兵败如山倒。

在溪口，蒋介石多次对儿子蒋经国及其亲信说："国民党今后欲谋出路，首先必须对党的组织进行改造，而且是脱胎换骨的改造，

不然的话，党绝无希望。”

蒋经国说他也有此想法。父子二人，不谋而合。

此后，蒋介石在溪口闲得无事时，就苦苦思索对国民党如何进行改造的问题。

1949年1月至4月，蒋介石先后与来晋见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黄少谷、王叔铭、袁守谦、阎锡山、谷正纲、张治中、吴鼎昌、万耀煌、宋希濂、张群、俞济时等人，谈过将来要对国民党组织进行彻底改造的问题。

3月10日晚，蒋介石与到溪口的袁守谦共进晚餐。在桌子上，蒋介石着重向袁守谦谈了将来对国民党进行改造的想法。他还提出改造分三个阶段进行，一是整理，二是改造，三是新生。

1949年7月8日，蒋介石在台北主持召开整理党务会议，讨论国民党的改造方案。会上，一些国民党大员发言说，鉴于过去党权过于集中而造成失败的教训，国民党的性质应该为民主政党。蒋介石不同意此意见，认为国民党应为革命的政党，而不能纯粹为“民主”政党，此时一切必须以重新做起为要旨，要从小处做起。

7月16日上午，蒋介石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与中正会联席会议。会上，通过了蒋介石一手操持的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的决议，蒋介石任非常委员会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张群、阎锡山、吴忠信、吴铁城、陈立夫、居正、于右任、何应钦、朱家骅为委员，洪兰友、程思远为正副秘书长。

此次会上，蒋介石除向与会大员报告了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的会谈经过及全力保卫广州的方案外，还提出了《改造党务方案》，把国民党的改造作为继续反共的根本措施。

过了两天，也就是7月18日，蒋介石又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会上经过激烈的讨论，决定接受蒋介石提出的《本党改造案》。此案强调说：对国民党的组织进行改造，是一个根本措施，必须把党改造好，才能刷新政治，发展经济，加强军事，扭

转局势。

会上，还决定成立“改造筹备委员会”。

殷海光对蒋介石搞的国民党改造运动极为关注，他很想看看蒋介石到底要把国民党改造成什么样子。因此，他把蒋介石对这个问题的讲话搜集到一起，然后抽时间进行仔细研究。他看了蒋介石的每次讲话和《党务改造方案》后，感到很不对劲，认为按蒋介石的方法、方式改造国民党，很难扭转不利局势，更不用说有光明前途了。

抱着说真话、直话的想法，他决定写一篇论此次改造运动的文章，以表达个人的看法。7月23日，他写的《论国民党的改造运动》专论，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他在文中说：

> 国民党的改造运动酝酿了很久。抗日民族战争期间，国民党的中央机构随“政府”驻在重庆的时候，就有“革新”运动之酝酿。那个时候，国民党的情势，还不及现在这样恶劣。改造的必要在当时已经为大家感觉到。所以，“革新”的呼声一出，许多乞求改革进步的党员都同声响应。党外同情人士，也寄于莫大的期望。可是，那时一方面大敌当前，另一方面因为本党一部分人士还没有彻底觉悟，所以，“革新”之声，不旋踵即幻灭。
>
> 这次，本党总裁（指蒋介石）蔽聪，对于本党之改造，致力甚多，广州政治观察家云：“蒋总裁此行之重大收获，厥在完成党内之改造，加强团结。”由此可见，患影已久的蒋总裁，对于改造国民党之必要，已有深刻认识，并且拿行动来推进。吾人期望蒋先生此行获有重大成果。①

① 1949年7月23日台湾《中央日报》。

殷海光在专论中叙述了国民党在半个世纪过程中的历次改组经过后，谈了自己对这一次改造运动的看法：

> 这一段历史是非常富于启示作用的。今日本党要转弱为强，要能发挥力量，以抵抗××××侵略，必须改组，这是大家公认的事。但是改组如果只改形式，只变形不变质，其为徒劳无功殆为必然之事。今日欲使改组获得实效，必须吸收国内、国际二方面之力量，并对三民主义重新加以研究认识。当前国内人民普遍的要求为获得自由与面包，为反极权统治与实现民主自由。针对这些要求，本党一改以往的作风，宽大为怀，兼容并包，广为含容自由民主人士。在国际方面，苏俄已改变其过去援助弱小民族之政策而走向极权统治道路，民主世界反×力量日渐集结。因而，我们必须赶紧吸收这一力量，使这一力量成为本党之后劲。要达到这一目的，本党也必须痛改过去的办法，充分表现自由民主精神。三民主义为救国救民之原则，自属不可动摇。但是，对于三民主义的诠释，应与世界现实潮流配合，应与新的情势适应。此则大有待于学识优越的党员之努力，使三民主义从新发挥说服作用。本党如能吸收国内人民的普遍意志，接纳新的分子，汰除腐旧人物，吸收民主世界的力量，对于三民主义多作新的解释，则改组以后一定能发挥新力量，打开目前的难关，而创造一个新的局面。①

此时的殷海光，虽然在思想上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已经有了较大的距离，但他毕竟是一个国民党员，对国民党仍抱有希

① 1949年7月23日台湾《中央日报》。

望，不愿看到国民党彻底垮下去，希望蒋介石借这次改造运动，能使国民党起死回生，不要把改造运动搞偏了，也不要借改造之机排斥异己。

这篇社论，蒋介石是否看了，不得而知。

他的文章发表后，国民党在军事上一溃千里，蒋介石在广州筹划的国民党的改造运动，因军事上败讯频传，他要集中精力指挥西南及南部地区的作战，也偃旗息鼓。

过了两个月，也就是1949年9月20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了题为《为本党改造全党同志书》。他在此文中说："本党的改造，已成为全党同志一致的要求，和救亡图存唯一的途径。"①

他还说："全体党员要从痛苦的体验中总结教训，要抱定决心，集中意志进行改造，复兴革命，开拓光明前途。先确定党的社会基础，再建立党的社会组织工作，奠定改造社会，……之基础，达到改造之目的。集中一切力量，缜密组织，严密纪律，以保障反共斗争胜利。"②

9月21日，《中央日报》在显要位置刊登了蒋介石的这个告全党书。殷海光仔细看了蒋介石的告全党书后，自言自语道："如果按这个样子改造，国民党能改造好么？"

此后，殷海光对蒋介石叫嚷的"改造"不那么感兴趣了。

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蒋介石及其残兵败将在大陆无处立足，只得逃往台湾。由于海峡之隔，人民解放军的攻台作战，不能立即展开，这使得蒋介石在台湾有了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

在台湾，蒋介石又多次对儿子蒋经国说：大陆失败的一个重要

---

① 李勇、张仲田编：《蒋介石年谱》，第391页。

② 张山克编著：《台湾问题大事记》，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原因，是领导国民革命的党组织涣散，派系林立，纪纲废弛，精神颓废，没有战斗力。到台湾省后，要立即对国民党组织进行彻底的改造，在人事上进行大换血，方有所作为。

1950年1月2日，蒋介石指示陈立夫、郑彦棻、黄少谷、张其昀、洪兰友等人，在台湾风景名胜日月潭开会研究改造国民党的问题。陈立夫等经过两天的研讨，提出了甲乙两个方案，然后报送蒋介石。甲乙两案均主张将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停止运作，听候改造。关于党的名称，两案提出了"中国民主党"、"中国革命民主党"、"中国国民党"、"新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新党"，供蒋介石选择。

蒋介石看了这两个方案后，在上面批道：

> 关于本党改造之甲、乙两案，所有准备工作，应特别注重新组织、新纲领、新号召及新任务与新分子之吸收、计划、政纲、政策与理论等有关文告。又五中全会召开以前应准备之工作等拟定各种方案报核。①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北"总理纪念周"大会上，当着近2000名国民党中高级官员的面，谈了对国民党组织进行改造的问题。他说要不顾牺牲与情面，对国民党组织进行彻底改造，使国民党的形象有所改观。

经过数次会议讨论、研究，张其昀、黄少谷等人又搞了一个改造方案。

1950年7月21日，蒋介石在台北草山第二宾馆晚宴招待中常委、监委常委、设计委员。在宴会上，蒋介石就国民党的改造方

① 《雷震全集》第32册，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0～11页。

案，征询各位意见。与会者发言后，蒋介石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他同意设立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为15至25人，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停止行使职权，另设一评议委员会，以年纪大、资历深者担任委员。

7月22日上午，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正式通过改造方案。7月26日，蒋介石在台北举行茶会，200多名国民党党政要员到会。在会上，蒋介石发表致辞，他说："我们国民党一败至此，十分痛心。今后如不被共产党清算及受他人欺侮，目前只有三条路可走，一为照样下去；二为彻底改造；三为我个人辞去总裁，由中委自行改造。大家在一起研究的结果，采取第二条路走，希望此次改造成功。改造工作成功了，国家才有办法。"①

蒋介石讲完话，问在身旁的陈诚等大员还有什么意见，大家都说没有什么意见。接着，由蒋介石宣布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组成人员，共16人，他们是陈诚、张其昀、张道藩、谷正纲、郑彦棻、陈雪屏、胡健中、袁守谦、崔书琴、谷凤翔、曾虚白、蒋经国、肖自诚、沈昌焕、郭澄、连震东。

这批人中，除陈诚、袁守谦为军系，张其昀、谷正纲为党系，其他多是三青团和蒋介石身边的文秘人员，原国民党的一大批要员出局。

名单一公布，与会人员无不吃惊，并感到心灰意冷。如崔书琴，原本连中央委员也不是，据说此人初到台湾时，感到台湾不可靠，又将家迁到香港，写文章用化名，既无气魄、胆量，又自私自利。他能参加改造委员会，全系张其昀在蒋介石面前美言而成。与会人员感到，过去蒋介石用人不讲才德，只讲关系和是否顺从，今天仍未吸取教训，在"改造"的名义下，继续用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将能干事的元老重臣一一赶下台。

---

① 《雷震全集》第32册，第153页。

蒋介石宣布了"改造委员"名单后，接着又宣布了"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名单，吴敬恒、居正、于右任、丁惟汾、邹鲁、王宠惠、阎锡山、吴忠信、张群、吴铁城、何应钦、白崇禧、陈济棠、陈果夫、朱家骅、王世杰、董显光、吴国桢等榜上有名。

在这个名单中，有些大员不见了。人们还发现，从事党务工作20余年的党魁陈立夫也不在其中。很显然，蒋介石要陈立夫负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之责，做他的替罪羊。熟悉国民党内情的人都清楚，国民党的总裁是蒋介石，党内的大小事情，他均亲自过问，国民党失败了，把责任都推到陈立夫身上，显失公允。很多人暗地为陈立夫打抱不平。

参加此次大会的原"总统府国策顾问"雷震散会回家后，在日记中写道：

> 国民党改造名单发表后，大家泄了气，像这样一批名单，要人来重视，则是很困难的，即个别分析，亦未发现有若干之人。真误了改造工作，单凭两篇文章，何能测定一人之份量，而"不入于杨，则入于墨"的办法，不能解决派系，而促成本党团结。昨夜思想浮沉，竟一夜不能入眠。……①

7月28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

> （蒋）匀田来，问此次改造委员产生经过及其政治倾向，并询今后重心何在？美人弄不明白，特来访问。我告以今后重心在蒋经国。他说大家见到名字后大失所望，倒不如要王雪艇（王世杰）、张岳军（张群）主张主政治者来

① 《雷震全集》第32册，第153～155页。

干，亦可使大家明了。晚间（汤）恩伯兄来谈，亦对改造委员，觉得莫明其妙，好似杂凑班子……①

8月5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在台北中央党部举行成立大会并举行就职典礼，16名改造委员宣誓就职，中央评议委员居正、于右任等到场监视。会上，通过了《中央改造委员会组织大纲》，任命张其昀为改造委员会秘书长。

蒋介石在就职典礼上发表了"训词"。

改造委员会宣誓之后，蒋介石又召集全体委员开会，讨论通过了《中央改造委员会组织大纲》，并决定在中央改造委员会下设7个组、5个委员会、1个秘书处，陈雪屏、谷正纲、郑彦棻、曾虚白、袁守谦、唐纵、郭澄分任各组组长，蒋经国、俞鸿钧、李文范、罗家伦、陶希圣分任训练、财务、纪律、党史、设计委员会主任。

8月7日晚，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长张其昀向雷震告知了"改造委员会"成立经过及人事安排方案，雷震听了，更感心灰意冷。此时，雷震与张其昀的关系虽然不错，由于张其昀是蒋介石的心腹，他觉得不好说什么，一切只得藏在心里。

事后，《自由中国》举行编辑委员会议，雷震向《自由中国》全体同仁谈了国民党的改造经过及人事安排。殷海光听了雷震谈的情况后，感慨万端，忍不住地发了一通议论。

他认为，蒋介石打着改造的旗号，行排除异己之实。如果国民党由改造后的这些人来领导，断无生机。

他想就此次改造运动在《自由中国》上写一篇文章，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动笔。直到1954年5月，殷海光才在《自由中国》上发表《这是国民党反省的时候》，再次论及蒋介石在台湾搞的改造运动，他说：

---

① 《雷震全集》第32册，第153～155页。

国民党讲求控制的这一套作风，原为民国13年(1924年)改组容共后的感染所至。但在大陆时期表现得还不太积极。而到台湾后之采取这种作风，甚至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国民党经过两年的改造，产生了七全大会，产生了现在的领导干部。党内某负责人(作者注：指蒋介石)竟誉之为"不流血的革命"。其踌躇满志，当可想而知。胡适之先生谓国民党这次改造是失败的。的确，国民党这次的改造，是国民党走向失败的开端。……这可以从两方面观察：第一，从干部的成分转换来看。前年因国民党改组而转换的领导干部，多半是技术性的人物。这些技术性的人物，如从事技术性的局部工作，或可收到若干领导作用。但是，如果希望这种性质的人物权衡全局，顾全大体，温暖人心，使人觉得国民党可亲可爱，从而使国民党在人民心中生根，发挥真正的力量，那简直是缘木求鱼。第二，从思想的变质来看。这一点是与第一点密切关联着的。这几年来，国民党的思想性格之发展方向日渐与它的传统性格相反，而这种相反发展在这几年的改造中则得到定型。在这一发展路线中的国民党人说："国民党过去的组织松懈，所以在大陆失败。今后要能成功，必须加强组织。"加强组织是好的。可是，国民党在现有的人事基础上侈言加强组织，结果，加强组织之效未收，小圈子主义的阴影借尸还魂，从私利出发的排他性日渐成长。在这一前题之下，国民党的基本传统性格行将毁弃殆尽。①

国民党的基本传统性格是什么呢？殷海光在文中说是"最大的

① 《殷海光全集》第11卷，第349～350页。

包容性”。如按他这种说法，经过蒋介石改造后的国民党，确实是把“最大的包容性”毁弃了。因为改造后的国民党阵营，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成员，基本是清一色的亲蒋人士，原来反对过蒋介石或对他有过不满的人，在这次改造运动中全部靠边站了。

当时，台湾舆论都不敢公开评述蒋介石的改造运动，只有殷海光敢公开评说。不过，他此次写文章向蒋介石建言，并评论蒋介石的改造运动，言辞还比较温和，冲击力不大，蒋介石、国民党也没有怎么计较、追究他。

11

殷海光名声大噪：蒋介石极力拉拢

50年代初，殷海光经常在《自由中国》上发表政论文章，在港台地区名声大噪，并引起外国舆论界的注意。

1953年11月，国民党派往香港的一批文人，组织了一个“香港文化工作返台观光团”，回台湾参观访问。当时，蒋介石在台湾立脚只有两三年时间，加之在国外的名声很臭，到台湾访问的名人及团体很少。香港的一批亲蒋文人组织这个“返台观光团”到台湾访问，蒋介石十分重视，除亲自接见全体团员外，还指示其亲信和各大员要做好该团体的

接待工作。因此，“香港文化工作返台观光团”在台访问期间，国民党大员纷纷宴请。

11月12日，国民党大员沈昌焕约“香港文化工作返台观光团”全体团员吃饭，并请了一些知名人士作陪，其中《自由中国》杂志请了3人，他们是殷海光、雷震、毛子水。

沈昌焕当时的职务是总裁办公室新闻副组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由于他的身份特殊，在很多场合，他代表蒋介石说话。这一次，他请《自由中国》的殷海光等人作陪，是经蒋介石点头同意的，国民党拉拢殷海光的意图，十分明显。

当时，“香港文化工作返台观光团”的团员们大多只见过殷海光的文章，未见其人，这次返台，大家很想见见殷海光，并与他好好谈谈。因此，他们听说沈昌焕请了殷海光，很高兴，急切地期待晚上一睹这位文章写得气势磅礴的知名政论家的风采。

哪知，宴会时间到了，殷海光还未到。香港的一些文人纷纷找雷震打听殷海光怎么还没有到，沈昌焕也找雷震、毛子水打听，雷震告诉他们：殷海光晚上可能有特殊事情，不然，他会来的。

殷海光人虽未到，他的文章却是宴会上人们谈论的热闹话题，而且大家都是赞不绝口。这一天晚上，雷震在日记中写道：“殷之文章颇受社会之注意。”①

1955年春，美国国务院请殷海光以“访问学者”身分到美国作为期半年的访问、考察，赴美期间的一切费用，由美国方面负担。

那时，殷海光的名声虽大，因揭露台湾黑暗面的文章写得不是太多，他与国民党、蒋介石的矛盾还不是很尖锐，国民党很快批准他赴美国。

殷海光在美国期间，颇受美国学界、政界重视，并应邀在美国各地作了多次演讲。殷海光在美国的表现，台湾当局通过驻美的特

① 《雷震全集》第35册，第168页。

务机构，知道得一清二楚。

1955年6月15日，殷海光回到台湾，台湾大学同仁及《自由中国》杂志社先后设宴为他接风。

殷海光从美国回台不久，突然接到"国防部"送来的请柬。殷海光仔细一看，是蒋经国的请帖。

前面已经提到，殷海光与蒋经国在大陆就很熟，他离开中央日报社，对国民党的宣传事业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所以，国民党的中常委、主管宣传的陶希圣一再写信挽留他，还是未挽留住。

殷海光离开《中央日报》后，蒋经国很快知道了，因他当时的主要精力放在抓特务和军事上，一天到晚搞"保密防谍"、抓人杀人，未过问宣传、舆论方面的事情，故未找殷海光"谈心"。

到了50年代中期，台湾稳定了，蒋经国开始四处插手，并时常代其父蒋介石处理一些重要事情。

殷海光从美国回来后，他感到外国政府如此重视殷海光，台湾自然更应该重视。更何况，把殷海光拉住，可使他为国民党、"中华民国"做宣传工作；拉不住，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只要他不写攻击其父和国民党的文章，也算达到了目的。

蒋经国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觉得儿子的考虑很对，同意他找一次殷海光。

殷海光接到蒋经国的请柬，心情十分复杂。从内心讲，他已与国民党决裂，与蒋经国也无什么交往，加之此次在美国期间，看到、听到原政务委员、台湾省政府主席吴国桢揭露蒋氏父子的一些黑暗内幕，心里对蒋经国更无好感，不想参加蒋经国的宴请活动。

后来，他又考虑，上次沈昌焕请他的客时，他借故未参加，此次如又不参加，在礼节上似乎讲不过去。同时，他又考虑，这次蒋经国请他的客，必然要问他在美国的情况，可借这个机会，向蒋介绍一些外国的政治情况，并委婉地劝他们父子多给人民一点自由，不要在台湾搞法西斯那一套。

蒋经国在台北选择了一个条件非常好的餐厅。陪同殷海光前去的有台大和台大文学院的负责人。蒋经国带的人有国民党大员陶希圣、沈昌焕等。

殷海光进入餐厅后，蒋经国已先到了。

此时的蒋经国，比先前胖了一些。今天虽然是他请客，因大权在握，他摆出一副高高在上、官气十足的样子。

殷海光看到他那派头，心里就不高兴了。对国民党官僚的这套作风，殷海光向来讨厌，也很看不起。

双方坐下后，蒋经国先开了腔，他向殷海光问道："殷先生，你到美国去了多长时间？"

殷海光应道："半年。"

"在美国见到政界人士吗？"

"见了一些。不过，我见的人，学术界的占大多数。"

"他们会见你时，问过台湾的情况没有？"

"问了。"

"你是怎么讲的？"

"是怎么样就怎么讲。"

"那……"

殷海光听得出，蒋经国对他的答复不高兴了。蒋经国与他父亲一样，只喜欢别人说好听或歌颂的话，不喜欢别人说真话、批评的话，尤其在外国人面前，更要说台湾的好话。不然，蒋氏父子就不高兴。

他们喝了一点饮料后，蒋经国又开口说："殷先生，你现在是有影响的政论家、教授，大家一同到这里来，是共赴'国'难。我们的'中华民国'因受共产党的诬蔑、诽谤，加上过去在大陆军事上的失利，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要改变这种状况，还得靠你们这些有影响的人多多做宣传工作。"

坐在一旁的陶希圣，也给蒋经国帮腔说，要改变"中华民国"在

国际上的形象，并实现反攻大陆的目标，确实需要殷海光这样的名家多说好话。

谈到这里，蒋经国又问殷海光："吴国桢在美国大骂'政府'，美国学术界、华侨对这件事怎么看？"

殷海光直言不讳地说："大部分人同情吴国桢，也有少数人认为他骂得不对。"

"同情吴国桢什么呢？"

"认为'政府'丑化、诬蔑他，错误地撤了他的职，有很多人还认为台湾在政治上确有毛病。"

"你见过胡适之先生没有？"

"见过。"

"他与你谈过这件事吗？"

"谈过。"

"他对此事怎么看？"

"与'政府'的观点是一致的。"

"他反驳吴国桢没有？"

"反驳了。"

"殷先生对此怎么看？"

"我认为胡适先生不应反驳吴国桢。吴国桢在美国说得对，我们就作些改进，说得不对，民众就要批评他。胡适阻止他说话，他长了一张嘴，有讲话的自由，怎么阻止得住呢？古人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台湾的事情做得好，吴国桢怎么讲也讲不坏；做得不好，他说得再好，人家美国人也不相信。"

殷海光的这一席话，蒋经国听了很不高兴。他说："中国有句古话，家丑不可外扬，自己'国家'内部的事情，应该在'国'内讲嘛，更何况'政府'没有做什么错事。吴国桢在国外大骂'政府'，这事做得太不应该！"

陶希圣也在一旁附和着说："吴国桢做的事太不像话，党内党

外对吴此举可说是义愤填膺！”

吴国桢在美国反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并与胡适发生论战时，殷海光正在美国，并坚定地站在吴国桢一边。今天，他们在饭桌上谈这件事时，引起殷海光的不快。

他认为，桌子上的这帮人，完全不讲是非，不分红黑，跟他们讲下去，不是发生争论，就是对牛弹琴，说不如不说。

俗话说，话不投机半句多。对蒋经国的谈话，殷海光非常反感，而且反感得连东西也吃不下去。

他心想：国家被你们这些人弄得这个样子，逃到这个岛上来，不但不改过自新，反而继续搞专制、独裁统治，还要别人为你们歌功颂德、涂脂抹粉，这就是政治？这就是政治家？

他感到，他与蒋经国信仰不一，走的路不同。他不愿与蒋经国搭话，蒋经国向他问事情，他不是不理，就是言及其他。

坐在旁边的陪客觉得殷海光太傲慢了，甚至有些过分。他们认为，平时，一些专家、教授想巴结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都巴结不到，蒋经国今天特地请你殷海光吃饭，你还摆出这个傲慢的样子。你殷海光无非是写了几篇文章，会写文章的人多得很，有什么了不起！

幸好陪同的人怕蒋经国有意见，无话找话说，没有使蒋经国太难堪。

蒋经国心里很明白，殷海光不多讲话，就是心里不高兴。他对殷海光有意见，但又不好讲出来。因此，这次宴请在极不愉快中结束。

这是蒋经国在台湾请人吃饭时，最难堪的一次。国民党拉拢他的目的，难以达到。

事后，殷海光在《自由中国》杂志社的一次编委会上，将蒋经国宴请他的经过告诉了同事、好友雷震、夏道平等人，引起他们的哈哈大笑。

雷震开他的玩笑说：“蒋经国身为太子，花钱买冷脸，你怎么不

替他想想啊！”

1994 年 3 月 26 日，台湾东海大学研究生简明海访问原《自由中国》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宋文明先生时，谈到了当年蒋经国宴请殷海光之事，他说：

> 1956 年《自由中国》“祝寿专号”之前，蒋经国曾请殷吃饭，但殷在席上不予理会，一言不发，蒋经国觉得殷太傲慢，两方的关系更不佳。①

宋文明与殷海光系《自由中国》同事，两人的理念相合，关系也很不错，他谈的这一情况，比较真实可靠，只是未写出其中的一些细节。

蒋经国宴请殷海光未达到目的，加之对殷海光印象奇劣，此后再也不理睬殷海光了。殷海光对蒋经国也很有意见，其中意见最大的，是他利用特务机关滥杀无辜，监视平民百姓，利用“反共救国团”在全岛胡作非为，干扰、破坏学校教育，制造对其父的个人迷信，故经常不断地在《自由中国》上批评揭露蒋家的黑暗统治，成为蒋介石父子心中的大敌。

后来，殷海光受到蒋家一连串的政治迫害，并不准他去美国治病、做研究工作，除了因文章得罪了蒋家以外，恐怕殷海光在蒋经国宴请、拉拢时，对他傲慢不敬，也是祸因之一。

---

① 简明海著：《救亡与启蒙的困境——殷海光思想转变之研究》附录，第 24 页。

12

蒋控制各级学校：殷海光奋起反对

50年代初期，蒋介石认为在大陆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教育和青年失控，使各大中学的青年和教师绝大多数跟共产党跑了，或做了共产党的外围“工具”。

基于这样的认识，蒋介石在台湾对教育的控制大大加强了。他说，学校最急需的就是如何反共，要以三民主义的思想精神，完全浃洽于每一个学生的精神、思想、生活和各种学术、课程之中。

蒋介石对台湾各学校的控制，一是思想

上的，二是组织上的。思想上的控制，主要是在学校大力推行“反共爱国”和“三民主义”教育；组织上的控制，就是在各级学校建立党团组织，然后通过党团组织来实现对学校的控制。

在控制学校的过程中，“反共救国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反共救国团”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为组织全岛青年“反共复国”，于1952年10月31日在台北建立的。蒋介石任团长，蒋经国任主任，所以，台湾人又称其为“父子团”。

“反共救国团”开成立大会时，蒋介石亲自到会讲了话。他说：“反共救国团”是一个“教育性的组织”、“群众性的组织”、“战斗性的组织”。要求“反共救国团”担当起“反共抗俄”、“救国救民”的责任。

“反共救国团”虽然由蒋介石任团长，实际负责的是蒋经国。为使“反共救国团”搞点名堂，蒋经国亲自搞了一个章程，章程规定各级“反共救国团”的宗旨为“信仰三民主义”、“拥护领袖”、“服从命令”、“严守纪律”、“服务牺牲”等。

“反共救国团”成立后，蒋经国四处招兵买马，然后，对其进行业务训练。学员一结业，就被派到各级学校。他们经常在学校散发反共宣传读物，举行各种“拥护领袖”、“效忠领袖”的会议和活动。除此之外，“反共救国团”还要求每个学生要背诵“三民主义读本”、“总理遗教”、“总统训词”，学生为完成这些任务，不得不“披星戴月”、“三更眠、五更起”，学生和家长对此怨声载道。

国民党、蒋介石及“反共救国团”的这些做法，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1954年5月底，余燕人、黄厂风、广长白3人给《自由中国》杂志写了一篇《抢救教育危机》的信，对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反共救国团”干扰学校教育，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行为，进行了强烈批评，信中说：

编辑先生：

夙仰贵刊立论公正，故愿借一角之地，以表达我们这几个做家长的人眼看自己子女所受教育感到沉痛与忧虑，如蒙刊载，感激之至。

查教育厅自本年暑假以来，即曾三令五申，命令学校减轻学生负担。但真相如何呢？那似乎只有天知道了！何也，今天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的考试比数是相当少的。考取的比数既是相当少，升学考试时就必需有激烈的竞争。考试要有激烈的竞争，则平日减轻课业根本做不到。

……其实，以现在中学生的课业来说，凭心说不十分繁重。但是今天的中学生负担的繁重则又确是事实。这个繁重不是课业的繁重，而是规定学生来念的课外东西太多了：三民主义、总理遗教、总统训词、青年救国团发下来的必读小册子……等等，连篇累牍，念之不尽，读之不竭。教育当局、学校当局、救国团并经常进行考试以察看学生们是否背念得如家谱一样的烂熟。所以很多的时间都被这些"政治大课"占去了。每到政治测验的前两天，我们眼看着我们的子女"戴月披星"、"三更眠，五更起"的愁眉苦脸的抱着这些书来啃，真正的课业，反而丢在一旁。所以我们说学生原课业并不繁重，繁重的是这些"课外的课业"。"课外的课业"再加上正常的课业都放在学生的肩上，当然太繁重了。

此外，学生课外活动的繁多，也是耽搁学生时间，浪费学生精神，增加学生负担的一大原因。自青年救国团成立以来，这种课外活动可谓贪求不厌，有增无减。一个学生除了要参与校内的课外活动之外，还要开分队会议、小组讨论、干部会议，要上爱"国"课程，要练习大合唱，有时要去三军球场维持秩序，有时要去中山堂开战斗晚会，有

时要开展多种募捐，有时要去劳军，有时要去游行……“名目繁多”、“不及备载”。最近报端载有教育厅批具“减少学生课外活动办法”，但是实际上学生的课外活动是一点也没有减少。不但没有减少，更令人奇怪的是国民党60周年纪念，竟也发动学生去郊区做宣传，要恭读党部发下来的国民党60周年专刊，要作“我对国民党的认识”等类的论文。试问国民党党庆和学生有什么关系？是教育厅还是救国团对学校发下来这种不合理的命令？如果国民党党庆可以发动学生来宣传，请问以后民社党、青年党党庆也来发动学生宣传怎么办？这样学校还成个什么样子？如果不许民社党、青年党这样做，只许国民党“自我为之”，怎么能自圆其说呢？我们现在不是在实行宪政吗？我们不是标榜民主自由吗？我们的教育应该是自由的教育，而不是任何一党包办的党化教育。……“总统”近几年来曾三番五次的，不断地向全世界和全国人民宣示我们要建立良好的民主制度，可见“总统”祈求“中国”能走上民主政治心情之诚切。然而，我们今天教育界的这种种措施正是背道而驰，正是违反了蒋“总统”实践民主的意志。这哪是一个真正拥护“总统”，效忠“总统”的人所应有的作为呢？

我们要明白地指出：全省的公立学校，都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办的。全“国”的纳税人，也就是全“国”公民，有资格、有权利要他们的子女到学校去接受正常的教育而不去接受宣传教育。教育当局和救国团不可以借教育之名而行党化之实。

教育对于青年的影响太重了，我们不能让青年在受教育的阶段就使他们对于民主制度有了全然歪曲的认识。教育为“国家”的百年大计，这样的教育将会造成怎样

的后果呢？凡对“国家”有责任感的人对此能不忧戚？我们不能不大声疾呼地吁请当局注重这种可怕的趋势，抢救教育危机！①

《自由中国》杂志编辑部接到余燕人等的这封来信后，一致感到此信反映了当前台湾教育界存在的严重问题，应该予以重视。

但是，在是否发表这封信的问题上，《自由中国》杂志社内部意见又不统一。不同意发表的人认为，此信如公开发表，一定会惹怒蒋氏父子。

殷海光极力主张发表这封信。其理由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打着“反共抗俄”、“反攻大陆”的旗号，危害学校教育，耽误、浪费青少年的美好光阴，如不公开反对、制止此举，将会危害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作为民间杂志，不能因为怕蒋介石报复而放弃应负的监督、督促的责任。

由于殷海光、雷震，还有夏道平的一再坚持，《自由中国》在第11卷第12期上发表了余燕人等人的公开信。

果然，《抢救教育危机》一面世，蒋介石就看到了，而且勃然大怒。1954年12月2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宣传会报会”上当场对与会人员下令说：“开除雷震的党籍！”

出席此次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唐纵说：“当年党员登记时，雷震没有登记归队，等于没有党籍。”蒋介石又愤怒地说：“没有党籍也要开除！”

后来，国民党怕闹大笑话，用“注销党籍”的方式来处分雷震。由于此处分自欺欺人，国民党也未发通知给雷震，只在《中央日报》上发了一则消息。

殷海光看到消息后，认为雷震因反对蒋介石的“党化教育”，维

① 台湾《自由中国》，1954年第11卷第12期。

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被“开除党籍”是好事、幸事。1955年1月4日，他给雷震写了一封祝贺信：

儆公先生：

欣闻老前辈断尾（指开除党籍），诚新春之一喜讯也，可祝可贺。从此先生更可本平民立场，为民主事业奋进不休也。敬祝

新年快乐！

后学：殷海光

1月4日①

雷震收到殷海光的信，心中自感快慰。

尽管《自由中国》反对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学校搞“党化教育”，蒋氏父子仍我行我素，继续利用他们庞大的党、团组织，尤其是“反共救国团”，继续在各级学校搞“党化教育”，制造个人崇拜，培植忠于蒋家的势力。

对蒋氏父子的这种做法，殷海光极为不满。他认为，蒋介石主政大陆期间，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法西斯统治，把政治搞得一团漆黑，国家搞得支离破碎，人民痛苦达到极点。这样一个独裁者，一个败军之将，一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一个祸国殃民的窃国大盗，逃到台湾来仍然要老百姓，甚至正在受教育的娃娃崇拜、拥护、效忠、服从他，太不像话。

想到这里，他决定再次撰文拆穿蒋氏父子在台湾搞“党化教育”的祸心，拨开迷雾，让人们看清蒋介石的真面目。

1958年1月16日，殷海光在《自由中国》第18卷第2期上，

① 《雷震秘藏书信选》，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281页。

发表了一篇《我们的教育》一文。殷海光在这篇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破坏教育的行为，他说：

> 今日台湾的教育，细细观察，不仅不及民国初年，而且不及满清末年。那时的教育，是逐步向一"开放的社会"发展；今日台湾的教育，则是向建立一个"封闭社会"之途迈进。大致说来，这几年台湾教育的退步，至少退步了50年，这就等于说，这半个世纪的时光是白浪费了。照目前的情形看来，这一浪费，还不知到何年何月才停止，我们真为下一代担忧。
>
> 这几年来，在背后控制台湾教育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党化教育"；二是狭隘的"民族精神教育"。而这两个原则又是互相渗透、互相支持、互相作用的。
>
> 台湾党化教育的得以实施，显然并不出于家长及受教育之欢迎悦纳，而全系藉政权便利从事布置。厉行党化教育者挟其无可抗拒的政治优势和一二顶大帽子，控制学校机构，树立党团组织，并且掌握大部分教职人员，网既布成，彼等进而规定课程，灌输党化思想，传播政治神话，控制学生课内外活动。彼等藉党化教育，把下一代铸造成合于他们主观需要的类型。①

殷海光指出了蒋介石、国民党危害台湾教育，浪费青少年生命的问题后，又向当局提出了几个主要要求：

第一，停止"党化教育"。他说，"党化教育"压榨人心，制造偏见，除对一党以外，对"国家"、民族有什么好处？老实讲，在世界现状之下，"党化教育"是不会成功的。退一步说，"党化教育"即会成

① 《殷海光全集》第11卷，第543～544页。

功，充其量不过是造出一批只听一个党的话的盲从之众而已。这样的人，离开了国民党的窝子，根本不能适应外界的新环境。真正“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而办教育的人，怎会做这样“伤天害理”的勾当？现在办教育的人，如果稍有良心和常识，应该建议有权力者赶快停止党化教育。停止党化教育，即停止对大家毫无益处的党化过程，以及围绕党化目标的一切设施，让青少年们的身心从党化的迷阵中解放出来，多用时间、精力吸收科学知识，学习科学技能。

第二，学术自由。他说，自古至今，钳制学术自由的势力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泛宗教主义、泛道德主义和泛自治主义。……在泛政治主义之下，一切学术思想都变成政治工具，政治教条成为学术思想之“先天的前提”，政治纲领成为学术思想之不可逾越的纲领。因而，政治领袖也就成为学术领袖；于是，一切学术思想的发展，必须受政治路线之规定。……泛政治主义已经走到山穷水尽之境了，奈何台湾官方有一部分人士还迷恋这将死的骸尸？我们总不能不承认这派那派，这派那派的政治是少数人一时闹的事，而学术则是社会百年、千年的事。今日闹政治者，何必连这冷僻的学术角落也不放过？为了社会的长久生命着想，我们应该让学术从政治权力之下解放出来，让它自由发展。不然，这个社会的智慧将会由萎缩以至于死亡……

第三，简化课程。他说，现在，台湾从大学到幼儿园的课程之繁重，无疑属世界首位，课程名目之多，也是世无其匹的。小学生竟有忙到夜晚11点钟才能上床休息。世界各国，哪有这样办教育的？这样办教育，台湾的学术贡献应该居世界之首了。但在事实上，是一部分学生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心身受到戕害；另一部分学生则采取敷衍手段，浪费时光和金钱。

殷海光的这些针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言论，深深刺痛了蒋介石，自然为蒋介石所不容。国民党控制的舆论阵地，如《中央日报》等，很快出现了反击《我们的教育》的文章，蒋介石还通过儿子蒋经

国，指示国民党教育部长张其昀，组织全岛教育系统声讨殷海光的《我们的教育》一文，要广大师生，特别是大中学校师生，“擦亮眼睛”、“站稳立场”、“忠于领袖”、“坚定信心”，不要被《自由中国》上的文章所迷惑。

不过，国民党此次批评、攻击《自由中国》及殷海光的时间、规模，远不及《反攻大陆问题》那一次。

1958年3月29日，是台湾“青年节”。按照过去惯例，蒋介石要在这一天发表“反共”或“反攻”之类的文告、讲话。而这一次，他不讲“反共”之类的话了，却向青年学生强调要建立礼义廉耻，要有气节，并要有独立自主的信念。他还说，当前要特别提高警觉，勿为伪装的自由、民主所欺骗。

当时，在台湾大力宣传自由、民主，反对蒋介石的极权统治和“党化教育”的，只有殷海光和《自由中国》的同仁。殷海光的文章和思想在青年、学生中有很大的影响，蒋介石在“文告”中要青年学生勿为伪装的自由、民主所欺骗，显然是指殷海光和《自由中国》的。

殷海光看了国民党的批评和攻击文章，又看了蒋介石的“文告”，觉得很好笑。他感到在此问题上还有些话未说完，还需再写一篇文章，其语言也要再大胆、明白一些。

1958年4月底，殷海光又写了一篇《学术教育应独立于政治》一文，发表在5月16日出版的《自由中国》第18卷第10期上。他在文中尖锐地指出：

> 泛政治主义笼罩的地区，目前大都是“以党治国”的地区。在这样的地区，政府只是一党专政的工具。在一党专政的工具统治下，所谓教育一定是“党化教育”。党化教育是怎么回事呢？党化教育有下列特色：(1)灌输青年，使青年们于不知不觉之间从党的立场和一孔之见来看世界、看人、看事。(2)将教育当做党的宣传工具，制造青年

们分享党的情绪，憎恶党所憎恶的事，喜好党所喜好的事物。(3)神化党的人物和党的历史。(4)造成青年们一个印象，以为"国家"虽大，若无此党，则日月为之无光，天地为之绝变，故舍此党莫属。(5)要把下一代牵着鼻子走，跟着歌颂这个党，为这个党摇旗呐喊。这种教育的目标，系为党铸造下一代的预备队，奠定一党统治的万世之基。所以，党化教育就是一党统治的意识向下一代的延伸。

这个样子的党化教育成效怎样呢？要党化教育高度收效，必须有许许多多条件，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建立密不透风的铁幕。建立铁幕的意义之一面，就是建立在思想和知识方面的一个绝缘体。在这个绝缘体中，外界的思想和知识透不进来。办到了这一步，就可在这一绝缘体中依照政治的需要来设计一个天方夜谭式的"知识世界"。囚在这个知识世界里的人，从孩提以至昏老，他们的大脑活动不能越出这个世界一步。然而，要能办到这一点，必须满足一个前提，就是铁幕不能漏一点缝。万一漏一点缝，让里面思想的囚徒看出外面的世界与平素所听到的颇不相符，那么统治者费九牛二虎之力所建立的知识世界就为之破灭。知识世界一经破灭，那么，人民的身体纵然还在囚笼之中，可是他们的心思放洋了……

就台湾目前所处形势来观察，台湾更非实行党化教育的适合地区。第一，海空交通频繁，无法不对外接触。第二，经济和军事都仰赖外援，无法完全遮断民主势力的影响。第三，交换教授出国留学，民主国家的书报流入逐年增加。这些事项之逐年增加，意含着民主思想之逐年增加。这三种因素之存在与扩大使思想一元化的局面根本无从形成。所以，在台湾当前所处的形势中，如果要实行党化教育，那么就是逆势行事，逆人行事。逆此二者行事，

一定徒劳无功。如果藉着强硬的政治力量来施行，当然在形式上不难办到。形式上的党化教育，只能给予强力推行者以形式上的满足，以象征性的安慰。他们自己可以告诉自己：我党的势力还是很大，党权在此岛上还是维系于不坠，下一代还会继承我党的党统。这一套办法，固然可以说是"聊胜于无"。然而，它所招来的是什么呢？是普遍的冷感、无情的淡漠，和尽可能的敷衍应付。

……由此可见，党化教育根本就是落伍的东西，根本就是行不通的东西。这样一套东西之存在，除了象征一个党的统治之存在以外，我们看不出它对受教育者有任何益处。

……官方所加于学术教育的钳制，大致分别起来有两种：一种可以叫做"内在的钳制"。所谓内在的钳制，就是为学术教育提供政治的前提，规定政治的路线，这种钳制之不当及其造成的深远恶果，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不再赘述。另一种可以叫做"外在的钳制"。所谓外在的钳制，就是：(1)在学校建立党化的政治组织，控制校内师生的生活，掌握学生的社团生活；(2)安置秘密或半秘密的"安全"人员驻校侦察并监视教师及学生的言论和思想，致使师生感到有一双冥冥之手威胁着他们，什么正当事情都不敢放胆去做；(3)凭藉政治力量，把一党的党义等等列为必修课目。虽然，官方人士所作内在的钳制之成绩远较此外在的成绩为差，但二者俱足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思想言论等等活动，归于窒息。……官方人士果真为国民，就应该首先把这些扼杀学术教育的措施解除，为"国家"保留一片生机，让学术教育独立于政治，自由发

展。①

1958年夏，台湾当局的"行政院长"俞鸿钧因与"立法院"发生政争，一气之下辞了职，7月1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

7月14日，陈诚内阁组成，国民党"教育家"、原在大陆时期任过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的梅贻奇接替张其昀出任教育部长。

张其昀虽位居中常委，却系一作风不正、能力低下的官僚政客。他任教育部长期间，一切秉承蒋介石的主旨行事，积极推行党化教育，制造个人迷信，神化蒋介石，教学工作放任不管，广大教职员工对他意见很大。陈诚重新组阁时，顶住蒋介石的压力，决定不用不得人心的张其昀，启用能力强，各方反映较好的老教育家梅贻奇。陈诚的这一举措，从某种程度上讲，缓和了广大教职员工与蒋氏父子的矛盾。

殷海光在报上看到这一消息，觉得这是自己及《自由中国》杂志社同仁向新部长表达反对教育党化，不顾教学质量的好机会。1958年8月初，他一口气写成《对梅部长的低调希望》。在这篇文章中，殷海光历数了张其昀任教育部长期间的过失后，对梅贻奇提出了希望，其中一大希望就是减轻学生的精神负担，不要搞"党化教育"，不要在教育界制造对蒋介石的个人迷信。他说："办教育是可以的，办党化教育则是罪大恶极的事。"

当时，台湾处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下，反蒋介石和国民党，随时都有失去自由和生命的危险。殷海光在那样的环境里，勇敢地站出来，公开在刊物上反对蒋介石干扰、破坏教育，其智其勇，令人钦佩。

1958年10月20日，殷海光再次在《自由中国》上写了一篇

① 《殷海光全集》第12卷，第580～581、585～586页。

《认清当前形势，开展自新运动》的文章。在此文中，殷海光斗胆向蒋介石、国民党提出五项急需办的事，这五项中，第三、四项涉及"党化教育"问题，内容如下：

三、取消浪费青年生命、制造个人势力的青年反共救国团；

四、取消党化教育，各大学停止党化课程，停止党化书刊。①

那时，《自由中国》在台湾发行量很大，读者很多，殷海光在《自由中国》公开向蒋介石的言行挑战，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尽管大家在蒋介石的高压下不敢起来附和、支持殷海光，梅贻奇上任后也不敢在各级学校取消"党化教育"，人民群众在心里却很拥护殷海光的主张。

殷海光在台湾奋起反对蒋介石控制各级学校的行为，蒋介石自然难以容忍。后来，他指使儿子蒋经国动用党、政、军、特，残酷打击迫害殷海光，就与殷海光利用《自由中国》这个阵地反对他控制各级学校有很大的关系。

① 《殷海光全集》第12卷，第734页。

13

国民党选举失败：殷海光批评蒋介石

1954年春夏之际，是台湾第二届省议员和县市长选举期。

此次选举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于4月18日选出18名省议员，第二期于5月2日选出36名省议员和各县市长。

国民党为牢牢控制各级政权，并取得这两次选举的胜利，蒋介石、蒋经国、陈诚费尽心机，并作过数次指示，召开过多次会议。

选举开始后，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大小党工倾巢出动，拉票、贿票、涂票以及故意唱错票等手段，全数使出，力争使国民党提名的候

选人全部“当选”。

在第一期选举中，因国民党势力强大，又加上大肆舞弊，其候选人基本未落选。

第二期选举情况就不同了，党内党外候选人的竞争异常激烈。其中，又以台北市的两位市长候选人竞选最为精彩激烈，扣人心弦。

台北是“中华民国”的“首都”，两位候选人一为国民党提名的王民宁，另一位是无党无派人士高玉树。台北在蒋介石的鼻子底下，因此，蒋介石对此次市长选举极为关注，希望经他同意提名的王民宁能顺利当选。

尽管蒋介石、国民党为王民宁的选举使出了许多不正当的手段，其结果，还是高玉树击败了王民宁，而且两人票数相差 2 万多。

据说，5 月 2 日晚上开票时，最后有 5 箱未打开，如果全部开箱，高玉树的票还不止多 2 万余张。国民党知道无望，便要流氓手段，暗地推人出来在开箱现场高呼“高玉树舞弊”的口号，阻止选举工作人员开后面的 5 箱票。为此，双方竞选总部的人员发生冲突。

后来，5 箱选票虽经高玉树选举总部的人员一再要求打开了，票数却未公开，直到现在，此事仍是一个谜。

5 月 2 日夜，极度关注此次选举的殷海光带着学生李敖、何秀煌等来到高玉树竞选总部，观看计票情况和结果。

此时，高玉树竞选总部人山人海，军警云集。殷海光看到高玉树的票数超过王民宁时，非常兴奋。他自言自语道：“这票数就是一杆秤，就是民心大检验，也是民主与专制的一次激烈较量。王民宁的落选，说明国民党在台湾的施政很不得人心。”

王民宁此次落选，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天深夜，这条爆炸性的新闻迅即传遍全岛，拥护高玉树的市民不顾军警的阻拦，自发拥到街上举行庆祝游行、鸣放鞭炮，还有的人唱起了歌、跳起了舞。

殷海光与李敖、何秀煌看到人们如此高兴，心里也激动万分。他们从高玉树此次选举的胜利，看到了极权的可恶，民主的希望。

从高玉树竞选总部出来，李敖见殷海光很高兴，乘兴请他到台北中央酒店看外国舞女跳半脱不脱的舞蹈。

殷海光回到家里后，因兴奋过度，久久难以入眠。他很想就此次事件写篇文章，谈谈自己的想法，借此机会，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播点民主的种子，并让它尽快生根、发芽。

过了两天，也就是5月4日，雷震到殷海光家来了。两人谈起此次高玉树战胜王民宁的事，都很高兴，殷海光还告诉雷震，他想对此次选举写一文章发表在《自由中国》杂志上。

雷震说："我也有此意。你要写，就写一社论，代表我们《自由中国》讲话。国民党打了一个大败仗，估计蒋介石这两天不太舒服，我们写一社论给他看看，也让他醒一醒，使他知道，如果他和国民党继续在台湾搞专制、独裁统治，民心将会失尽。"

殷海光同意了。

两人商量的社论题目叫《这是国民党反省的时候》。雷震一走，殷海光就动了笔。1954年5月16日，《这是国民党反省的时候》社论发在《自由中国》第10卷第10期上。他在文中说：

> ……我们愿藉这次竞选为题，作一客观的解析，以促使国民党作一冷静的自我反省。
>
> 这次竞选，除了台北等市以外，有些县市，其县市长的候选人竟只有一个。例如台北县和基隆市就是，难道这些地方有从政兴趣的，真的只有一人吗？只准选一人不就是等于指定吗？这样又怎能算是竞选？只准选举一人，置选民的公民权于何地？一般人民对于这种独占作风，提起来无不深表遗憾。
>
> 这次国民党之提名王民宁为台北市市长候选人，是

以党的全部力量支持，而且势在必得的。国民党发动台北区全体党员，投票支持王民宁。凡参加投票的党员，一律在总考绩上记分。有些学校校长，甚至传令学生，要他们的家长一致投选王民宁。就这种种做法看来，王民宁之当选应该已成定局了。然而，结果如何呢？王民宁竟失败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个中的原因，自然很值得国民党的领导干部们平心静气地、客观地详加检讨。但是，据说党中一部分负责干部的第一个反应，认为是由于"控制不力"。果真有这种想法，那真是错误已极！那真是不可救药！

对于一般人民而言，犹可说是"控制不力"。对于国民党的党员而言，应该是"控制甚力"了。可是，事实并不如此。据说，有许多党员放弃投票，有许多党员投废票，有许多党员改投高玉树的票，甚至有少数党员公开拒绝投票。这次由党提名候选人而落选的，不止王民宁一人而已，还有嘉义县的林金生等。竞选失败，本是极平常的事，而这次失败最堪注意的理由，并非一般选民对于党提候选人本身一定有何成见，而系民主自由思想无可阻遏地渐深人心。对于国民党在竞选中所暴露的那一套作风不感兴趣，于是转而厌憎候选人本身。这样看来，这些候选人之所以失败，并非由于控制不力所致，恰恰相反，主要是由于"控制过力"，碰到民主思想反激出来的结果。……国民党讲求控制的这一套作风，原为民国13年改组容共后的感染所致。但在大陆时期表现得还不太积极。而到台湾后之采取这种作风，甚至有变本加厉的趋势。

……古往今来，"小圈子主义"、"控制手段"，从来没有收过好的效果。

……

纯正国民党的传统是不讲"控制"的。只有极权的政治组织才一味强调"控制",也许有人怀疑:不讲"控制",在现阶段怎样才能发挥力量以灭共倒俄呢?道不在远,就在眼前:真心诚意实行民主是也。中国(作者注:指台湾地区)目前的一切政治问题,根本上都辐凑到民主问题上。不真正实行民主,则条条路都是死巷子,任何枝枝节节的技术性的改革都是徒劳而无功。能真正实行民主,则条条路都畅通无阻。所以,真正实行民主是政治上基本转变的契机。①

殷海光在此社论中还指出:国民党以往的传统,就是最大的"包容性",这一基本传统性格表现在孙中山的论著中。多年以来,国民党把这一传统丢了,国民党的行动之最后的决定因素,是统治欲之发挥,这种欲望之发挥,不仅桎梏着一般国民的生机,而且冻结了国民党自身的活力,演变所及,国民党状貌臃大,而党的生命则奄奄如也。国民党今后起死回生的唯一大道,就是实行党内民主。而且唯有实行党内民主,才能振奋党内聪明才智之士;只有实行民主,才能使大家的思想和能力作最高度的发挥。只要实行真正的民主,才有活力。

他接着说:国民党一方面要放弃眼前的小利小益,向着"国家"民族的大利大益处着眼,另一方面必须尽力放弃"码头独占"和"唯我独占"的心理习惯,国民党不要以为这次台北市等处党提候选人失败是件奇耻大辱的事。如果有这种念头横在心里,那么就是"码头独占"的心理习惯在作怪。

在这篇社论的最后,殷海光恳切并毫不留情地向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提醒说:

---

① 《殷海光全集》第11卷,第348~349页。

老实说，就我们今日的凭藉和处境来看，我们再也没有余暇作历史性的浪费了。我们此时正立在一个分歧点上：一边是一个旧时代的残局；另一边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如果继续采取那些落伍的"小动作"，那么注定了陷入旧时代的残局。在人类社会中，每一个时代都有新的因素出现。历史并无重演的必然性。今后绝没有侥幸取巧的事。如果光明磊落地走上民主大道，那么眼前就是一个时代的开端，身负重责的国民党人，何去何从呢？这只有待于国民党人自决。国民党内不乏优秀才智之士。愿国民党人反省，彻底反省！①

此时，殷海光已脱离国民党多年，并对国民党有过十分尖锐的批评，但这一次行文用字，还是留有一定余地，而且是从批评——规劝——提醒的善意出发的，希望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能从这次选举失败中猛醒，并吸取教训，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殷海光从40年代末开始，就看破了蒋介石、国民党，对蒋介石、国民党有诸多批评，而且狠下决心脱离了国民党，并辞去了中央日报社的职务。过了5年时间，还是蒋介石当道，他还是用独裁的办法统治台湾，他是"自由"、"民主"的死敌，怎么还希望他"反省"，还希望他实行"民主"呢？

可以说，只要蒋介石当政，国民党不可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做真正的反省，不可能使台湾走上殷海光所希望的那样的民主之路。

① 《殷海光全集》第11卷，第353页。

14

台北发生反美大事件：殷海光公开抨击蒋介石

1957年5月，台北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二四”反美运动。

台湾原无美国军队。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为了防止人民解放军渡海攻台，一再向美国政府请求派兵进驻台湾。1950年6月5日，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在台湾设立“前进指挥所”，第一批F-80型战机进驻台湾。在以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美国在台湾的军队及情报机构增加到30余个，人数也由最初的50余人增加到7万多人。

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及美军进入台湾，

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攻台计划暂时搁置。蒋介石集团在美军的保护下立住了脚，便将美军奉为上宾，当作“恩人”。蒋介石为报答这些“恩人”，用搜括到的民脂民膏大兴土木，在台北一些风景区为美军修建最高级的住宅，配备最豪华的汽车，还为他们提供包括妓院在内的各种高级娱乐场所，供美军官兵淫乐。蒋介石的这些做法，大大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民族自尊心。

受到特别优待的美军看到蒋介石集团腐败无能，便在台湾以“老大”或“恩人”自居，他们享有“外交豁免权”，因而在台湾飞扬跋扈，为非作歹，肆无忌惮地欺压、侮辱台湾民众。

1953 年 7 月，4 名美军士兵酒后开车，在台北大街上横冲直撞，一连撞死 3 人，撞伤 7 人；1955 年 3 月，6 名美军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台湾某校一名女学生劫持到住宅进行侮辱；1956 年 8 月，驻扎在冈山的美军陆军第十七飞弹中队的一群美军在一家私营酒家强要吃喝，遭店主拒绝后，将该店店主和几名职员打伤。

美军的强盗行径，激起台湾民众的无比愤慨，他们暗地进行各种报复。如秘密炸坏基隆港的美军舰艇，破坏美军的酒吧、舞厅和新闻处，结伙偷袭美国军事人员等。

到 50 年代中期，美国驻台军事人员与台湾民众的矛盾日益尖锐，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五·二四”反美运动的导火线，是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职员刘自然于 5 月 20 日突然遭到美国驻台湾军事顾问团医药补给官罗伯特·雷诺枪杀。5 月 23 日，美国驻台湾军事顾问团组成的临时法庭宣布雷诺无罪，并用专机将他偷偷运往菲律宾，然后经马尼拉回国。美军包庇杀人犯的行为，激起台湾人民的愤怒，一场大规模的反美运动由此引发。

5 月 24 日，在台北市民及刘自然亲属的支持下，刘自然的太太刘奥特华举着用中英文书写的抗议美国军事顾问团包庇杀人犯的牌子，在美国驻台湾大使馆门前进行演讲抗议，引起数万台北民

众的同情与围观。

刘奥特华上街后，台北市成功中学的54名代表，也来到美国大使馆门前示威，他们还将一幅“抗议美军藐视人权”的巨型横幅，挂在美国大使馆的天台上。

学生一来，场面就热闹了。刘奥特华的冤情控诉也达到高潮。她含着泪水，一遍又一遍地向群众讲述雷诺如何枪杀她丈夫，美军顾问团又是如何包庇杀人犯的。她的演讲，将在场群众的仇美情绪激发到顶点。

随后，十余名群众自发用硬纸板写了“杀人偿命”四个大字，与成功中学的“抗议美军藐视人权”的巨型横幅挂在一起，十分醒目。

这时，群众再也忍不住了。两名学生首先抓起石块，猛砸美国大使馆的门窗。

恰在此时，一辆运送红砖的卡车开过来了。示威群众觉得，这是砸美国大使馆的好武器，便将卡车拦住了。群众爬上车，搬下红砖，然后手拿砖块，冲到美国大使馆的墙边，猛砸大使馆四周门窗上的玻璃，不到20分钟，两层楼的门窗全部被砸坏。

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们吓得丧魂失魄。有两名外交官试图出来阻止，反被雨点般的砖头吓了回去。

群众砸完门窗，觉得还不解恨。他们看到大使馆楼顶上迎风飘动的美国星条旗，怒火中烧。一青年学生指着旗子喊道：“同胞们，冲上去把星条旗扯下来！”

另一个学生也叫喊道：“将旗杆推倒！”

几名青年奋力一跃，跃到了美国大使馆的围墙上，再顺墙爬到了楼顶。他们用力一推，旗杆倒了。他们又从地上抓起旗子，将它撕碎，再放在地上用脚踩。

大使馆门前的群众见状，非常兴奋，不停地鼓掌欢呼。

过了一阵，一青年工人用手卷成话筒，大声叫道：“冲到大使馆去捣毁这个强盗窝子！”

“冲啊!”人群中又有人叫了起来。

人们似潮水般地向大使馆内涌去。两名站岗的宪兵想用枪托阻拦,被愤怒的群众打倒在地,宪兵怕再挨打,枪也顾不上要,仓皇逃走。

冲击大使馆的群众一部分用砖块、铁棒砸汽车;另一部分到楼上,将里面的家具、电话机、通讯器材、书籍、文件统统捣毁扔到窗外,碎纸片像雪花一样,在空中飞舞。不大一会儿,大使馆内的两辆吉普车、四辆轿车和一辆卡车被砸成废铁。

大使馆参赞在几名外交官的掩护下,乘混乱逃了出去。没有走的外交官,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打得鼻青脸肿,还有的倒在地上喊爹叫娘。

随后,愤怒到极点的两万多名民众又冲到阳明山捣毁了美国驻台湾新闻处。邻近的美国驻台湾军事顾问团也被群众层层包围。

冲击美国新闻处的群众一气之下将里面的唱片、书刊、影片全部撕毁,然后放火烧掉,整个新闻处变成一片火海。

由于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的铁门被锁住,民众冲不进去。示威者不顾蒋军机关枪的威胁,砸坏了停在糖业大厦门前的 6 辆军用汽车。

这时,一位老太婆发现 7 名美国士兵躲在台北邮电局的一间房子里面,立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示威群众。群众冲破宪警的阻拦,到电信局内搜寻美国士兵,但 7 名美国士兵已被蒋军偷偷护送出去,冲进去的群众扑了一场空。

事件发生后,台湾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美游行示威,台北华侨中学全体师生绝食 3 天,以抗议美军的暴行。

5 月 24 日下午,台湾当局的“行政院院长”俞鸿钧就刘自然事件发表公开声明,警告群众说,要保持镇静,反美活动不要“越轨”。

当天晚上,台北调进大批军队,全市实行“宵禁”。

刘自然事件迅速演变成全岛的反美运动,蒋介石怒不可遏,立

即召来了台北卫戍司令黄珍吾。蒋拿起拐杖，在茶几上使劲地敲打，责骂他说："你这个卫戍司令是怎么干的？怎么会发生这样大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懂得平抑民众的情绪，让那么多老百姓聚集、闹事？把美国人得罪了再怎么善了？"

黄珍吾吓得胆战心惊，一声不吭。据蒋介石的贴身侍从翁元先生在《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日子》一书中讲，蒋介石在台湾很少发这么大的脾气，唯此次觉得手下未阻止住事态的发展，酿成一场大规模的反美运动而大动肝火。

训了黄珍吾后，蒋介石又召来"行政院院长"俞鸿钧，指示他火速召开会议讨论研究"五·二四"事件及善后事宜。

俞鸿钧当即召开了会议。随后，俞鸿钧内阁向蒋介石提出总辞职，以示对此事负责，蒋介石未准。

5月26日，美国驻台湾大使兰金面见蒋介石，就"五·二四"事件和台湾的反美运动向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台湾当局处理有关失职人员，赔偿损失。

蒋介石面对异常愤怒的兰金，一再向美方表示歉意，并说："这次事件是因民众对处理美国士兵不满引发的，是个案，不是反美运动。我们将秉公处理此事，美方的损失，我们一定会作赔偿的。"

当天，蒋介石宣布免去对"五·二四"事件"处置不力"和"负有直接责任"的台北卫戍司令黄珍吾的职务，任命黄杰为台北卫戍司令，原宪兵副司令、第八军军长郭永任台湾省警务处处长。

为讨好美国并减轻美国人的不满，6月1日，蒋介石就"五·二四"事件发表公开谈话，他说："我们要认真检讨'五·二四'事件，要在反共的进程中辨明是非敌友，勿自毁长城，'反共抗俄'只有和美国站在一起，才能获得胜利。美国是我们的朋友，唯有这个朋友，在列强中从来没有侵略过我们中国的寸土尺地。它更在辛丑前后，防止了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这是大家所应切记不忘的。"

蒋介石的这番言论，荒谬至极。自鸦片战争以来，美帝对中国

的侵略与掠夺，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与损害，只要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就知道，哪是蒋说的那么回事呢？蒋介石此论，分明是为其主子抹粉，消除台湾人民对美军的仇恨。

蒋介石发表了此番言论后，台湾的各报刊再不敢发表议论"五·二四"事件的文章了，民众对蒋介石的言论虽有很大的意见，只能在私下说，公开场合不敢谈论。

刘自然事件一发生，殷海光就很关注。

5月24日那天下午，殷海光赶到《自由中国》杂志社找雷震，建议开个紧急编委会，安排一个人就"五·二四"事件写一社论，以表达《自由中国》同仁对此事的立场。与殷海光同到杂志社的，还有著名诗人周弃子。周弃子也极力建议《自由中国》发一社论。

殷海光的建议，引起雷震的重视。

当天，雷震打电话到台湾当局的"外交部"亚西司，找到一位姓盛的司长，请他提供一点材料；随后，他又打电话找杂志社的律师端木，向他询问美国的法律问题；再随后，他又去找《自由中国》编委、主笔夏道平执笔写此社论。

夏道平当即表示，社会上对此事看法不一，建议大家在一起讨论一下，使大家对此事件达成共识，不然，他不好写。

雷震仔细考虑了一下，觉得夏道平的想法有道理，决定5月27日在杂志社内开编委会，专门研究此问题。

殷海光没有料到，他的这一建议，在《自由中国》社内引发了一场大论战，而且相互之间还伤了和气。

问题的关键是对此次事件如何评断。以雷震、毛子水为首的认为，此次反美运动，是不应该的，是官方或警方制止不力，社论应对此进行严厉批评。雷震、毛子水的这一看法，与蒋介石近似。以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宋文明、聂华苓等为一方的认为，此次事件的责任在美军顾问团包庇杀人犯和美方太傲慢，又太看不起中国人，如果美方在5月23日公平地判决此案，就不会有"五·二四"

反美运动，社论的重点应放在谴责雷诺杀人和美军包庇杀人犯。蒋介石政权对美军的态度，也应批评。两方的意见争论不休，各说各有理，甚至争得脸红脖子粗。殷海光与雷震争论时，慷慨激昂，寸步不让。快吃午饭了，两方才初步达成对美方和蒋介石"政府"都要批评的共识。

此社论写起来后，雷震作了些修改，未交编委讨论就送到印刷厂排印。负责日常编务的编委黄中看了此稿后，很不满意，认为经雷震修改的这个稿子观点不明确，是非未分清，文字也太软，与编委们讨论达成的共识有距离。

黄中心里这样想，又不敢说出来。

为此事，他很焦急。后来，他到印刷厂去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何不将发排稿叫印刷厂先打印两份出来，送给殷海光和戴杜衡两位编委看看呢？雷震对他们两位很尊重，如果他们两位不同意这个社论稿，雷震非作修改不可。

他将打印好的社论稿封好，然后派人分送殷海光、戴杜衡。殷、戴两人看了，分别给雷震写了回信，表示不同意这个社论稿，建议作重大修改，其中特别要提到谴责美方不公平的判决及包庇杀人犯，也要批评蒋介石集团崇洋媚外、娇惯外国人的心理与作风。

黄中看了他们的信，怕雷震不接受，又派人去把殷、戴两人请到杂志社来劝说雷震修改社论。

殷海光、戴杜衡了解了黄中的想法与意图后，便向雷震建议修改此社论。雷震不同意修改，说此社论是根据大家上次讨论的意见写的，再改就不好了。

殷海光、戴杜衡坚持要改，并与雷震发生了争论。

雷震坚决不同意改，并说："《自由中国》杂志在海内外影响很大，在美国就有数千份，社论一发表，人家就会说我们不好。"

殷海光见他固执己见，很不客气地说："你过去的官虽然做到了'总统府国策顾问'，却未脱书生气。台湾发生的这个事件，已经

看得很清楚了，是一起很典型的美国人欺侮中国人的事件，人民自发起来打砸美国大使馆，是忍无可忍，迫不得已，也可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又都有民族自尊心，理应维护本民族人民的利益，公开谴责美国军人的霸道行为，要求美方惩办杀人犯，并给受害者家属认罪赔钱。对蒋介石'政府'过分优待外国人的媚外心态及其做法，也应进行坚决的批评。"

雷震摇头说："殷先生，你是研究逻辑实证论的学者，说话更应该以事实为根据，以理服人。美方对案子判决不公，应该通过合法途径与美方交涉，不应砸人家的大使馆，打人家的人嘛。"

殷海光马上反驳道："蒋介石'政府'一向媚外欺内，惧外压内，不会为这事与美方交涉。更何况，人家美军在台湾有外交豁免权，根本不受你管，交涉也无益。如果'政府'管了刘奥特华的事，向美方作了交涉，为她申了冤，她能上街抗议吗？刘奥特华不上街作抗议演讲，老百姓不砸美国大使馆，不打美国人，这个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所以我认为，'五·二四'事件的爆发，一方面是美方杀了人，又包庇杀人犯，另一方面，是蒋介石'政府'不管老百姓的事，不顾刘家人的死活，不与美方交涉而引发的。此次反美运动，是老百姓自发行动起来的，不是'政府'行为。如果说有错，首先是美方，其次是蒋介石'政府'，刘奥特华与老百姓没有任何过错。这就是事实，就是根据！"

雷震无话可说了，但他仍不同意修改社论。

雷震的态度，使殷海光火了："雷先生，我不客气地说，你要是这样下去，这个杂志以后就是你一个人办了！"

戴杜衡、金承艺、黄中、聂华苓等人也站在殷海光一边，力劝雷震对此社论作些修改。

雷震见大家都赞同殷海光、戴杜衡的意见，只好说："夏道平先生也是编委，如果作改动，那要请夏先生来讨论一下。"

夏道平先生被请来了。

他听了雷震、殷海光的叙述，认为殷海光有道理，建议对此社论作修改。

夏道平为人忠厚、正直，思维细密。他赞同殷海光的意见，雷震毫无办法了，只得同意对社论进行修改。

雷震口头同意修改，心里还是不赞同，而且颇多牢骚，只好将自己的意见保留。1957 年 5 月 29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 ……殷先生认为我是书生，将来只有我一个人。殷并说宣传要讲技术，今日我才了解他这个人之为人。……黄中此次态度不好，他是青年人，态度激昂尚可原谅，但我们已改好之社论又交殷、戴二人看，且请他们来，显然是要他们来影响我的，结果夏先生来到，将殷、戴二人意见采纳，社论之重心则移到责备美国方面去了。
>
> 这次社论真使我难受，我这几天与马之骕、金承艺诸人辩论多次，今日聂华苓也不赞成我的意见。①

由于殷海光的坚持，1957 年 6 月 1 日，《自由中国》发表了谴责驻台美军的社论《雷诺判决无罪与台北骚动事件的检讨》，社论发表后，反响强烈，民众都认为《自由中国》对这件大事说了真话、公道话。

台湾著名政论家、作家李敖在《李敖回忆录》一书中说："雷震虽然办《自由中国》，但这杂志真正的灵魂人物是殷海光。"② 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殷海光确系《自由中国》的灵魂人物，难怪《自由中国》被迫停刊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不整《自由中国》的其他主笔，唯独抓住殷海光不放，并千方百计地打击迫害他。

---

① 《雷震全集》第 39 册，第 103 页。

② 《李敖回忆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 年版，第 88 页。

尽管《自由中国》发了一篇谴责美军包庇杀人犯的社论，殷海光想起与雷震的争论，又重新看了《自由中国》上的社论，感到还有很多话要说，特别是对蒋介石"政府"的批评，他觉得在语气和力度上，要再加大一些。于是，他一鼓作气，写了一篇长文《雷诺事件的检讨与建议》。

文章写好后，他感到此文不便在《自由中国》发表，便投给香港的《祖国》周刊，并署上个人名字。香港《祖国》周刊很敬重殷海光，也很喜欢他的文章。他们收到殷海光的文章后，当即决定分两期发在该刊第18卷第12、13期上。

殷海光在分析"五·二四"反美运动的原因时说：

……驻台工作的一部分美国人，尤其是一部分军人，所作表现是不令中国人愉快的。这可分做以下两方面叙述：

一、恩主姿态。若干美国人对中国人有意无意流露一副恩主姿态。在言谈对应之间似乎比照出两个不同的高下阶层，美国人是施恩者，位于高一等的阶层；中国（作者注：指台湾地区）人是受恩者，位于低一等的阶层。这一种若有意无意的划分，若隐若显的界线，捉之无物，感之则令人有动于衷，慨乎梗塞于心。此情此景，最易勾起中国（作者注：指台湾地区）人的自卑感；而此地越发觉得这些美国人骄傲。可巧美国人的个子又高又大，更易把他们的盛气凌人的气概衬托出来，发扬光大。

二、生活方式之不同。……此时此地，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青年大都感到结婚匪易，苦闷沉沉，而美兵到处，当地女子，垂手可得。中国年轻人看在眼里，岂有开心之理？中国当上校的军官不见得有适合的住宅，而美军一来，即使是一名上士，也可租赁高级住宅。至于个人、家庭

用具、出入交通工具，也高人一等。这不算美国人的错。但是，在台湾，中国人占绝对大多数，美国人占绝对少数，这种实际生活的比照，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看来特别显眼。穷人对富人总是难免在潜意识中发生妒嫉念头的。这类妒嫉念头，平时沉淀到意识深处，一有机会，哪有不趁机发作之理呢？

……雷诺杀人被判无罪，这一判决触动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正义感，大家痛感不平，并且因此把潜意识中的蕴藏的对一部分美国人的不快之感拖带出来，爆发而成一个火山。

……中国人民对雷诺案件判决认为不公正，这一反应的影响所及，不止是中国一国而已。它已微妙地影响到太平洋西岸所有的国家。毋庸讳言，北起南韩南迄菲律宾，对美国或多或少有不愉快的经验，雷诺案件之判决无罪，台湾中国人所发生的强烈反响，多少使这些同病相怜的亚洲国家得到同样的感应。……全台湾的中国人对于雷诺杀人判决无罪一致地表示高度的愤慨。这一事实，才是台湾骚动事件造成的核心。敬告美国朋友：这一事实，中国任何政治组织制造不出来的。制造这个事实的，不必揣测，就是那几位美国辩护律师的投票结果。容我再说一遍：宣判的结果使中国人立刻产生了不公正的感觉，并且因此连带地触及中国人的某些“原始情感”。没有这个事实作原动力，任何政治组织也煽动不起来。有这个事实作原动力，只要有一点偶然的因素，就足以使得群众心理一发而不可收拾。①

① 《殷海光全集》第 11 卷，第 476 页。

殷海光分析了"五·二四"事件的原因后，又严厉地批评了美国人对此事的错误态度与做法：

……美国人对打死中国人一事看得这样不重要。我们打了你们的大使馆，我们的"政府"立即道歉，答应赔偿，你们还要怪中国"政府"没有很快地镇压我们。这算不算得是"帝国主义"思想？

……

骚乱所引起的严重外交形势掩盖了雷案判决所引起的不平之鸣。外交的压力压倒了中国人的正义感，美方的姿态阻吓了中国人情感的奔放。中国人又得在铁的现实面前，再一次学习忍耐。在美国人的势力之下，中国的人命多么不值钱。

……雷案发生之初，大家本乎这些信念，沉默地期待公正的裁判，大家都认为"美国人不会不公正的"。万想不到裁判的结果竟是杀人者无罪，多么令人失望！等到不满之情酿成骚乱事件以后，他们所看得见的只是森严的外交面孔。对于雷案之曲直，反而搁置一旁，亦若无足轻重。这使他们发生疑问：美国的公平在哪里？美国的正义在哪里？"天下乌鸦一般黑"，美国还不是靠钱势压人？

雷案判决结果如此，照中国人看来是一个错。现在美国官方又拿因雷案而引起的外交局面抹煞了原有的问题，这在中国一般人看来是错上加错。①

殷海光在文中还向美方提出三个建议：一、自动放弃驻军豁免权，放弃豁免权就是放弃特权，在台湾人民面前不能以"恩人"自

① 《殷海光全集》第11卷，第481页。

居。美国是一个大国，大国要表现一点大国的风度，大国对人退让三分不算示弱。其二，不要因此事裁员或减少援助。其三，捐助遗孤。应对刘自然遗孤发起捐款。这样做，以表示美国人民对雷诺枪杀中国人表示一点歉意，捐款不在多少，能表示美国人对这件事有同情感就很好了，美国官方从预算里拨出的钱没有温暖，直接从美国人民捐来的钱里有温情。这是医治中国人心灵创伤的最有效的途径。

殷海光提的这三条建议，美国方面一条也做不到。自古以来，弱国受欺，人矮挨打，这几乎成为国际间的一条定律。蒋介石集团全靠美国保护，美方怎么能满足他们难以接受的这三条呢？

对蒋介石处理"五·二四"事件的态度和方式，殷海光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他说：

> 中国政府（作者注：应为台湾当局）的领导人物对于外来拂意的事采取"隐忍"的态度。美国人似乎很少能够察觉中国政治领导人物的这种心理状态。
>
> ……
>
> 中国的政治势力自大陆撤退来台以迄于今的情形如何，只有"一言难尽"四字差堪描状。
>
> 这几年台湾最令人触目惊心的现象，是事权之高度集中。这几年来的事权之高度集中，恐怕至少是"中华民国"以来所未有的。其次是自己替自己擦粉的工作之勤，也是世界罕见的。因为要替自己擦粉，所以无论对人对事只许说好听的话，不许有批评的话。因为自己替自己擦粉，所以撇出过去的光荣来填补现在的空虚。因为自己要替自己抹粉，所以文艺只许写光明面，不许写黑暗面，跟着这一条路线发展下来的，是政治布景技术之进步。外来的参观者只能看到前台，看不到后台。领谈之声远近皆

闻。于是，自我陶醉的空气弥漫六合。在这种空气里呼吸惯了的人，是恶闻一切逆耳之言的。再加上“非常时期”这一大理由，于是言论自由被压缩到“楼台明灭山有无”的光景。此外，企图心炽旺者集中精力制造心理紧张，灌输狭隘的团体意识，但是许下的诺言却一再不能兑现。在这种氛围里的人，心情岂有不忧闷之理？心情忧闷已久，岂有不遇机发泄之理？

……假定民间盛传的说法是合于事实，那么官方一部分人士为什么要回避刘自然这一伪造的真相？是什么原因要这样讳莫如深？如果自己的人被别人打死了，还因有所讳忌而不敢公布真相，这真是“死要面子”。你自己既然因死要面子而不敢公布真相，怎能责备别人的审判人员回避真相？你自己既然不敢正视事实，怎能责备别人将计就计串演一幕了事？你要假把戏的时候，就不能要求别人玩真把戏。

……

等到骚乱发动，为什么治安机构不能迅速有效遏止呢？最显然的答复是“无人负责”。如果有人再进一步追问：“台湾的官多如牛毛，为什么出了这样大的乱子，就找不到一个人负责呢？”这话说来就长了，至少自 1936 年以来，当局深受刺激，觉负己之徒盈天下。于是，当局此后用人以“可靠”为第一条件；施政以防制变生肘腋为第一要务。尤其自大陆沦陷，撤退来台以后，深创巨痛，因而这种心理状态更加深刻化，这种施政原则更加彻底化。于是，事无大小，必先“请示”。这样一来，无论文武百官，身上所受有形、无形、直接、间接的束缚，不可数计。这一套束缚，现在已经组成了一个严密的网子。你一落入这个网子里，像苍蝇掉进蜘蛛网里一样，动弹不得，直到你生命的浆汁

被消耗殆尽而后已。时至今日，除了纯技术性的工作略有旋回余地以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在这个天罗地网里有所作为的。这个网子在积极方面固然不能发生任何效用；可是在钳制人的自主活动方面则已发挥了史无前例的效用。所以，一旦发生了什么意外，只要总开关不拨动，旁的人纵有通天的本领也是一筹莫展的。

如果说官方一个能干的人都没有，这真是太冤枉了。照我们看，官方能干的人还是不少。可是，为什么丝毫不能发生"正面的"作用呢？一个人赤手空拳时，无非是一堆细胞，任何能耐也是施展不开的。人要能施展他的本领，必须有所凭藉。如果这种凭藉表面是在他手里而实际上被握在背后一人手里，那么他只是一个陈列品而已。像台湾这几年来的局面，即令是亚历山大复生，拿破仑再世，也是束手无策的。如果出了事故时自己负责解决了不见得有奖，万一出了毛病则可罹莫测之祸，在这种情况之中，谁敢负责呢？①

"五·二四"事件发生后，特别是蒋介石就此事发表谈话的那一段时间，台湾舆论对刘自然事件都保持沉默。其因，自然是怕得罪蒋介石，只有殷海光敢公开撰文批评美国，批评蒋介石及其"政府"。他这种敢说真话的勇气和敢于斗争的精神，受到台湾人民的高度称赞。美籍华裔作家江南先生在他的著作《蒋经国传》中，也曾对殷海光此举予以肯定、赞扬。

① 《殷海光全集》第11卷，第491～494页。

15

蒋制“反攻大陆”政策：殷海光斗胆砸招牌

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在美国人的保护下，又朝思暮想“反攻大陆”，重掌政权。为实现这一梦想，蒋介石将“反攻大陆”定为“中华民国”的基本“国策”。

五六十年代，蒋介石在各种公共场所、各种会议上，都要讲“反攻大陆”问题，并将“反攻大陆”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来抓。除此之外，他还将“反攻大陆”作为一块招牌，欺骗台湾人民，掩盖他的胡作非为。

我们先看看蒋介石是怎样讲“反攻大陆”的。

1949年6月26日，蒋介石在台北探望了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后，主持召开了东南区军事会议，并发表了讲话。他夸海口说：他要在三年之内完成反攻大陆任务。不出三年，一定可以消灭共×，一年反攻，三年成功。

1950年1月30日，蒋介石在台北草山（后改名为阳明山）纪念周上讲话，他在会上训示全体国民党党员说：大陆丢失不足为惧，惧者为能否恢复"国家"灵魂，当前国人应自强奋斗，以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固守基地，反攻大陆。

2月18日，蒋介石就大陆中央人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发表《告同胞书》，诬蔑中苏条约是"卖国条约"，要求台湾人民配合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发表《复行视事文告》，他在文告中说："中正许身革命40余年，生死荣辱与共早已置之度外，进退出去，一惟国民之公意是从，际此存亡危急之时期，已无推诿责任之可能，爰于3月1日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① 他还在"文告"中发誓说要"扫除共×，光复大陆"。

随后，他又在"总理纪念周"上，对自己在大陆的失误作了检讨，并发誓说：要不惜牺牲感情与情面，虚心接受在大陆失败的教训，为"反攻复国"大业鞠躬尽瘁，争取最后的胜利。

3月13日，蒋介石在台北发表《复职的目的与使命》的讲话时说，要把去年的"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计划，改为"一年整训，两年反攻，扫荡共×，三年成功"。这就是说：从现在起，少则三年，多至五年，要达到消灭共×，复兴"中华民国"的目的。

3月29日，他又就"青年节"发表文告，号召台湾青年要为"光复大陆"奋斗。

1950年5月16日，蒋介石在台湾广播电台发表《为撤退舟

① 李勇、张仲田编：《蒋介石年谱》，第400页。

山、海南"国军"告大陆同胞书》,蒋介石说:"我们亦要在一年之内,完成我们反攻大陆的准备,最迟一年以后,必能实行反攻大陆。"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复兴中华民国"的口号。

1950 年 9 月 15 日,蒋介石向美洲华侨发表广播讲话,声称"只要保有一片领土,树起青天白日旗,便不论有何艰难险阻也要拼死效力,建设台湾,反攻大陆。"

1951 年 1 月 8 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举行的会议上,训示全体国民党员要稳定经济、整顿纪律、安定社会、团结内部;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

5 月 16 日,蒋介石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对"反攻大陆"作了更玄的说法,他说:"国民党军队如有足够的装备,半年就可以反攻。"

10 月 10 日,蒋介石就"双十节"发表《告同胞书》,说大陆"沦陷"是国民党的奇耻大辱,一定要"反共抗俄"、"雪耻复仇,同心戮力完成光复大陆的任务"。

12 月 1 日,蒋介石训示"行政院",说 1952 年的施政重点是"整顿户口,加强防空,实施总动员,强化反共抗俄,准备反攻大陆"。

1952 年 7 月 19 日,蒋介石在答美联社记者时说:"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不需要外来人力和地面部队的支持,只需提供后勤支持。"

1953 年 2 月 12 日,蒋介石对合众国际社记者说,国民党军队一旦反攻大陆,大陆同胞就会群起响应,只需要盟国给予后勤、物资支持,反攻一定会成功。7 月 23 日,蒋介石又对《纽约时报》记者说:台湾如果获得足够的装备就可以"反攻大陆"。10 月 7 日,蒋介石又在接见美国记者时说:国民党反攻大陆不须美国军队介入,只需外国提供后勤支援,必能击败中共、苏联。

1954 年 10 月 27 日，蒋介石在台北接见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时，对他们说："大陆百万游击队准备进攻，大陆人民百分之九十支持'国军'，东南亚华侨应负协助反攻任务。"

同年 11 月 5 日，蒋介石在招待台侨领导人的宴会上，要求他们拥护台湾当局，声称少则五年，多则七年，必可完成反攻大陆使命。

1956 年 1 月 28 日，蒋介石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密勒、《星期六晚报》记者向斯时声称，如果不受外力的干涉阻挠，台湾现在便能适时反攻大陆。他所说的"外力"，就是国民党当局请求与美国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他自己请求签订的条约，此时又说"阻挠"了他们的"反攻大陆"，天下奇谈。

过了五天，蒋介石又告诉美国记者："国军"必将重返大陆，中共政权在五年或十年内必定摧毁。3 月 29 日，蒋介石为庆祝"青年节"发表谈话时讲，大陆政权将于明年崩溃，到时就可反攻了。

1957 年 1 月 1 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声称要促进复国机运，把握国内反共形势，主动反攻大陆。

3 月 2 日，蒋介石再次对美国记者发表谈话时说，国民党军队一旦反攻，大陆同胞会"群起响应"，反攻不必要美国军队介入，只需美国提供后勤与技术支持。

特别有趣的是，蒋介石为实施他的"反攻大陆"计划，于 1954 年 1 月在"总统府"下设立了一个"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由他的心腹陈诚出任主任委员，陈诚的老部下朱怀冰任秘书长。

使人不可理解的是，身为"总统"的蒋介石，过去在国民党其他他认为比较重要的部门兼职时，都任第一把手，此次在"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里面，只挂了一个普通的"委员"职衔。尽管这样，蒋介石对"光复会"的工作却非常重视，每次开大会，他都要到会上训话、作指示。蒋介石还给"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规定了目的、原则、工作重心。

据说，从1954年到70年代，“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研究了1000多种“反攻”方案。由于这些方案耗费设计研究人员心血及钱财无数，而一项也无法在大陆实施，一些设计研究人员干得没有劲了，会议也不想出席，只到领薪水时，才到单位去一趟。

蒋介石常把“反攻大陆”挂在嘴上，国民党的大小官僚、军队、机关、学校及报刊、电台、文艺作品，也一天到晚跟在蒋介石后面高喊“反攻大陆”。

尽管蒋介石向台湾人民许诺的“反攻大陆”从一年推到两年，两年推到三年，最后又推到五年、七年，并信誓旦旦地保证“五年成功”，人们还是难以看到他“反攻大陆”。最后五年、七年时间也过了，蒋介石也知道“反攻大陆”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仍然在大小会议上不厌其烦地喊“反攻大陆”，他们的“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也年复一年地在设计如何“光复大陆”及“光复”之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如何运作的方案，大小会议也年复一年地开，蒋介石也照样年年去讲话、作指示，并一次又一次地叫喊“一定要反攻大陆”。

对蒋介石在“反攻大陆”问题上搞的一套假把戏，殷海光十分关注，并看得非常透彻，他很想写一篇专论这个问题的文章，公开把此事捅破，把蒋介石的阴谋拆穿。

1957年7月4日、9日，《自由中国》杂志社开了两次编委会。其中9日下午的一次编委会，是在殷海光家中进行的。大家都认为，国民党及其“政府”近几年来的政策、措施，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的，都有非常严重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中，有的应该立刻解决，有的应设法防止再度发生。

在讨论过程中，编委、主笔戴杜衡提出设一个“今日问题”专栏，就台湾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问题，逐一进行专论，以表达《自由中国》全体同仁对当前“国事”的看法。戴杜衡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编委们在讨论台湾的政治问题时，有的说要论自由，有

的说要论民主。殷海光觉得，这两个问题以前论过多次，这次首先要论的应是蒋介石一天到晚高喊的"反攻大陆"问题，并说了几条论这一问题的理由。他还说，蒋介石创出的这个口号及采取的措施，给台湾社会造成的危害太大了，如再不指破，危害还会更大。大家听了他的"高论"，都同意他的意见。

编委会还决定，在首篇专论之前，写一篇代序《是什么说什么》。

讨论《反攻大陆问题》由谁执笔时，大家一致推举殷海光，因为这个问题系他提出来的，他对此又作了较长时间的观察和分析，由他写比较合适。

雷震也极力要他执笔。

大家都要殷海光写，殷海光答应了。

殷海光心里很清楚，"反攻大陆"是台湾最敏感的问题，如果写出来的文字与蒋介石讲的不一样，或者唱了反调，必起波澜，甚至惹出很大的麻烦。

尽管这样，他还是硬着头皮写。

只一天的功夫，《反攻大陆问题》的社论写起来了。殷海光在文中说：

> 关于这个问题，大致说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来自官方。官方言论还是口头强硬，说得异常肯定，满有把握的样子。他们说反攻大陆确有把握，他们心里是否如此，我们无法使用脑波记录器，所以无从揣测。另一种说法来自民间之有意无意的流露。从这些流露看去，民间的想法似乎随着岁月之增加而与官方的说法距离日远了……①

① 《殷海光全集》第11卷，第509～510页。

殷海光在文中接着指出：

反攻大陆是一个尚未实现的事件。我们要能对尚未实现的事件作论断，只有依据“公算”。现在据以作为公算的知识和因素非常之多，在此只能将其最重要的列举出来，供作研究。第一是国际形势。其构成国际形势的基本要素，应包括(1)世界人民普遍的心理趋向；(2)武器的发展；(3)国际第三势力的成长。第二是现代战争的必要条件。应包括(1)人口；(2)资源；(3)科学水准。

……

根据以上所提供的知识因素，分析的结果认为“反攻大陆”的公算在相当时期内并不太大，而官方不仅嘴里说成十分必然的样子，这且不说，而官方这几年来在台湾的措施都是以“马上就要回大陆”为基本假定。这种办法，真是弊害横生。

第一，因为一切都是为了“马上就要回大陆”，一般人就形成事事“暂时忍受”和“暂时迁就”的心理状态。大家看到官方许多不合理或苛烦无比的措施，都认为这是暂时的现象，将来回到大陆就好了，所以只有忍受下去。

第二，因为被“马上就要回大陆”的心理所致，官方许许多多措施，不求彻底，不求永久，而一般人民在心理上则被“吊起”。于是许许多多事情得过且过不去设法开展。

第三，因为“马上就反攻大陆”，官方人士拼命这种训练，那种训练，弄得颇紧张的样子。紧张的时间太长，大家所追求的目标则不可得。于是久而久之，双重人格就出现在公共场合，满口“拥护”、“革命”、“反攻”；在私人场合就是牢骚、怅惘、悲观、失望、彷徨。

依据上面的指陈，我们知道以“马上就要回大陆”这一假想为根据的种种作法是有显著弊害的。而“马上就要回大陆”这一假想又是颇为渺茫。一个“国家”的一切作法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这是太不稳健了。一群人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活动，哪里会“生死以之”，全力以赴？①

殷海光执笔的《反攻大陆问题》的社论刊在1957年8月1日《自由中国》第17卷第3期上。此期《自由中国》一面世，就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共鸣。老百姓拍手称快，说《自由中国》讲了他们想讲而不敢讲的心里话。

与此同时，此期《自由中国》也引起官方的反感与愤怒。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特务一面派人大量收购流入市面的此期《自由中国》，一面通过“邮检”，查扣《自由中国》寄给作者、读者及有关人士的杂志。连《自由中国》航寄给居住在美国的胡适的此期杂志，也被警备总司令部查扣，引起胡适的强烈不满。

1957年8月28日，住在纽约东81街104号的胡适给雷震写信说：

《自由中国》最近两期（第17卷第3、4期）都没有收到。有一天，我在廷黻先生的车子里看见他新到的第17卷3期，我回寓也收到一封，拆开来是17卷1期，并不是3期，很可怪。

所以我在报纸上望到所谓“自由中国反攻论战”，我竟没有看到那引起论争的原文。

所以我要请你们把17卷第3期以下，都用航空补寄

① 《殷海光全集》第11卷，第509～512、518～520页。

一册，至感。①

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派专人将此期杂志送给蒋介石、蒋经国、陈诚等人看。蒋介石看了《反攻大陆问题》后，火冒三丈，大骂道："娘希匹，《自由中国》那帮家伙的言论太出格了，连'反攻大陆'也反对，也攻击，太不像话了！他们与共产党系一丘之貉！"

他骂了之后，马上将儿子蒋经国及主管文宣工作的陶希圣等人召到面前说："《自由中国》公开反对'反攻大陆'，散布'反攻无望论'，严重影响反共大业和民心士气，你们应立即组织人写文章驳斥他们的荒谬言论，还要在机关、团体、学校及部队召开专门会议进行声讨，清除他们的不良影响。"

蒋经国、陶希圣答应马上就办。

蒋介石又向陶希圣问道："你知道这篇社论是谁写的吗？"

陶希圣说："从文笔看，极有可能是殷海光写的。"

"又是他？"

"是他。"

"你对他很了解，你认为是他，那就是他。"

"这一期'今日问题'的代序《是什么说什么》，也有可能是他写的。"

蒋介石听了，咬着牙说："可以说，反攻大陆是我们的反共旗帜和招牌，也是所有来台人员的强烈愿望，大家日夜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我也正在想办法尽快反攻大陆。在这关键时刻，他不但不帮'政府'做反攻大陆的宣传工作，反而还搞破坏，他已变成共产党的同路人、帮凶！可恶、可恨！"

"是这么回事，"蒋经国接着说，"殷海光的那支笔比共产党的破坏作用还要大。"

---

① 李敖等著：《千秋评论丛书》第84期，第256页。

蒋经国话音一落，蒋介石又对陶希圣说："这件事就由你和经国去组织办，一定要把《自由中国》散布的毒素、谬论一一驳倒、肃清。"

陶希圣连连点头道："好，好。"

前面已经提到，过去，殷海光与陶希圣的关系非同一般，但在关系到国民党的利益，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形象的问题上，他自然要站在蒋介石一边。

根据蒋介石的意见，陶希圣接连召开了几次会议，组织、布置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中华日报》等报刊，对殷海光撰写的《反攻大陆问题》进行围剿、批判。

一时间，《中央日报》、《中华日报》、《精忠报》、《新生报》，还有以民间面貌出现的《联合报》及一些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反攻大陆问题》的文章，有的说《反攻大陆问题》破坏"反共抗俄"，有的攻击《自由中国》散布"反攻无望论"，还有的说砸了"中华民国"的"招牌"。

有人粗略地作了一下估计，自《自由中国》发表《反攻大陆问题》的那两个月时间里，国民党的报刊上发表攻击《反攻大陆问题》的文章不下两百篇，发表文章的有国民党要员，也有国民党学者，还有军人及所谓的"名流"。

有趣的是，国民党除在报刊、电台上组织大批文章攻击、围剿《反攻大陆问题》的社论外，还在各级学校、军队中组织各种声讨、座谈会，驳斥《反攻大陆问题》的社论，而且所有的会上都有人这样说：不久的将来，蒋"总统"将带领"国军"打回大陆，用"铁"的事实回击《自由中国》及写《反攻大陆问题》那些"坏蛋"们的"胡言乱语"。

可是，"不久的将来"又遥遥无期，蒋介石及其追随者口口声声说的"反攻大陆"，又无法成为"铁"的事实。

1998年春，笔者见到一位回大陆探亲的退伍老兵，这位老兵

50年代曾在台湾南部的一支国民党部队中服役，60年代末退役。我与他谈到《自由中国》事件时，他笑了笑说：

《自由中国》是一份水平很高的杂志，50年代在台湾影响非常大。起初，我们在部队能看到，当官的也不怎么干预我们看。后来就不行了，当官的对我们说，上面来了通知，部队官兵以后不能看《自由中国》，只能看《中央日报》和军队报刊。我记得当时有两件事闹得很大，一个是给蒋介石祝寿，《自由中国》出了一个"祝寿专号"，印了很多，结果引起蒋介石和蒋经国的不满；第二就是《反攻大陆问题》的文章，使当局非常恼火。《自由中国》上发表的《反攻大陆问题》文章，其实说的都是真话、实在话，老百姓也都是那么看的，只是不敢公开表达出来。《自由中国》的编者、作者都是名气很大的人，他们打了蒋介石的脸，使蒋介石不好看，所以蒋介石很生气。

官方为反击《自由中国》上发表的《反攻大陆问题》的文章，1957年下半年在军队中办了好长时间的"三民主义讲习班"，轮训军官，6天一期，讲习班的主旨是"坚定反攻复国信念，巩固革命领导中心"。那些教官们一讲课，就把刊有《反攻大陆问题》的杂志带到课堂上，作为反面教材攻击一番。

记得，我们部队组织了多次大型的会议，连长、营长、团长都给我们讲话，说《自由中国》散布"反攻无望论"，打击民心士气，干扰反共抗俄，部队官兵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不能受《自由中国》上的毒素的影响，坚定"反攻大陆"的信心，拥护蒋"总统"，尽快打回大陆。

我还记得，每个连队都开过好多次这样的会，连长还要我们每个人讲。那时，我们当兵的文化都不高，加上又

未看到《自由中国》上的《反攻大陆问题》，说不清什么道道，连长要我们讲，我们只有喊几句口号，如“打回大陆，消灭共×”、“坚定反攻信心，完成反共大业”、“拥护领袖，效忠党国”等。现在想起来，感到很好笑。

后来，我到高雄，在一朋友处看到一本《自由中国》，正好那上面刊有《反攻大陆问题》的文章，我感到很好奇，一口气读完了。读了之后，我觉得《反攻大陆问题》没有什么错，并认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当局不应对《反攻大陆问题》那么仇恨，那样大动干戈。

我将自己的想法对我的朋友讲了，朋友说：“这就是国民党的悲哀。蒋介石主政大陆期间，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不许党内党外的人说真话，谁讲真话、献良策，就遭到贬斥、暗害，他的言行，完全背离广大民众，这还有不失败的？他到台湾后，仍然是老毛病不改旧性在。这一期《自由中国》上的那篇代序《是什么说什么》，可说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真正讲到点子上了。《反攻大陆问题》说的话句句是实，老百姓非常赞同，官方驳他妈的什么？七驳八驳，最后就是毛坑里拨粪——自己臭自己。

蒋介石天天喊反攻大陆，并说什么时候反攻，这不是说的梦话？你那么有本事，怎么会被共产党打到这个小岛上来呢？当年那么大的力量，又有美国支持，你都奈何不了共产党，现在这么点力量，又隔着大海，还能去反攻？他讲反攻大陆时，除了他身边的几个无用的奴才相信外，还有哪个相信那些鬼话？

听了这位老兵的话，笔者觉得很有趣，回到家里立即作了追记，故特写在这里。此事又可证明，当年蒋介石是如何恨殷海光写的《反攻大陆问题》一文，民众又是如何赞同《反攻大陆问题》的。

殷海光看到国民党报刊接连不断发表攻击、谩骂《反攻大陆问题》，而且又讲得毫无道理，感到还有很多话要说，于是，又写了一篇《反攻大陆问题的问题》，发表在《自由中国》上。他向社会解释《自由中国》发表《反攻大陆问题》的本意有二：第一，请不要把"反攻大陆"的希望建立在无绝对把握的未来世界战争的基础上面，同时也不要把未来世界战争机械的理解为射击战争；第二，希望大家不要为"马上就要回大陆"的心理所误，以致放弃了今天真正该做的事，而去追逐那个世界射击战争的渺茫幻影，找一条可以走得通的路。

尽管殷海光及《自由中国》作了上述解释和说明，国民党围剿、批判《反攻大陆问题》的火力仍然未减，而且把围剿运动发展到了海外。

蒋介石除了组织舆论批判、围剿《反攻大陆问题》的文章外，还别出心裁地用所谓的"行动"进行反击，以稳定军心、人心。

1957年10月8日，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儿子蒋经国一道，匆匆赶到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县，在宜兰合作农场出席"荣民"（已退休的单身老兵）授田仪式，亲自将"战士授田证"授给所谓的"荣民"。

所谓"战士授田证"，就是台湾当局制定的一个欺骗退伍老兵的假把戏。按照当局的说法，持有"战士授田证"的退伍军人，待"反攻大陆"成功后，可凭此证在大陆任何地方分得一份田产。

为了将此戏演得很真，国民党在宜兰合作农场将此仪式办得十分隆重，经过当局挑选的那几个不明真相的退伍老兵接过蒋介石亲自颁发的"战士授田证"时，感动得流出了泪水。

后来，国民党又陆续给所有退伍老兵发了"战士授田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领到"战士授田证"的退伍老兵们，无一人在大陆领到真正的田产。过了几十年后，国民党许的愿、发的证兑不了现，老兵们怒气冲天，不断闹事，国民党只好把那些骗了他们

几十年的授田证折价收回。

由于《反攻大陆问题》砸了蒋介石的招牌，揭了蒋介石的老底，蒋介石心里自然难受。为了稳定台湾人心，坚定国民党人的"反攻大陆"信心，1957 年 10 月 10 日，蒋介石利用"双十节"，向台湾人民发表了一个《双十文告》。在这个奇妙的"文告"中，蒋介石又向人民许诺"反攻大陆"成功后，将保证"恢复"如下六项"自由"：

（一）劳动就业自由，废除工奴与集中营；

（二）温饱康乐自由，废除合作社、国营农场，粮食配给"暴政"；

（三）思想研究自由，根绝洗脑筋；

（四）经济自由，取消统购统销与公私合营；

（五）生命安全自由，取消阶级斗争，禁止制造仇恨清算；

（六）选择生活方式自由，发扬民族精神，保证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之自由。还提了三大保证：(1)凡脱离共军来归官兵一律一视同仁，论功行赏；(2)凡中共团体既往不咎；(3)除元凶外一律平等对待。①

蒋介石在此"文告"中专门谈"反攻大陆"及"反攻"后的六项保证，显然是有用心的。他的目的有二：一是反击殷海光及《自由中国》；二是告诉人民，他有能力领导国民党"反攻大陆"，而且一定能成功，"成功"后的方针、政策也制定了，不要相信《自由中国》散布的那些"荒谬言论"。

稍具常识的人都清楚，蒋介石的这六项保证，不过是骗人的鬼话。且不说大陆根本不存在所谓"工奴"、"集中营"，单就他所保证

① 李勇、张仲田编：《蒋介石年谱》，第 428 页。

的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之自由来说，也完全是胡话。他统治大陆22年，哪一天保证过人民的上述自由？杨杏佛、史量才、闻一多、李公朴等人发表了对他不满的言论，他就下令军统进行暗杀，甚至连国父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副总统"李宗仁也列入了暗杀者的名单。对反对他的工人、学生，他更是残忍，下令军警用机枪扫射、刺刀杀戮，对书刊的查禁，更是古今罕见。他到台湾后，关押、暗杀不同政见的人士，难以计数，特务、安全人员无孔不入，查封的书刊，与大陆比起来，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白色恐怖达到极点，人民还相信他那六项"保证"吗？

有意思的是，殷海光写了《反攻大陆问题》一文后，蒋介石虽然下令国民党大举围剿、批判，骨子里又不得不佩服殷海光及《自由中国》人士，并暗地在言论、政策上，作了一些改进和调整。如1957年10月10日至23日，国民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台北召开，此次大会提出的口号与行动纲领是"建设台湾，促进反攻"，再不像过去那样光说不切实际的话，不做眼前应做的事，不提建设台湾，而一味提"反攻大陆"。这一变化，显然是《反攻大陆问题》一文带来的。

更有意思的是，蒋介石接见外国人，口气也有了一些变化。如1958年2月，蒋介石接见日本记者访问团谈到"反攻大陆"问题时，他说：

> "中华民国"的反攻复国大业，决不是单靠有形的军事力量来完成的。许多外国友人常从此角度来看我们这个基本问题，自然觉得这是一件万分艰巨，甚至是短期内不易达成的任务；但是，要知道——革命战争主要是靠社会民众和主义思想的力量来支持成功的。①

① 李勇、张仲田主编：《蒋介石年谱》，第430页。

蒋介石的这段谈话，清楚地告诉人民两点：第一，在军事上，他承认台湾没有能力去"反攻大陆"，所以决不能"单靠"军事；第二，"反攻大陆"要靠政治进攻——主义思想。这两点，与殷海光及《自由中国》人士的看法，已接近一致了。

当然，蒋介石是个说话不太负责任的人，他对同一个问题有多种说法是常事。问题在于，他自己心里也清楚无能力"反攻大陆"，却口口声声说要"反攻大陆"，而且今年推明年、明年推后年，并在舆论上对殷海光及《自由中国》穷追不舍，猛攻猛打，不知为何？

殷海光和《自由中国》同仁都感到，此次与蒋介石及其党徒争论"反攻大陆"问题，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既然跟他们讲不清道理，只有任凭他们攻击了。待有机会，再作反击。

到1958年10月，殷海光见国民党围剿、斥责《反攻大陆问题》的文字仍然不断在报上出现，心里很不服气。他认为，蒋介石集团之所以对《反攻大陆问题》的社论如此恼怒，如此痛恨，除了此文砸了他们的牌子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对形势认识不清，甚至是糊里糊涂的，有必要给蒋介石等人指点迷津。

基于上述考虑，10月中旬，他在《自由中国》上又写了《认清当前形势，展开自新运动》一文，他在文中说：

> "政府"迁台以来，最大的政治课题是"反攻大陆"。然而，对"反攻大陆"这一课题很少有合于事实真相的清楚认识。一般人的认识，多得自官方的宣传。而官方宣传又多系以情绪、愿望和面子作基础。这样的认识是经不起考验的。①

殷海光说，"反攻大陆"之事，要从两方面观察，一方面是国际

① 《殷海光全集》第12卷，第725页。

形势；另一方面是台湾的军事力量。他仔细分析了美国政府领导人对台湾海峡局势的态度和言论，台湾的军事力量及国民党领导人的言论，中国大陆的军事力量，得出一个结论：

> 无论就国际形势说，还是就敌我军事力量之消长说，反攻大陆之事，除非有世界大战发生，否则在可见及的将来，是迈不开步子的。

他认为台湾在军事上"反攻大陆"是不可能的事，唯一的办法是向大陆作"政治进军"，并说"政治进军"不受国际形势的牵制。

他在文中还向蒋介石等人提出借此机会开展一次"自新运动"，认清形势，求真务实，并取消"一党专政"等五条建议。

殷海光此文，对蒋介石、国民党来说，是做不到的事，他们当然也不会理会。"反攻大陆"的政治口号，在官方的各种场合，仍不绝于耳。

1958年10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问台湾。10月23日，杜勒斯与蒋介石发表了《蒋杜联合公报》，该公报中的第六款说："'中华民国政府'认为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及其神圣使命，并相信此一使命之基础，建立在中国人民之人心，而达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藉武力。"①

10月2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全文刊登了《蒋杜联合公报》。殷海光很快注意到这一段文字，而且看了又看。

他自语道："蒋该死啊，当初我对反攻大陆问题说了真话，你们大动干戈，组织那么大的力量围剿我和《自由中国》。既然我和《自由中国》的同仁说错了，那你今天为什么要说'而非凭藉武力'呢？还是我和《自由中国》的同仁高明！"

---

① 1958年10月24日台湾《中央日报》。

他太高兴了，马上跑到《自由中国》杂志社，向雷震告知了这一消息。雷震听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说："蒋介石、蒋经国父子花那么多精力、财力反对《反攻大陆问题》，算是白反对的，他们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

殷海光向雷震提出，要抓住此事再做一篇文章，把憋在心中的一口气吐出去。雷震及杂志社其他同仁都同意殷海光的意见，并鼓励殷海光赶快把文章弄起来。

1959 年 1 月，殷海光写了篇《自由中国之路》，发表在 2 月 20 日《自由中国》第 24 期上，殷海光此次打破常规，在文章标题下，特别加上一句"……10 年了！"的话，意即蒋介石开出的一个又一个"反攻大陆"的日期早已过了，而且一过就是 10 年，可是"反攻"仍不见眉目。他在文章的开头说：

> 我们从大陆撤退来台，匆匆 10 年了！当时 30 岁的人，现已 40 岁。当时 40 岁的人，现已 50 岁。当时 50 岁的人，现已垂垂老矣！人生本来没有多少个 10 年。而有作为的岁月，尤其不多。我们是否还要呆下去呢？究竟呆到什么时候为止呢？这类问题，密切地关系每一个人的前途，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权利提出这些问题。
>
> ……
>
> ……去年 12 月 23 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结果却是"不使用武力"来"反攻大陆"。我们已经不止一次说过，在这个世界上，一国"独行其是"的时代已到尾声了。任何国家想要有重大的行动，必须考虑国际形势并得到他国的支援。这些年来，无论就国际形势说，还是就自由中国本身力量说，都不能拿军事力量"反攻大陆"。……高嚷"反攻大陆"者并非心里不想"打回大陆"，而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中美联合公报"之发表，等于把一张底牌揭开。10年来铁的事实证明武力反攻大陆的"尽然率"(公算)很低，而摆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个茫茫了无已时的前途……①

1959年是《自由中国》创刊10周年。杂志社的全体人员在准备庆祝活动的同时，也认真地回顾了《自由中国》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编委会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发表一篇《自由中国的10年回顾》的文章。并借此机会，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作适当反击。

此文由雷震执笔，写得较长。文章谈到国民党对《反攻大陆问题》的围剿时说：

在46年(1957年)到47年(1958年)2月间，本刊发表一系列"今日的问题"的社论以后，又受到第二度的大围攻。第二度的围攻中我们又被戴上一项"反攻无望论者"的帽子，接着又有所谓"卖国主义者"、"亡国主义者"等罪名。除这些文字上公开的攻击、谩骂、构陷以外，还有或明或暗或重或轻的恫吓和利诱，经常在本刊主笔们的面前分别耍弄。这些事，我们真是一言难尽。

……

这一方面的文字，近年来我们特别注意于较长期的打算与根本问题的解决，而不斤斤计较在枝节问题上，作隔靴搔痒式的讨论。因此，本刊在46年(1957年)8月至47年(1958年)2月间发表了一系列"今日的问题"的社论共15篇。在那些文章当中，我们几乎把当前所有的重要问题都一一谈到。问题尽管是个别地谈，但我们是从一

① 《殷海光全集》第12卷，第771～773页。

个基本的看法出发的。那就是，我们认定："政府"历年叫喊的军事反攻，事实上，这个"尽然率"(Pyobability 当时译作"公算"，曾引起很多人误解)是很小的。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好好地在"实事求是、持久渐进、实质反×"的基本原则上做些反×建"国"的工作，不要以迷茫之情、狂热之气，天天在那里叫喊马上可以"反攻大陆"，因而使一般人形成"暂时忍受"和"暂时迁就"的心理，以致蹉跎岁月，一误再误……①

此篇文章是以《自由中国》杂志社的名义发表的，代表杂志社全体同仁的意见。对蒋介石、国民党围剿《反攻大陆问题》的错误做法虽然写得不多，却非常清楚明白地向社会表明了《反攻大陆问题》一文说的是真话、实话，没有错误。批评了蒋介石、国民党的横蛮、霸道作风。

到了 1960 年春，国民党的报刊上，仍常有批判、攻击《反攻大陆问题》的文章，殷海光十分恼火。他气愤地骂道："历史已经证明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政策彻底失败了，为什么还要攻击我们呢？蒋介石、国民党太混账了！"

到了 5 月初，他实在忍不住了，在《给雷震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中，向蒋介石、国民党愤怒地问道：

……

(4)所谓"反攻大陆"，叫了几年，究竟哪一天开始？

(5)俄国有强力火箭、地球卫星、原子武器，连美国也不敢贸然言战，台湾什么也没有，如何"反"法"抗"法？

(6)中国共产党当年在江西××××，只有 800 支

① 《雷震全集》第 13 册，第 112～114 页。

枪，尚且没有扑灭掉它。现在共产党占据中国大陆，手握世界第三强大的武装力量。台湾及其外岛需要美国第七舰队保护和支援。这证明它自卫尚成问题，怎样能够"反攻大陆"？况且，蒋杜宣言明明白白说"不使用武力反攻大陆"，那么怎样去"反攻"呢？①

由于《反攻大陆问题》的社论对蒋介石集团的冲击太大，蒋介石除指使特务机关破坏《自由中国》在台湾地区的印刷、发行外，还决定阻止该杂志在海外的发行。

原来，《自由中国》除在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发行外，还从1955年2月份起，由总部设在美国旧金山的亚洲协会每月购买3000本分送给美国各地的华侨阅读，"反攻大陆"事件之后，蒋介石感到《自由中国》经常不断地发表攻击、拆穿他假像的文章，对他的个人形象和"反攻大陆"事业有影响，故特地指示"外交部长"叶公超出面与亚洲协会驻台湾代表史麟书交涉，要求亚洲协会再不要购《自由中国》杂志。

叶公超还根据蒋介石的意见，会见了美国驻台湾"大使"庄莱德，请求他劝阻亚洲协会购买《自由中国》。

起初，亚洲协会没有同意蒋介石集团的意见，后因蒋介石集团一再给他们施压，亚洲协会才被迫作出逐步停止购买《自由中国》，其步骤是：从1958年1月起，每月少购1000本，到1960年全部停止。

亚洲协会停购《自由中国》，对《自由中国》在海外的发行虽有一定的影响，但因其杂志品位、质量较高，加上是非不断，在岛内的发行却不断上升。这样，弥补了亚洲协会停购造成的损失。

1960年9月4日，雷震案爆发。当天晚上，国民党中央常委陶

① 《殷海光全集》第12卷，第906～907页。

希圣与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曹圣芬、“行政院”新闻局长沈锜，共同宴请台湾各大报社的负责人。宴会期间，沈锜叫人散发了早已印制好的《〈自由中国〉半月刊违法言论摘要》的宣传册子。由于此册子的封面为白色，故人们称它为“白皮书”。“白皮书”称《自由中国》半月刊有六个方面的“违法”言论，其中有三大问题系殷海光所写，而首要问题，是殷海光写的《反攻大陆问题》。现将国民党散发的《〈自由中国〉半月刊违法言论摘要》中与《反攻大陆问题》有关的部分抄录如下：

> 《自由中国》半月刊自46年(1957年)8月1日之第17卷第3期社论(二)今日的问题(二)《反攻大陆问题》一文，刊登违背反共抗俄“国策”言论后，近年来更变本加厉，迭经刊载攻讦反共抗俄“国策”，诋毁“政府元首”，挑拨人民与“政府”间感情，煽动军人及青年愤恨“政府”，瞧毁士气民心，更进而鼓励本省人与外省人相互仇视。揆其目的，无非在阴谋煽动颠覆我合法之“政府”。
>
> ……该文妄言反攻大陆，经公算结果，前途渺茫，与“政府”的“反攻复国国策”有违。此种有利于叛徒之宣传，为该《自由中国》杂志言论一贯之立场。如《反攻大陆问题》等文内容，均有“反攻无望”之泄气言论，影响民心士气，莫此为甚！①

据1960年9月6日香港《星岛日报》报道，逮捕雷震，是经蒋介石批准的，《自由中国》违法言论摘要的宣传册子，也是经蒋介石审查批准后才散发的。

以后，国民党的军事法庭起诉、审判雷震时，殷海光的《反攻大

① 《雷震全集》第3册，第55～58页。

陆问题》一文，均是雷震的主罪。下面，是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关于雷震起诉书中的两段文字：

> ……雷震自任《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后，亲自主持该刊编辑发行，于是该刊作风渐次转变，还更变本加厉，妄指"政府"之反攻大陆之政策与号召，为自欺欺人自误误人之词，散布悲观无望之论调，意图瓦解反共抗俄斗志。……查该刊侈言"政府"欠缺从事现代战争必备条件，高喊"反攻大陆"为自误误人，自欺欺人之词，故陷世误信光复大陆殆不可能；又言军中官兵情绪抑忧猜忌，虚构军队本身潜伏危机，为反攻无望作注脚，其抹杀客观事实，以偏概全，率作肯定不利之论，自足影响士气，打击民心，显于叛徒有利无疑。①

10月1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高等审判厅在雷震等人的正式判决书中，又用殷海光的《反攻大陆问题》一文作为雷震的主罪，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此作法可看出，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对《反攻大陆问题》是多么恼火。

我们再看1960年9月中旬，蒋介石在台北市郊阳明山办公室，会见美国记者访问团的谈话。美国记者问他，为何要逮捕《自由中国》半月刊负责人雷震时，他说："逮捕的原因，是该刊登载的文章反对'政府'，反对反攻大陆，对共×是有利的"。

蒋介石说的反对反攻大陆的"文章"，显然是指殷海光写的《反攻大陆问题》的社论。

据说，《自由中国》被迫停刊后，国民党控制的报刊，仍然不断地将殷海光写的《反攻大陆问题》作为靶子打。由此可见，殷海光的

---

① 《雷震全集》第3册，第243～246页。

文章，给蒋介石、国民党造成的冲击之大，刺痛之深。

对蒋介石集团的长时间批判、围剿，到60年代中期后，殷海光因被监控、被整臭，无法作反击，直到他临死前的4个月，他在一篇用英文秘密口述的文章《剖析国民党》中，才又作了分析与反击，他说：

> “反攻大陆”是国民党能力所不及的，没有什么比这一点事实更确实了。但为什么它长期以来整天嚷着这句行不通的口号呢？值得思考的理由有很多。
>
> （一）蒋介石及其心腹自称革命家，但与共产党竞赛却屡遭挫伤、溃败、幻灭，于是，需要参与一些盖世勋业来医治内心的彷徨，缓和心理紧张，稳定摇摇欲坠的威信，修理支离破碎的权威，重建组织，复活失落了的自信。
>
> （二）“生存”是一切生物最关心的问题。很多国民党党员都是中共在长征时和其他困难时期变节的共产党员。内心的负罪感使他们对中共怕得要死，恐惧中共攻下台湾后把他们杀光。于是，逃到台湾的一伙人员只有死撑。自卫的上策就是进攻，或者装出进攻的姿态。这形成“反攻”口号的实质。
>
> （三）国民党内有一些秘密会社的分子，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国民党在个人关系的行为模式上都与秘密会社息息相连，特别是在上海时期青帮和红帮在长江沿岸长期以来都在努力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一般而言，失败的一方绝不会向胜利的一方卖身投靠，否则永无翻身之日。因此，败方首先的任务是保持威信，重建势力，复仇雪恨是其一切行动的最高目标，也是收复失地的不二法门。在某个程度上，由于这些帮会蜕变而成的国民党，无可避免地注满这种帮会主义的原始意识。显而易见，这也是30

年代初期以来巩固蒋介石仆从核心的道理之一。顺着这条历史发展基线，惨败的国民党（青帮）的“伟大领袖”一天当权和拥有发表文告的“自由”，便一天不会向中共臣服。

（四）根据中国传统，一朝的土地落在叛逆手上，即等于“灭国”。这时，负责的皇帝必须自杀以谢国人。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却继续跟中共打下去，这表示故事还没有完结。而且，他们一天不停地喊“反攻”，就能一天卸掉在大陆丧师的责任。

（五）台湾的大陆人都曾经是虚荣的奴隶（占压倒性的多数），在声势和面子之间团团转。被共产党赶出大陆后，他们绝大多数都丧失了地位和声威。这是他们无法忍受的。于是，他们照旧把自己当作伟大人民的“总统”，握有一个伟大国邦的主权。这些想法最后分析起来是假是真暂且不论，总之它们都带有大陆人的虚荣感。它们虽然是幻觉，却令许多大陆人混混然不致太难过。蒋介石政府的权力，因此日见增强。

（六）抗战八年，中国人生灵涂炭，国民党对此全无作为，人民对它越发失望。跟着，国民党又在全国范围内打内战，使恶劣局势更加不可收拾。

……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和战后没有遵守“救国救民”的诺言。党内除了少数的例外，全是腐败不堪。他们的行径与孙中山的教导和初期入党时的目标南辕北辙。整个国民党可说是面目全非。

可是，“反攻”口号却令国民党党员大大减轻内心的无助感和负罪感。他们自命正统，称共产党为“叛逆”，于是，他有藉口死握权力不放了。

（七）50年代初期，美国掀起麦加锡反共狂潮，依附

美国的国民党打着“反攻”的幌子，既赢得洋人的欢心和信任，复能堵塞台湾人民的口。

不过，随着时迁世移，返回大陆的念头越来越渺茫了，“反攻”口号的功用也日渐消失了。①

在此篇《瞒天大谎的分析》一节中，殷海光接着又指出：

卡尔·波珀有句名言：“大人物可能犯大错误。”我认为，由远古至现在，许多伟大的领袖也说过伟大的谎话。希特勒便曾率直地主张说谎话，并且要说瞒天“大谎”，不是“小谎”。

正像希特勒的瞒天“大谎”，蒋介石的应承“领导大家回大陆”也是伟大的艺术杰作。可是，如果不用测谎机，要在逻辑上论定“反攻大陆”这一此起彼伏的口号是瞒天大谎，并不容易。

……

（一）希特勒在慕尼黑条约会议中声称：“我对欧洲的领土要求，这是最后一次了。”后来他反复重申，却一次又一次背信，从未停止蚕食欧洲。同样，蒋介石在50年代初说什么“五年反攻”，然后是“三年”，接着是“一年”，好了，到了60年代，他又说：“即将反攻”。可是，事实证明它只是空话。

（二）1958年，蒋介石与杜勒斯发表联合声明，说“中华民国”将不使用武力反攻大陆。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把这当一回事。

---

① 《殷海光书信集》，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315～317页。

（三）蒋介石一伙曾经巧妙地利用美国某几位口若悬河的政客，关于中国问题的演说，以及美国长期以来支持蒋在联合国的席位的事实，塑造得到美国撑腰的印象，暗示美国将支持反攻大陆。

以上三项都使我们获得一个结论：蒋介石反复重申"反攻大陆"的政策是彻头彻尾的谎话。

谎话当然是谎话，但这个谎话大得远非在台的大陆人士所能洞识。他们对"国邦"事务和国际事务知之甚浅，做梦也不会想到最高领袖居然要处心积虑利用他们的希望和恐惧为自己和自己一伙人的私利撒下弥天大谎。蒋介石及其一伙讲谎话时把握十足，充满自信而且开动一切宣传机器，被传统束缚惯了的大陆人士自然难以看清其假面目。即使发觉，也不知如何是好。①

殷海光对蒋介石在"反攻大陆"上的假把戏分析得十分深刻。的确，蒋介石败逃台湾后，如不找一个欺骗人的口号，不举着"反攻大陆"的旗子和招牌，他就没有脸面再做"中华民国总统"，也无法统治台湾人民。可惜，当时的台湾岛上，除殷海光外，能洞察蒋介石奸心的人太少，敢于公开反对蒋介石用不切实际的口号欺骗台湾人民的更是微乎其微。这样，殷海光奋起砸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招牌时，很少有人起来呼应，声援的力量也很弱。

直到雷案发生，《自由中国》被迫停刊后，才有极少数刊物为殷海光及《反攻大陆问题》的社论说公道话。如1960年11月1日，香港《民主评论》杂志就在《谁打击了士气人心》一文中说：

就我们所知，今天真正影响人心的，是"政府"口头叫

① 《殷海光书信集》，第318～319页。

嚷11年之久的"反攻大陆",到今天仍是个口号,而未能见于行动,这个事实,深深打击了大陆来台同胞的内心伤痛。

……这已说明了"政府"目前的作法,不仅打击了大陆来台同胞的人心,也令海外人心沮丧,这种人心失望情绪,一定要归咎于《自由中国》半月刊内的一些文章,是不是有点冤枉?①

尽管蒋介石利用自己的权势,组织国民党的舆论阵地对殷海光的《反攻大陆问题》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批判、围剿,并不惜继续作假,不停地高喊"反攻大陆",历史已证明真理在殷海光一边,蒋介石的口号和做法不但破了产,而且荒唐可笑。受到后人批评、谴责、耻笑的,不是殷海光和《自由中国》,而是独裁者蒋介石。

① 1960年11月1日香港《民主评论》。

16

殷海光抨击台湾风气：蒋介石大为恼火

进入1958年，《自由中国》已进入第九个年头。在这九年中，《自由中国》虽然遇到一个又一个挫折，一个又一个波澜，但还是闯过了难关。

尽管国民党、蒋介石将《自由中国》当作很坏的刊物，广大民众对《自由中国》却极为喜爱，每期刊物一出，读者踊跃购买。

有一天，殷海光到台北圆山临济寺，见一和尚在看《自由中国》，连忙拢去问他为何看《自由中国》杂志，这个和尚对殷海光说："《自由中国》上讲的都是真话，也很有道理，别的

刊物爱说假话。”

殷海光听了，心里很高兴。

离开临济寺，他又到一学生处吃午饭。在这位学生家里的阳台上，他看到其邻居的一个海军军官在看《自由中国》杂志，感到很惊奇，跑过去问他怎么看起了《自由中国》，对这个杂志有何看法。海军军官对殷海光说：“我原来未看过《自由中国》，近年来，我们军队政治部编的杂志总在骂《自由中国》，我感到很奇怪，买了几本回来。看了之后，我感到《自由中国》上的话说得很对，也很有理性，而且讲得很深刻。我认为，军队政治部的刊物不应骂《自由中国》。”

听了这位海军军官的话，殷海光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他自语道：“好坏、真假，人民还是看得准、分得清。”

第二天，殷海光赶到雷震家，把昨天的所见所闻如实地告诉了雷震，并说：“《自由中国》今日才算出山了。”

雷震听了，高兴地笑了。

雷震还告诉殷海光，近来，他会见了不少各界人士，还接到不少民众来信，大家对社会风气越来越坏十分关注，而且非常不满，并希望我们写文章批评。

正好，殷海光也有此想法。这一段时间，来看他的学生、朋友时常谈到这个问题。他们都认为，由于蒋介石在台湾实行独裁统治，不容别人提建议，更不许别人批评时政，致使台湾政坛从上到下好大喜功、大搞形式，喜听好话，相互欺骗，是非颠倒，民众对此非常痛恨，感到这样下去，台湾没有任何出路。

雷震对殷海光说：“下一期的‘今日问题’可否由你写一篇关于这方面的社论呢？”

“可以。”殷海光很爽快地答应了。

1958 年 1 月 18 日下午 3 点，《自由中国》全体编委会成员在杂志社开会。雷震将自己与殷海光的想法告诉了其他编委，大家都赞成殷海光执笔写“今日的问题”社论。

编委们同意殷海光写这篇社论，除殷的政论文章来得快，写得好外，最主要的还是他一向主张“是什么说什么”，言别人不敢言，作别人不敢作之事。批评蒋介石及台湾社会风气不好之作，如果出自他的手，必然精采。

散了会，殷海光急忙回到家里，一气呵成了《近年的政治心理与作风》一文。此文发表在《自由中国》杂志第18卷第3期上。

殷海光在文中说，近来，常有人忧虑台湾社会风气之日趋颓败，而且忧虑言论常见于报刊，但是，这些言论大都是枝节之谈，尚未论及社会风气何以这样日趋颓败的原因。

他指出，八九年来，台湾社会逐渐为泛政治主义所笼罩，政治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层面和每一角落。时至今日，政治已经成为社会的一部引擎。社会的各种活动都得套上这部引擎的带子，由这部引擎来发动、来支配，于是，政治引擎开向什么方向，社会就得跟着走向什么方向；政治引擎发生什么偏差，社会活动也不能不随之而发生什么偏差。台湾社会不能在这部政治引擎以外作一个社会应有的发展。近几年来，台湾社会的种种发展，是这部引擎导演与支配之直接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要说明台湾风气何以日趋颓败，便不能不“正本清源”地从解析近年来台湾的政治作风着手。

他接着指出：稍具政治观察力的人不难看出，近八九年来，在政治作风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范畴上，官方人士并没有什么新的创造。过去在大陆上有什么法宝，迁台以后带来的还是那些法宝。这几年来，有些作风不过是将在大陆时的一些隐而未显的因素加以“发扬光大”而已。当然，由于痛切失败，由于台湾局面狭小，在控制的策略上，较在大陆时代稍具精炼。此外，由于时移世变，政治作风中也加添了少许新的技术因素。要把近年的政治作风说得透彻，必须从分析那些一直流行于政治圈内的基本心态开始。

殷海光在此文中，举出了蒋介石及其集团在台湾的政治心理有五种，并逐一进行分析：

(1)虚无感。现在台湾搞政治的人,在办训练时满口的"主义"和"历史使命",这些术语叫得震天价响,但叫者的内心则是虚无的,且充满了幻灭感,叫者的行事为人,与口头所叫的相去十万八千里,即可看出彼等所叫者自己也不相信。但是,正因愈是充满了幻灭感,便愈要拿"绝对的信仰绝对的主义"这类口号来弥补内心的空虚,让自己得到象征性的满足:聊胜于无!……所谓"为国为民"的理想,早置于脑后,而穷年利用金钱、官爵以及特殊的秘密力量要弄权力。到了这个地步,要弄权力之目的,完全是为权力而权力。权力对于要弄者而言,成了不可须臾的嗜好。嗜好权力到了这种纯净的程度,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除延续其权力以外,对任何事都不感真正的兴趣,这真是虚无到了极点。

(2)帮会意识。帮会意识在下层社会有其好的作用,但一用到政治上就坏。现代国家之行"政党政治",是把政党作为国家的工具。帮会意识一用到政治上,就倒过来把国家作一党的工具。直到现在为止,"中国"并没有英美意义的政党政治——虽然许多人这样希望着。凡少数人利用单一的政治组织永久独占国家者,没有不是天下为私者。愈是天下为私者,愈要打起"天下为公"的招牌,因为这个招牌可作私图的掩饰。……帮会意识可以表现于几个方面:

第一,码头独占(略)。

第二,入股有份。这就是说,如果你想分肥,那么你一定得入帮。只问是否在帮,不问有无功劳、才能、学识。入了帮的人,即使学识再差,才能再低,也比未入帮的人得到较好的机会。

第三，小天地。帮会以内的人，每一动态，主要的着眼点只在小圈子的存亡与利害，小圈子以外则非所问。既然如此心眼如豆，于是在国家的利益与这小圈子的利益不能两全时，小圈子里的人一动念就是牺牲国家以成全小圈子。事例昭昭，在人耳目。

第四，家丑不可外扬。民主国家有"拨粪运动"。拨粪运动是尽可能地将丑事或坏事公开，让大家公开批评、公开指责，好让类似的事以后不再发生。我们这里则盛行"家丑不可外扬"，宁可让坏事闷在里面发臭，以致溃烂，而不敢说出，这本是中国传统的社会心理。有帮会意识者，进一步将这种传统的社会心理变成一个组织意识。他们不乐意甚至不许人公开揭露不光彩的事。他们动不动说："有什么问题向我提出。"问题一经向他们提出，是否能够解决，只有天晓得。不过，这样一来，遮丑的效果可以收敛一点，不仅如此，只要大家真的向他提出问题，这也就是典型承认了他是足以代表一切的中心，并且在任何条件下归向这一个中心。

(3)民可愚弄。做官的人几乎有一个共同的"基本信念"，就是认为自己才智高人一等，玩弄手法时老百姓蒙在鼓里，永远看不出。近年来台湾的选举以及若干经济上的措施把官方人士的这种心理暴露无遗。至于政治上的颠倒黑白，造作传奇，那更不用说了，传统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训诫，可谓深入官心……

(4)自卑感(略)。

(5)疑惧感(略)。

因为上述的政治心理，所以直接产生了下列的政治作风。

A. 便宜行事。30余年来，政治权势人物(作者注：指

蒋介石)心目中从无法制观念。所谓"率公守法"之说,完全是对被治者片面的要求。彼辈心目中所存的观念惟"便宜行事"。掩护"便宜行事"的藉口,无非是"革命",无非是"非常时期",无非是"紧急状态"。

"便宜行事"所衍出来的弊端真是不可胜数。"便宜行事"一日不停,法治就一日建立不起来。法治一日建立不起来,"中国"就永远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结果就站立不起来。而迁台以来,"便宜行事"之结果,竟夹带出一个"超级权力"。这个"超级权力",不公不私,亦公亦私。这个超级权力置于"政府"之上,同时又深入"政府"骨髓之中。这股势力之存在,你如要明白指出,却又像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它在任何政治机构或军事编制之外,且是,它确能在任何政治机构或军事编制里发生主宰作用。如果任何人不同意它,那么便立即感到它的阻力。许多人一提到它,精神就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可是,如果你投靠它,那么你也许会畅行无阻。总而言之,这一超级权力可管一切事,但它不负任何责任,法律更管它不着。它像一部红色救护车,挡者披靡。

我们真不明白,这一超级权力古今中外还有第二个没有?如果将来有人替中国写政治史,这一超级权力又归到哪一类中去?

B. 只讲利害不讲是非。几年来,政治作风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特色是,为政只讲直接的现实利害,而不讲是非。搞政治的人,只要能够得到最直接的现实利益,其余的是非问题,可以搁在一旁不管。行之既久,就把利害当做权衡是非的标准。传统的"义利之辨",为什么在实际上这样失却拘束力?

只讲利害者,当然唯力是尚。许多人不难感到:这年

头，没有什么“理”好讲，一切唯“力”是视。“力量即是真理”，谁有力量，谁就有“真理”。这里所谓的力量，包括枪杆、群众和钞票。这几年来的政治风气完全是力量的较量：你有多少枪杆，你就说多少话。枪杆愈多，说话愈响。没有枪杆，纵上千百万封书，结果与烧冥纸相同。你身后有多少群众，你便被人打了多少分数。你被打了多少分数，便得到多少光彩。如果你没有群众，那么，随便下一个纸条子就可以解决你。如果你有大量钞票，不怕你不受尊重，更不怕你不会成为新闻人物。如果这三种力量统统都有，那么你在此时此地搞政治的人物之心目中自然可中上上之选。可是，如果一个人不具备上述三种力量的任何一种，那么他纵有救国救民的大抱负，纵然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虽叫得力竭声嘶，也不会有人理睬。这多年来为政者的作风如此，于是弄得一般人也唯力是尚，而不知讲理为何事。一般人总是多少接受经验教训的动物，当大多数人眼看着讲理的人都吃了亏时，谁还跟在后面做傻子呢？

C. 捧红吃黑。今日政治圈内之捧红吃黑，真是已经显著到路人皆见的地步。请看现在的办法吧！有势力的，捧；有声望的，捧；走红的电影明星，捧；在科学上成就于外国的，捧。可是，在另一方面，躲在静僻的角落里作无声无息的努力者，谁也不去理会他。真正埋头苦干的人，纵使不受摧残，也任其在生活的困难中挣扎，谁也不伸出援助之手。搞政治者之势利，从无今日之甚。

D. 海派作风。海派作风与捧红吃黑同出一个心理根源。因此二者有相通之妙。不过，海派作风特别注意花花绿绿的色调，特别是努力制造新闻，特别看重人的娱乐价值。海派作风的特质就是只讲求表面热闹好看，而不顾里面的实际。所以，这几年来，官方人士在庆贺、祝寿、表演、

扎彩坊，这些方面特别起劲，亦若天下已大太平。

E. 远交近攻。远交近攻，本是战国时代这国用来对付另外的国家之策略，现在则被"政府"用来对付人民，这可以说是旧策略的新运用。这几年来，政治权力人物对待人民的态度与办法，和他们的实力所及远近成反比：他们对待愈远的人愈客气，对待愈近的人愈不客气，换句话说，他们对待愈离其实力所不能控制的范围以外的人愈宽厚，对待愈是其实力所及的范围以内的人愈苛刻。至于对"笼中鸡"，那就是随心所欲了。同是中国人，即令是单帮客、无聊文人，只要来台祝寿观光，有助于官方做成"天下归心"的样子，便待遇优渥，方便多端。同是一位大学教授，在台执教时所受的尊重并不比一位中学教师多得太多；可是，一旦从香港来台，便身价十倍，一旦从美国来台，便身价百倍，人的价值，竟随着政治广告需要而定高下！

政风之浇薄，无一时代可与今比拟！

F. 推拖敷衍。……今人之搞政治，有功归己，有过则归人，"中国"（作者注：这里指台湾地区）弄成今天这个局面，政治地位愈高者，应负的责任愈多。但是，我们做百姓的从来没有听见诸公有任何真心承担责任的话……

大帽子压人，也是政场推拖敷衍的一重大因素。这些大帽子，多半是空话，没有人知道其确定的意义内容，有的话更是永远不能兑现。虽然如此，但是，这些大帽子都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即令你心知其非，也不敢公开指出……

……

现在，台湾社会是个什么光景呢？一般说来，缺乏积极活跃的生之动力。老年人冬眠，中年状态消沉，或蝇营

狗苟，或耽于逸乐，打发无聊的岁月；青少年正常发展的道路大部分被堵死了，因之只有日渐向歪路上走。一切较远大的计划都在被官方疑忌之列；只有吃、喝、玩、乐，网开一面。这样的社会，酒家营业如何不鼎盛？大街小巷的麻将声如何不响？钻营奔竞之徒如何不充塞之途？太保太妹的预备队如何不年有增加？像道不拾遗，扶助老人，这等等事在文明的西方社会老早像呼吸空气一样平常的事，没有人拿着当话题的。而在我们这里居然有新闻价值，这可以反衬出我们社会已经颓败到什么程度！

在台湾，政治既然是发动社会活动的引擎，所以我们要正本清源地改造社会风气，必须从根本上改造政治心理与政治作风着手。怎样改造政治心理和政治作风呢？所需方法当然很多。但是，目前的先决条件是开放言论自由。开放言论自由，让大家得以将前面所提示的种种病症公开说出来，使之无所遁形，这才是改造的开端。①

《近年的政治心理与作风》一文，是殷海光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重要政论文章。此文一发表，社会反响十分强烈。许多人认为，这篇文章说的是真话、实话，而且是大家想说又不敢说的心里话。

大约从50年代中期起，国民党特务开始潜入印刷厂偷拍《自由中国》社发排的稿件。他们拍照的目的，旨在分析此文是谁写的，以便日后作为打击《自由中国》人士的证据。

此期稿件很快被特务拍了照片。

杂志一印出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看到了，而且知道《近年的政治心理与作风》一文出自殷海光之手。

---

① 《殷海光全集》第11卷，第552～564页。

对《近年的政治心理与作风》一文，蒋介石非常恼火，他大骂道："娘稀匹，一派胡言，一派胡言！"

蒋介石发火不久，儿子蒋经国进来了。

蒋经国看到其父桌子上有一本刚出版的《自由中国》，估计其父已看过了。他正要开口说话，蒋介石气冲冲地说："雷儆寰的《自由中国》上又有一篇很坏的文章，你知不知道？"

"知道了。"

"那上面的话，有很多是攻击、丑化我的！"

"是的。文章执笔人是殷海光。"

"《自由中国》的那帮家伙太可恶！"

"既可恶又可恨！"

父子俩正在谈话间，有人进来报告急事，他们的谈话才中止下来。

1958 年 2 月 4 日，是星期一，国民党按惯例要举行"宣传会报"会。参加此次"宣传会报"会的大员有蒋介石、陈诚、陶希圣、蒋经国、谷正纲、张群、张其昀、曹圣芬等。

会议由蒋介石主持。

会议一开始，蒋介石就气冲冲地批评了一些人，然后将话题转到《自由中国》上，并愤怒地当众骂道："刚出的《自由中国》上，有一篇社论叫《近年的政治心理与作风》，反动得很！那里面通篇是骂我的，太不像话！事实上，我一心为'国'，日夜操劳，他们像苍蝇搭在鸡蛋上，总想找点缝。那些人吃了饭没有事做，把我和'政府'其他负责人骂得一文不值！这么大的事情，'政府'人员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反击？为什么不管？！殷海光在《自由中国》上写了那么多丑化我和'政府'的文章，我们党内有很多人还很欣赏他，佩服他，称赞他的文章作得好。这些党员已经没有是非观念，黑白也不分了，可见我们一些党员已堕落到了什么程度！"

蒋介石边骂边拍桌子，大家见他的气太大，无人敢作声。

他骂完了，陶希圣作了检讨。他说："过去，我的工作未做好。总裁今天生气，对我个人及我们的工作是一个促进。以后，我们要在宣传上很好地堵住、反击那些偏激言论，特别是丑化、攻击总裁及'政府'的文字。"

陶希圣讲完，谷正纲、张其昀等接着发了言。

最后，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日报》社长曹圣芬发言。他讲到《自由中国》杂志及殷海光、雷震时，突然站立起来，慷慨激昂地说："《自由中国》已成为台湾偏激言论的领头羊，也可说是影响台湾民心士气的祸根。这个杂志一日不取缔，台湾一日不得安宁。把《自由中国》关闭了，再将雷震、殷海光抓起来，可杀一儆百。'政府'可能担心关闭《自由中国》会引起外国，尤其是美国方面的反对。我个人认为，关闭这个杂志，外国人不会管的。他们连自己的事情也管不了，哪有精力管我们台湾的事呢？"

尽管国民党大员个个叫喊要封杀《自由中国》，蒋介石却不便表态，因为《自由中国》中的胡适、殷海光、雷震等人名气太大，而且又是书生论政，突然一下子关闭了，恐引起诸多麻烦。

他的考虑是：要关闭《自由中国》，还得作些准备，找一个很"充足"的理由。所以，国民党的这次"宣传会报"会上，关闭《自由中国》的声音虽然很强，因蒋介石不作声，会议未作出正式决定。

尽管殷海光的文章《近年的政治心理与作风》未使《自由中国》关门，却惹出了不小的麻烦，也为蒋介石日后打击《自由中国》种下祸根。

1996 年 2 月 7 日，原《自由中国》杂志编委宋文明接受台湾东海大学研究生简明海的访问时说："殷的文字是非常激进的，故与雷震渐渐改革的思想有落差，……殷的言论造成《自由中国》与国

民党的关系渐渐破裂，殷要负很大的责任。”①

如按宋文明先生的这种说法，殷海光写的《近年的政治心理与作风》一文，就是造成《自由中国》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关系破裂的重要文章之一。

① 简明海著：《救亡与启蒙的困境——殷海光思想转变之研究》附录，第24页。

17

蒋介石想挖殷海光：殷海光识其奸心

殷海光写的《近年的政治心理与作风》一文，不仅使蒋介石大为恼火，也很使他坐卧不安了一阵。

他心想：《自由中国》那帮人老是盯着我和国民党，盯着“政府”，而且专找岔子，今日攻击我这，明日攻击我那，这样叫我如何领导国民党？如何组织台湾军民“反攻大陆”？如何有脸面会见外宾、接见下属呢？

在气头上，蒋介石曾考虑下令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连人连杂志一锅端，后来考虑《自由中国》的编委们都是名人，特别是胡适、毛子

水、殷海光、雷震等，他们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很高，一锅端的副作用太大。他又决定采取暂时忍耐的办法，让《自由中国》继续往下办。

可是，《自由中国》杂志的言论越来越出格，他们从过去批评一个单位、一件事、一个人，逐步发展到批评整个国民党和蒋介石，而且近三四年来，这个杂志的矛头基本上对着蒋介石，这就使蒋介石难以忍受了。

1958年5月中旬的一天，陶希圣到蒋介石办公室去汇报事情，陶希圣还未开口，蒋介石就问他："你近来与《自由中国》的那些人有接触没有？"

"没有。"

"那里面近来的情况你了不了解？"

"也了解，也不了解。"

"你说明白、细致一些。"

陶希圣说："杂志社的编委我都熟悉，但里面的具体运作情况，我就不太清楚。"

"谁清楚？"

"经国比较清楚。"

蒋介石又问："这个杂志社的主笔有哪些人？"

"主要的有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

"那里面的社论及攻击我和'政府'的文章，是不是他们三人写的？"

"写攻击你和'政府'文章的主要是殷海光。他的胆子大，来得快，又爱刺人。夏道平、戴杜衡两人温和一些。"

蒋介石思索了一下，又对陶希圣说："近来，我的心情甚为不好，就是被《自由中国》那帮人气的。我想，不能让他们老这样写下去。我们不公开取缔这个杂志，但要把这个杂志弄垮。其办法可多种多样，比如不准书商卖《自由中国》，不要印刷厂印他们的杂志，还可用办其他杂志的办法，将他们的人挖出来，造成他们有杂志无

人办或难办的局面。”

陶希圣听了，连忙附和说：“总裁这个指示英明，我非常赞同。”

“下一次开宣传会报会时，我们对这个问题专门研究一下。”

陶希圣点头哈腰说：“我赞同总裁的意见。我也觉得要对《自由中国》的问题专门研究一下，不能老让他们这样肆无忌惮地大放厥词。”

陶希圣一说完，蒋经国进来了。

蒋介石将对陶希圣讲的话，又重新对儿子说了一遍。

蒋经国说：“我与父亲想的完全一致。《自由中国》表面是雷震主持，最起作用的却是殷海光，杂志上最毒的文章，也多是他写的。我想，目前搞《自由中国》的最好办法，就是挖他们的墙脚，而其中最主要的是把殷海光挖出来。如果《自由中国》里面没有殷海光，言论就会平和多了。我还想，殷海光不老是标榜自己反共吗？我们就以办反共杂志为名，将他挖出来。杂志以合作的形式办，钱由‘政府’出，发行人由‘政府’派，业务上由他负责。”

老蒋觉得儿子这个办法很好，当即表态说：“那这个事就由你去办吧。我原想在下次宣传会报会上研究一下，现在不研究了，就这样办。”

蒋经国从老蒋那里出来后，马上找到原在国民党青年军中任过职的老部下、“家门”、又与殷海光颇熟的蒋廉儒说：“廉儒，我有一件大事需交给你去办一下，不知你能否完成？”

蒋廉儒连忙问：“什么大事？”

蒋经国说：“‘政府’想办一个反共杂志，但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合作人。我们考虑来考虑去，觉得最合适的只有台大哲学系的殷海光教授。他过去一直反共，文章写得又好，又有长期办报、办刊的丰富经验。由他主持这个刊物的业务，一定可以办好。我与殷海光虽然很熟，因我现在工作忙，又在职，不便直接去找他，请你代我出一下面，到台湾大学去找他商谈商谈。”

“他不是与胡适、雷震他们一起办《自由中国》吗?”

“实话对你说吧,‘政府’要他来办反共刊物,其目的就是不要他办《自由中国》。”

“‘政府’既然请他出来合作办杂志,那有什么好的条件吸引他呢?”

“你对他讲,办杂志的经费全由‘政府’出,另外给他优厚的补贴。他在刊物上写反共文章,杂志社一样付酬,而且比《自由中国》还高。杂志社的业务人员,也由他全权聘请。”

蒋廉儒说:“你开出的这个条件很优厚,我就按你说的去找他,尽力把他拉出来。”

过了两天,蒋廉儒奉蒋经国之命,真的来到了殷家。他把蒋经国的意见如实地转告了殷海光,希望殷海光抓住这个机遇,与“政府”合作,干一番大事业。

殷海光听了,感到蒋廉儒此次上门,是王婆照应武大郎——没安好心,其目的是要他离开《自由中国》。他对蒋廉儒说:“蒋先生开出的条件是很优厚,由于这事来得太突然,使我一下子无法答复,让我仔细考虑一下再说。”

“什么时候回话?”

“等几天吧。”

蒋廉儒回去后,将殷海光的意见转告了蒋经国。蒋经国说:“殷海光没有拒绝,说明还有希望,过两天你再去一趟,多说点好话。此事成功了,我给你请功。”

过了两天,蒋廉儒真的又来到了殷家。

殷海光对他说:“我现在又要教书,又要为《自由中国》承担一些任务,恐怕难以与蒋经国先生合作。”

蒋廉儒说:“你把《自由中国》的编委、主笔之职辞掉嘛。经国先生说了,你为‘政府’办反共刊物,各方面的待遇肯定要比《自由中国》好。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殷先生虽为名家,毕竟

也是人，何必老呆在党'国'要人都不看重甚至还有意见的民间杂志呢？"

殷海光瞪了他一眼，不冷不热地说："你前天跟我讲了蒋经国先生的意见后，我曾仔细考虑过，我觉得我不太适宜与'政府'合办刊物，就在《自由中国》兼着干吧。"

蒋廉儒见殷海光不想离开《自由中国》，又劝他说："殷先生，你办报办刊的能力，台湾文化界无人不知，写的文章惊天动地。可惜，'政府'对你那些文章和著作没有好的评价。汉代著名学者桓宽说过，茂林之下无丰草，大块之间无美苗。这两句话，是真理啊。你很优秀，才华盖世，希望你听蒋先生的话，掉个方向，从《自由中国》的泥坑中爬出来，好好与党'国'合作，办一个名牌杂志。那时，你不是名利更大了吗？"

殷海光听了蒋廉儒这几句话，很不高兴。他心里想：你们这些小人、软骨头，何必在我这里来这一套呢？

他对蒋廉儒说："我不想与你再谈这件事了，让我再考虑考虑，过几天再正式答复你吧。"

蒋廉儒见殷海光的心情不太好，又不作肯定的答复，很不高兴地离开了殷家。

1958 年 5 月 20 日下午，《自由中国》开编委会。殷海光将蒋廉儒谈的情况告诉了雷震、夏道平、聂华苓等人。雷震听了说："蒋家开始挖我们《自由中国》的墙脚了。"

殷海光问如何回复蒋廉儒，雷震说："你就告诉他，意见、信仰不一，不好合办杂志。"

聂华苓插话说："你可写一文章交给他，要他们的党报党刊发表，他们如能发表，你可与他们合办杂志；不能发表，即是无法合作。一篇文章就把他们真假合作的意图试出来了。"

殷海光觉得聂华苓这个主意妙，决定按聂的意见行事。

一星期之后，蒋廉儒又来到殷家，并告诉殷海光说："经国主任

对你很关心，真心实意邀你合作，你考虑得怎么样？”

殷海光将一篇文稿交给蒋廉儒说：“先不说合作之事，你把我这篇文章拿去，请你们在党报或党刊上全文发表。文章发表了，我们再来谈合作办刊的事。”

蒋廉儒把文稿拿回去交给了蒋经国。蒋经国看了文稿，文章字数不多，内容多是论民主、科学的，国民党的党报党刊，自然难以发表这样的文章。

蒋经国很生气地将文稿往地下一摔，骂道：“殷海光是不知好歹的东西！他不吃敬酒，那就等着吃罚酒吧！”

这样，蒋氏父子挖《自由中国》墙脚的奸心，被殷海光识破，并使其失败。

18

蒋介石强行三连任：殷海光公开反对

要说清蒋介石违“宪”强行第三次连任的问题，得从40年代说起。

1946年11月至12月，蒋介石为加强其法西斯统治，不顾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的反对，撕毁《双十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在南京召开了一党独大的“国民大会”，亦称“制宪国大”，并制定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

根据“宪法”第4章第47条的规定，“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的任期是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

这一年的11月27日，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召集国民党代表开座谈会时说，“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制定宪法”，“就是为了打击共产党”。

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出席了“国民大会”。他代表南京国民党政府接受了《中华民国宪法》，并在会上致词说：“深望我全体代表，协助国民政府，领导全体民众，共同一致。拥护这一部‘宪法’，实行这一部‘宪法’。”

这就是说，“宪法”是蒋介石亲自领导制定的，是他代表“中华民国政府”接受的，又是他号召全国民众“拥护这部‘宪法’，实行这部‘宪法’”。

可是，到1948年初，蒋介石感到“宪法”对他的独裁有妨碍，便借三四月间召开伪“国大”的机会，策动胡适、王世杰等700人提议，在会上又制定了一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抵消了“宪法”对“总统”权力的限制与约束，赋予“总统”在“宪法”外“紧急处置”的权力，以使蒋介石当上“总统”后，进一步实施其独裁统治。

1948年4月19日，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

1954年，蒋介石任期已到。这一年2月19日至3月25日，国民党在台北又召开了“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蒋介石在此次会上又当选为“总统”，5月20日在台北宣誓就职。

尽管此次大会丑闻、闹剧不断，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蒋介石此次连任属“合法”，以后再连任就是违“法”。

权力狂蒋介石根本未考虑任满后卸任交权的问题。

1958年12月23日，台湾当局的“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在台北举行全体大会，蒋介石到会作了讲话，谈到“总统”问题时，他说了一些“暗话”：

……自去年以来，“国民大会”有好些代表，曾经提出修改“宪法”的问题，自然这是各位代表的职权，个人不便

有所干预，但我可以代表中国国民党，代表“政府”来说，我们不仅是没有修改“宪法”的意思，并且反对修改“宪法”。……反共复国的武器，如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莫不皆是，而“宪法”则尤为反攻复国的有力武器。所以，我们必须尊重它，而且要拥护它，才能达到反攻复国的目的。……①

蒋介石的这段话告诉人们，有人曾向他建议修改“中华民国宪法”中关于“总统”、“副总统”“连任一次”的条款，他不同意，他要遵守“宪法”，以保持“宪法”的“完整”。

他此时讲这段话，是向人们作“政治试探”，目的是看看社会各界有何反映。

当时，除了小部分知情人外，许多人不知道蒋介石讲此话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更不知他早已计划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还天真地认为蒋介石讲此话是对的，“总统”是守“法”的。如果他带头遵“法”守“法”，国民党的“反攻大陆”事业就有希望了。大家心里这么想，却没有任何表示。

蒋介石没有料到，他讲了此话后，各界没有什么反应。

1959 年初，距蒋介石第二任期满不到一年时间，台北老百姓从早到晚在街头巷尾私下议论蒋介石连不连任的问题，而且议论得十分热烈。

民间的议论，很快进入了蒋介石的耳朵。

蒋介石觉得，应对此事有一个表示，但话又不能说得太明白。他先叫儿子蒋经国写一篇与他做“总统”有关的文章，放点风出去试探一下。

蒋经国心领神会，找人代笔，于 1959 年 1 月 4 日在台湾《中央

① 1958 年 12 月 24 日台湾《中央日报》。

日报》、《中国时报》等报上同时发表了《我们为胜利而生的!》一文，此文写得颇费心思，特别强调和赞扬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老人与海》一书中老人所具有的"永不灰心，永不放手"的精神。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此文的用意是告诉广大读者，台湾的"反攻大陆"事业，仍然需要蒋介石这样具有"永不灰心，永不放手"的老人领导，他的老父亲要再次连任，而且要任到底。

又过了一段时间，蒋介石亲自讲"暗示"话的机会来了。

5月15日，国民党八届二中全会在台北召开。在此次会上，蒋介石作了《掌握中心复国的机运》的报告。5月18日，是"总理纪念周"，蒋介石再次作了讲话。在这次讲话中，蒋介石除再次阐明了反对修改"宪法"的观点外，对人们极为关注的他是否第三次连任"总统"的问题，讲了三点"看法"：

> 我一向不为自己的出处考虑。但目前应顾虑三点，即一不要使敌人感到称心；二不要使大陆亿万同胞感到失望；三不要使海内外军民感到惶惑。①

蒋介石口里讲出这三点后，与会人员都感到，他嘴里虽然讲不修改"宪法"，骨子里还是想继续任"总统"。因为，权力是甜美的东西，他舍不得丢。此外，他暗定的接班人、儿子蒋经国羽毛未丰，还需他扶一把。

也有人说，蒋介石讲此话，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中华民国总统"一职，非他莫属，而且要一任到底，眼睛盯着此位子的人，不要想入非非，反对他第三次连任，也是徒劳的。

其实，蒋介石未作以上表示之前，他就与陶希圣、唐纵、张群等少数心腹作了三次连任的密商。他的主意是："宪法"一字不动，重

① 1959年5月20日台湾《中央日报》。

新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再用修订的临时条款否定"宪法"中"连任一次"的条款。

蒋介石公开作了三点表示后，又指使儿子蒋经国动员各党、政、军、特部门，在台湾各地开展"拥护'总统'连选连任"的活动，许多地方和单位还成立了"拥护蒋'总统'连选连任委员会"。他通过这种办法，将自己的想法、意图化为"民众拥护"、"人民的要求"，以表明他第三次连任"总统"，不是他本人要当，而是民众要他当的。

各级各地的"拥连会"在蒋经国、陶希圣等人的组织、指挥下，通过"座谈会"、请人作演讲、办墙报、贴标语、拟写"劝进电"等形式，把"拥护连任"活动扩展到全岛的每个角落。

一时间，"拥护蒋'总统'连选连任"的大标语遍布城乡，要求蒋"总统"连任的"通电"、"劝进电"充斥各报刊。

殷海光看到蒋介石、国民党搞的这些活动，非常气愤，认为这些活动并不是民众的意愿，而是蒋氏父子利用自己的权力，假借民意，为自己违"法"连任造势。他觉得，《自由中国》作为民间杂志，应该担当起反对蒋介石胡作非为的责任，公开揭穿蒋介石的阴谋和祸心，阻止蒋介石再次连任。

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得到雷震的赞同。其实，早在1959年春，雷震就在国民党一些要人那里得知蒋介石想用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办法，第三次连任"总统"的消息。雷还将这一情况告诉了胡适，希望胡适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影响，阻止蒋介石连任，胡适便托"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带口信给蒋，希望蒋介石从"千秋事业"着想，再不要连任了。蒋介石听不进胡适的劝告，坚决要连任。

雷震接受了殷海光的建议，决定开《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会全体会议。会上，雷震将探得的消息，向全体编辑委员通了气，大家对蒋介石违"宪"连任的行为非常愤怒，认为《自由中国》应在此关键时刻，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以护"宪"为名，组织一批文章，反对蒋

介石再次连任。

《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中，殷海光和雷震是反对蒋介石第三次连任的急先锋，而且胆子也最大。

此后，《自由中国》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反对修"宪"，反对蒋介石连任的文章，影响较大的有《欣幸中的疑虑》、《乌烟瘴气的政治活动在台大》、《蒋总统不会作错了决定吧！》《护宪乎？毁宪乎？——望国大代表作明智的抉择》、《岂容御用大法官滥用解释权》、《敬向国大代表同仁说几句话》、《我们对毁宪策动者的警告》等文。在这些文章中，尤以不在台湾的张君劢、左舜生、李璜等73人的《我们对毁宪策动者的警告》最为精彩。文中说：

> 当"两个中国"的国际阴谋日趋显著、"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岌岌可危之际，我们发现国民党当权派不作努力救亡之策，反而进行毁"宪"连任的活动；面对着这个严重的危机，我们不得不对毁宪者提出沉痛的警告。
>
> 蒋"总统"在民国47年(1958年)冬曾宣布反对修改"宪法"，其后并曾一再重申此意，海内外同声赞许，以为蒋"总统"能一改旧习，尊重"宪法"，而不作违"宪"连任之计，不意最近数月来，各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当权派正拟利用行将召开的"国民大会"，修订临时条款，以使蒋"总统"能获连任。依照"宪法"规定，目前已无修"宪"的合法途径，而修改临时条款即是修"宪"，亦是毁"宪"，其理甚明，目前蒋"总统"对此尚无明确表示，但就劝进者的各种活动看，我们有理由判定变相的"毁宪连任"，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事实。
>
> 我们认为，如果国民党当权派竟然如此行动，无异是自己丧失了"中华民国"法统下的合法地位，即将使本以"宪法"为根据的"政府"，变成一个毁"宪"的非法政权

……

……我们在这里警告国民党当权派及台湾的"国大代表"：我们要认清，这一"毁宪"连任的事件，在历史上将成为分别邪正和决定成败的大关键；它考验中国人（作者注：这里实指中国台湾地区）的智慧，也考验中国人的良心。我们切盼国民党当权派能够悬崖勒马，也深望各位代表能够自爱自重，不要做毁"宪"祸"国"的历史罪人……

"中华民国"已临存亡关头！国民党当权派究将毁"宪"毁"国"，以遂连任的私图，抑或捐弃私念以保全"宪政法统"。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选择，何去何从，系于你们之一念。①

《自由中国》除连续发表本岛人士写的反对蒋介石第三次连任的文章外，还把港澳人士在香港、澳门及美国报刊上发表的反对蒋介石连任的文章也予以转载，如香港胡越先生5月8日在《联合评论》上发表的《蒋真要连任第三届"总统"吗？》，5月15日发表的署名"本社同仁"的《反对修"宪"——不赞成蒋连任第三任"总统"》，5月20日香港版的《自由人》杂志上的《蒋何以非做第三任"总统"不可？》等，使台湾人民及时了解了台湾以外地区人民对蒋介石第三次连任的态度。

《自由中国》的做法，使蒋介石极为愤怒。

为打击和警告《自由中国》及反对他再次连任的人士，他指使其下属搞了一连串小动作。

第一个小动作是查扣反对他连选连任的杂志。1959年6月、9月，蒋介石下令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查扣不断登载海外人士反对他再次连任"总统"的香港《自由人》和《祖国》周刊，并在9月份注销

① 《雷震全集》第4册，第467～468页。

了《祖国》周刊在台湾地区的"内销登记证",使《自由中国》再难以了解岛外反对蒋介石第三次连任的情况。

第二个小动作是搞"劝进电"。1959 年 10 月 10 日,是国民党的"双十国庆"。当局在台北组织了 10 万人的"庆祝国庆大会",会上通过了要求蒋介石"连选连任"的《上"总统"电》,会后又举行"效忠领袖"、"拥护蒋'总统'连选连任"大游行,以造成全岛人民要求蒋介石连任的假相。

第三个小动作是堵自由主义者胡适的口。1959 年下半年的一天,蒋介石通过"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告诉胡适,他再次连任已成定局,要求胡适在公开场合再不要谈他三连任的问题,以免引起党"国"人士的不快。

第四个小动作是编印了一个《记取历史教训》的小宣传册子,在国民党和军队中散发。《记取历史教训》主要是批评、驳斥胡适和《自由中国》反对蒋介石连任的言论,说国民党过去在大陆失败,乃由于自己的同志不知团结和巩固领导中心所致,这个教训极为深刻,希望大家记取。小册子还严厉警告反对蒋介石第三次连任的人,不要破坏"国家"领导中心,否则,决没有好下场。

这个小册子虽是发给国民党党内的人员阅读,但还是有一位与胡适相熟、又很关心此事的国民党大员将封面撕掉,然后换一个包装秘密送给了胡适。

胡适看了非常恼火,心里气得阵阵作痛。他认为,蒋介石的这种做法,非常不好,是小人之举,但在公开场合,他不谈这件事。

随后,胡适将《记取历史教训》的小册子上换的封面撕去,又转给《自由中国》的雷震、殷海光、夏道平等人看,使他们了解蒋介石的目的和意图。

第五个小动作是写匿名信。大约在《记取历史教训》小册子印发后不久,蒋介石又指使其部下,连续给胡适写了两封匿名信。两封信的时间隔得很短,内容相差不多,主要是说,如今的反共复国

大业，还需要蒋“总统”的睿智英明领导，故国人必须团结，拥护他竞选连任“总统”。信中还要胡适劝告《自由中国》杂志，再不要发表反对蒋介石连任的激烈言论，以免引起不良后果。

胡适收到这两封信，心情甚为沉重。他知道这两封信来自官方，对蒋介石及其追随者的这种不太光明的做法十分反感。

蒋介石为了确保自己在1960年2月至3月举行的“国民大会”上顺利当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其一，成立了以陶希圣为总负责人的做“国大代表”工作的专班。蒋介石将一大批国民党大员召集拢来，组建了一个专做“国大代表”工作的庞大队伍，这个队伍又分成若干组，每组10人，每人承包10个“国大代表”，并保证使“国大代表”投蒋介石的票。

其二，高价收购《自由中国》。那时，公开在台湾反对蒋介石三连任的报刊，只有《自由中国》，而且影响又很大。因此，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对《自由中国》既恼火，又头痛。为了消除岛上这个最大的反三连任的“高音喇叭”，蒋氏父子召集国民党的几个主要头目开了一个专门会议。会议决定由国民党出巨资，以驻泰国“大使”杭立武的名义，高价收购《自由中国》杂志，并由原与雷震有私交的“国家安全局”副局长陈大庆出面与《自由中国》杂志社商谈收购的具体事宜。

1959年5月中旬的一天，陈大庆奉蒋之命，特地到《自由中国》杂志社找雷震做“游说”工作。雷震听了陈大庆转述的蒋介石的意见后，感到蒋介石此举卑鄙无耻，要权不要脸。他很不客气地对陈大庆说：“不论蒋总裁要出多大的价收购《自由中国》杂志，我不能答应。如果我为贪图金银钱财、荣华富贵，将同仁苦心经营的这份杂志出卖给蒋氏父子，不仅对不住杂志社的全体同人，对不住这几年来关心、爱护《自由中国》的读者、朋友，而且还将使我的子孙后代抬不起头。此外，我觉得蒋总裁做这个决定荒唐可笑，愚蠢至极。他没有想一想，杭立武先生现在虽然不在台湾，也不过问杂志

社的事务，与我们杂志社的关系却非同一般。当年，他是《自由中国》的创刊者之一，现在仍是杂志社的编委，由自己的人用高价收购自己的杂志，天下有这样的事吗？这对在泰国的杭立武先生岂不是一种侮辱？”

陈大庆听了，无话可说，并忍不住发出了笑声。

他感到无法说服雷震及杂志社的其他人员，坐了个把小时就走了。这样，蒋介石高价收购《自由中国》的企图难以实现。

其三，派国民党大员胡健中带一批人马和大笔资金到香港，收买滞留在港的“国大代表”，力劝他们到台湾参加“国民大会”，并一定要投蒋介石的票。胡健中在香港活动四天，用重金将在港的大部分“国大代表”买通才回到台湾。后来，蒋介石的这一做法走漏了风声，引起居住在台湾岛上的“国大代表”的强烈不满。他们说：“我们在岛上的尚未拿到钱，而香港方面的代表则拿到了手！”

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唐纵一面找知情人堵口，一面四处安抚在台的“国大代表”，要求知道此事的人再不要声张，并一再表示，对在台的“国大代表”的愿望和要求，尽快向蒋介石反映。

其四，派陈诚给在台湾的“国大代表”敲警钟，要求“国大代表”们勿受社会上反对三连任浪潮的影响。1959 年 12 月 22 日、23 日，陈诚两次去台北延平路军官俱乐部，召集正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受训的 500 名“国大代表”训话。陈诚在会上讲，有人阴谋乘“国民大会”召开之机，反对蒋“总统”连任，各位代表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明辨是非，勿上其当。陈诚还在会上举着拳头大叫道：“反对蒋‘总统’第三次连任是共产党的阴谋！今天凡是反对连任者，不是和共产党有勾结，就是共产党的同路人！”陈诚的这一喊叫，使反对蒋三连任的部分“国大代表”吓得面如土色。

其五，用金钱收买在台“国大代表”。蒋介石抓住台湾的“国大代表”爱财的特性，许给“国大代表”以后每月可领取薪水 3000 元。

按国民党"政府"原来的规定,"国大代表"因平时不做工作,不领薪水,只在开大会时领一笔"会费"。蒋介石此次要违"宪"三连任,须经"国大代表"投票才算数。当时,大多数"国大代表"为钱所困,生活清苦,想获得与"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的平等待遇。他们得知蒋介石想三连任,很想借此机会要挟蒋介石,迫使蒋介石解决他们的工资问题。

1954 年初,一些"国大代表"向蒋介石上书,要求增加旅差费,蒋接到信后大发脾气,说"国大代表"贪得无厌,每次开会领那么多钱,还要什么旅差费,太无道理。3 月 8 日,蒋介石到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出席"总理纪念周"会时,又就这件事当着许多"国大代表"的面大骂道:"有些'国大代表'最近向'政府'要旅差费,此种行为近乎敲诈,卑鄙无耻!"

那时,蒋介石连任合乎"宪法",他不怕"国大代表"不投他的票,故敢公开责骂"国大代表"。这一次,情况就不同了,"国大代表"提出的要求虽比 1954 年要高得多,他因要违"宪"连任,不但不敢批评、责骂,而且还要动用巨额资金去哄,去收买那些过去被他骂过的"国大代表"。

蒋介石此时的想法是,他和"国大代表"各有所求,"总统"是自己做,代表的钱是公家出,做这种交易也划得来。于是,他通过手下先向"国大代表"们放风说,蒋"总统"对"国大代表"们很关心,已指示"政府"尽力解决大家的工资问题。此风一放,使那些对蒋介石一直耿耿于怀的"国大代表"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1960 年 3 月 3 日下午,蒋介石又亲自到台北陆军大学礼堂召集国民党籍的"国大代表"开会,向他们许诺说:从今以后,"国大代表"可享受与"立委"、"监委"一样的待遇,每月薪水 3000 元。

那时,一个大学教授的月工资不足 1000 元,蒋介石一下子许诺一千多名"国大代表"月薪 3000 元,台湾当局仅此一项每年就要多支出三四百万元。当时,台湾当局的财政状况很不好,蒋介石为

保自己的位子，用如此多的公款收买“国大代表”，可说是不惜血本。

其六，分化瓦解、拉拢反对蒋介石第三次连任的党外阵营。当时，反对蒋介石三连任的人，除胡适外，还有以《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编委兼主笔殷海光为首的党外阵营，包括民社党、青年党头目左舜生、蒋匀田、夏涛声等数十人。国民党为分化、瓦解他们，采取了金钱收买、请客吃饭、威胁恐吓的手段。如派人密送4万港币给滞留在港的左舜生，请他不要在反对蒋介石三连任的“宣言”上署名（此款被左退回）；两次派陈诚请胡适吃饭，要求胡适支持蒋介石连任，并要胡适做大会主席；由中常委陶希圣出面，以请陈启天、夏涛声、蒋匀田、李万居吃饭为名，做党外人士的工作，并许诺尽快拨给两党活动经费，希望他们不要反对蒋介石三连任。对雷震、殷海光及《自由中国》的其他人士，蒋介石则通过特务机关，不断地写恐吓信，给他们制造麻烦，阻止他们开展反对蒋介石三连任的活动。

雷震探听到上述情况后，非常愤怒，于1960年2月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希望胡适站出来公开反对蒋介石这种要位要权不要脸的行为。

在信的末尾，雷震还说，在对待蒋介石违“宪”连任的问题上，大家觉得他“太消极”。雷震想用这句话来激励一下胡适，希望他在此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如果他能公开表示反对蒋介石再次连任，反对阵营的力量一定会更大。

不料，胡适收到雷震的信后，又收到蒋介石方面的匿名信。他对蒋介石的这种做法很恼火，但他考虑问题与行事的方法与殷海光、雷震等人不同，他不赞同大肆声张，也不愿搞得太激烈。

为防雷震、殷海光与蒋介石发生激烈冲突，他于3月6日早晨给雷震写了一封信，向他们告知蒋介石的态度，并希望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谨慎、策略一些。胡适在信中还说：

昨天又收到匿名信一封，我加上你早已看过的另一封匿名信也附送上，请你合并看看。

我把这三件都送给你，请你细看。不必给任何人看。这个情形是严重的。

你似乎不很了解我去年写给编辑部的信以及10周年演说的用意。

你最好跟毛公（指毛子水）多谈谈。下一期的稿子措词要特别小心。①

雷震收到胡适的信及蒋介石手下的匿名信，心里不是滋味。尽管胡适嘱他不要给任何人看，他还是给殷海光看了。

殷海光觉得蒋介石此做法，不仅违"法"，而且十分卑鄙。他对雷震说："胡适先生怕这怕那，我们不要怕。为了给台湾人民争一点点自由、民主，我们要继续抨击蒋介石逆天行事及他干的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样，我们即使难以将蒋拉下马，也要蒋介石在台上不舒服，不光彩。"

雷震及其他编委也赞同殷海光的意见，决定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公开揭露蒋介石及其同伙在"连选连任"上干的丑事。

恰在这时，国民党台湾大学党部与所谓的"台湾大学拥护蒋'总统'连选连任委员会"，在台大校园及台北市区大张旗鼓地开展拥蒋连任活动，他们时而贴标语，时而办墙报，时而写"劝进电"。他们的做法，引起一些师生的强烈不满。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还派大批便衣特务潜伏在校园内，抓捕了几名反对"拥护连选连任"的学生。

此事发生后，一些进步师生纷纷找殷海光反映，要求殷海光出

① 李敖著：《千秋评论丛书》第86期，第10页。

来领头组织全校师生进行游行示威，反对蒋介石及其党徒在校园内的胡作非为。

殷海光觉得，台湾在“戒严”时期，国民党在台大的势力很大，过去又无人做串连发动工作，如组织人游行示威，来的人也不会太多，少数学生、教师如公开对抗，蒋介石必派兵镇压。这样，将会造成无谓的牺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目前最好的办法，是将此事写成文章，在报刊上公开曝光。

那些师生接受了他的建议，答应马上组织人写文章，送《自由中国》杂志社。殷海光还告诉他们，赶快找人写，文章一来，《自由中国》就可发表。

1960 年 1 月 16 日，《自由中国》第 22 卷第 2 期上，发表了署名为“一群台大学生”的文章《谈台湾大学的拥护连任运动》，将蒋介石及其爪牙在台大校园内的非法活动公之于众。

那时的台大，是台湾的“政治热点”，国民党一有什么重大活动，常先在台大进行，然后向社会推广、介绍。《自由中国》公开把蒋介石在台大搞的“拥护连任”活动的把戏揭穿了，蒋介石及其同党痛恨极了。

为了公开亮出自己反对蒋介石“连选连任”的观点，并要求当局释放被捕学生，殷海光除对学生作了一些实际指导外，于 3 月 5 日在《自由中国》第 22 卷第 5 期上，发表了一篇《乌烟瘴气的政治活动在台大》的文章，将国民党在台大校园的阴谋活动一一昭告天下。

在这篇文章中，殷海光提出了六点“看法”，要求台大校长钱思亮将特务赶出校园，营救被捕学生，并公开反对蒋介石再次连任。他说：

……

（五）我们无权强迫任何个人赞成连任。但是，对假借

特殊组织在学校里策动学生团体假借名义制造拥护连任的气氛，基于我们是学校的一分子，我们是有权反对的。无论是“反对团体”抑是“赞成团体”，都不能代表我们的意见。我们认为要而且只要合乎以下两个原则就行了。

A.“总统”的候选人不是同时也不能是绝对的，即使就目前的情况，也不是绝对的。如其不然，我们就不是“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

B.“总统”的选举必须是真正合法的，任何“偷关漏税”的办法也不行。

写到这里，我们有几点感想：

1. 政治上的“勾心斗角”或“虚饰”，在一定限度内是被认许的。但超过这个限度，便是“破坏”与“欺诈”，我们不能容忍。

2. 现时“国家”这批“领班人员”差不多是我们父辈或公辈的人。我们希望这次的“总统”选举，这些人要做出堪称为我们父辈或公辈做的。请这些人千万别陷入错觉做出被史家或被明眼人看来，以为是我们的儿辈做的事情。

3. 依照盎格鲁萨克森人的说法，人是自私的动物，因而人只为自己的利害关系打算，原本无可厚非。大哉华夏，非同凡响，我们自称是“四维八德”的动物，基于这个自认，我们责令大家，尤其是“国家”的“领班人员”，稍稍收敛自私的本相，多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前途作想，恐怕没有人会有异议吧！①

殷海光写此文时，台湾的首届三次“国民代表大会”正在举行。

① 《殷海光全集》第12卷，第866～867页。

蒋介石的“连选连任”活动也接近尾声。在此时刻，他能站出来，公开写文章与国民党唱反调，公然反对蒋介石再次连任，可说冒了很大的险。但为了追求公平、理念，他不顾个人安危。

尽管殷海光与《自由中国》人士激烈反对蒋介石违“宪”连任，蒋介石却我行我素，一意孤行，要继续违“宪”连任。

3月11日，蒋介石正式颁布修订后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此条款再次扩大了“总统”的权力，“总统”可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47条“连选得连任一次”的约束。有了这个条款，蒋介石可做终身“总统”了。

12日，国民党中央全会举行临时会议，用记名投票的方式，推选蒋介石为第三任“总统”候选人，陈诚为“副总统”候选人。此次“推选”，因在选票上要记上投票者的姓名，故无人敢投反对票和弃权票，蒋、陈两人各以50票的满票顺利“当选”。

3月21日，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出席会议的“代表”1509人，尽管“国大代表”不足数，选举不合“法”，蒋介石却不顾这些，并用极不“民主”的记名投票方式，得1481票，当选“中华民国”第三任“总统”。

选举完时，已是下午1点。

几乎是在选举完的同时，国民党在台北市区内早已准备好的鞭炮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半小时之内，所有的大街小巷都挂起了“恭祝蒋中正当选第三任‘总统’”的金字大横幅，标语、宣传画也满街都是。“反共救国团”的团员们还手举“国旗”，涌到公园举行庆祝、集会。

台湾大学的“欢庆”活动，更是热闹。那震耳欲聋的鞭炮、锣鼓声，使喜欢清静的教授们大受刺激。

蒋介石动用庞大的党、政、军、特，将其连选连任的活动安排得有条不紊。有人说，他连选连任“总统”，就像打仗一样，步步为营，着着精算，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在大会的闭幕式上，蒋介石得意洋洋地说，这次大会取得了三项“伟大成就”：其一，会上的一切举措，都能遵循“民主规范”，发扬了“高度民主”的精神，使一切都能成为公意和真理的抉择；其二，大会的一切程序，都是根据“法理”来进行的，从修订“临时条款”到完成选举，都是遵循“宪法”所赋予大会的使命来达成的；其三，损小全大，贯彻了不修改“宪法”的决策，是这次大会最大的一个成功。

国民党的报刊，马上将蒋介石的“闭幕词”公开发表。

殷海光在报上看到这些消息，愤怒万分。

殷海光及《自由中国》人士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看得很清楚。“中华民国”虽然有一部“宪法”，并被蒋介石紧紧抱住，对他却没有任何约束力。他口口声声不修宪，要尊重、维护“宪法”，心里却没有“宪法”。他用“宪法”去压别人，约束老百姓，却不约束自己，甚至为了三连任，还搞一个“法”外“法”。他与历史上的那些残暴的封建统治者没有任何区别。

面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怎么办呢？台湾的出路在哪里？殷海光想来想去，觉得暴力活动行不通，台湾也没有这个力量，唯一的办法就是举起五四运动的旗帜——民主与科学，用民主、科学理论启发民智，特别是青年人，号召青年们起来与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作斗争。

基于以上考虑，他于1960年4月写了一篇《五四是我们的灯塔》一文，一方面对蒋介石的卑鄙行为进行抨击，另一方面希望青年们发扬五四精神，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坚决的斗争。

他抨击蒋介石、国民党说：

> 一个独裁的政权在革命群众的肩头上建立起来的时候，就是革命的狂想曲告终的时候，也是革命群众尝到革命苦果的时候。权力是甜美的东西，愈吃愈有味。权力又

像海洛因，越中毒越想抽。尝到权力甜头的人，他们人生的最高目标就是怎样保持权力，扩大权力和延续权力。人一到了抛开理想、唯权力是务时，便可以不择手段了。但是，他们的权力来自革命。他们必须继续维持群众对革命幻觉，他们的权力才不致丧失。他们必须继续装出革命的姿态，他们的权力之存在才似乎有理由。尤其是在巨大变动中受到迎头冲击的时候，他们更需强调革命来保持摇摇欲坠的权力。

……

自古以来，一切私图，都要在"为公"的掩饰之下进行才有群众效忠；一切坏事，都要藉美名才能行得通；一切不可告人之隐，必须假借堂堂正正的理由才能遮住。口称"革命"而心嗜权力的人物，在初期阶段，藉以欺蒙与驱策群众的，是这种那种"主义"。一旦群众信仰了"主义"，跟着摇旗呐喊，跟着"奋斗牺牲"，跟着作火牛冲锋陷阵，于是他们从中形成了组织，由组织而套取了权力。但是，"主义"久久不能兑现，天国永不降临。群众再愚蠢，也没有不由怀疑，而失望，而解体，甚至叛离的。到了这一关头，就是独裁权力崩溃的时候。但是，这一类型的人物最善利用机会。他们不放过每一个可资利用的机会。他们能把绝大的失败责任推到别人头上，他们也能将失败扭成再度握取权力的局面。他们重新写历史，过去一切好像与他们全不相干。他们又搬出一大套口号作再度登台的藉口。他们又许下一些诺言做政治资本。他们再度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这些做作，使得他们的存在和控制，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的样子。在这看起来很有道理的蒙蔽之下，他们又混过了许多岁月。然而，岁月是无情的。世界局势的变化，在对他们不利，他们所许下的诺言，看来实现的希望

愈来愈渺茫。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所开的空头支票一直不能兑现。而在掌握之下的无辜者却已支付了重大代价，肩负着沉重的负担。显然得很，这样的代价是永远得不到补偿的。面对着这样的现实，大群的人由怀疑，而失望，而麻木，而厌弃。职业革命家们的"革命"再度流产了。他们的那一套口号，那一套符咒，那一些大题目，逐渐在现实面前粉碎，慢慢失灵，慢慢失去压人的作用。但是，权势是不可失的。他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日渐改变的冷酷现实。为了维持权势，他们必须在群众和冷酷的现实之间隔一道墙……

……在20世纪60年代，居然还有人用笔墨、用口号，把跟大家一样的人神化起来，说成怎样圣明伟大。如果茫茫众生之中真有这样的超人出现，那么我们不致陷在这里十余年之久了！谈经济，重要工作就是发展印钞工业，虚报统计数字，制造表面繁荣，而骨子里却危机重重，脆弱不堪，物价日益高涨，一般人民的生活一天困苦一天。可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阔"革命"的人士对于长面子，送往迎来，屯养庞大的统治工具，制造"万众归心"的印象，则一掷千万金，手面阔绰之至。阿克顿爵士有句名言："权力使人腐烂，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烂"。十余年来，我们看见这个绝对的权力，在一个大题目的藉口之下，像奔驰于一片无人的原野，横冲直闯，为所欲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对他发生一点制衡作用。我们看见这个权力绝对骄纵地腐烂下去。

……

依据经验事实，我们必须承认，要救中国（笔者注：这里指台湾地区），必须真正实行民主。十余年来的事实已经足够证明，大家面前这个样子的"领导中心"根本负不

起他们所标榜的大责任。第一，这些人士最大的兴趣在维持一己的权势。他们的一切作为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置"国家"大体于不顾。第二，气量狭小，因而圈子愈来愈小。第三，只会搞小动作、要小聪明、制造镜头，于是弄得"小人道长，君子道消"，风气愈来愈浅薄。第四，制造灰暗的恐怖空气，使整个社会伏于一双冥冥之手底下，生机斩断殆尽。第五，除了这些本领以外，这些人士可说智穷力竭，一无所长。如果我们要保持一点中国人的净土，我们必须实行民主。这里所说实行民主，不是实行窗橱里的民主，而是包括下列两方面：第一，实行人民有决定权的民主；第二，把这个权威主义笼罩之下的社会转变而为在民主生活方式之下的社会。这种转变，不是形式的转变，而是实质的转变。①

从上面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此时的殷海光，已经对蒋介石从看不惯到十分厌恶的程度了。他公开在文中说蒋介石这个"领导中心"担负不了"反攻大陆"的责任，因为他没有这个才智，他只会搞小动作，要小聪明。蒋介石的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势"。

这段文字还有一点特别可贵的地方是，殷海光在白色恐怖极严重的60年代初，公开举起"民主"的旗帜来对付蒋介石的独裁，公开向蒋介石挑战，公开叫着要用"民主"的方式，来使台湾社会转型，使台湾走上民主、科学的大道。那时，台湾岛上的知识分子，只有殷海光有如此胆量和气魄！

谁来举五四的旗帜？谁能使台湾社会转型呢？殷海光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他认为，反独裁、反恐怖、反极权的重任，只

① 《殷海光全集》第12卷，第876~880页。

有让那些有志，有作为的青年人来担当。他说：

> ……今后欲救中国（作者注：这里指台湾地区）于深渊，并没有其他奇径可走，还是只有实行民主，采纳科学。“五四”又过了41年了，在这个特别值得纪念的节日，我们将我们的见解重新提出，让大家有个真切努力的方向。我们尤其希望青年一代，再不要做冲阵的火牛，再不做扑灯之蛾，拿定主意，坚强地进步，让一个合理的社会经由民主与科学的程序在我们手里实现！①

那时，《自由中国》在台湾的发行量很大，殷海光的读者也很多。他这篇矛头直指蒋介石的文章，吸引了不少读者。只可惜，台湾岛上，只有一个殷海光，他的文章写得再好，反蒋声音再大，也孤掌难鸣，难以将蒋介石从“总统”宝座上拉下来。

1960年5月18日，蒋介石不顾殷海光及《自由中国》人士的反对，在台北举行了盛大的就职典礼，正式就任“中华民国”的第三任“总统”。

尽管殷海光的力量很有限，他的呼喊、抗争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还是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也极大地启发、鼓舞了台湾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后来，有不少青年走上了抗争之路。

---

① 《殷海光全集》第12卷，第885页。

19

南韩李承晚下台：殷警告蒋不要贪权

蒋介石不顾台湾岛内外人士的反对，用不正当手段“连选连任”后，殷海光及《自由中国》人士冒着生命危险，仍不停地写文章批评蒋介石、国民党。

此时，蒋介石心里很清楚，他这个“总统”是用不正当手段弄来的，殷海光、雷震等《自由中国》人士反对自己，也不是没有道理。他的想法是：暂时忍耐一下，日后再整肃。

因上述原因，殷海光与《自由中国》暂时无祸。

1960年春，紧邻台湾岛的南朝鲜政局发

生大动荡，使殷海光看到了民主的曙光。他欣喜若狂，日夜关注着南韩政局的发展、变化，并希望南韩的局势能影响台湾。

南朝鲜局势动荡的起因是该国大独裁者、"总统"李承晚贿选连任引发的。

李承晚 1875 年 3 月 26 日生于南朝鲜黄海道平山郡，幼年曾在私塾学习汉文，后入汉城教会学校培材学堂学习英语，1896 年参加独立协会，投身于"朝鲜爱国文化启蒙运动"，1898 年被捕入狱，1904 年获释，不久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并获哲学博士学位。1910 年李返回朝鲜，从事宗教活动，旋即被抓捕，后经人斡旋获释。1912 年，李承晚再度去美国，随后又回国从事政治活动。

1919 年，李承晚当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首脑，1920 年到中国上海就任，次年辞职，又去美国组织欧美委员会。第二次大战期间，李要求盟国允许朝鲜独立。

1945 年 10 月，李从美国回到汉城，积极支持美国占领南朝鲜南部地区，后被美国占领当局委任为南朝鲜"民主议院"的议长。1948 年 6 月，李被朝鲜国会选为第一任议长，同年 2 月 15 日，任南朝鲜首届"总统"。1952 年连选连任"总统"，1953 年朝鲜停战后，他多次破坏停战协定。同年 7 月，他与美国签订《韩国美国共同防御条约》，使美军长期留在朝鲜南部。

李承晚执政期间，残酷镇压工农、学生运动，反对自由、民主，宣布反对他的进步党为非法政党，并将主要领导人予以逮捕，然后以"叛国罪"判处死刑。他还将大批进步青年学生逮捕入狱。李承晚的法西斯统治，引起南朝鲜人民的强烈不满。

1960 年春，南朝鲜举行大选。李承晚为了继续连任，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迫人民投他的票，他还用不正当手段收买选民，在选票、计票上做手脚。

李承晚的卑劣行径激起南朝鲜人民的极大的愤慨。3 月 15 日，南朝鲜马山市人民为反对李承晚贿选而举行起义，公开举起打

倒李承晚的旗帜。

马山市人民的起义，很快波及到汉城、釜山、仁川等市。为扑灭人民的反抗运动，李承晚派出大批军警进行镇压，造成很多群众伤亡。

多行不义必自毙。李承晚的暴行不但难以扑灭人民的反抗怒火，反而使反抗运动更加高涨；南朝鲜人民，尤其是大中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不断呼喊“李承晚下台”的口号。

4月6日，汉城市5000名工人、青年学生举着旗帜和“李承晚政府辞职”的大横幅，向李承晚的国会大厦、美国驻南朝鲜大使馆及李承晚的住所进发。

面对人民的反抗怒潮，李承晚如临大敌，宣布“紧急戒严”。他还派出大批军警阻拦，并布设了“警戒线”。示威群众面对荷枪实弹的军警，毫不惧怕，用身体冲破了“警戒线”。参加示威的群众越来越多。

李承晚集团的军警在国会大厦附近阻拦游行队伍，抓捕、殴打示威群众，并不准群众向李承晚的住所前进。这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进行了3个多小时，有70多人被逮捕，百余人被打伤。李承晚的20多名军警在镇压群众时，受了伤。

南朝鲜群众的抗议示威活动，引发了李承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危机。他们争权夺利，推卸责任，互相攻讦，并为“总统”选举丑剧和“马山事件”的责任寻找替死鬼，来迷惑南朝鲜人民。李承晚集团的内务部长官崔仁圭于18日宣布辞职。

李承晚的“自由党”内部也因此事发生内讧。一些“自由党”国会议员公开承认，该党在“选举”中“过分地运用官方权力进行干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失去了民心”，“在政治活动上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4月12日，南朝鲜马山市3万多市民再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

示威，并与镇压他们的军警展开了生死搏斗。

这天晚上，马山市群众与李承晚集团的斗争达到了高潮。怒不可遏的群众冲击了李承晚集团的马山市政府，将里面的办公用品、设施砸得稀巴烂。示威群众还袭击了中央洞派出所、马山刑务所及市政府官员的住宅。

晚上 9 点，在马山警察署内的 4000 多群众与向老百姓开枪、并用高压水龙和催泪弹镇压人民的 300 名军警展开了肉搏。群众把装满水的两辆消防车和另外几辆军用吉普车捣毁了。

10 时左右，当群众听说李承晚集团的庆尚南道的道知事和道警察局长等正在昌原郡政府办公厅内开会讨论如何镇压反抗的群众时，立刻就有数千名群众高呼“打死他们”、“要求民主”、“3 月 15 日的选举无效”的口号，冲去包围了昌原郡政府办公厅。群众还打碎了玻璃窗和电灯。随后，愤怒的群众冲进了会议室，把参加会议的所有政客打得抱头鼠窜，庆尚南道的警察局长吓得往桌子底下钻。

殷海光在民间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心里又高兴又激动。他认为，南朝鲜人民有觉悟、有是非观、有正义感、有勇气，希望他们继续奋斗下去，直至把李承晚赶下台。

他还认为，南朝鲜人民冒死起来抗暴，说明李承晚是独裁者，不得人心。李承晚为了连任，派大批军警监督选民投票，强迫人民投他的票，由于他的手段不及蒋介石高明，因而引发了人民的抗议示威。南朝鲜人民的抗暴斗争，对台湾人民的反暴政将会起推动作用。

一天，他到《自由中国》杂志社去开编委会会议，顺便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雷震、夏道平等编委，希望他们关注南韩的政局，并作一些分析、判断。

殷海光还对雷震说：“依我判断，南朝鲜局势还会恶化。”

雷震问他：“你的根据是什么？”

殷海光说："李承晚做的坏事太多了，而且做得太蠢，所以民心丧尽。他与蒋介石一样，做坏事有一个特点，就是打着反共的招牌，所有黑事都是在这个幌子下进行的。有趣的是，这两个独裁者还勾结得很紧。据我所知，他们亲自会面勾搭的有三次，一次是1947年4月13日，李承晚从美国返回南朝鲜路过上海时，蒋介石与他作过深谈；第二次是1949年8月6日，蒋介石应李承晚的邀请，到韩国访问了三天，双方还发表过反共《联合公报》，随后还与李承晚联名给菲律宾总统季里诺致信说，他们一致认为，共产主义"威胁"必须消除，为对付共产主义的"威胁"，必须集体作战与个别作战并行。他们俩还建议季里诺召开远东地区的反共会议，商谈成立"远东各国反共联盟"的具体办法；第三次是1953年11月27日，李承晚应蒋介石的邀请，突然到台湾访问，两人又进行了密谈，并共同发表了一个反共声明。其实，他们的所作所为，根本反不倒共，也可说是乱弹琴。他们说的反共，实质就是维护自己的法西斯统治，巩固自己的权位。这次，本来就是李承晚错了，人民有意见，进行反抗，他马上就派兵镇压，结果火上加油，人民更恨他了。老百姓忍无可忍，只有冒着生命危险来反抗。有压迫就必然有反抗。你越镇压，老百姓越要抗争。李承晚处理此事的第一着错了，现在收不了场。所以，我判断南朝鲜局势一下子平静不了。"

雷震认为，殷海光分析得很有道理。

殷海光又说："蒋介石违'宪'连选连任虽然与李承晚一样，但他的政治手腕就比李承晚狡猾、阴险多了。他的黑事，多半是秘密运作，别人有意见，他就派人疏通、说服、收买，或混水摸鱼、制造假像，使一些本可以爆发大动荡的事情，被他巧妙地化解了。"

殷海光讲完，雷震与《自由中国》杂志社的人士希望他就此事写一篇文章，发在《自由中国》杂志上。殷海光表示，对南朝鲜政局动荡的资料，已在搜集，如写文章，还需对该国局势作进一步的观察。

4月18日、19日，汉城连续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示威群众冲击了内阁所在地，还有不少人冒着枪林弹雨，夺取军警的武器，与军警展开战斗。

在群众的巨大压力下，南朝鲜内阁集体宣布辞职。

4月26日，汉城50万人民举行游行示威。他们高呼"李承晚滚下台来"、"李起鹏该死"、"偿还学生们的血债"、"不自由毋宁死"等口号，面对冲来的坦克一动也不动，并大喊道："碾死我们吧！"还有的学生、老太太爬到坦克上去呼口号。

这一天，整个南朝鲜沸腾了，几乎所有的城市爆发了反对李承晚连任的大示威。

面对风起云涌的反李运动，李承晚与美国驻南朝鲜大使馆大使麦克瑙吉、驻军总司令马格鲁德作了密商后，向社会发表声明，说如果人民希望他不再任职，他同意辞去"总统"职务。他还说，他已告诉他的密友，在最近选举中当选的"副总统"李起鹏，也辞去一切公职。

27日下午，李承晚向南朝鲜议会提出辞呈，正式宣布下台。随后，他化装逃离汉城，并躲藏起来。

4月28日，殷海光在《联合报》、《自立晚报》上看到了李承晚下台的消息，十分兴奋。他自语道："人民终于战胜了独裁，南韩大地终于出现了曙光。"

他从南朝鲜人民反暴政、反独裁的斗争中受到启发：人民的自由、民主不是上帝恩赐的，要靠斗争才能争取到。希望此次事件能影响东南亚，特别是影响台湾。

对此次事件，他有很多感想，有很多话要说，其中最重要的话就是借此事件警告一下蒋介石：再不要像李承晚那样要权不要脸，更不要打着反共的旗号，干着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

4月30日上午，雷震来到殷海光家访问。

殷海光一见到雷震，非常兴奋地说："南韩的大独裁者李承晚

硬是被人民赶下了台，好过瘾！”

雷震笑了笑说：“看你这样子，像个小孩子似的。”

殷海光又说：“蒋介石贿选，与李承晚一模一样，可惜没有人去启发、组织人民起来游行示威，使他逃脱了一次惩罚。”

“是啊！”雷震感慨万千地说，“‘国民大会’前后，我们只注意在知名人士和民、青两党人士中活动，没有到广大学生、知识分子中去发动，也没有使学生、知识分子，包括工人、农民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殷海光赞同雷震的看法。他还对雷震说：“蒋介石的心虽然很黑，手段也很毒辣，却比较讲究技巧，如假借人民拥护，给‘国大代表’发薪水，重金收买反对他连任的头面人物，记名投票等等。李承晚就搞不到这些，只知道在投票、计票上搞假，太明显了，所以激起人民的愤怒。”

雷震还告诉殷海光，这几天，胡适也很兴奋，他和王世杰还认为此次事件将会影响亚洲很多地区。胡适还特别赞赏南韩150名大学教授带头参加游行示威，这对李承晚的压力相当大，所以不得不下台。

听了雷震的介绍，殷海光说：“这几天，我的心情确实非常激动，也很想写几篇文章，你帮忙给我找点资料。”

雷震答应了，并希望殷海光尽快写起来。

雷震一走，殷海光就开始动笔写。

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殷海光就写成了《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他把文章送给雷震看，雷震认为此文写得很刺激，胆子也很大。不过，对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没有刺激也不行。

他建议将此文作为社论，发表在《自由中国》第22卷第10期上，各编辑委员都赞同雷震的意见。

5月16日，第10期《自由中国》印出来了，并很快进入市场，大家看到这期《自由中国》杂志，都说：“好厉害呀，蒋先生看了恐怕

受不了！”

殷海光在《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中，历数了李承晚的种种恶事后说：

> ……李承晚藉反共为护符的黑暗统治也给戳穿了！
>
> ……自古至今，统治者太专横、太霸道、太自私以致叫人忍无可忍的时候，大家都要冒着生命危险来反抗的，这种反抗一起，任何大帽子都压不住了，最后倾倒的是违拂众意的统治者。
>
> ……一切贪恋权位的人都应该觉悟：世事是多变的，世上并无永保权位的万灵丹！
>
> ……
>
> 韩国这次事变的意义是很大的，它给我们揭穿了一个反共的独裁统治的内幕。这一个内幕是怎样编排的呢？这是由一个非彼莫属的无可代替的人身作永久性的核心；用一个党派作统治的羽翼，套取美援并利用国库作豢养羽翼的资本；拿警察和特务作监视和压制人民的力量，必要时并用以助选。这一内幕是怎样导演的呢？它是：为了达到政治目标，软则收买贿赂，硬则抓拿监禁；明则利用司法程序，暗则施行逮捕处决；轻则取消饭碗，重则威胁生命；缓则放言恫吓，急则暴力相加；远则招待逢迎唯恐不及，近则视同鬼狗粪土，而掩蔽这一内幕的一张幕，就是叫得响亮的“反共”。①

殷海光写了上面这一段话后，感到对蒋介石还应说几句警示的话，使台湾的李承晚式的人物蒋介石能清醒一些，他说：

---

① 《殷海光全集》第12卷，第892～893页。

……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反共不能使人成为神圣。任何人不能藉着"反共"招牌干尽一切坏事。自由人不做"反共的奴隶"。"反共"而不照着正当的道理行的时候，人民还是有理由要求独裁的反共者下台……①

这一期《自由中国》一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许多人给《自由中国》杂志社写信、打电话，说此期《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写得很有力，说出了老百姓不敢说的话。

5月16日，台湾知名人士李万居、夏涛声到杂志社找雷震商量事情。一见面，他们都对雷震说："你们这一期的社论好厉害呀！我们为你捏一把汗！"

夏涛声还说："蒋介石要看到了这期《自由中国》上的文章，一定要大发脾气，也有可能要骂娘！"

雷震的朋友陈访先说："你们的文章要这样写下去，一定会把蒋介石写下台，国民党也会被你们搞垮！"

5月17日，雷震去台湾政治大学探访该校教授韦仲殷时，碰到台湾"教育部"官员、殷海光的同乡柯树屏。柯树屏对雷震说："你们这一期上的文章火药味好浓，估计又会被抢购一空，一印再印的。"

雷震笑了笑说："这一期已印了1.6万册，不会再印。"

柯树屏又问："这一期的社论《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是不是殷海光写的？"

"是的。"

柯树屏说："殷海光和你不出事则罢，如一出事，这篇文章一定是你们跑不了的大'罪证'。"

---

① 《殷海光全集》第12卷，第895页。

“这是写南韩的，定我们的罪没有道理。”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此文表面是写南韩李承晚，实际是指蒋介石。当然，我希望你们无事，问题是蒋介石读了此文，就不这样看了。”

殷海光在《自由中国》上发表《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一文时，蒋介石正在筹备数十万人参加的“就职大典”，他的特务机关也在紧张地安排、策划“就职大典”期间的安全事宜，一时顾及不到这件事。

过了三个多月，蒋介石的位子坐稳了，所谓的“大事”也处理了，便集中力量打击反对他三连任的民主人士，《自由中国》的雷震、殷海光首当其冲。

9月4日，蒋介石下令抓捕雷震时，顺便散发的宣传小册子《〈自由中国〉违法言论摘要》中，将殷海光的《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一文，列为六条重罪之一，其罪名是“鼓动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违反台湾当局的“刑法”第100条第2项。

此后，台湾当局定雷震个人的罪时，也将此文列为一条罪状。1960年9月24日，台湾当局的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法庭在雷震等人的起诉书中，就用此文作罪证，说《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一文“煽动流血暴动，蓄意制造变乱”。

尽管后来未听到蒋介石对殷海光《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有何反应，从国民党公布的《〈自由中国〉违法言论摘要》、雷震的起诉书及民众的反应看，殷海光此文对蒋介石的冲击是相当大的，不然，国民党不会将此文抠出来作为“罪证”。

殷海光写《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的本意，是想用李承晚的教训警告蒋介石不要恋位贪权，压制自由民主，同时，也希望台湾人民像南韩人民一样，勇敢地站起来反抗蒋介石的黑暗统治，将贿选上台的蒋介石赶下台。

但是，殷海光、雷震等一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高高在上，脱

离群众，没有深入到学生、教师、工人、农民中去做扎扎实实的宣传、发动工作，加上政治手腕和权术远高于李承晚的蒋介石在三连任上精心策划，步步周到，使他违"宪"连任成功，而且连小规模的反抗事件也未发生。

此事说明，殷海光这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社会的变革过程中，只能务虚，不能务实。要使台湾社会真正走上自由、民主之路，还需很多人去做务实的工作。这一任务，只有靠他的弟子及其他青年们去完成。

20

雷震建党遇蒋阻拦：殷海光支持雷震

从1957年4月份起，《自由中国》人士见蒋介石在岛上胡作非为，陆续发表了一些赞同在台湾建立一个新党的文章。那时，殷海光、雷震等人都有这一愿望，因杂志社风波不断，官司缠身，政治环境太恶劣，加上无人出来领头，建党只是纸上谈兵。

到1960年，蒋介石利用其控制的党、政、军、特，违"宪"第三次连任"总统"，使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中国》人士深深地感到，蒋介石是个地地道道的独裁者，要使台湾走上民主之路，使人民真正享受到自由，有必要在适当

时机组织一个新政党，然后用党的力量组织群众起来与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作斗争，并将蒋介石拉下马。

雷震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胡适，并希望胡适出来领头。不料，胡适只表示支持雷震建党，不愿参加新党，更不愿当负责人。

胡适的态度，使雷震很失望。

此时，《自由中国》内部的人士对雷震组建新党也有不同的看法。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等认为，台湾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新党，其方法和步骤是舆论超前，组织工作靠后。目前建党的时机还不成熟，现时的主要精力应放在宣传、启蒙、教育上，组党如搞急了，有可能连累《自由中国》杂志。

基于这样的想法，殷海光和夏道平极力反对雷震将组党活动基地设在自由中国杂志社内，并决定不参加"中国民主党"。

雷震与殷海光等人的看法相反。他认为，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人士的头等大事，组织新党迫在眉睫，再不能延缓。蒋介石策划"三连任"前后，他组建新党的愿望更为迫切。

1960年5月24日，台湾省举行第二届议会及第四届县市长选举。在此次选举期间，国民党大做手脚。各级党部为保证党提名的候选人当选，要求党员监票人、唱票人把非党人士的票唱给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如在台北选区担任117号投票所管理员的王家兴就于5月2日到《自由中国》投诉说，24日投票选举省议员时，任主任监察员的国民党台北市第六区四分部书记彭青和区公所干事、主任监察员张鹤林，要他把非党人士郭国基、李福春、宋霖康的票唱给党员陈重光。王家兴问出了问题谁负责，彭青说："不要怕，我和张均是自己人，出了问题由我和张负责。"

王家兴觉得，既然是公开选举，就应一视同仁，公正合理，是谁的票就记在谁身上。他没有理会彭、张二人，唱票时，是谁的就唱给谁。

站在一旁的张鹤林见王家兴未按他的意见办，十分着急，忍不住用嘴对着王家兴的耳朵说："把郭国基、李福春、宋霖康的票唱给陈重光是上级的指示，请你按上级的意见办。"

王家兴很痛恨舞弊，不按张鹤林的意见办。彭青、张鹤林没有法，便又生一计，以王家兴唱累了为由，将王家兴换下来"休息"，另派一国民党员上去唱票。这样，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陈重光在东园国校117号投票所获得了不少的舞弊票。

此后，在台北市市长选举时，国民党又如法炮制，将非国民党籍的市长候选人林清安的票唱给国民党提名的市长候选人黄启瑞，使黄启瑞顺利当上了台北市市长。

雷震听了王家兴的投诉后，非常恼火。王家兴走了，他的心情仍久久难以平静。他认为，台湾的这次地方选举，与蒋介石连"宪"三连任一样，也是假民主。

当天，雷震给台湾省议会党外议员候选人李福春写信，请他5月3日到自由中国杂志社谈谈。

5月3日，王家兴与李福春又邀上李赐卿一同来到自由中国杂志社，谈5月24日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中作弊的情况。

他们与雷震等人谈了一个上午。

雷震问他们可不可以再去查选票，他们都说，选举一完，国民党把做手脚的事情都掩盖了，他们用空白票填上国民党候选人的名字，将民众投给非党候选人的票毁掉了，再去查，数字一点也不错。再说，已投了的选票都交给了民政局，他们不会让人查的。

王家兴还告诉雷震，李福春与宋霖康本可当选为省议员，因票被国民党唱掉很多而落选。还有一位非国民党籍的女士，有2万多张选票，本可当选，也被国民党唱掉了。台北市党外市长候选人林清安的选票不少，黄启瑞只有十几万张选票，因林清安的票有很多被唱给了黄启瑞，结果林清安落选，还有其他县市的选举，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作弊。

雷震听了他们三人谈的情况，感到国民党可恨、可恶。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样太不公平，可逼得台湾人造反的。"①

此后，雷震将王家兴、李福春、李赐卿谈的情况告诉了胡适、殷海光、夏道平等《自由中国》人士及民、青两党负责人。他感到，台湾此次"总统"、"副总统"及地方议员和县、市长选举出现的问题，根子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身上，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用党来监督国民党，或与国民党争高低。

殷海光、夏道平等人则认为，新党是需要的，但现在还不行。因为台湾建立反对党的条件还不成熟，蒋介石不会允许在台湾搞一个与他对立的党。雷震则认为，应立即成立一个新党，不然，蒋介石还会在台湾胡来。

为此事，雷震多次在《自由中国》社内与殷海光、夏道平等人交换意见，希望殷海光、夏道平等人支持他在台湾建立新党，如跟他一起搞新党则更好。殷海光、夏道平没有同意。

后来，雷震为避免刺激蒋介石，决定将组党活动分两步走。第一步，抓住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中舞弊的契机，打着"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的牌子，作些组织、舆论准备；第二步，待时机成熟了，再宣布正式建党。

对雷震组党，殷海光虽认为不大可能，也不参与，心里却又很赞成。只是在组党的时机、方法上，与雷震有不同的看法。殷海光考虑自己不宜从事实际政治活动，向雷震表示，可帮助新党造舆论，但不参加新党，也不参加新党的活动。

同时，殷海光、夏道平还一再向雷震建议，筹建新党的大本营不要放在《自由中国》杂志社，最好是另外找个地方。

殷海光虽然一再表示不参加雷震的组党活动，心里又想去亲自观察一下新党的组建过程，并希望新党诞生后，能给台湾政坛带

① 《雷震全集》第40册，第301页。

来新的景象。

据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的《雷震全集》日记部分记载，殷海光应雷震之邀，曾两次参加了新党的组党活动，第一次是1960年7月2日在雷震家中。这次活动，是由雷震牵头进行的，胡适也参加了，并在会上作了演讲。

此次活动，除胡适、雷震、殷海光参加了外，《自由中国》杂志社的夏道平、傅正及其他党派、民主人士，如夏涛声、蒋匀田、李万居、吴三连、高玉树、齐世英、成舍我、杨金虎、杨毓滋等也参与了。其中，殷海光、夏道平、蒋匀田、王世宪是以非组党人士的名义参加的。

此次会议除由胡适作了支持雷震建新党的讲话外，雷震、王地、许世贤等人还就如何开展组织工作作了研究，并决定将台湾划分为5个区域，然后派人到各区域开展工作。

第二次是1960年7月5日下午，雷震借在其寓所开《自由中国》编委会会议的机会，约请组党的核心人物齐世英、夏涛声、成舍我、谢汉儒及蒋匀田、王世宪等人开会，讨论新党的党纲。

《自由中国》编委会从下午3时开到5时。5时30分接着开带有组党性质的"选举改进座谈会"，殷海光、夏道平被就地邀请参加。

对新党的党纲问题，会上发言最多的是蒋匀田、王世宪。据《雷震日记》记载，在这次讨论党纲的会上，殷海光作为非组党成员，也作了发言，其内容是希望新党的党纲用词要新颖务实，不能用陈腔滥调。不然，无号召力。

殷海光除参加了上两次活动外，还为雷震推荐了一个组织参谋人员。此人叫刘培初，住台南，大概与殷海光很熟。殷海光原与他谈过雷震正在组党的事，引起他的极大兴趣，想与雷震见见面，并向雷震献献策。

1960年7月的一天上午，刘培初给雷震打电话，说请他与自

由中国杂志社的殷海光、夏道平等人吃饭，并顺便谈谈自己对新党的建议。雷震答应了。

殷海光、夏道平陪雷震马上赶到了台南。晚上，由刘培初在台南一家餐厅请雷、殷、夏三人吃饭。

殷海光向雷震介绍刘培初说："他是组织能手，多年抱建新党的愿望而未能实现，现在得知你在建新党，他很高兴，也愿参与。今天终于有机会见面，你们可好好谈谈。"

两人双手紧握，非常高兴。

刘培初对雷震建议说："因台湾建党的环境太恶劣，当局恐怕不允许你们公开建党。为安全和开展工作起见，建议新党的总部暂设在美国，工作重心放在大陆，台湾在其次。新加坡及东南各地均可建立组织，还可在这些地方选择优秀人才参加。"

雷震听了，感到刘培初的建议不切实际，其原因有二：一是总部如设在美国，交通难办，对台通信要受特务机关检查，难以指挥；其二，新党的宗旨是追求自由、民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总部如设在美国，对台湾就无什么影响，更不用说改变台湾现状。

对刘培初的建议，雷震不感兴趣，双方谈得不那么投机。

晚上9点，殷海光、夏道平陪雷震返回台北。对台南之行，雷震颇感失望。

这一天，雷震在日记中写道："(刘)语多不切实际，何以殷先生认为他有组织才能？"①

以上，是殷海光在行动上参与或支持雷震的组党活动。殷海光支持雷震组建新党，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他在言论上的期望与支持。

1960年夏秋，殷海光与雷震、夏道平等人商量决定，在新党诞生前，组织一系列文章，呼唤新党诞生，并公开揭露蒋介石为首的

---

① 《雷震全集》第40册，第342页。

国民党危害台湾人民的“罪行”，为新党造势。

1960年7月20日，殷海光在《自由中国》上写了《我对于在野党的基本建议》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殷海光从称呼、基本目标、政纲、工作重心、基本态度等方面，对新党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希望，同时，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作风、行为，作了严厉的批评。

在谈到台湾的政治时，殷海光说，台湾最基本的政治就是“防共”，但蒋介石并未防到点子上，他说：

> ……国民党权势核心人物（指蒋介石）一开始就把文章做离题了。这应该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近十几年来，国民党的权势核心人物依照自己对共产党的好恶、了解，并从维持极少数人的权威和利益着眼，来从事防共工作。于是，防共这样的世界大事，被他们弄成一个党争的形势，和少数人的颜面得失和政权存亡等问题搅混在一起。于是，通过他的权力和谋划，十几年来，强使大家穿上一件束缚思想、态度和反共方法的紧身衣。大家穿上这件紧身衣，于是在共产党尚未受到损害之时，大家已被束缚得奄奄欲毙。结果，演变所及，连有志防共的人都感到有力无处使，只有那几个人在那里唱木偶戏，别人只有做木偶的份。一切聪明才智都塞死了。这真是中国（作者注：此处指台湾地区）立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变。①

在谈到台湾的经济问题时，殷海光又说：

> 台湾经济的基本毛病断害于政治。台湾政治断害台湾经济的，有三大因素：一是“幻想曲”；二是“面子经”；三

① 《殷海光全集》第12卷，第951～952页。

是维持统治权威。据专家估计，台湾每年岁入总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都消耗于这三大项目。权势核心人物（指蒋介石）在别的方面非常吝啬，而独独于这三样事则不惜工本。这样一来，台湾经济患着严重的"血漏症"。这个基本症结不解决，台湾经济只有在表面好看之下睁着眼睛损耗下去。这样损耗下去，不要说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准无法提高，公务人员的生活不能改善，而且只有愈来愈困苦。目前是因为美援捐助，尚可敷衍门面。哪一天美援停止，哪一天就水落石出。台湾经济并非不能自立，其所以弄得这么恶劣，就是因为权势核心（指蒋介石）要舍拿这点小本钱做大生意。①

写到台湾文化问题，殷海光又接着说：

台湾近十几年在思想上呈现两种现象：一是倒退；二是"静如止水"。从倒退方面说，台湾近十几年来在思想上的倒退不止50年。就目前在台湾一部分人之间彼此吐纳的思想或观念形态看来，不用说赶不上"五四"时代，连清末也不如。②

对蒋介石政权的教育，殷海光作了严厉的批评：

……国民党权势核心给台湾带来的灾害中之最大的要算党化教育。党化教育的作用有六：第一，象征台湾之接受一党统治；第二，表示国民党党祚之永存；第三，制造国民党的预备队；第四，作不断动员之起始的一环；第五，

① ② 《殷海光全集》第12卷，第954、955页。

控制青年的思想和行动，教育他们从一个党的观点来看世界，看政治，看历史；第六，塑造人身崇拜。这样看来，国民党权势核心完全不承认青年是属于“国家”的，属于社会的，以及属于青年自己的，而只是属于“我党”的。在他们心中，他们只承认青年是党的工具。由此可以旁证，国民党权势核心心目之中不承认“天下为公”。他们要化天下之公而为一党之私。①

在该文第五部分，殷海光对蒋介石、国民党不讲是非的问题，也作了十分尖锐的批评：

十几年来，国民党的权势核心是努力把台湾造成他们的乐园。这种光景，是他们从北伐以来所未曾有的。现在，他们有的是钱，有的是势，有的是力。他们所缺乏的只有一点，就是不能太讲是非，不能太说真话。所以今日之台湾竟成“党腔”之天下。今日台湾政治权势人物流行的所谓是非，大都需要用暴力、威吓和金钱，那么他们所谓的是非便会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

殷海光在向新党提建议的同时，又在多个方面狠狠批评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他写此文的目的就是要使大家知道，国民党在蒋介石的把持下，在各个方面已成为台湾社会的祸根，而要改变台湾目前的局面，并使台湾出现一线生机，只有看即将诞生的新党了，并希望人民支持这个新党。

当时，雷震组党面临蒋介石政权的极大压力。一方面，蒋介石托人带口信给雷震，要他不要搞建党活动，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

① 《殷海光全集》第12卷，第956～957页。

通过正常渠道，向他转达；另一方面，蒋介石通过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于7月29日发表社论《政党的承认问题》，向社会公开告知，国民党绝不承认任何新组建的政党；再一方面，雷震自公开搞了"选举改进座谈会"后，蒋介石开始派大批特务监视、跟踪雷震与《自由中国》社的成员，干扰破坏雷震的组党活动。

1960年7月30日，雷震到高雄开展组党活动时，蒋介石、蒋经国派特务跟踪到高雄监视。雷震在高雄期间，通过杨金虎等人的关系，临时决定在高雄医师工会的一间会议室开个会议。特务机关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由警备总司令部高雄区的一副司令出面威胁医师工会理事长说："未经许可，不得有不明身分之人在你处开秘密会。如不遵从，将给予严重处分。"

高雄第一大饭店也接到了同样的警告。

雷震无法，只得取消下午3点原定在医师工会开会的计划，将会议移到民主人士杨金虎家，并以聚餐的形式开会。这样，当局就不能进行干涉了。

1960年7月30日、31日，国民党为打击、丑化雷震等人，利用其《新生报》南部版和《中央日报》对雷震等组建新党造谣诬蔑。《新生报》南部版在7月30日用头号字标出三栏大标题：共×透过港统战分子，支持台湾新党活动，企图颠覆"政府"，文中说："据此间获悉，共×为遂行其所谓'和平解放台湾'的阴谋，最近通过以前曾赴北平卸命到香港担任统战任务的程逆思远带了黄逆绍竑的一封信访黄×初其人，请其为×方负责支持台湾'新党'的活动，以期在政治上造成台湾内部的混乱。"①

7月31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也在显要位置用三栏标题《×图利用新党阴谋活动进行颠覆阴谋》，发表消息说："中共最近又在日本、香港等地积极展开对外统战工作，企图利用台湾

① 1960年7月30日台湾《新生报》南部版。

新党的活动，藉所谓和平解放台湾的叫嚣，在政治上造成台湾内部混乱，以内外夹攻的方式，实现颠覆'政府'的阴谋。"①

殷海光、雷震、夏道平等人看到了这两篇新闻，非常气愤。殷海光对雷震说："蒋介石、国民党下流到这种地步，可见他们手法之卑鄙。你是当事人，应该立即对蒋家造的谣言进行驳斥，不然，你们会失去很多人的支持。"

雷震觉得殷海光等人的意见很好。他很快草就了一篇《驳斥党报官报的谬论和诬蔑》一文。雷震在此文中，引用1960年8月2日香港《星岛日报》社论《反对党是中共颠覆政府的工具？》，对蒋家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雷震还在文中说，国民党如果不承认新党，新党也并不要求它承认，同时新党也将不承认国民党。

7月下旬，雷震还在《自由中国》杂志社接到一个神秘男士的电话，对方不说单位，也不说姓名，只说是给雷震通一个气。对方说："雷先生，我要告诉你啊，不要搞新党，国民党已开会决定了打击新党的策略：一为软化吴三连，二为困扰高玉树，三为打击雷震。"对方在电话中还说："你要防止有人暗害你，尽量不要步行，以防止制造假车祸。到公共场所饮食应特别小心，以防有人下毒。"

对方说完，就放下了电话。

1960年8月12日，雷震与台湾知名人士余登发、高玉树等人同到吴三连家访问时，吴三连突然告诉雷震，他的组党活动到此为止。雷震问他何故，他说有难处。事后，雷震通过其他途径得知了原因。

原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为阻止新党诞生，对吴三连真的采取了软化、恐吓的策略。他们通过国民党台湾省议会党团干事许金德，一再要求他不要参加新党，并奉令告诉吴三连所主持的三个工厂，如果吴参加新党，三个厂今后莫想得到一分钱的贷款。吴三连

① 1960年7月31日台湾《中央日报》。

的工厂全靠银行贷款运转，如果今后不贷款，他的工厂就要被迫关闭。这个威胁对吴三连来说，是要命的。为了工厂的生存，吴三连只有放弃参加组党活动。

如此同时，国民党特务机关还策动吴三连所属三个厂的其他人员，劝吴三连离开台湾半年，还力劝他与许金德一同到省政府去面见省主席周至柔，保证今后不再参加筹备新党的活动。

吴三连在中途退出，使雷震甚感震惊，也倍感压力。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可见国民党卑鄙也。"①

雷震回到自由中国杂志社后，把自己在组党过程中的遭遇告诉了殷海光、夏道平等人。殷海光听了，气愤至极，骂道："蒋介石是权霸，国民党是党霸！"

此时的殷海光，在台湾既是名教授，又是著名政论家，名气甚大。他感到，原来的预料已成事实，雷震的新党有可能成立不了。现在，只有用舆论支持雷震。同时，把自己对新党的看法和愿望也作一公开表示，为后人留下一份历史记录。

抱着这样的想法，殷海光与夏道平等向雷震建议，在《自由中国》上组织一批揭露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阻挠破坏新党筹备活动的卑劣行为的文章，并以"选举改进座谈会"的名义，发表一个声明，将组党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压力，一并公之于众。雷震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决定立即着手组织文章。

不久，一批揭露文章在《自由中国》上发表了。

8月20日下午，自由中国杂志社开编委会，雷震将近段筹组新党遇到的麻烦和阻力对各位编委通了气。此次会议原定讨论老挝政局发生变化的社论和三论"青年反共救国团"的撤销问题。殷海光、夏道平等人感到，雷震等人组党面临的压力太大，问题又很严重，应针对《中央日报》上的社论《政党的承认问题》，在《自由中

① 《雷震全集》第40册，第370页。

国》上专门设一个"政党承认问题"的栏目，将《中央日报》社论《政党的承认问题》全文予以转载，然后将香港、台湾反对这篇社论的文章选择几篇一并发表，让读者鉴别谁有道理。

他们的建议，得到与会编委们的赞同。

散会之后，殷海光回到家里一鼓作气写成影响颇大的、至今仍被海峡两岸专家、学者常引用、谈及的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

殷海光在文中批评蒋介石、国民党说：

……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时，在缔造民国上，确有不朽的功劳。然而，近十几年来，在少数权势核心藉暴力与饭碗的控制之下，早已变质而成为少数权势人物（指蒋介石）的御用工具了。……目前在台湾使千千万万人感到窒息的，只有这极少数分子而已。

我们非常惊讶，这篇文章（指《中央日报》社论）所表露的基本思想方式、心理反应习惯，对于事实妄加歪曲的勇气，还是和大陆即将沦陷以前一模一样。这样的深创巨痛、国破家亡的事实，竟不能使这一撮权势分子接受丝毫的经验教训，而将思想和作风作丝毫的修正，这是"国家"、民族的大不幸！

……

……行宪已经十几年了，组织政党是人民依据"宪法"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任何人不得拿任何藉口来剥夺。同时，任何政党在法律上完全平等。这在欧美民主国度的政治家简直是不值一提的常识。然而，国民党少数权势核心人物的想法则与众不同。他们认为在他们势力范围以内，任何政党必须得到他们点头，才算是个政党。

他们的这种念头，就是从"党国"思想里滋生出来的码头独占主义。他们所讲其他一切主义完全是假的。我

们把一切欺人的幌子揭开，直接透视他们的基本心理状态，用两句话就可以包括殆尽："因为我们能控制你们，所以我们总是比你们有理。"依此，他们总是认为"只要我们能控制你们，怎样干都没有关系；你们不同意，其奈我何？"撤退台湾十几年来，一切动作仍然是从这一"唯控制主义"出发的。任何失败的事实都不足以改变他们的这一念头。

近十几年来，国民党权势核心人物（作者注：指蒋介石），使出浑身的力量，实行"加紧控制"，他们是否收到什么效果呢？从一方面看，他们的确收到了一时的效果。在这个小岛上，他们确曾收买了一些无思想、无原则、唯利是图之徒。他们正同在大陆掌握政权时代一样，在台湾把有人格、有气节、有抱负的人很有效的消灭殆尽了。他们控制了一群以说谎造谣为专业者。他们控制着一群藉着帮同作恶以自肥的人。他们控制着藉唱万岁而飞黄腾达的"聪明人"。他们制造了成千成万当面喊拥护叫口号的政治演员。他们控制着台湾一千万人的身体。然而，除此以外，他们还控制着什么呢？

这世界不是为少数人创造的。这少数人要百分之百地实现他们"唯控制主义"的梦想，必须把台湾造成一个百分之百的"封闭系统"；绝对不与外界交通，不要外国人的钱，不要外国人的武力保护。而且，还要有一座化石似的永不改变的社会基础。然而，世界上没有永不腐烂的积水，没有永远可被欺骗的人众，他们的"唯控制主义"不能不在台风、海浪和年华的消逝中腐蚀下去！

……

我们确信，只有真正实行民主政治，才能结束这一祸乱相寻的局面，而导致"国家"社会人民于长治久安之途。

新的在野党之组织，不过是企求这一目标之实现而已……①

《大江东流挡不住》发表后，反响甚大，对蒋介石、国民党冲击得也很厉害。

据说，《大江东流挡不住》社论发表后，蒋介石非常恼火，认为《自由中国》故意与他斗气，一怒之下，下令逮捕雷震等人。《自由中国》如不发表《大江东流挡不住》一文，也许蒋介石不会那么快地抓雷震，《自由中国》也不会受到牵连。

这些说法，国民党的档案难以查到，没有证据，也无从考察。

此时的雷震，是一个热爱中华民族的"宪政主义"者。在思想上，他受殷海光的影响较深，一心追求自由、民主，所以原《自由中国》杂志编委、著名美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在评论他们俩时说，殷海光在理论上反极权，雷震则在行动上反极权。但不论怎样说，他在白色恐怖很重的60年代，筹组与蒋介石对立的新政党，极其危险，随时都有被绑架、暗杀的可能。他的此举，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其胆量令人钦佩。但是，他在斗争方式、策略上，似乎又不怎么讲究，给人一种有勇无谋的印象。在这方面，胡适比他老到、圆滑得多。

尽管如此，雷震从搞"选举改进座谈会"到筹备"中国民主党"，还算做了一件较有影响的事。殷海光冒险支持、声援他，为他大造舆论，虽然给他被捕起了"火上加油"的负作用，台湾的史学家们还是对殷的此举作了肯定。

台湾大作家李敖在谈到这一阶段的雷震、殷海光时说：

雷震是深受殷海光影响下的勇者，他们合作无间，给

① 《殷海光全集》第12卷，第975～978页。

中国(作者注:这里应为台湾地区)人做了划时代的贡献,为人类争取言论自由做了最精彩的榜样。①

① 李敖编著:《雷震研究》,台湾李敖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 页。

21

雷震被蒋逮捕：殷海光大力援救

雷震因组建新党触怒了蒋介石，蒋介石便下令逮捕雷震等人。为了掩人耳目，国民党特务机关将“涉嫌叛乱”的罪名加在雷震头上，并迅即制定了一套抓捕方案。

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行政院”新闻局、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还制定了一套抓捕雷震后的宣传计划。

1960年9月4日上午9点20分，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派出上校军事检察官桑振业、保安大队中校副大队长施建良、上尉副中队长郭振斌等率大批军警，将台北木栅埤腹路

71号之6雷震的住宅团团包围起来，然后由几名军警冲入雷宅内，将雷震铐起来带上囚车。与雷震同时被捕的，有追随雷震建党的《自由中国》杂志编辑傅正、负责杂志发行工作的经理马之骕和原《自由中国》会计、现国史馆藏员刘子英（作者注：刘被抓进去是作陷害雷震工具的）。

军警们还对雷宅和自由中国杂志社进行了大搜查，雷震在香港及通过其他渠道弄到的一批大陆书刊，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及《辩证唯物论》、《共产主义世界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要文献》、《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革命路线而斗争》等书，均被军警搜去。

雷震被捕的当天，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发言人王超凡中将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雷震等涉嫌叛乱，已由本部根据惩治叛乱条例第10条的规定于9月4日依法拘捕，现正在侦讯中。"①

4日晚上，国民党中常委陶希圣率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曹圣芬、"行政院"新闻局长沈锜，以宴请的名义，召集台湾各报刊、电台负责人开会，告知抓捕雷震的原因及经过，并在会上公开散发了白皮书《〈自由中国〉半月刊违法言论摘要》。现将当年台湾《联合报》登载的与殷海光有关的"白皮书"摘录于此：

> [本报讯]有关机关对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半月刊涉嫌违法的言论至为注意，将其摘要汇集，分为6大项目：(1)倡导反攻无望；(2)主张美国干涉我国内政；(3)煽动军人愤恨政府；(4)为共×作统战宣传；(5)挑拨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同胞间感情；(6)鼓动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

① 1960年9月5日台湾《征信新闻报》。

命。茲分別与其要点如次：

（一）倡导反攻"无望"——46年（1957年）8月1日，17卷3期《反攻大陆问题》（作者注：由殷海光撰写），文内有"官方在'反攻大陆'这个大帽子之下，利用人民的这种心理状态，遂得以畅所欲为。这几年来，人权自由受到严重的妨害，政治向着反民主的道路发展，其故在此。结果所及，'反攻大陆'尚在毫无端倪之时，我们已经失去了自己所有的"。又"而马上就要回大陆这一假想又是颇为渺茫。一个国家的一切作法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这是太不稳健了，一群人在这样一个假想之上活动，哪里会'生死以之'，全力以赴？"

该文妄言反攻大陆，经公算结果，前途渺茫，与"政府"反攻复国"国策"有违。影响民心士气，莫此为甚。显已触犯了"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第2条第5、6两款，及"惩治叛乱条例"第7条。

（二）、（三）略。

（四）为共×作统战宣传——47年（1958年）10月16日第19卷第8期的社论《认清当前局势，展开自新运动——向大陆作政治进军》（作者注：由殷海光撰写）内有："于是乎台湾一天一天地走向孤立的道路。这种统治的结果，使整个政治机能愈来愈僵固，政治的格局愈来愈狭小"，"我们兹举几项最需急办的事项如下：①取消一党专政；②取消党化军队；③取消浪费青年生命、制造个人势力的青年反共救国团；④取消党化教育。"

又如49年（1960年）2月16日22卷4期《护宪乎？毁宪乎？——望国大代表作明智的抉择》，49年（1960年）5月16日22卷10期《殷海光致雷震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均证该杂志煽动海内外人民，颠覆"政府"，另组

"政府"或投向其他政权之阴谋，蓄谋已久。触犯"叛乱条例"第6、7两条，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第2条第3、5、6款，"刑法"第100条第2项。

（五）略。

（六）鼓动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49年（1960年）5月16日22卷10期社论《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作者注：由殷海光撰写）内有："自古至今，统治者太专横、太霸道、太自私，以致叫人忍无可忍的时候，大家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反抗的。"

该刊自南韩、土耳其两国政变后，一再撰文鼓励人民效法韩土政变掀起流血革命，以图颠覆"政府"，触犯"刑法"第100条，"惩治叛乱条例"第7条，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第2条第3、4、6款。①

9月5日，殷海光在《联合报》上看到了此"白皮书"。他觉得，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弄的这个"白皮书"既无聊，又可笑，他们断章取义，张冠李戴，一派胡言。如他们在第4条罪状中所举的《认清当前形势，开展自新运动》一文，实际上是向当局提的几条建议，与共产党的"统战"没有任何关系。南韩李承晚垮台，是李自己在选举中舞弊及搞法西斯独裁统治激起人民的愤怒，人民自发起来推翻李承晚政权，根本不存在"政变"的问题。

为了给雷震说公道话，殷海光找到《时与潮》杂志负责人齐世英，要求在其主持的刊物上发表为雷震打抱不平的文章，齐世英被他的义举与勇气所感动，说："局势这样糟，环境这样恶劣，你还敢写真话直话，我非常佩服。你的文章一来，我一定发表，出了问题，责任由我来担。"

---

① 1960年9月5日台湾《联合报》。

齐世英作了承诺，殷海光马上回家写了为雷震辩护的《我看雷震和新党》一文，他在文中说：

……依据中外独立性的舆论一致的判断，雷震先生之失去身体自由与新党之创建有关。显然得很，1960年9月4日上午若干人对雷震先生所采取的这项行动，是对新党"打蛇打头"的行动。我怎样也想不出雷震先生等人创建新党有什么"危险"可言。①

殷海光在文中从人的素质、社会基础、国际背景三个方面，对雷震及新党一一作了分析，认为雷震不会"造反"、"革命"。他说：

……我们知道他是"年愈花甲"的人。如果一个人活到了60多岁才搞"革命"，这有点像一个女子在20岁时"抱独身主义"而到60多岁忽然要谈恋爱的事不能说没有，但总有点令人发生"姗姗来迟"之感吧！

……总而言之，这几位先生都是中年以上的人，都深晓利害，都熟谙世情，且都有身家之累。这样的一些人物，怎么"造反"？怎能"革命"？……怎么会发生危险？怎么值得这样紧张？

……

依据上面的解析，我们知道，即将成立的新党，无论在人的素质上和社会基础上，以及在这样的国际前景上，都先天地决定着它不是一个"革命党"，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主党"。这样的一个政党有什么作用呢？这样的一个政党的作用有二：第一，她可作中国（作者注：这里指

① 《殷海光全集》第12卷，第983页。

台湾地区）民主政治的产婆；第二，她可作自由中国（作者注：这里指台湾地区）政治机能里的调节器。

……

……近十几年来，台湾的社会活动，除了吃喝玩乐以外，一切都置于自上而下的强力控制下，一切非来自控制者的活动都在怀疑和禁止之列。因此，社会正常发展的生机都窒息和扼杀了。长此以往，结果不堪设想！针对这种可悲的情形，自由中国（作者注：指台湾地区）需要一部政治的调节机。有了这部调节机之调节，社会各方面的机能才得以作正当的发展。

……

无疑，雷震先生是这样的一个新党之催生医师。他为了这个新党之出世，他为了实现"民主宪政"的梦，牺牲了唾手可得的富贵荣华，而陷身莫测的疑云。我绝不愿为一时一地的是非而辩论。自古至今，该有多少人为了科学的真理，或为了争取民主自由，而牺牲生命的。这些人物，而在当时，不是曾被咬定为"叛徒"吗？然而，时过境迁了，那些咬定这些志士为"叛徒"的人们，确对历史留下了人类愚蠢、自私和黑暗的。虽然，我置身于这小书室中，我正神驰于古今的兴亡历史，可是我毕竟与这样的一群人处在同一个时代和同一个岛上。我的身体，正像一切讲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人之身体一样，毫无掩蔽地暴露在一个没有约束力的权力之下。雷震先生就是这样地失去身体自由了。想到这里，我不禁要藉《圣经》上的一句话赠给雷震先生：

"为义而受难的人，有福了。"①

① 《殷海光全集》第12卷，第984～988页。

他还想：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公布的《自由中国》的6条"罪状"，自己执笔的文章占了3条，而且罪名已加在雷震头上了。俗话说：好汉作事好汉当，自己写的文章，责任应由自己担，不应加在雷震头上。他决定找个机会与夏道平、宋文明等人商谈一下，如何承担此案的责任问题。殷海光还未去找夏道平、宋文明，雷震案发生了新的变化。变化的原因，是刘子英作了"坦白交待"。

原来，刘子英入狱后，经不住警方威胁利诱，违心承认自己是"匪谍"，并按国民党的要求写了"坦白书"。他在"坦白书"中声称他到台湾之初，向雷震告知了自己是"匪谍"，雷震未表示什么意见。

9月6日晚，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发言人王超凡根据刘子英的"交待"，又一次召集台湾各新闻单位的记者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刘子英为"匪谍"。1960年9月7日《联合报》以《王超凡宣称"刘子英为匪谍》为题，对此事作了报道，全文如下：

[本报讯]《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雷震等4人涉嫌叛乱案，经警备总部连日来的侦察，已证实刘子英为匪谍。据该部发言人王超凡中将昨晚对各报记者表示："刘子英是匪谍，雷震也牵连在内。"至刘为匪谍之详细事实，将候军事检查官侦察起诉后，公开发表。

据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刘子英为"匪谍"，警总已获有具体事证，彼系于39年(1950年)奉匪方使命来台湾，其入境时之保人为雷震。刘在雷震任国民党参政会副秘书长时担任秘书之职，雷氏甚多私人函件均由其处理，后任监察院专门委员，大陆陷"匪"时，彼曾将监察院文件移交给共χ。继为"匪"利用，先赴香港，与在台之雷震取得联系，由雷震设法使其来台，由于刘学验俱丰，工作能力强，尤擅书法及诗词，故深得其服务机关长官之赏识。刘

在案发被捕时，身兼3项职务。其一为国史馆人事室主任，其二为中日文化经济协会文书科长，其三即兼任《自由中国》半月刊会计。其余被捕时，治安人员曾在其寓所搜获通"匪"文件及雷震寄存之文件甚多。

警备总部曾两度号召"匪谍"自首运动，希望潜台"匪谍"迷途知返，该部当给予自新之机会，"匪谍"自首运动结束后，该部仍未关闭自首之门，而刘子英等人竟执迷不悟。①

对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王超凡的发言，殷海光觉得很可笑，而且不值一驳。他心里很明白，无论国民党怎么说，刘子英怎么说，雷震不会是"匪谍"，更不存在"涉嫌叛乱"。雷震的所有"罪行"，都是国民党诬栽的。

9月中旬，美国一记者访问团访问台湾。14日，这个记者团在台湾当局新闻局长沈锜、美国驻台协防司令部司令史慕德的陪同下，面见了蒋介石。

9月15日，国民党《中央日报》转发美联社的一则蒋介石会见美国记者访问团的消息，消息中说：

"中华民国"蒋"总统"本日预言共×将在3年之内崩溃。

当询及《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及在酝酿中之反对党领导人雷震之被捕一事，"总统"认为一切均系依法办理。

……

蒋"总统"对雷案的谈话，是9月4日雷震因涉嫌叛

① 1960年9月7日台湾《联合报》。

乱罪被捕后，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意见。

蒋"总统"对于逮捕《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雷震和该刊其他3位职员的原因，说该刊所登载的文章对共X是有利的。他相信已有"匪谍"在该刊的幕后作活动，逮捕雷震当然有法律的依据。

蒋"总统"表示，这件事与雷震组织反对党的事无关。他说，任何人可以自由地在台湾从事政治活动，但是绝对不许参与颠覆活动。

蒋"总统"说，他知道雷震的逮捕已在美国和自由亚洲引起反应，但是他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且雷震的逮捕，是根据"中华民国"的法律来办理的。

蒋"总统"说，他不愿作进一步的评论，因为这件案子尚在侦察期中。不过他说，已被逮捕的刘子英，在1950年到达台湾的时候，曾经告诉雷震他是"匪谍"，而雷震仍予隐匿。

蒋"总统"说，这件案子的重要性，在有些国家中，目前不会了解，不过，他相信在将来，他们是会了解的。①

殷海光看了这则消息，感到蒋介石对雷震案的情况、经过这么"清楚"，说明他直接参加研究或很细致地过问了此案。这是一起经过精心密谋的政治迫害大案。

他还感到，一定要找个机会，对蒋介石的胡言与诬栽进行批驳，使台湾民众对这个大案有个真实的了解。

由于雷案是军法审判，殷海光估计当局很快要对雷震进行起诉。因此，蒋介石的谈话发表后，他特别关心雷震的"起诉书"，想看

① 1960年9月15日台湾《中央日报》。

看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给雷震定了多少罪，如何定的罪。

9月2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检察官殷敬文就雷震案正式向军事法庭提起公诉。27日，《联合报》全文刊登了殷敬文的起诉书，起诉书中认定雷的主要罪状有二：一、包庇"匪谍"刘子英；二、主持《自由中国》期间，攻击国民党、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政策，散布悲观无望论调，以图鼓动暴乱，而图达"颠覆政府之目的"①。

殷海光在报上看到这个起诉书后，立即将原《自由中国》编委夏道平、宋文明请到家中，并对他们说："雷先生的起诉书公布了。我看过之后，感到起诉书全系胡言。国民党公布雷震的第二大罪状是我们几个人写的，而且又是我们力主发表的，这个责任不能由他一人担，我们几个人应将此问题担过来，使雷先生少坐几年牢。"

夏道平、宋文明非常同意殷海光的意见。于是，由殷海光执笔，3人共同署名，在海内外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在台湾各报发表。

这篇共同声明1200字，主要讲了三点意思：其一，他们在《自由中国》上写的文章，是书生论政，没有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兴趣，其目的是为了"反共救国"，别无他求；其二，承担他们在《自由中国》上所写的文章的言论责任；其三，批评国民党诬栽、陷害雷震的"白皮书"是断章取义、东拼西凑、张冠李戴、改头换面之词。

雷震等人被抓后，过去与雷震有交往，包括《自由中国》杂志社的少数人，都吓破了胆，生怕受牵连，停止了一切活动，只有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胆量过人，不顾生死，在雷震受政治迫害时，勇于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并继续批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

后来，人们对殷海光在此时与夏、宋二人一道发表共同声明勇救雷震的行动，极为赞赏。如1961年11月7日出版的《时与潮》周刊，对殷海光此举就有很高的评价：

---

① 1960年9月24日台湾《联合报》。

这几篇文章见报后，无疑的已在新闻界、文化界以及法界人士之间引起深切的注意与关怀。一般人的看法认为，中国读书人一向是重视"文责自负"的观念的，而在轰动如雷案的现况下，这几位写文章的人，敢于不避任何可能的困扰与不利，挺身出来为自己的文章而辩护，同时也表示出愿意为雷震分担一部分文字叛乱的罪责，这些足以说明读书人对智识负责，对历史负责的道德勇气。①

尽管殷海光领头发表了承担责任的声明，蒋介石集团仍不放松对雷震的迫害。因为，雷震的要害问题是组织政党，他们的首要目标是扑灭新党。《自由中国》上的"违法"言论虽然使蒋介石很恼火，问题却在其次。所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军事法庭仍要判雷震的徒刑。

10月18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法庭匆忙以"明知共谍，知谍不报"和"涉嫌叛乱"罪名判处雷震有期徒刑10年，其他几名"罪犯"也各判处了有期徒刑。

10月24日，殷海光应台湾《时与潮》杂志之请，专门向该社记者谈了三点看法。随后，《时与潮》杂志将殷海光的此次谈话全文刊出。殷海光着重谈的三点是：

第一，固然，雷震先生为人很有毅力，胆识超人，威武不能屈，而且能抱定一个理想，并且不避艰危地为这一理想献身。这都是他的特别长处，同时也是此地的知识分子特别缺乏的品质。但是，他的这些长处并不因"涉嫌叛乱"而丝毫增加。如果没有逮捕他，那么，这些优点不会被

① 《雷震全集》第4册，第603～604页。

许多人注意的。现在，经过"牢狱的锻炼"，就把这些优点显露出来了。这多少是有着鼓舞人心和辩证是非之作用。

第二，雷震近数年来提倡民主自由和人权保障。有许多人士尚不知道这是何等重要的事，只当作耳边风。经过这一个月来"雷案"的演变经过和若干表演，许多人士可以在脑筋里打转，体会到民主自由和人权保障不是空谈，而是与一个人的祸福安危攸关的事。这次雷震先生个人之牺牲，至少可以促使许许多多人有这种认识，这种认识加深和扩大，对于自由中国的民主运动，一定有促进和加速的作用。

第三，固然，《自由中国》半月刊的言论与官方的腔调有所不同，但是，在我看来，都是一些七折八扣的平易。这些平易之论，在雷震先生被捕以前，有些人不一定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这次雷震先生的被捕，确可加深大家对《自由中国》半月刊言论的印象。我们深信这些印象，在最近的将来，会在人心中发酵，并且开花结果。

最后，殷教授说：雷案的本身，也许很快就可了结，也许较迟才能了结。这个我不知道。可是，有一点，我却十分清楚，雷案外而在国际上的影响，内而在自由中国民主运动的催生作用，无论直接间接，却方在发展的开始，我睁开眼睛看看，张起耳朵听听，自从雷震先生的身体失去自由以来，全自由世界的同胞是怎样关切他的？……他所发生的长远作用，他所表现的方向，他所揭开的广大的人民的意义，则正在勃发的起点。①

殷海光的上述言论，与蒋介石及国民党其他要人讲的完全相

① 《雷震全集》第12册，第232～233页。

反。他的用意很清楚，一是为雷震担责任；二是讲公道话；三是批评蒋介石集团的违"法"行为；四是告诫蒋介石及其国民党不要太做出格了，看起来抓了雷震，实际上这件事做得很蠢，你们失去的远比抓雷震的要多，你们将来要受到后人的谴责。

殷海光此举，颇获台湾民众及民主人士的好评。雷震在狱中听到殷海光的言论后，也获得不少安慰。

进入70年代，雷震出了狱。雷震特地将殷海光的上述言论一一搜集起来，准备日后出全集用。

殷海光抨击蒋介石和救雷震的言论虽然令人敬佩，却为蒋介石集团所不容。《自由中国》未停刊时，他是抨击蒋介石的急先锋，停刊之后，他又成为声援、救雷震的领头人，雷震案落幕了，蒋介石自然不会放过他。

22

蒋欲将殷海光排除：同仁坚决予以抵制

雷震等人因所谓的“涉嫌叛乱”罪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抓捕入狱后，《自由中国》杂志因没有发行人而被迫停刊。

当时，海内外舆论一致认为，蒋介石下令逮捕雷震，主要原因有二：其一，阻止雷震创建“中国民主党”；其二，连带《自由中国》，使《自由中国》就此停刊，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后来，因海内外舆论太大，蒋介石为千夫所指，批评他的人士都说《自由中国》是台湾的一块牌子，也是台湾有言论“自由”的象征，

《自由中国》被迫停刊，系蒋介石制造的一起震惊世界的文字狱，是扼杀“言论自由”。

蒋介石见海内外舆论一直在批评他，渐感逼迫《自由中国》停刊的做法是个很大的失误。有一天，他召集儿子蒋经国、国民党中央常委陶希圣，另一中常委、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曹圣芬，新闻局长沈锜等，专门研究这件事。

蒋介石对他们说：“雷震入狱后，社会反映好大，原来没有料到舆论反映这么强烈。现在人已抓了，中国民主党肯定是组织不成了。这是我们的一大胜利。看来，对《自由中国》杂志问题，不能简单处理。这个刊物一停，海内外舆论一口咬定我们打击言论自由，是文字狱。我考虑，这个杂志还是让他们办下去，但再不能像以往那样让他们胡言乱语。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谈谈。”

蒋介石一说完，陶希圣马上说：“总裁这个意见高明，我举双手赞成。”

陶希圣之所以赞同这个意见，是因为雷震被抓后，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曾当面对他说：国民党搞的《〈自由中国〉违法言论摘要》做得不高明，也站不住脚。《自由中国》上的文章，都未违“法”。如果抓雷震造成《自由中国》停刊，那是错上加错。这样的话听多了，陶希圣也渐渐感到，《自由中国》停刊，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并无任何好处。

另外，海内外的许多知名人士为《自由中国》打抱不平，还有的向台湾当局，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领导人发电，希望他们允许《自由中国》继续办下去。

蒋介石见陶希圣也同意他的主张，又说：“既然你也有此看法，那就由你出面找《自由中国》杂志社的人谈谈，希望他们把刊物继续办下去。但要提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再不能要殷海光参与，也不准发表他的文章。”

陶希圣非常赞同蒋介石的这个意见。

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个杂志表面是雷震领头并任发行人，其灵魂人物却是殷海光，因为该杂志上鼓吹自由、民主，反极权、反暴政、反蒋介石专制独裁的文章，大多出自殷海光之手，而且文章一出，冲击力甚大，所以蒋介石非常恨殷海光。

陶希圣受命后，决定找《自由中国》编委戴杜衡。戴杜衡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后叛党投奔国民党阵营，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任主笔，是陶希圣在大陆时期的部下，而且关系不错。戴到台湾后，脱离《中央日报》，投奔了《自由中国》，任编委兼主笔。在《自由中国》社内，戴杜衡虽然没有殷海光的名气大，因其文字功夫深，为人谨慎，考虑问题比较周到，是杂志社内一位说话较有分量的主笔。

一天，戴杜衡被陶希圣请到家中吃晚饭。在席上，陶希圣对戴杜衡说："戴先生，我今天请你来，一是话话家常，二是谈点公事。"

戴杜衡说："非常乐意听陶先生的教诲。"

陶希圣说："过去，我对《自由中国》还是很关心的，雷先生有什么事找我，只要能做到的，我都是尽力而为。这些情况，我想戴先生也是很清楚的。可惜的是，雷震先生，还有殷海光先生个性太强了，不听人劝，又不愿与'政府'合作，并不断地在杂志上批评'总统'和执政党，'总统'很恼火，经常把我找去批评，弄得我很为难。雷震先生落到今天的结果，这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我想，他现在可能很后悔。尽管《自由中国》过去发表了很多不利于'政府'及'反共抗俄'的文章，'政府'还是不计较那些过去了的事，仍然同意《自由中国》杂志继续办下去。"

戴杜衡一听说蒋介石、国民党允许继续办《自由中国》，十分惊讶。他向陶希圣问道："'政府'真同意我们将杂志办下去？"

"是呀！你还不相信？"

"相信是相信，不过……"

陶希圣感到戴杜衡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又说："'政府'允许你们继续办《自由中国》，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殷海光不能参与,也不能让他在杂志上发表文章。"

"这……"

陶希圣说:"你去与《自由中国》的几个主要人员商量一下,如你们想将杂志办下去,'政府'希望由夏道平先生继任发行人。"

对这个问题,戴杜衡不敢答复。沉默了一阵,他对陶希圣说:"你提的这件事,我觉得应与大家商量一下,看看他们有什么意见,然后再给你回话。"

陶希圣点头同意。

戴杜衡从陶希圣处出来后,连忙去找"监察委员"、雷震夫人宋英。宋英听了,感到这是一件大事,应该很慎重地与自由中国杂志社的编委们商量一下。她对戴杜衡讲:"听听大家的意见再说吧。"

戴杜衡又去找自由中国杂志社的编委夏道平。夏道平听了,很气愤地说:"这是蒋介石的阴谋。他们既要打击雷震,又要得'台湾有自由'的美名。你告诉陶希圣,我任不任《自由中国》发行人,也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我对此也无所谓。国民党提出不要殷海光参与《自由中国》的条件,可以肯定地说行不通。《自由中国》宁可不复刊,也不可没有殷海光!"

过了几天,戴杜衡将夏道平的意见转告了陶希圣。陶希圣认为,夏道平的意见,蒋介石不会同意,他也不敢表态。他只好对戴杜衡说:"既是这样,此事放到以后再说吧。"

夏道平的态度,在当时来说,代表了《自由中国》全体人员的意愿,他坚持要殷海光继续参与《自由中国》,国民党、蒋介石的目的就达不到。正像原《自由中国》作者胡虚一先生所说:"陶希圣既要《自由中国》排除殷海光,而夏道平则坚持《自由中国》不能没有殷海光。这样的情势,《自由中国》的复刊自不顺利了。"①

---

① 胡虚一编著:《胡适致雷震先生秘件》,第161页。

对蒋介石集团既想让《自由中国》保留下去，又排除殷海光的问题，当年的报刊也有过报道。如1960年12月26日出版的《时与潮》就在《〈自由中国〉停刊退款》一文中说：

> 本来，在雷震被捕之初，他在家信中还一再特别叮嘱，希望《自由中国》继续出版下去，因为他认为《自由中国》出版不中断，是对"国家"有好处的。
>
> 然而，一个杂志的发行人被捕失去了自由，除非变更登记，另由别人担任发行人，就无法继续出版。起初，《自由中国》的同仁研商的结果，决定由编辑委员会委员夏道平出面变更登记为发行人，因为据说，有关人士曾暗示，如果由夏道平继续主持，而殷海光不再参加工作，则可以考虑准许变更登记，这种条件在《自由中国》社的同仁看法，自然未便接受。
>
> 后来，也曾研究由胡适博士本人或雷太太宋英担任发行人，但因法律有规定，胡院长是公务员，不能担任杂志社发行人，宋英为监察委员，"宪法"规定不得执行业务，于是，《自由中国》变更登记的事，因为再没有合适的人可做发行人，所以只好暂时不谈了。①

当年报刊的这一报道清楚地说明，《自由中国》触怒蒋介石的言祸，主要由殷海光造成；雷震的主罪，也主要由殷海光的文章构成；《自由中国》杂志此后不能复刊，又是殷海光的原因。

当时，社会各界对《自由中国》是否复刊十分关注，每天有不少人打电话到《自由中国》社询问，还有的亲自到杂志社探访。

1960年10月底，台湾《联合报》记者常胜君为此专访胡适，并

① 《雷震全集》第5册，第765～766页。

在该报写了一篇《雷震·〈自由中国〉·反对党——夜访胡适谈三事》的文章，文中说：

> 外传《自由中国》的编辑委员们有意请胡先生担任发行人，主持复刊。这位当年一手创办这本杂志的学者说："我从来没有接到过这样的信，也没有人和我谈过这件事。"他表示《自由中国》究竟复不复刊，应该由全体编辑委员会决定。不过，他指出，香港曾有两批人要用《自由中国》的名义出版杂志，他曾写信而且打电报给这些人，来表明他的态度：
>
> 第一，只有《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发行人和编辑委员会，才有权决定究竟还出不出刊，这些人包括雷震、毛子水、夏道平、殷海光以及胡适自己等委员，此外的人无权决定。
>
> 第二，如果决定不再出刊，他认为一个杂志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
>
> 第三，如果决定要继续出刊，则应该仍然在台北出，他绝对反对在香港、美国，甚至其他可以不负本"国"法律责任的地方出版。
>
> 问到胡适先生自己的个人意见，究竟赞不赞成《自由中国》继续出版。他说："我个人没有意见，一切听从编辑委员会的决定。"①

胡适接受《联合报》记者采访不久，陶希圣又上门找胡适。他想通过胡适，尽力达到蒋介石的愿望：既使《自由中国》复刊，又将殷海光排除出去。

---

① 《雷震全集》第11册，第174页。

胡适此时的心情甚烦。他对蒋介石下令逮捕雷震等人意见很大，并公开表示了不满。因此，他回台湾后，蒋介石一直不理他。

陶希圣对胡适说："《自由中国》是一个有很大影响的刊物，而且你也参与其中，'政府'希望此刊物能继续办下去。雷震不能主持其事，可否由夏道平先生任发行人？"

胡适一听陶希圣说话的口气，就知道他是奉蒋介石之命来的。不然，他不敢，也不会来谈此事。

晚年的胡适，在政治上比过去更老辣，更注重技巧。陶希圣来了，他心里有气，也不发作。因为，他深知雷震与《自由中国》落到这个地步，与陶希圣经常在蒋介石面前说《自由中国》的坏话有很大的关系。

他对陶希圣说："我虽然是《自由中国》的编辑委员会委员，因我不在台湾，也无法参与其中的活动，杂志的编、印、发，都是他们搞。复刊的事，我一个人无法作主，得与大家商量一下。如果大家觉得能继续办，我无意见。大家认为就此停刊，我也没有办法。复刊后，至于谁任发行人的问题，这也得由大家决定。"

陶希圣又说："如果继续办，'政府'希望排除殷海光，还要保证不发表他的文章。"

对这个问题，胡适觉得不好讲。他说："现在的首要问题，不是排不排除殷海光先生的问题，而是办不办的问题，如果大家不想复刊，此事就没有必要说了。"

胡适这几句话说得很有技巧，陶希圣也不好再讲什么了。

临别，陶希圣希望胡适将《自由中国》社的人员找拢来议一议，胡适答应了。

陶希圣走后，胡适心情十分沉重。他在室内来回地走着，并自言自语道："这份杂志是你们搞垮的，现在又希望复刊。为什么要这样作呢？环境这样恶劣，《自由中国》即使复刊，也办不下去！"

胡适虽感到《自由中国》难以复刊，他还是决定找个机会请劫

后余生的《自由中国》同仁拢来商量一下是否复刊的问题。

恰在这时，雷震夫人宋英给胡适打来电话，将陶希圣托戴杜衡转的口信告知了胡适，希望胡适将编辑委员们召集拢来开会商量一下。胡适在电话中说，这是大事情，需仔细考虑一下，过两天再回复她。

宋英觉得这样也好，答应等胡适的回话。

1960年11月2日下午，胡适给宋英回了一信，信中说：

> 前天你在电话上对我说的话（指《自由中国》复刊的事），我也曾想过。不幸这几天实在忙乱，我没有法子邀集各位编辑委员来谈。所以我写此信，请你先和就近可以商量的各位谈谈，最要紧的是先问问子水与道平的意见。我还没有机会与子水谈话，但我想他未必肯担任这件事。
>
> 照现在的情形，我只有本星期五（11月4日）的晚上可以在家。如果你能邀他们在8点半以后到南港谈谈，我可以在家等候。
>
> 过了11月4日夜，就得在11月7日以后了。
>
> 适之敬上。
>
> 49.11.2日下午
>
> 如星期五夜能来，乞告汪司机。如需汽车，我可以派车在8点到你指定的地点。
>
> 适之。①

大约在写这封信的同时，《联合报》另一记者采访胡适时，问《自由中国》是否复刊，胡适说，只有《自由中国》的发行人和编辑委员会，才有权决定究竟复不复刊，其中提到了殷海光。他在给宋英

① 李敖著：《千秋评论丛书》第87期，第59页。

的这封信中，因已知道蒋介石集团有不要殷海光再参与《自由中国》的意见，所以不提殷海光了，只说“最重要的是先问问毛子水和夏道平的意见”。

过了几天，在宋英的联络下，原《自由中国》编委殷海光、夏道平、毛子水、金承艺、戴杜衡、宋文明、聂华苓在南港胡适处，举行了《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

胡适没有把国民党的意图告诉大家，只对大家说：“雷先生入狱后，《自由中国》被迫停刊。当局虽弄了一个《〈自由中国〉违法言论摘要》，但未宣布取缔《自由中国》杂志，按新闻局的规定，如果半年出不了杂志，就视同自动停刊，以后想办也无法办了。我今天请大家来，旨在让大家在一起讨论一下，看杂志是办还是不办。请大家发表意见。”

胡适话音一落，老编委毛子水发言说：“我个人意见，再不办了。这个刊物办了11年，与国民党和蒋‘总统’结怨太深，而且这个怨又不易解开，今后再在言论上出问题，当局又要找麻烦，一有麻烦，杂志就难办了。再说，雷先生入了狱，一出问题，再没有像他那样的人出面去疏通、化解。因此，我主张停刊。”

毛子水一讲完，金承艺就发言说：“我的意见，继续办下去。其理由是，《自由中国》是名牌杂志，创一个名牌不易，停了很可惜。至于大家考虑到今后言论不好把握的问题，这很好说，谨慎一点就是了。”

宋文明、夏道平、戴杜衡均觉得不好办，没有讲多少话。

殷海光觉得，雷震、《自由中国》出现今天这个结局，自己有很大的责任。所以，他坐在沙发上一直未发言。胡适见他不讲话，向他问道：“海光先生的意见呢？”

殷海光说：“我不好说。”

“为什么呢？”

殷海光说：“往下办，环境太恶劣，言论不能自由；不办，违背了

雷先生的嘱托，又丢了一个名牌杂志，自由主义者也失去了一处重要的言论阵地。所以，我感到不好说。”

殷海光是《自由中国》的台柱，当家编委，发言的分量很重。他觉得很难办，大家更感难办。

胡适见大多数人不赞成再办下去，便正式宣布说：“留得青山在，等候时机来。《自由中国》被迫停刊，也是光荣结束！”

这次会议之后，殷海光和雷震夫人宋英根据最后一次编委会的决定，叫原《自由中国》作者胡虚一、《自由中国》职员程积宽负责做好杂志社的善后工作。

自此，影响巨大的《自由中国》杂志在台湾岛上消失了。

蒋介石既想打击雷震，又想排除殷海光的《自由中国》能够复刊的目的，终未达到。

23

雷震案落幕：蒋介石指示抓殷海光

前面已经提到，《自由中国》时代，殷海光是杂志社的灵魂人物，其理论、思想，左右了《自由中国》的方向，他的文章，火药味极浓，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批判、攻击又不遗余力。

他在《自由中国》中起的作用，国民党及其特务机关了如指掌。

雷震案落幕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抽出人马，再来打击这位特大号的"自由主义者"、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最头痛的政论家。

从目前披露的史料看，蒋介石集团打击、

迫害殷海光，是分武和文两个步骤进行的。这里着重记述武的部分。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心里很清楚，殷海光在大陆时期就是有一定名气的政论家。到台湾后，又写了一些反共文章，可说是"铁杆反共理论家"。对他这样的人，如也用"涉嫌叛乱"来定罪名，肯定说不过去。因此，要整殷海光，得用别的罪名。

此时，台湾特务机构的总头目是蒋经国，国民党整殷海光，蒋介石、蒋经国父子自然是主谋。他们向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下达了整肃殷海光的指示。

《自由中国》时期，殷海光最痛恨的是蒋介石，警备总司令部及其下属的保安处就抓住这一点来做整殷海光的文章。

台湾总司令部的大小特务们经过精心策划，设计了一个"除三害"案，来陷害殷海光。

所谓"三害"，按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说法，就是指"总统"蒋介石及儿子蒋经国、"副总统"陈诚。"除三害"，就是谋害上述三人。

警备总司令部的陷害计划，得到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批准。蒋经国还给警备总司令陈大庆指示说："殷海光的影响大，打击他时，计划要周密，行动要细心，不要出差错。"

按照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计划，陷害殷海光，必须找一个比较可靠的人做打手。为找这个打手，保安处的数十名特务们四处活动，找了很长时间，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李英涛。

据台湾学者胡虚一先生讲，李英涛系河北省人，住台北县南港路，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还任过低级军官，复员后在台北肥料六厂当过一段时间的职员，后失业。此人财迷心窍，不务正业，品质低劣，唯一的特长就是嘴巴会说。他自己常摇头晃脑地对人说："我的嘴，两张皮，随说随转移。"与他相熟的人都说他是"马吃石灰，一张白嘴"。

警备总司令部找上他，主要看中了他的两点：一是无工作缺钱

花；二是嘴巴能讲。他想钱，给他一笔，就可为"警总"卖命当打手，会讲话可与殷海光搭上关系，并取得殷海光的信任。

大约在1961年3月份的一天，李英涛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处的特务叫去，处长刘醒吾对李英涛说："根据'总统'和经国主任的指示，'政府'制定了一套抓捕台大哲学系教授、原《自由中国》编委兼主笔殷海光的计划。'政府'之所以要抓捕他，是因为他是'总统'和我们国民党人的大敌。而要抓捕他，又必须有证据，为了弄证据，有两件事必须由你去完成。"

"哪两件？"

刘醒吾说："其一，你先到台北肥料六厂图书馆去活动一下，建议他们请殷海光到厂里作一次演讲，并且要说明，听殷海光演讲是一种艺术享受，请他不易，不要把机会错过了。那个图书馆里有一个人是殷海光的学生，建议由他出面去请殷海光，殷海光一定会去的。你要利用这个机会与殷海光接触，取得他的信任，并与他建立密切的关系。其二，你与他的关系建立起来后，我们给你代拟一个谋刺蒋'总统'、陈'副总统'、蒋经国主任的'除三害计划'，你拿着这个计划去要求他作'指导'。他正在'指导'时，我们的人就冲进去把他抓起来。"

李英涛听了，感到这个任务很重，也不光彩，给多少钱的问题也未提，故半天没有答应。

刘醒吾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给他打气壮胆说："李英涛，这个任务交给你，你应感到很光荣。这是蒋'总统'和经国主任亲自交办的案件。你如完成了这个任务，就是效忠领袖、热爱领袖的表现，也可说是为党'国'做了一件青史留名的大事。到时候，你工作有了，钱也花不完。"

有钱能使鬼推磨。见钱眼开的李英涛一听说有钱又有工作，眼睛一亮，并露出了喜悦的神色。他当即向刘醒吾表示："我一定按刘长官的要求，努力完成蒋'总统'交给的这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

务！”

李英涛表了态，而且信心又很足，刘醒吾非常高兴。当然，他心里很清楚，这是钱起的作用。李英涛这种人，要他效忠领袖、党“国”，如同要庙里的关公去打仗——不可能。

刘醒吾深知，找一个合格的打手很不易。他怕李英涛把事情办砸了，一再提醒他说：“殷海光名气大，学问高，说写一流，论文论理，你不是他的对手。因此，你与他相识后，尽量不要与他谈学问，只发牢骚，大讲对蒋‘总统’、国民党不满的话。不然，他不会相信你的。”

李英涛连连点头，表示记住了。

此后，李英涛根据台湾特务机关的指示，一步步地去实施陷害殷海光的计划。

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殷海光在极其复杂的台湾社会里，与人打交道时就没有这样去考虑，也没有设防。因此，别人请他去作演讲时，他少了一个心眼，马上答应了。他没有想一想，50年代，台湾清华大学请他去作演讲时，就遭到国民党的阻挠，结果未去成。其后，国民党又下令台湾大学各院系，不准请他作演讲。进入60年代，他与蒋介石、国民党的矛盾更加尖锐，此时突然有人来请其作演讲，而且请者十分热情，满嘴颂词，这不是很不正常吗？遗憾的是，他太大意了。

当时，殷海光的高足李敖来看望他时，还提醒他可能有人作圈套，力劝他不要去演讲。李敖的善意和提醒，也未引起他的重视。

他如期到台肥六厂作了演讲。这一天，虽然听众到得颇多，场面也很热闹，殷海光讲得也极其精彩，却有数名特务混在其中，还有的在做秘密录音。

殷海光演讲完毕，李英涛以提问为名走到殷海光面前。他先作了一番自我介绍，然后就大骂蒋介石如何祸国殃民，如何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如何利用特务残害有正义感的民主人士。

李英涛的这一举动，果然取得了殷海光的信任，殷海光把他作为“知音”、“知己”，与他谈得津津有味，并把家里的地址告诉了他，还请他有空到家里坐坐。

此后，李英涛有事无事常往殷海光家跑，谈的内容，多是骂蒋介石、国民党。

李英涛每次从殷家出来，都要去警备总司令部汇报，警备总司令陈大庆也随时将情况报告给蒋经国。因此，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对殷海光吃“饵料”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急切希望殷海光早日上钩。

到了这一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大小特务都认为，陷害殷海光的第一步计划实现了，再就是实施计划的第二步——李与殷海光商量“除三害计划”。在他们正在商量“除三害计划”或殷海光在计划上留下了手迹后，就立即将其逮捕。

警备总司令部的这一步计划，得到蒋经国的同意。

1962年2月20日，李英涛急匆匆地来到台北温州街殷家。他一见到殷海光，就掏出一份警备总司令部代他草拟，然后由他抄写的《我为“国家”除三害的理由及决心》递给殷海光看，并要殷海光为他当“顾问”、“出计谋”。

殷海光一看，是一份暗杀计划，不由吃了一惊。他心里想：谋刺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可不是好玩的事。像李英涛这样的无业退伍军人，又单枪匹马，根本无法做成此事。更何况，明人不做黑事，搞暗杀这类勾当，不是君子所为。他望着李英涛，好半天不讲话，也不知如何是好。

李英涛见殷海光不作声，又对殷海光说：“殷教授，你不要害怕，也不要紧张。我李英涛身为7尺男儿，从小就想作大事，可一直没有机会，这一次有机会了。你要相信我一定能干成此事，杀不了3个，最少要干掉两个，为台湾人民除害，为中华民族立功。”

殷海光见他越说越狂，越说越离谱，更觉得不便讲话，两眼呆

呆地望着李英涛，一言不发。

李英涛以为殷海光还在犹豫，马上掏出一张他的全身照片说："殷教授，为了表示我的决心，我今天送一张照片给你作证、也算作纪念。"

这张照片反面有四句诗，其中两句是"生平所最慕，荆轲与子房"。殷海光看了诗，想起史书记载的荆轲冒死刺秦王的情景，顺口道："自古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

殷海光讲了这句话，李英涛以为是赞扬他的不怕死精神，便手舞足蹈地说："殷先生，我跟你讲，冒死为国为民的英雄好汉，我们燕赵之地代代不绝。我这次如能成功，可与荆轲齐名，永载史册。"

殷海光见李英涛的言语太没有分寸，对他有戒心了，直到李英涛离开，殷海光对他的计划和打算，不作任何表示。

大约过了两天，原常向《自由中国》投稿的作者、基隆市立第一中学英语教师胡虚一到台北来看殷海光。他们相识已有多年，并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

殷海光将李英涛来的情况告诉了胡虚一。胡虚一听后，甚为震惊，当即要殷海光将李英涛的《我为"国家"除三害的理由及决心》和照片拿出来看看。殷海光应允，并取出了李英涛丢在殷家的"计划"、照片。

胡虚一看了，当即向殷海光指出：这是国民党及其特务机关陷害你的圈套，李英涛百分之百是特务机关钓你这个大鱼的"饵料"，你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

胡虚一的提醒，使殷海光感到此事的复杂。他对胡虚一说："你未见过李英涛其人，他如再来，我想叫他到你那里去一趟，请你帮我进一步识别一下此人，行不行？"

胡虚一同意了。

殷海光此举，太欠妥当。他不知将李英涛这样的人介绍到朋友那里去，将会给朋友带来多大的麻烦，造成怎样的后果。

过了几天，李英涛到殷家来取“计划”，殷海光没有给，叫他先到基隆一中去见见胡虚一，对殷海光突然提的这一要求，李英涛未料到。他问为什么要到基隆去见胡虚一，殷海光说：“胡虚一先生是我的熟人，也可说是朋友，你到他那里去谈谈。”

李英涛见殷海光非要他去，只好答应马上去基隆。

他从殷家退出来后，又连忙去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请示，特务们经过一番研究，认为李英涛未从殷家取出《我为“国家”除三害的理由及决心》，只有去一趟基隆，并顺便观察一下胡虚一其人及胡与殷海光的关系。

1962 年 2 月底的一天，李英涛到基隆市一中找到了胡虚一。他一进胡虚一的房间，不顾在场还有旁人，就自我介绍说是殷海光的朋友，商谈“除三害计划”，并大骂蒋介石、蒋经国和陈诚，弄得胡虚一不知所措。

除此之外，李英涛还大肆吹嘘他过去在部队中的“光荣”经历和“呼风唤雨”的本领。

由于胡虚一对李英涛有所防范，加之对李的言行很反感，李在胡处呆了不到两个小时就走了。

通过短暂的接触和观察，胡虚一断定这个幼稚轻薄、狂妄虚伪之徒，不是正派人，十有八九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收买的陷害殷海光的打手。

胡虚一怕殷海光再上李英涛的当，当天就赶到台北殷家，向殷海光谈了对李英涛的看法，并一再提醒他在言行上要对李进行特别防范。

过了两天，李英涛又到基隆来找胡虚一。胡虚一一见到李英涛，一股厌恶感就油然而生。他忍不住地痛斥李英涛说：“李英涛，你的为人和找殷海光教授的目的，我已很清楚了。希望你的戏演到这里结束为好。我总觉得人生在世，应做好人，不要做小人，更不要做鬼。”

李英涛听了这几句话，心里又慌又紧张。他向胡虚一问道："你这是什么话？"

胡虚一怒气冲冲地说："我警告你不要做陷害人的打手。殷海光教授是名扬海内外的知名学者，也是这个岛上唯一敢与不平抗争，敢为民众说话的政论家、思想家。凡是有良心、正义感的人，哪个不尊敬、不佩服他？他没有侵犯你的任何利益，也与你无仇无怨，为什么要充当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打手去陷害他？"

李英涛感到，事情已经暴露了，一切都完了。他坐在椅子上无言以对，样子十分难堪。

胡虚一又教训了他一通后，对他说："我的教学工作很忙，再没有时间与你谈了，你赶快走！"

李英涛如丧家之犬，灰溜溜地离开了基隆市一中。

他回到台北，非常害怕胡虚一与殷海光通了气，使他取不回《我为"国家"除三害的理由及决心》，便又匆匆赶到殷海光家。

他一进入殷家，就慌慌忙忙地说："殷教授，'除三害计划'再不能迟疑，要赶快行动！"

殷海光问他为什么，他说夜长梦多，怕走漏风声事情办不成而引来杀身之祸。

他还说，他已备好了手枪，准备伺机行动。说完，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份《公告国人遗书》递给殷海光说："无论如何，'除三害计划'我干定了，为表示我完成此重大任务的决心，我起草了这个《公告国人遗书》。由于我的文化不高，有些道理、事实说不清，麻烦你帮助修改一下。"

殷海光看到这个东西，怕伸手去接，急中生智说："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放在这里，待我仔细看看再说。"

李英涛要殷海光马上动笔改。殷海光已察觉了李的用意，便借故说心情不好，没有精力修改，过几天再说。李英涛无法，只好尊重殷海光的意见，答应过两天来取。

李英涛将《公告国人遗书》丢在殷家的桌子上后，匆匆离开了。

殷海光仔细看了李英涛带来的《公告国人遗书》，考虑了老半天，想不出对付李英涛的办法。此时，他又想到了胡虚一。他认为，胡虚一过去在军中混过多年，有丰富的阅历和对付这类事情的经验。他给胡虚一写了一封30余字的限时专递快信，告知有事要谈，请胡虚一到基隆七堵火车站会面。

殷海光到达火车站后，胡虚一已在出口处等着。

他们找到一个偏僻无人的地方停了下来。殷海光戴上白手套，将李英涛的《公告国人遗书》递给胡虚一看，并请胡虚一出出如何处理此事的主意。

胡虚一看了《公告国人遗书》，发现上面有两处空着未写，一处是蒋介石、蒋经国、陈诚罪状下面，一处是要求释放张学良、孙立人、雷震一条下面，便问殷海光，此两处是不是留着他写，然后作"罪证"的，殷海光说肯定是的。

胡虚一给殷海光出主意说："蒋介石、国民党整人的手段卑鄙、毒辣，为了避免他们的迫害，你现在只有采取两个办法。其一，李英涛再来取《公告国人遗书》时，你一句话不讲，直接将《公告国人遗书》退给他。他如看到你在《公告国人遗书》上一字未改，心里就明白了，自然再不会来你家的；第二，不退还《公告国人遗书》，并告诉他，这个《公告国人遗书》要留着当资料用。同时，严正警告他再不可来家谈'除三害计划'的事，平时也不要来打扰你读书、写作。"

殷海光觉得胡虚一出的这个点子可采纳，而且也只有这么办。

胡虚一走后，李英涛就来了。

这一次，殷海光既不招呼他坐，也不给他倒水，直截了当地说："李英涛，我是一个做学问的知识分子，没有兴趣，也没有水平修改你那个东西。请你将《公告国人遗书》拿走。我读书写作很忙，你再不要打扰我了。"

李英涛以为，殷海光已动笔修改了他的《公告国人遗书》，没有

想到，他不但一字未动，而且还不准他再上门，这意味着陷害失败了。到这时，李英涛不得不撕去平时“极敬重殷教授”的假面具，露出其狰狞面目了。他对殷海光怒吼道：“殷海光，我今天算看破了你！你不帮我修改这个《公告国人遗书》，我也要你这个家伙没有好日子过！”

殷海光看着面前这个跳梁小丑的表演，没有理会。

李英涛气冲冲地离开了殷家。他走出温州街，想到任务没有完成，心里很不舒服。他站在街上细细一想，觉得陷害殷海光的目的未实现，全是胡虚一造成的，他恨透了胡虚一。

当天，他又赶到基隆市第一中学胡虚一处，对胡虚一大肆指责，胡虚一知道他的背景、来头，没有理会这条疯狗。

陷害殷海光没有成功，李英涛感到不好向警备总司令部交差，也对不起蒋家父子。他战战兢兢地来到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处，向刘醒吾谈了陷害失败的经过及原因。

刘醒吾听了，顿生怒火，大骂李英涛太笨，是饭桶，将手把手教办的事情弄砸了。他还说：“殷海光是蒋‘总统’和经国主任最痛恨的反动政论家。我们老早就要抓他，这次没有钓到他，今后再不好抓了。你这次失误，给党‘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

李英涛吓出了尿，身子不停地颤。他双腿往下一跪，又哭又叫道：“我没有干好，我有罪，我有……”

刘醒吾感到，此次陷害殷海光未成功，将无法向总司令、特务头目陈大庆和蒋氏父子交待，他当即下令将李英涛关押起来。这个卑鄙之徒，此次害人不但未得到重奖，反而入了牢房，他先前怎么也未想到自己会落得如此下场。

台湾警备总司令陈大庆听了刘醒吾的汇报，感到此案办得太糟，心里颇不高兴。为了出口气，他立即给保安大队下令，殷海光不好抓暂时放一下，先将识破这起陷害案的胡虚一予以逮捕。

1963 年 4 月 4 日下午，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大队出动 10

余名特务，将正在教学的胡虚一抓到台北西宁南路保安处质留室关押起来。

4月15日，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上校警察官严同晖以(63)警检诉015号起诉书，正式向军事法庭提起公诉。同日，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法庭以“非法之法，颠覆政府罪”，判处胡虚一有期徒刑7年，剥夺公权3年。

胡虚一从关押到判刑，直到服刑，受尽了折磨，眼睛也被整瞎一只。令人敬佩的是，胡虚一虽然冤在狱中，骨头却甚硬。他从不低头，也不向当局乞求，对殷海光也无任何怨言。他还时常担心殷海光的安全与健康。他还觉得，殷海光是台湾驱除黑暗的先锋与伟大斗士，了不起的英雄，为这样一位思想家受难、坐牢，是值得的。

1970年7月21日，胡虚一刑满出狱。他的义气与骨气，赢得台湾人民的尊敬与爱戴。有一次，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见到他时，得知他为殷海光的问题冤狱7年，心里即刻涌起一股敬佩之情，并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徐复观还紧紧地握住胡虚一的手说：“胡先生，殷海光先生了不起，你也了不起！”

1998年6月20日，笔者在湖北大学参加海峡两岸殷海光学术研讨会时，有幸结识了胡虚一先生，并与他在湖大招待所进行了长谈。在谈到他当年为殷海光坐牢一事时，他感慨万千地说：

> 我帮殷海光先生识破了国民党陷害他的阴谋，使国民党抓捕殷先生的计划败露，并落了空。他们再不好抓殷先生，就迁怒于我，将我抓进监狱，判处7年徒刑。可以说，当年如不是我助他识破了蒋氏父子陷害他的阴谋，殷先生肯定要入狱，而且还要判重刑。所以，我出狱后，殷夫人对我十分关心，一再嘱殷门弟子们要照顾好我。她每次回台湾，还带礼物来看我。现在回想起当年的往事，特别是我在人生最珍贵的青年时期，为殷先生坐了那么多年

牢，感慨就特别多……

听了胡虚一先生的叙述，感觉他确是个了不起的义士。他在人生最宝贵的青年时期，为殷海光的事坐了长达7年的牢房，而且工作失落，家庭难以建立，经济上的损失就更不用说了。现在，他已老了，头发也全部变白，其雄心壮志还在，决心写一部他与殷海光的书。笔者感到，他的牢虽然没有白坐，但他当年为殷海光受的苦难太大了，台湾的史书，应该为这位义士大写一笔。

胡虚一先生为殷海光坐牢，殷海光心里自然难受、内疚。奇怪的是，笔者翻遍《殷海光全集》，殷海光本人对此却未留一字记录，他自己写的一篇记叙国民党迫害他全过程的《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也未写此事。笔者推断：这中间可能有难言之隐。

到80年代，胡虚一在殷门弟子李敖及陈宏正先生的帮助下，先后在一系列文章中记叙并公开了此事后，台湾人民才得知当年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打击、迫害斗士殷海光时，还有如此黑暗的一幕。

24

殷海光饭前大骂蒋：天长日久身受损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指使其特务机关设计陷害殷海光失败后，殷海光感到国民党不会善罢甘休，还要想方设法迫害他。

他的政论文章很难发表，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方面。可是，他是一个责任感很强的知识分子，口里虽然常对人说，此后要集中精力写学术方面的书，少关注社会，行动上又做不到。来台湾的外国友人、朋友、学生一进他家的门，他又总是不自不觉地谈到了台湾社会问题，谈到了他很痛恨的蒋介石，对蒋

介石的胡作非为愤怒指责，大声痛骂。

1965年春，殷海光对蒋介石在政治方面的动向关注起来。依据他的观察，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的任期将满，他是否四次连任，应该有一个说法。

一天，原《自由中国》主笔、政论家夏道平先生来看他，两人谈起了蒋介石的任期问题。殷海光对夏道平说："蒋介石今年78岁了，老朽不堪，可他到现在未说再不连任的事情，看来这个老不死的东西要任到死才止。这个老独裁者如此舍不得交出权力，我看有两个目的：一是刻意培养蒋经国，将来把'总统'职位交给儿子。他可能觉得由儿子掌权，'中华民国'才不会灭亡；其二，他觉得权力很过瘾，很有味，舍不得交给别人。"

夏道平说："你分析得很对。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根据蒋介石的个性及为人，他有可能要在这个月底，放点风出来或对此事表个态。"

果然，1965年12月25日，蒋介石借出席"国大代表"联谊会的机会，就他第四次连任"中华民国总统"的问题，说了一些若明若暗的话。他说，"国家"现在面临"戡乱讨逆状态"，是战时宪政体制；"宪法"不易修改，战时宪政之运用，以"国家"安全为前提。

12月26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了蒋介石在"国大"联谊会上的讲话内容。

殷海光看到蒋介石的讲话后，很认真地作了一番分析。他自语道："夏先生说准了，蒋介石说'战时宪政之运用'以'国家'安全为前提，就是说台湾目前处在'战争状态'，是非常时期，'中华民国'的首脑，还是应由他继续做，只有他来做，才能保证台湾的安全，才能使台湾社会稳定。因此，他第四次连任，不存在违'宪'的问题。"

殷海光将自己的看法对一些相好的熟人、朋友讲了，大家都同意他的看法。他的熟人、朋友为了他的安全，都劝他在公开场合不要讲这类话，他听不进，仍不厌其烦地讲。

1966年1月1日，是新年的第一天，蒋介石为了给自己再次违"宪"连任找出新根据，挖空心思地搞了个《告国人书》。在这个《告国人书》中，他除继续宣扬"复国建国"、"根除匪祸"等陈词滥调外，又弄出一个新说法："今年为国民革命决定性关头"①。

殷海光在报上看到这个《告国人书》，非常愤怒，大骂道："蒋介石是个政治流氓，是中国第一不要脸的政客。他为了做'总统'，凭空乱想，搞出一个'今年为国民革命决定性关头'，为他赖在'总统'位子上找借口。这个假话，实际是他用来骗位子和权力的。我殷海光今年要眼睁睁地看看1966年是个什么样的'决定性的关头'！"

1966年2月19日，台湾当局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台北举行，大会应出席的"代表"为1488人，实际报到只有1446人。此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有二：其一为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进一步扩张蒋介石的权力，加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其二，选举"总统"、"副总统"，使蒋介石违"宪"连任合法化。

为蒋介石违"宪"永远连任并无限扩张"总统"权力而增订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在大会上通过，此条款共八条，其中第一条为：

> "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之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39条或第43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②

第三条为：

---

① 1966年1月1日台湾《中央日报》。

② 1966年2月20日台湾《中央日报》。

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之限制。①

第四条为：

动员戡乱时期，“国民大会”得制定办法，创制中央法律原则与复决中央法律，不受“宪法”第27条第2项之限制。②

增订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一公布，引起了殷海光的注意。他将此次“增订”的内容与上次大会修改的那个条款一核对，发现有两个变化：一是蒋介石的权力更大了，甚至大到无法无天，独裁到顶；二是为蒋介石永远连任开了绿灯。可以说，这个条例的通过，是台湾政治的大倒退。

一天，殷海光的两个学生来看他，殷海光与他们谈起了正在进行的“国民大会”，十分愤慨地说：“蒋介石这个人是贪得无厌的权力狂。他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与历史上的暴君、阴谋家如出一辙。”

两个学生问他为什么这样说，他说：“你们看，他每次在‘国民大会’召开前，就假惺惺地讲，不修改‘宪法’，要遵法守法，保持‘宪法’的完整性，可‘宪法’与他的利益发生冲突或对他的权力有阻碍时，他就打着‘戡乱’的幌子，搞个比‘宪法’还大的‘法’——临时条款，一方面‘宪法’不动，另一方面用临时‘条款’抵销‘宪法’对他的限制与约束。这次搞的增订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共计八条，有四条不受‘宪法’中的三个条款的限制，‘宪法’中的这四条对他不能限制。不能限制，就是不起作用，这个一再修订的‘临时条

① ② 1966年2月20日台湾《中央日报》。

款'比'宪法'还厉害、还重要。再说这戡乱,也是一件很可笑的事,他在大陆当'总统'时,就叫嚷'戡乱',可他七戡八戡,结果败得一塌糊涂,共产党被他越戡越大。他被共产党赶到这个岛上来苟延残喘,仍在狂热地叫喊'戡乱',而且还要靠美国人保护。这'戡乱时期',分明是蒋介石维护自己独裁的借口、幌子。蒋介石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窃国大盗!"

两个学生见他那么愤怒、恼火,一再劝他不要发火。他忍不住,一直不停地骂,到吃饭时,又骂了一阵。

后来,美国一学者来看他,他把这些骂蒋介石的话又重讲一遍,结果因太愤怒连饭也吃不进去。

1966年3月7日,国民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台北召开。

按照过去惯例,"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必须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进行内部提名推选,然后提交"国民大会"正式选举。

蒋介石心里很清楚,第三次连任时,国民党内就有一些人反对,有的虽然不公开反对,心里却很不痛快。要第四次连任,党内一定又有不少人反对。为了统一中央委员的认识,减少阻力,并在中央全会上顺利通过提名,非常有必要在全会上就自己第四次连任的问题作一次讲话。

下面,是蒋介石在国民党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一段讲话:

……这次会议,必须提名第四届"总统"、"副总统"为本党候选人,在提名之前,我曾经考虑到,今后6年期间,反攻复国业务,经纬万端,中正自知力拙才短,无以胜任,尤其是财政、经济方面,更不是中正所长,但个人自不能置身事外,推卸责任,故自愿专心致志于反攻革命的方针,与行动之指导。所以建议提名党内年高德劭,勋望素孚的同志为"总统"候选人,而以年事较轻,学验均优,而

有专长的同志副之；使个人得以总裁的身份，专力于反攻复国党务和军事的指导工作。惟是中央评议委员、中央委员诸同志，仍一致决议，并投票通过以中正为第四届"总统"候选人，中正基于党员的义务，革命的初志，以及对"国家"的绝续，民族盛衰，与革命成败，历史荣辱，自惟有遵从党的决定，接受征召。

……

中正虽已行80，鬓发苍白，但自信精神、体力迄未稍衰，今天不惟有信心，对反攻复国大计，保证我们已立于不败之地，而亦更有责任，保证在反攻进程中，可操必胜之权；领导本党同志、全国军队，一齐来赢得反攻复国的圣战，完成建国复兴大业……①

过了几天，殷海光在朋友处得知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讲话的内容。他当即对熟人说："蒋介石的讲话，全是言不由衷的鬼话。今后6年，哪有'反攻复国业务'？哪有什么'经纬万端'？他明明是不要老脸地赖在'总统'的位子上不下来，却说成'自惟有遵从党的决定，接受征召'。他已80高龄，老朽昏庸，体弱多病，活动明显减少，却隐瞒实情，讲出'体力迄未稍衰'的假话。他这样做，分明是揽权霸权，哪是为'国家'尽责任啊！"

殷海光还从蒋介石的"建议提名党内年高德劭，勋望素孚的同志为'总统'候选人，而以年事较轻，学验均优，而有专长的同志副之"几句话中，推断出蒋介石有传位于子的企图，他提到的"年事较轻，学验均优，而有专长"的人，就是指的蒋经国。他可能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一下子把蒋经国推到前台，故只有自己再违'宪'

① 李松林著：《蒋介石晚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6～317页。

连任下去。待时机成熟了，再把儿子公开浮出水面，弄到前台。

殷海光把问题看准了，可惜没有《自由中国》那样的文章园地，再无法把意见、想法公开发表出来，只有在家里大骂蒋介石"中正不正，卑鄙无赖！"

殷海光骂了一遍又一遍，一天又一天，有时吃饭也大骂一阵，骂得自己吃不进去饭，妻子、女儿见他生气，也食之无味。

他的妻子夏君璐见他时常在家骂蒋介石，劝他说："蒋介石是'总统'，你是一个教书的教授，那些在官场的官员不骂他，你骂他起什么作用呢？再说，你骂他，他又听不见，全是白骂的。你要这样下去，身体垮得快得很！"

他对蒋介石恨得咬牙切齿，妻子无论怎样劝也劝不住。

尽管殷海光知道生气对身体不好，骂蒋介石不起作用，但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把骂当宣泄仇恨的工具，击敌的武器，似乎觉得骂了之后，自己对"国家"和台湾人民才尽了责任。他不知，真正做大事的人，不会乱生气，也不会骂人的。

当时对蒋介石挑选谁为他的"搭档"做"副总统"，也是殷海光极关注的事情。由于蒋介石在此事上安有私心，"副总统"一职由谁出任，一度扑朔迷离，有的猜测是张群、何应钦，有的猜测是孙科，只有少数人说是严家淦。

到了3月10日，眼看国民党九届二中全会马上就要开始选举了，蒋介石才临时召集国民党中常委开会提出由严家淦作"副总统"候选人。由于蒋介石会前秘而不宣，选举日子到了才将名单提出来要大家举手通过，大家有想法或不同意，也不好或不敢反对。

严家淦的名字一公布，令许多政治观察家大跌眼镜，因为大家怎么也没有想到，蒋介石会要严家淦做副手。

此时，殷海光的头脑很清晰。他分析了严家淦的生平、从政经历，判断蒋介石突然把一个文弱书生，又无班底和政治企图的严家淦弄出来，显然是为蒋经国将来做"总统"过渡的。这样，既可使蒋

经国顺利接班，又可使自己不落传位于子的骂名。蒋介石此举，老谋深算，费尽心机。

他愤怒地说："蒋介石之所以败到这个岛上来，就是他从不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处处从私利出发。为了自己与家人的私利，他玩弄权术，搞小动作。这样的人，怎么能治好'国家'呢？蒋经国即使被他扶上了台，蒋介石必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骂的！"

以往每次开"国民大会"，蒋介石只宴请大会主席团成员、国民党中央委员，有时还宴请一些他认为能为所用的名流、知名人士，不宴请一般的"国大代表"。其原因是那时他任"总统"及连任一次，是"合法"的，他不怕"国大代表"不投他的票，故"国大代表"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并不高，所以，不需要拉拢、宴请。对"国大代表"们的冷暖、痛痒，他也从不过问。到了1960年，情况就不同了，他要违"宪"连任，有些人不满，公开表示反对他第三次连任，他有些紧张、担心了，便对"国大代表"关起心来，既指示"国民大会"秘书长谷正纲要办好会议期间的伙食，安排好交通、住宿，还许诺给他们解决工资问题。自此，从不拿工资的"国民大会代表"们，再不为衣食问题发愁了。

这一次，蒋介石要违"宪"连任，又必须经"国大代表"投票方才有效。"国大代表"们再无什么问题需要蒋介石解决，蒋介石便想出新招——宴请全体"国大代表"，以笼络人心，使代表们继续投他的票。

3月12日，蒋介石在台北设盛宴招待一千多名"国大代表"，并在宴会上发表了一番言不由衷的讲话，他说：

> 我本来希望国民党同志不要提名我为候选人，因为才德兼备，对"国家"人民有贡献的老同志很多。但是，最后大家仍然推我，我感到很惶恐。我今年已80岁，再连一任，仍不能反攻，怎对得起"国家"？此次"国民大会"，乃是

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我们必须把握时局发展的枢纽，俾完成历史的使命。此外，我本来希望民、青两党亦能提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可是他们很客气。一党提名，未始不是一种缺憾。

蒋介石的这番话，"国大代表"心里都清楚不是实情。但这些老朽们均被蒋介石拉拢、收买，他们只顾自己的一己私利，不顾台湾民众的意见如何，只要自己的薪水和"国大代表"的身份终身不变，蒋介石怎么说，他们都能接受，并纷纷在宴席上保证：为了"中华民国"的长治久安，一定投蒋介石的票。

蒋介石采取的上述步骤，为他第四次连任扫除了所有障碍。

1966年3月21日，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第四任"总统"。3月25日，"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蒋介石致祝词，他在会上一再强调要巩固"国权"，维护"法统"，开启"民主戡乱时期"，实行精神生活总动员，完成"反共复国"任务。

3月22日，殷海光在报上看到蒋介石的讲话内容，气又来了，他愤怒地扔下报纸，大骂道："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他为了永远做'总统'，带头违法，居然还叫喊'维护法统'，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反攻大陆'、'反共复国'的口号喊了十六七年，事实证明是骗人的鬼话，可他还在喊这些欺骗人的口号！蒋介石是当今中国第一不要脸的人！"

到1966年夏秋，蒋介石政权对殷海光的迫害一个接着一个，殷对蒋介石更痛恨了。他认为，他所遭受的不幸，都是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造成的，蒋介石不下台或不死，台湾难有生机，他的痛苦难以解除。

到了这年底，蒋介石在"戡乱"、"反攻"方面没有任何动作，台湾岛上的政治、经济状况，也面貌依旧。在外交方面，除了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到台湾访问了3天外，也无什么热闹看。

唯一稍能引起大众注意的事情是：12月26至29日，蒋介石在台北主持召开了一个国民党中央九届四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蒋介石说：全党人士于敌消我长、相激相荡的大好形势之中，要激励新的精神，奋发新的力量。根据蒋介石的意见，此次会议还通过了《改进本党组织适应战斗需要案》、《展开反共革命行动加速摧毁×伪政权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动方案》。

会上，调整了几名中央常委，新进去的五人，如胡健中、陈大庆、黎玉玺等，都是蒋的亲信。

殷海光看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九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及通过的三个文件，愤愤地说："蒋介石在年初的'国民大会'上说今年是'国民革命决定性的关头'，现在一年完了，没有看到一点'决定性的关头'的东西和动作，全体国民党党员、全体'国大代表'，全台湾人民非常失望，感到又被他骗了。他讲出的话兑不了现，收不了场，无法向人民交待，故又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搞了个自欺欺人的《展开革命行动加速摧毁×伪政权案》。"

此案虽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心里稍明白的人都很清楚，当年在大陆，国民党的力量那么强大，武器那么好，共产党力量那么小，武器是小米加步枪、长矛，蒋介石都无可奈何，现在这种状况，还能加速反攻？还能摧毁共产党政权？

此时的殷海光不知，一心想"反攻大陆"的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之所以说1966年是"国民革命决定性的关头"，并不断叫嚣要"反攻大陆"，"摧毁中共政权"，是因为他们抓住越战之机，于1965年制定了一个"CT—5"即《大火炬5号》"反攻大陆"的计划，而且认为此计划在美国的支持下，一定会成功。

《大火炬5号》反攻计划的主要设想是：拉住美国，并借美国的力量，以断绝中国援越线路，彻底解决越南战争为借口，与美国军队一道，从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五省登陆反攻，并一举摧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蒋经国还对美国要员们说，他父亲之所以选

择上述五省作为反攻登陆点，是因为中共在这些省份的军力较薄弱，他父亲在这几个省的威望比较高，老百姓非常支持他父亲的军事反攻。

为实现《大火炬5号》计划，蒋介石先后派夫人宋美龄、儿子蒋经国去美国联络、活动。1965年9月11、14日，宋美龄与美国总统约翰逊举行了两次会谈。在会谈中，宋美龄要求美方支持蒋介石政权"反攻大陆"，主动摧毁中国的核武器。

9月22日，蒋经国在美国会见了美国总统约翰逊、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彭岱等要人，要求美国政府支持台湾的《大火炬5号》计划，早日实现"反攻"，并将《大火炬5号》计划亲手交给了美国方面。

美国方面仔细研究了台湾方面制定的《大火炬5号》计划及摧毁中国核武器的建议，认为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方案不切实际，也不可能，摧毁中国核武器建议将危及自身的安全及利益，故决定不予支持，也不合作。

美方的决定，没有及时告诉台湾当局。而蒋介石还以为，美国会支持他们的《大火炬5号》反攻计划。只要有美国支持，反攻一定会成功。所以，他说1966年是"国民革命决定性的关头"。蒋介石的这一说法，既有即将与美国联合"反攻大陆"的期望在里面，也有为自己第四次连任找借口的因素。

由于得不到美国的支持，蒋介石的《大火炬5号》反攻计划胎死腹中。

美国政府不支持台湾当局的《大火炬5号》反攻方案，蒋氏父子非常恼火，也颇为失望。从此，他们对这个计划闭口不谈，而且守口如瓶。蒋氏父子狂叫了一二十年的"反攻大陆"口号，也成了一个历史大笑话。

不知何因，殷海光每到吃饭的时刻，气就来了。有一天，殷海光对着桌子上的饭菜大骂道："蒋介石不是个东西！他领导国民党几

十年，做了几十年的混账事！他在会上讲的那些话，作的那些决议都是自欺欺人！没有一样行得通！后人一定要大笑这个独夫民贼的！”

殷海光的女儿殷文丽见他骂得太吃力，扯他去吃饭，他不动，又继续骂：“大陆被蒋介石弄丢了，被这个独裁者残杀的人数以千万计。这个家伙败逃到台湾来后，不负任何责任，也不自杀，还厚着脸做‘总裁’、‘总统’！”

他骂个不停，导致胃部不适，饭自然也吃不进去了。他的夫人、女儿见他不吃饭，也索性不吃了。像这样饭弄好了因他生气骂蒋介石而吃不成，在殷家是常事。

据生理学家研究，消化系统对情绪的反应相当敏感。人一发怒，胃粘膜就充血发红，胃的运动加强，胃酸的分泌增多。久而久之，胃的功能就会被损坏，直至生癌，殷海光虽然研究哲学，修养却不到家，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苦乐问题也解决得不好，结果导致胃病上身，并日益严重，最后生癌。这是他的一大失误。

对殷海光在饭桌前骂蒋介石一事，殷海光喜爱的弟子、台湾著名学者、作家李敖在1998年9月台湾商业周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中，有过一段评述，而且至为精当。他说：

> 殷海光这种搞法，不是骂人之道，而是找死之道。他曾告诉我，他佩服的熊十力老先生最恨蒋介石，熊十力骂蒋介石，一边骂一边拿上有蒋介石照片的报纸，揉成一团，在自己生殖器下面擦，然后哈哈大笑，以化怒气。殷海光显然忘了老革命党熊十力的身教，结果一个高龄，一个短命，殷海光竟先被骂者而死。也许殷海光察觉出骂人时应该伴之以团报纸；但在饭桌前难以仿行，纵仿行成功，则得胃癌都将是女眷，因为他们“饭也吃不下了”。结论

是：殷海光舍己为人，自我牺牲，还是自己得了胃癌。殷海光生前对黄三说："我不想死，我要睁着眼睛看他们如何收场。"可是他不善养生如此，如何活得过敌人呢？①

殷海光饭前骂蒋介石，不但未骂倒对方，反倒使自己疾病上身。他的悲剧告诉人们：发怒如同虎伤身。人要做大事，首先要修身养性，境界要高，并要特别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保持乐观，不生气或少生气，否则，做不成大事。

① 李敖著：《李敖快意恩仇录》，台湾商业周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98 年版，第 299～300 页。

25

蒋搞谴责费正清运动：殷海光拒不参与

1966年12月20日，殷海光在《我怎样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一文中说：

> 本年上学期末，各校发现一种宣言，不知是哪儿来的。宣言的内容主要是批驳费正清等在美国国会的证词，说他们“助匪”、“犯罪”。照我看来，这篇文章可算官方雇佣文人的写作精华。彼等言论，完全是从一个政权的利益出发，罔顾世界大势。

其实，费正清等人的言论，意在保全台湾。台湾这个小岛，若不是美国第七舰队保卫（作者注：实为侵略），恐怕早在1950年被共产党攻下了，还有什么“反攻”空话可说？复次，这一宣言表面系“自由签名”，实际则为一“忠贞检查”。在台湾住了十几年的人，面对这一签名运动，心里都有数，如不签名将被疑为不忠于某党政权。这样的人将蒙种种不便，甚至有打破饭碗的危险。在台湾这种形态的绝对主义的统治之下，谁不怕麻烦？在台湾这个饭碗难找的岛上，谁不怕打破饭碗？于是而有1400位文化工作者签名的盛举。我因为一方面认为那一宣言的内容幼稚可笑，另一方面我尤其憎恶那种“间接强迫”的准××作风，所以拒绝签名。后来校方一高级党务人员亲自来舍劝签，仍然被我拒绝！

于是，多年累积的问题爆发了！①

上面这段文字，是殷海光写的国民党逼迫他签名谴责费正清一事，因篇幅有限，系长话短说。此事的经过，相当复杂。而要将此说清，必须从费正清说起。

费正清生于1907年，早年曾在美国驻华机构任过职，此后长期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并长期研究中国，及中国文化区域（包括越南、朝鲜、日本），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协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职。在几十年的教学、学术生涯中，费正清利用中国历史资料和亲身考察得来的体验及独特的视角研究中国，硕果累累，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影响巨大，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中国通”和研究中国的权威专家。

50至60年代，费正清多次到台湾考察访问，并与台湾各界知

① 《殷海光全集》第10卷，第307～308页。

名人士有接触。

1955年上半年，殷海光应美国国务院之邀，到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期半年的考察访问时，大部分时间就住在哈佛大学。在哈佛期间，殷海光与费正清有较多的接触，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殷海光回台后，费正清虽未与殷海光通信，却常通过访台人士，代问殷海光好，殷海光也常惦记着费正清。

应该说，殷海光、费正清都是做学问的人，他们之间的交往，属学术性质的交流，他们在谈话中虽然常论及美国与台湾的政治，也纯系书生之见。

1960年6月初，费正清夫妇到温州街殷家看望了殷海光，并作了长谈。交谈的内容，亦多与学术有关。

6月10日中午，自由中国杂志社宴请了费正清夫妇。参加宴会的人，除《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外，还有著名非国民党人士成舍我、齐世英、高玉树、吴三连、李万居、夏涛声等。殷海光此次以《自由中国》的主人、费正清的朋友的双重身份参加了宴会，并在宴会上与费正清作了交谈。

1964年，费正清再次到台湾。在李敖的陪同下，专程看望了殷海光，随后，费又在南港请殷海光与李敖吃了饭。

殷海光在受蒋介石迫害的日子里，费正清伸出了援助之手，经济上对殷海光作过一些帮助。平心而论，他们之间的这些交往，纯属个人友情，在政治上没有任何企图和目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对费正清与殷海光的交往，就不这么看了。

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署后，美国取代法国干涉越南事务，支持吴庭艳集团镇压南方人民的反独裁斗争，阴谋变越南南方为其殖民地和军事基地。1959年，南方人民开始武装斗争。1960年底，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武装斗争蓬勃发展，美国的军事侵略遭到越南人民的沉重打击。

1961年，美国根据"斯特利泰勒计划"，在越南南方建立了许

多“战略村”，并发动所谓的特种战争，企图在1962年底以前的18个月内“平定”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1962年4月，“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成立，指挥南越傀儡军作战。南方人民在北方人民的支援下，积极开展游击战，变“战略村”为打击美伪军的战斗村，使美伪军陷入泥潭。1963年，美国开始执行两年内“平定”南越的约翰逊“麦克纳马计划”。12月，南方军民在平也战役中取得了胜利，美国特种战争计划宣告破产。毫无疑问，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得到了中国人民强有力的支持。

为挽回败局，1965年2月，美国政府宣布对北越实施全面轰炸。7月28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宣布将侵越美军增至12.5万人，年底将增加到19万人，并将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的军队拉入越南战场。

由于美国发动的这场侵越战争系不义战争，不仅给越南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和牺牲，也给美国人民带来很大的不幸，并使美国政府背上沉重的包袱。因而，美国国内掀起一股巨大的反战浪潮，还有人为此自杀，要求政府尽快结束这场损失和伤亡颇大，又没有任何意义的战争。同时，检讨对华政策。

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是主张停止越南战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接触最力的政治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在美国国内作了许多活动。

在美国人民和部分国会议员、参议员的强烈要求下，约翰逊政府决定广泛听取各界人士意见，寻找结束越南战争的办法，研讨对华新政策。

1966年春末，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对华政策听证会上，费正清等一批对中国和东南亚问题有较深研究的专家、学者受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之邀，到参议院作证。

费正清等人未出席听证会前，富布赖特就对他作过交待，要他

在听证会上讲明白自己的观点，要说真话、直话，不要有什么顾虑。

费正清等人听从富布赖特的意见，在会上作证时，讲了一些真话。他说：1949年后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10余年的建设，各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在世界的地位有了提高。中国是一个大国，有数亿人口，它能够自行解决一些面临的重大问题，发展又很快，美国不应孤立中国，应该与中国进行接触。与中国接触，不会对美国构成任何威胁，还可帮助解决越战问题。

当时，富布赖特还希望费正清与另一学者鲍大可讲一下越南问题。他认为，美国的对越政策与对中国的政策一样，同样是有失明智和考虑欠周的，应该改变对越政策。由于费正清考虑美国的党派斗争太激烈，怕自己的讲话被国会的一些政客用来作为反对政府的口实，不愿把话题从中国转到越南。

为这事，富布赖特参议员后来还责怪费正清没有清楚明白地讲明白自己的所有观点，未把越南问题讲一讲。费正清后来一想，觉得富布赖特讲得有道理，答应以后再找一个机会讲讲越南问题。

费正清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作的证词，经新闻媒体的报道，迅即传遍全球。

费正清没有想到，他这次未提台湾一句话的作证，竟惹恼了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并使蒋氏父子坐卧不安。

蒋介石仔细看了外电关于费正清在美国参议院作证的报道，立即令儿子蒋经国和主管宣传的大将陶希圣到他的办公室，商讨如何在台湾开展反对费正清言论的活动。他对蒋经国和陶希圣说："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讯号。费正清能到参议院作此证，说明美国政界中有亲中共的分子，没有亲共分子请他，他进不了参议院。我知道费正清这个人，他是个中国通，也很倾共，大陆山河易色，他是有责任的。他这次到参议院作的证词，完全是一派胡言，对共产党有利，对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将产生负面影响。我的意见，你们与新闻局、国防部商量一下，弄一个公开谴责费正清的信，再在美国找一

家影响大的报纸登出来。同时，台湾的报刊，也要发表反对费正清言论的文章。还可叫谷正纲以'国民大会秘书长'的身分，给富布赖特参议员写一公函，要求他放弃或改变与中国大陆缓和关系的看法，对中共勿抱幻想。另外，叫谷以全体'国大代表'的名义，弄一封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经国、陶希圣非常赞同蒋介石的意见。

蒋经国当即与陶希圣面商如何写谴责费正清的公开信的问题。两人商量的结果是：公开信，由蒋经国在"国防部"组织人办，台湾报刊发表反费文章的事，由陶希圣负责。

蒋经国根据其父的指示，在自己掌控的"国防部"专门召开了小型秘密会，研究如何写谴责费正清的公开信的问题。蒋经国认为，费正清是美国学界人物，名声也在学界，谴责他，也应找学界人物，这样就比较有力。会议决定此事由"国防部"负责政战工作的曹敏出面找"立法委员"胡秋原和郑学稼、徐高阮具体商量一下，最好由胡秋原起草公开信。然后，由台湾的知名人士及所有中高级知识分子在上面签名。

他们觉得，这样做，可显示台湾所有知识分子都反对费正清在美国参议院的证词。

蒋经国、曹敏选中的三人，胡秋原、郑学稼本身是国民党员，徐高阮公开身份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无党无派，其实此公背景相当复杂。他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后变节。去台后，一直与特务机关的关系十分密切，与台湾当局的"国家安全局"、调查局、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大小头目打得十分火热，并为他们提供情报，充当打手。

胡、徐、郑三人听说此任务是蒋氏父子交办的，积极性甚高，很快弄出了一份《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此信指责费正清在美国参议院、国会等公开场合，不分清红皂白，为共产党唱赞歌、作宣传，丑化"自由中国"，希望美国人民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不要听信

费正清的谎言。信中还说，亲共姑息政策危害反共前途，希望姑息分子不要与虎谋皮，姑息是自撤藩篱，开门揖盗。目前，大陆经济混乱，内部倾轧，与之建立联系的主张十分荒谬，后果不堪设想。

此公开信弄起来后，蒋氏父子一面指示新闻局派人到美国，与《纽约时报》洽谈发表公开信的事宜，一面组织全岛中高级知识分子在此信上签名。

由于《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是蒋氏父子叫弄的，来头太大，国民党各级党部大力动员一些中高级知识分子签名时，大家知道此信的背景和来头后，害怕惹麻烦和丢饭碗，多在上面签了字，有的是叫人代签的，还有的是盗用他人名字签的。

不过，国民党无论是用什么手段叫人签字，有一点他们却特别看重，那就是极力动员认识费正清或与费正清是朋友关系的人签名，他们认为这样谴责就更有力，产生的影响会更大。

在已签名的1600名中高级知识分子中，与费正清个人关系相当好的台湾文化界名人、台湾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研究院第七届评议员李济排在头名。据费正清在后来出版的《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说，李济到美国富兰克林看费正清时讲，他并未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他是此信在美国公开发表后才看到自己的名字的。

按李济的说法，李济签名，并排在1600名中高级知识分子的第一名，显然是国民党做的手脚。

1998年9月，殷海光的学生、著名作家李敖在台湾商业周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谈到了这件事，他说：

> 据1966年7月3日《联合报》，当时新闻局长沈剑虹曾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报告施政说："国内学人教授1600余人驳斥美国姑息分子费正清之流的谬论，曾于5

月发表《致美国人民一封公开信》，已由新闻局译成英文，现已洽妥《纽约时报》，于近日内连同签署者1600余人名单在该报刊登。”可见国防部总政治部黑势力之大，大到可以自行作业，然后叫行政院新闻局到美国报上买广告的程度！胡秋原说他们“写一封对美国人民的公开信，结果有一千数百人签名的公开信在《纽约时报》发表，一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事实上，“一时发生相当大的”，不是影响而是丑闻。因为1600余名“国内学人教授”的众口一声，适足反证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被强奸。正因为是被强奸，所以失格的学人教授们，也就乱签一气，1600人中，因为各校兼课而见名就签，以致光签名重复的，就有6起之多！其中朱建明、董世初、何静安、郑小杰、卢英权、林碧沧诸教授，大名都出现两次，如此丑闻，真是今古奇观也！①

前面已提到，费正清与殷海光的关系较好，而且交往较多。因此，国民党中央党部、“国防部”的大小党工、大小特务对殷海光签名看得很重，希望他能在公开信上签名。

1966年5月的一天，台湾大学一教工受国民党和特务机关之托，将《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送到殷海光手上，要殷海光签名。

殷海光仔细看了“公开信”，感到蒋介石政权此做法幼稚无知，荒唐可笑，拒绝签字。

台大教工不解地向殷海光问道：“已有1400人签了名，你怎么不随大流呢？”

“我不随大流，这个字不能签。”

---

① 李敖著：《李敖快意恩仇录》，第281页。

“为什么?”

殷海光说:“我认为,人家是个学者,他在自己的参议院、国会上怎么说,说什么,这是他的自由,我们无权谴责。在美国的报刊上公开刊登此信,无什么作用不说,而且还要闹笑话。如果美国人损害了我们的‘主权’和利益,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一个有数十年历史的国民党,公然在岛上搞诽谤、谩骂人家的签名运动,不怕人家讥笑吗?”

“殷先生,你还是签……”

“在国民党没有向我说明为什么要签名的原因之前,我坚决不签!”

这位教工急得没法,怕回去不好向国民党及特务机关交差,只得向殷海光直说:“你要看远些,过去的事情不要计较了。你如坚决不签,上面又要说你不与党‘国’合作,他们今后要对你另眼相看的。”

殷海光说:“另眼相看我不怕。我已知道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将我打入了另册,我也知道蒋‘总统’恨我极了。我今天即使在这封公开信上签了名,当局也不会解除对我的监视、盯梢。所以,签不如不签!”

教工见难以说服殷海光,拿着签名信快快不乐地走了。

国民党中央党部得知台湾大学中高级知识分子中,只有殷海光未签名,连忙给台大校党部主要负责人打电话,要求他们再去找殷海光做工作,一定要殷海光签字,并说如果殷海光签了名,此公开信的效果要好得多。

过了两天,台大校党部主任又特地来找殷海光。他一进入殷家的门,笑眯眯地,而且又十分热情地叫道:“殷教授,你好!”

凭感觉,殷海光已知道这位主任是来干什么的。他随口答道:“好啊!”

校党部主任与他闲扯了几句后,才言归正传:“殷先生,这次全

岛知识分子都在《公开信》上签了名，你为何不签呢？要知道，这是你与'政府'合作的一次极好的机会呀！"

"我是一个教书之人，主要任务就是做好教学工作。'政府'要谴责费正清，那是'政府'的事情，我也没有反对、阻止。有1400人签了名就可以了，少我殷海光一人，没有什么问题。"

校党部主任听了，很不高兴地说："殷先生，你是知名人士，名气大，如不签名，'政府'不好看，台大不好看，所有文化、教育界人士也不好看，'中华民国'也不好看。"

殷海光听到这些花言巧语，非常气愤。他严肃地说："我的前半生经历，你们都知道，近10年在台湾的情况你们更清楚。我之所以不愿在这个公开信上签名，是因为我有我的想法。我与费正清虽有接触，但多是谈学术。他在美国发表的言论，我一概不知，他和鲍大可在美国参议院的证词我也没有听到，也没有见到，他作证的动机、目的，我也不清楚。这封信是谁策划的，哪个执的笔，我更不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会盲目地，不负责任地随便签名呢？再说，我在美国、日本、香港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是做学问的人，有的既认识我，也认识费正清，我不明不白地签了名，朋友们要讥笑我殷海光是没有头脑的人。"

"不是有1400人已签了名吗？"

殷海光很干脆地说："他们签了我也不签。他们走他们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殷先生，"校党部主任冷笑道，"俗话说，人随王法草随风。你这样偏激、固执，不随大流，不听'政府'的话，将要吃很大的亏。"

"我已想过了。无非是对我进行政治迫害。迫害的形式不外乎三种：其一，派特务暗杀；其二，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其三，解除公职。但你们国民党也要想一想，我是一信仰和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用上面三种办法整我划不划得来，会不会落骂名，后人对此将作何评价。"

校党部主任见殷海光如此强硬，气得直咬牙，但又无可奈何。过去，他常听人说殷海光脾气大，性格怪，不随波逐流，他还有些不相信，通过今天的接触，方知人们传说的一点不假。对这样的人，仅靠劝说、做工作是不起作用的，非得采取强硬措施才行。校党部主任想到这里，站起身恨恨地说："不听人劝，必有祸患。我要说的话已讲了，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我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殷海光很不客气地将国民党的这位主任逐出了家门。

国民党台大校党部主任回去后，气恨难平。心想：这个家伙已成为一极端分子，"政府"应给点颜色他看看。不然，他还要更加猛烈地反对蒋"总统"，反对党"国"。想到这里，他拿起电话，将殷海光不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情况分别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经国作了汇报。

蒋经国放下电话，心绪万千。原来，想搞个反对费正清的千人签名运动，并把费正清特别看重的殷海光拉进去，给费正清、鲍大可之流重重一击，遏制美国涌现的一股亲中共的潮流，没有想到这个家伙根本不买账，拒不签名。看来，要想办法狠狠地整他一下，不然，他不知"政府"的厉害，不知我蒋经国的厉害。

蒋经国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蒋介石，得到蒋介石的赞同。因为，蒋介石早就恨透了殷海光。

蒋介石还特别提醒蒋经国，殷海光是反共理论家，有名气，对付他这样的人，要有策略和技巧，不能简单地用"涉嫌叛乱"、"匪谍"的办法对付，弄不好，将适得其反。

蒋经国点了点头，胸有成竹地说："我记住了。"

不久，蒋氏父子指使胡秋原、徐高阮等人弄的《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由"行政院"新闻局局长沈剑虹找人译成英文，然后，派人到美国纽约，用重金在《纽约时报》买一版面，以广告的形式全文发表。

此公开信发表后，台湾国民党的报刊又纷纷连续报道。国民党指示各级机关、学校、团体以至军队召开各种会议，愤怒声讨、谴责费正清、鲍大可。国民党的一些官僚、文人还说，当年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费正清有一半的责任，他现在又极力主张与大陆共产党接触，其阴谋就是搞垮台湾。

尽管蒋氏父子把反费运动搞到了美国，却丝毫未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运作。费正清、鲍大可仍不停地在白宫、国会、参议院的政要中进行游说，要求美国政府结束越战，改变对华政策。因为，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这样做，将给美国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害。

对国民党在海外掀起的这股反费风潮，台湾大多数中高级知识分子随声附和，只有殷海光不签字、不谴责、不参与。此事过去几十年了，再回头去看当年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搞的那场十分可笑的反费运动，人们不得不佩服殷海光的智慧与胆识。

殷海光去世后，蒋氏父子在台湾搞的反费运动也大白于天下。费正清与人一谈起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殷海光顶着国民党及其特务机关的巨大压力，拒不签名谴责他的往事时，称赞殷海光威武不屈，敢于抗拒极权的大无畏精神。

26

殷海光申请离台：蒋介石下令阻止

1967年8月，殷海光被国民党整出台湾大学。国民党此举，目的是要殷海光与青年学生隔绝，使他的思想难以影响青年学生。

殷海光被赶出台湾大学不久，蒋介石就下令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派特务对他进行监视，殷海光一出门，特务的吉普车跟在其后，他的夫人、女儿外出，特务也进行跟踪，出进殷家的人，守在巷口的特务要一一进行盘查登记。

他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自由，再不想在台

湾呆，便向台湾当局的出入境管理局打了申请报告，要求去美国做研究工作。

他已被国民党特务机关记录在案，又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最头痛、最痛恨的人，特务机关早就将他列入了“黑名单”，并送给了出入境管理局。出入境管理局官员看了殷海光的申请，作不了主，连忙打电话给警备总司令部，问如何处理殷海光去美国的问题。

警备总司令部一特务头目答复说：“殷海光的问题，任何人作不了主。他是‘政府’控制的重点对象，没有蒋‘总统’和蒋经国的指示，不准他离台。”

出入境管理局得到这样的答复，便把殷海光的申请打入冷宫，既不批准他离台，也不告知是何原因。

殷海光见一月未批，又等一月。等了两月没有回音，便叫一学生去打听是什么原因，出入境管理局的官员不作任何回答。

1967年初，殷海光将自己不能离台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在美国、香港的朋友、学生，引起弟子们的重视。不久，殷门弟子们一面在香港聚会，商量解救殷海光的办法，一面在海外报刊上写文章揭露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台湾采用各种手段迫害殷海光，并不准他到美国进行学术研究的卑劣行为，弄得蒋氏父子十分难堪。

使惯了打拉手法的蒋介石接连受到外界的指责后，感到对殷海光的处理有些失当。他当即召集心腹陶希圣说：“外面对殷海光的事有些舆论。最近，我对此事考虑了一下，对他，我们是打多劝少，有些不平衡。他是个文人，对这样的人要进行帮助、劝说，你是否与中央党部的人商谈一下，派人到殷海光家里去好好与他谈谈，通过帮助、谈话，他也许有所变化，也不再要求去美国，他如不与‘政府’为敌，对他的管制可放松一些。”

前面已经提到，陶希圣原是殷海光的上司，又系同乡，在对待殷海光的问题上，他的心情甚为复杂。从政治立场上讲，他们早已分道扬镳，不是一条线上的人。从心里讲，殷海光及《自由中国》杂

志与国民党、蒋介石出现裂痕甚至决裂，他感到很痛心，甚至很痛恨，但从家乡人这个角度讲，也希望殷海光不要滑得太远。他非常希望国民党能把殷海光重新拉回来，至少不要成为国民党、蒋介石的敌人。所以，蒋介石要他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高级党工们派人上门对殷海光进行"帮助帮助"时，他是极力赞同的。

陶希圣马上与中央党部的高官们作了密商，并决定派几名高级党工到殷家。

1967年的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两名高级党工坐着一辆豪华小轿车驶向台北温州街小巷。车一停，两名党工直奔殷家。

国民党此举，殷海光未料到。两名高级党工进入他家并作了自我介绍后，他吃了一惊，心想：我已被你们赶出了台湾大学，文章未写，任何活动未参加，工作、生活无着落，还来找我干什么？

两名高级党工在客厅坐下后，一年龄较长的党工打着官腔，神气十足地说："我们是奉蒋'总统'之命来的。"

"找我干什么呢？"

"与殷先生谈谈心里话。"

殷海光不悦地说："我是路边石头众人踢，再加上你们的特务日夜监视，有什么好谈的啊！"

另一党工见殷海光很不高兴，便直接了当地说："殷先生，我们今天是奉命和你谈谈心，也可说是对你进行帮助，你不要生气。我们如谈得好，你的思想、态度如有转变，对你会有好处的。"

殷海光一听到说"帮助"、"好处"，非常恼火。心里想：你们国民党已把我整成这个样子，还来说什么"帮助"、"好处"，卑鄙！可耻！

他不冷不热地对两名党工说："我现在只想在家里读点书，什么要求也没有。不必，也不需要你们帮助，更不想得到你们的什么好处。"

年龄较长的党工将椅子拖到殷海光身边，故意做出很亲近的样子说："殷先生，你是心里很明白的人，怎么不知'听人劝，得一

半'的古训呢?"

"我有自己的信仰,为人、处事的方法也与一般人不同,不需要人劝。"

"殷先生,"年龄较长的党工继续说,"你的为人和品行我们已知道,我们之所以来帮助你,是因为党'国'还要借重你,希望你忘记过去,好好与我们国民党合作,与蒋'总统'合作。"

殷海光一听到"合作"两字,火冒三丈地说:"你一说合作,我的气就来了。当初,我并未想到要来台湾,蒋经国一再劝我来。我初到台湾时,很想做点事,后来看到当局越来越不像话,便离开了国民党阵营。古今中外的政府,在治理国家过程中,不可能没有闪失,问题是怎样对待闪失。我抱着爱'国'、尽责的心情,写了一些批评时政的文章,希望'政府'努力改正闪失。如果这个'政府'真是以民为上,替民负责,应该给我重奖。可是,以蒋介石先生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把我的批评当作是抹黑、攻击、丑化,将我当作大敌,并不惜动用党、政、军、特,对我这样一个书生进行陷害及各种迫害,一步步地将我往绝路上逼,我现在已走投无路,这叫我怎么与你们合作?叫我怎么信任蒋'总统'?怎么信任你们国民党?"

"还是可以合作,比如不到美国去,到教育部去任研究委员。"

"如果美国去不成,我在台湾任何地方都难以生存,只想隐在家里读书。"

那位年龄稍轻一点的党工又说:"台湾只有这么大,怎么隐得住呢?现在长草短草一把缠,不说其他的,只希望殷先生与我们合作,为'反共复国'大业作贡献。"

听到"反共复国"几个字,殷海光想起1957年在《自由中国》上写的《反攻大陆问题》社论,引起蒋介石的愤怒和国民党长期围剿的往事,心里火了。他敲着茶几说:"还谈这些干什么?'反攻大陆'、'反共复国'能不能成功,你们自己清楚,我也清楚。过去,我在这个问题上说了真话、直话,你们容不得。你们国民党上上下下跟

蒋先生一个口径，说‘反攻大陆’五年成功，现在过了三个五年，成功了没有？你们看到‘反攻大陆’的诺言兑不了现，又把口号改成‘反共复国’，继续欺骗愚弄台湾人民。你们‘反共复国’是假，想恢复失去了的权力和利益是真！”

“殷先生，你……”年龄稍轻的党工十分难堪。

殷海光余怒未消地说：“你们快走，我永远不会与你们搞什么合作的！”

两名高级党工没有法，只得离开殷家。

蒋介石以“帮助”、“劝说”为名拉拢殷海光的阴谋，遭到彻底失败。

1967 年 4 月底，殷海光在学生李敖等的帮助下，检查出了胃癌，5 月 1 日在台大医院做胃切除手术，5 月 14 日出院。

此次手术虽然暂时缓解了痛苦，殷海光心里很清楚，要真正控制住病情，只有离开台湾去美国，换个生存环境，一边工作一边治疗，才能多活几年。

他活动自如了，又积极筹备离开台湾的事宜。他再次向台湾出入境管理局递交了去美国的申请。

蒋介石、蒋经国很快知道殷海光又作了离台的申请。他们父子又给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下了指示，要“警总”给出入境管理局再次打招呼，不准殷海光去美国。

蒋氏父子要狠狠整一下殷海光。至于此事将会给国民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后人对此怎么评判，他们父子都没有去想。

1967 年 5 月底，在美国著名学者屈莱果、欧伟达等的帮助下，美国哈佛大学正式发函，聘请殷海光为该校研究员。殷海光接到聘书，去美国的心情更为迫切。

平时，他不巴结权贵，与国民党要人如陶希圣、张道藩、袁守谦、王世杰、杭立武等人虽很熟，但除了在一些纪念会、座谈会上见了面才打个招呼外，平时很少与他们往来。

这一次，他要离台，感到不找一些要人到蒋介石面前去疏通，就去不了美国。所以，他除自己低头去找了一些要人外，还四处托人到蒋介石面前说情。遗憾的是，他找的国民党要人及所托的人，表面上虽然答应他了，实际上都不敢去向蒋介石说情，因为他们知道蒋介石对殷海光很恼火，害怕在蒋介石面前提殷海光的事情。真正在蒋介石面前谈过殷海光离台问题的，只有少数几个人。

殷海光的学生李敖与国民党一些要人有关系，殷夫人夏君璐曾专程去找过李敖，要李敖去找国民党某要人，李敖很卖力地为殷海光作了活动，这位国民党要人也在蒋介石面前为殷海光说了话，蒋介石对此事不作声。蒋介石不表态，殷海光就休想离台。

李敖后来给殷海光写了一封信，谈了他找人说情的经过及感想，信全文如下：

海光老师：

寄上6月11号国民党《中央日报》消息一则，给你参考。

我还向有关方面暗示（等于明示）：还是把殷海光放走罢！逼人走绝路（生活困难）乃至抓人关人，是没有效果的，如果有效果，我们今天也不会在台湾了（过去在大陆，这套方法还用得太少了吗？可是效果呢？）。殷海光一类人（包括李敖之流），到了国外，当然不会说"政府"什么好话，可是他们到了国外，本人就该是台湾政府有自由的最好人证！就凭这点人证的资格，这个"政府"就值得做，并且划得来，得可偿失，值回票价！

总之，你能否走得成，完全要看他们智慧的高下，他们高或肯高，你就走了；否则的话，还是老局面，吾们是殉葬者而已，呜呼哀哉！

敖之

1967.7.12①

此后，又有几位国民党要人在蒋介石面前提到殷海光离台去美的事，蒋介石仍一声不吭。显然，他不同意放殷海光走。

一个"总统"管着一个大学教授的出入，这样稀奇的事，唯独台湾才有。

后来，蒋介石见总有人为殷海光说情，非常后悔当初没将他与雷震一起抓进监狱。蒋介石心想：这个家伙的嘴和笔太厉害了，让他去美国，如同放虎上山，他会大肆攻击自己和党"国"。对付他的最好办法，是把他稳在台湾。

蒋介石立即命人将新上任的警备总司令刘玉章召来，密谋如何处理殷海光的问题。

刘玉章很快来到了"总统府"。蒋介石问他："听说台湾大学的殷海光又写了去美国的申请，你知不知道？"

刘玉章答道："知道。"

"你们有何意见？"

刘玉章说："陈中将大庆先生离任时，专门向我谈过殷海光的问题。我认为，殷海光这个家伙长期与党'国'为敌，对'总裁'也多有不敬，不能轻易放走他。"

蒋介石皱着眉头问："我们说他不好，人家美国哈佛大学把他当宝贝。他们一听说殷海光离开了台大，并不愿到教育部，马上发聘书聘他为研究员，人家聘他去做研究工作，不放他，说得过去吗？"

"这……"

蒋介石见刘玉章说不出意见，心里大不悦。心想：他与前任总

① 李敖著：《千秋评论丛书》，第158～159页。

司令陈大庆比起来，还有一定的差距。陈大庆对各种类型的反对党“国”的不良分子，对付得很好。这刘玉章带兵冲冲杀杀很行，叫他处理比较棘手一点的政治案子，就没有经验了。看来，他是一个不怎么精通政治和权术的武夫。蒋介石想到这里，将秃头往后一仰，慢吞吞地说：

“你这个总司令不称职啊……”

“是不称职，总裁！”刘玉章说这话时，心里又慌又乱。

过了一阵，蒋介石又说：“听人讲，殷海光在台大的教职解聘后，香港、美国的一些学者和他的弟子纷纷为他打抱不平，指责我们迫害知识分子。还听说，他的朋友、弟子在香港搞了一次聚会，商量解救他的办法。看来，这件事弄复杂了，你们千万不能麻木，更不能把它不当一回事。”

“总裁说的极是。”

蒋介石又说：“殷海光不是一般的教授、学者，如放出去，那太便宜他了，对党‘国’也很不利。因此，不能放他走，而且这一关要卡死，你再派人与出入境管理局的有关人员把此事协调好。”

刘玉章连连点头说：“一定按‘总裁’的指示办。”

蒋介石接着说：“他不是不愿与‘政府’合作吗，不愿到教育部去吗？我考虑还是让他呆在台湾大学。对外就说不是‘政府’不要他去美国，而是台湾大学离不开他。这样，我们不放他走就有理由了，也堵住了美国、香港一些人的嘴巴。”

“台大已解聘了他，那怎么……”

“再补发一个聘书嘛。不过，此事要向台大校长钱思亮交待清楚，为防止殷海光再在学生中散布毒素，影响青年，殷海光的课表照贴，但不要他授课，也不准他演讲，只做个名义上的教授。”

“我马上去办。”

这样，殷海光成了台大，也成为台湾唯一一个因政治原因不能上讲台授课的教授。

此后，殷海光与夫人夏君璐虽然又找了许多人去活动，自然无什么结果。只是他当时还不知道，是蒋介石亲自下令不准他离台去美国的。

尽管他已知道国民党不准他离开台湾，他仍未放弃去美国哈佛大学的想法。他觉得，他在美国有学生，在政界、学术界有朋友，通过他们的关系给蒋介石集团施压，也许还有希望。

不久，他给在美国的学生写了一封信，要求这位学生为他去美国帮忙。他将自己近年来的处境和病情介绍了之后，在末尾写道：

> 现在，我把我来美事构想的程序写在下面。
>
> 第一步，请人写信（给台湾当局），越多可能越有力，这一步，已部分实行。
>
> 第二步，请你以我老友身份，与 Pelzel 联络，请其致函此间教育部，帮助我速办。
>
> 第三步，与 Taiybahk 联络。他与我相识。……他现在是国务院对华政策小组主席。促其请国务院督促此间美国驻华"大使馆"表示对我来美关切，并请"中国"官方协助。
>
> 第四步，如上述步骤无效，尽力把这件事宣扬，技术上由你设计。这一步最好由第三者事先让这儿派往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工作人员知悉。以"要用不用"为最有效。关于这一步，可分为三方面：A. 你所可能联络到的华府政界人士；B. 美国学界人士；C. 香港文化界人士。你以不露面为佳，并防人（摸底）。①

过了几天，殷海光又给美国著名学者屈莱果去了信，请他利用

① 《殷海光全集》第 10 卷，第 307～308 页。

自己的关系及有利条件，在美国政界作些活动，并给蒋介石施加一定的压力，迫使蒋介石集团放其出笼。

殷海光的这两封信寄出去后，他的朋友、学生为他出了大力，美国有关方面也曾通过外交渠道，与台湾当局进行过多次交涉。由于蒋介石对此下了命令，美国方面的交涉也不起作用。

蒋介石要把殷海光困死在台湾。

1967 年 7 月初，国民党将台湾大学的“续聘书”送到了殷家，同时告知他不能向学生授课。殷海光问台大的聘书为什么由国民党的党部送，党部的人先是支吾其词，后又说是受托。

殷海光认为，此聘书来路不正，办得不合常规，拒不接受。后经人们一再劝说，他才勉强接受了这张奇妙的“续聘书”。

他心里很清楚，国民党在这时突然给他送来一张假“续聘书”，目的是堵海外人士的嘴巴和不要他离开台湾。

他去不了美国，教学工作不能做，文章不能写，心里痛苦极了。他的情绪老不好，心里长期不痛快，癌细胞便迅速扩散……

27

逝前剖析国民党：骂蒋文字留千古

蒋介石不准殷海光去美国，使美国哈佛大学的聘书成为一纸空文。此事对殷海光刺激很大。

他到外国去不了，胃癌又得不到较好的治疗。一家人的生活无着落，原计划写作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也因病困扰难以动笔。

他感到，自己落到今天这个结果，完全是独裁者蒋介石及其国民党造成的，他恨透了国民党，恨透了蒋介石。

殷海光感到，尽管蒋介石的统治给台湾社会造成巨大的灾难，生活在这个岛上的知

识分子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都怕得罪官方，不敢抵制，人民也因被蒙蔽而未识破蒋介石和国民党，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他还想：自己已患癌症，在世的时间不长了，应该抓紧时间，写点解剖国民党及蒋介石的文字留给后人。由于他的病情一天天加重，他又迟迟动不了笔。

1969 年 4 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欧伟达、苏珊夫妇到台湾考察访问，并特地到殷家看望了殷海光。欧伟达、苏珊夫妇与殷海光系好朋友，而且交情颇深。

对欧伟达、苏珊夫妇的到来，殷海光很高兴，病也仿佛好了许多。

他们一起聊了一天。欧伟达、苏珊夫妇得知殷海光的处境，对他十分同情，对蒋介石及国民党用各种卑劣手段打击迫害殷海光的行为，极为愤慨。

当殷海光得知欧伟达、苏珊夫妇要在台湾呆一个时期时，便对欧伟达教授恳求说："我有一事想与你商量并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欧伟达问："什么事？"

殷海光说："我在台湾的一切遭遇都是蒋介石、国民党造成的。目前，这个独裁者和他操纵的国民党还继续在这个岛上作恶，继续残害人民。我在世的时间已不多了，想为后人留下一篇抨击、批判蒋介石的文章。因我的健康日益恶化，无法动笔写，想请你夫人苏珊女士在我这里住几天，由我口述，请她用英文帮我将这篇文章记录下来。"

欧伟达很爽快地答应了，并说："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相信她会将这个忙帮好的。"

苏珊也很乐意为殷海光做笔录工作。这样，一篇由殷海光口述的又颇有影响的长篇文章《剖析国民党》，在他去世前终于完成了。

在批评国民党时，殷海光说：

正如大多数研究中国的学者所知，国民党由初次涌现至现在，曾经多次蜕变。大致说来，国民党的演变可划分三个阶段：第一，它早年在孙中山领导下，略具政党雏形，它"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行动颇有理想主义的情操；第二，在昙花一现的和战略性的容共期间，这个革命组织最得人心；第三，当蒋介石取得绝对权力之后，国民党便逐渐走上反动的路线，逃到台湾后尤其变本加厉。由第二个阶段开始以至目前，国民党一点一点地丧失了早期的抱负和原来的政治理想主义……

国民党既把政治权力当作人生的最高目标，它就依循这个观点观察世间的一切事物。凡有利于它的政治权力都是好的；凡是不利于它的政治权力都是不好的。我们在台湾看到的各种宣传字句和教科书，莫不以这一火教式的划分为基石。

由于采用这种划分，国民党内外到处树敌。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如鲍大可、麦克·迈考尔、费正清，以及不同意国民党对中共看法的政治人物如甘迺迪兄弟，全是国民党痛骂的目标。一小撮自由知识分子，这些人只是由大陆逃亡台湾的自由知识界残余，亦受到处心积虑的迫害。

从历史观点看，台湾现政权的本质只是中国大陆旧政权的延续。除此之外，舵手（指蒋介石）的人格和国民党的性格都是台湾现时政情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最强力的发动机。……当然，台湾与大陆在环境上有若干分别，逼蒋家在政治策略上作出若干修改，但这只是调整而非在态度和政治取向方面彻底改变。他们急功近利，务求取回丧失给中国共产党的一切。

……现在的国民党对经济收益贪婪得多，宣传方法

细密得多，同美国人打交道较猾得多，镇压政治上的反对派冷酷得多，同时分外卖力地把台湾变成具体而微的极权警察“国家”，供自己长期挥霍。后者对蒋家及其手下最重要。真的，除了“打回大陆”，他们在台湾确似实现了大多数的目的，而这些目的，他们也曾梦想在中国大地上实现。

……只要国民党政党的权力伸展到哪里，就不可避免地在哪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

国民党政权畏惧公开批评，不敢诉诸公开辩论，为了苟延残喘，它需要权威氛围，保护自己，以免受到各种要命的批评，它要为当领袖的个人威信建立官僚统治阶层，并且支持以蒋介石为核心的领导集团。

国民党怎样统治台湾呢？因为一伙比较大胆的狡猾的人集拢起来，用自命合法的方式，掌握着社会资源，为私利统治着台湾。而且，实际上是打着“国策”的幌子，以“伟大领袖”的意志，把人民当作自己胡作非为的工具，理由是：“领袖是人民意志的旗手。”

……

……只要目前的政治形式、政党的结构、僵硬的政策和领导层一天不变，那么，国民党将不可能找到什么出路。

在国际间，国民党只懂一味跟着人家变，它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受美国支配。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在实际上决定了国民党政权的存亡，而1949年以来，事实上保存了它。一旦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国民党能不能长久维持现况下去呢，实难预料。所以，在外交事务方面，最令国民党担心的是美国政策可能有变，这对它

的政权将十分不利。这方面关注之情切，经常在报纸、杂志和电台广播反映出来。

国民党十分需要战争的情绪气候（emotional clinatc），但不是需要真正的枪炮战争。这个代价它是付不起的。它需要战争的情绪气候恢复它那退化了的气力，证明它采行了强制性措施是有根据的，并且以"世界反共阵营"成员的身份在人民面前站得英伟些。因此，越战升级了它会鼓掌称快，越战降级了它却感到惶恐万分。这些花样证明国民党实际上是杜勒斯的险着政策的真正执行者。①

在剖析国民党的同时，殷海光对国民党的"总裁"蒋介石也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尖锐的批评。过去，他在《自由中国》上写批评国民党的文章时，多半用"权势核心人物"六字代指蒋介石。这次口述英文文章时，就不用"权势核心人物"而直称蒋介石，把蒋介石的画皮层层剥开，使人们看清这位神秘的独裁者的真正面目。他说：

……正像20年来表露无遗的，蒋家及其手下在心底里的动机说不上是积极的动机。他们这一群败军之将，只知一味悔恨把大陆的统治权断丧给"共×"。

如果不懂得至低限度，从1937年以来的历史背景，不懂得舵手的人格，不懂得国民党的特征，我们就不可能清楚地了解台湾现政权为什么出现以及怎样出现。它是很多种不同因子的巧合和互相制约的产物。这些因子是：

（一）蒋氏家族和蒋氏父子的权力意志，特别是做父亲的锲而不舍地努力保持他个人的威信和颜面。老蒋一

① 《殷海光书信集》，第306～330页。

直声称他个人的威信和颜面等于"国家"民族的光荣。

(二)、(三)(略)

(四)蒋氏的权力结构有其独到之处。国民党是由一班职业党棍组成的,这些人绝大部分属于老朽昏庸,但正统治着人民和政治上的残存者。为了证明其合法性和重要性,整个国民党都要齐心协力打击敌人。

……

总之,国民党,尤其是那位"伟大领袖"(指蒋介石),对丧失大陆的控制权完全不必负责任。一切责任都应由他人或国内唱反调分子承担。

……

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蒋介石是七拼八凑而成的将军。当他由大陆溜走时,声望跌到最低点。可是,在今天的台湾,他已被神化为几乎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在台湾,虽然蒋介石只是一败涂地的将军,但没有人敢在公开场合直呼其名,他有什么了不起!

姑勿论是否了不起,总之如果国民党不把蒋介石当作偶像,台湾现政权便没有今天。问题是,败军之将怎样摇身一变而成为"伟大的舵手"呢?这个问题探究起来十分复杂。

……

蒋介石的手腕在中国军政界几乎无往不利。在1926年至1937年间,他是万众瞩目的宣传家和无懈可击的政客。逃到台湾以后,他用尽种种狡猾的无情的手段清除一切实质的政治反对派,并使所有潜伏的异端无法施展拳脚。今天,他在台湾自己创造的政治环境里可以为所欲为。可以发表自己喜欢的演说,不必惧怕检查或批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他得以轻易运用大陆人对中共的恐

惧和重返家园的憧憬。这是蒋介石能够把自己从败军之将变成台湾之神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他虽然在有生之日都是"活生生的时代错误"，但他依然是他个人的政治游戏的主角和国民党的"伟大舵手"。

……一个人怎么可以有权有势地君临千百万人之上呢？主要原因是他周围笼罩着一股神话空气。这股空气可能是社会传统传下来的，也可能是这个领袖的手下有意利用他而造出来的；当然也可能是二者的混合。就蒋介石的情形来说，他由溃败到再次站起来，为他塑造形象，显然是人为的成分多于真正传统成分。

……一切神话都经受不起严格的推理。历史也告诉我们，一切神话都是有害的。集体的神话无疑地掌握在一群人手中，由传统把它神圣化，混合各种民间传说，充满群众感情，根本经不起任何理性思考。这种神话很易给希特勒一类的野心宣传家曲解、夸张、加强、扩大。蒋介石及国民党在台湾的政绩，就是另一个令人吃惊的榜样。用来支撑蒋介石及其手下的权力结构，并为他们的各种行径制造理由的所谓的"反攻大陆"的口号，就是由蒋介石一伙捏造和圣化神谕的集体神话。这个神话已被建构成"基本国策"，不惜一切代价，务求它不受公众挑剔。

……

40多年来，蒋介石时刻拼命塑造一种特殊人格。这种人格禁闭在官僚制度中，剥掉个性和人类尊严，而官僚制度是生存的唯一保障。这种人没有道德观念和独立判断。一味懂得听从"伟大舵手"的命令，至少在执行职务上是这样。蒋介石在挑选爪牙时，盲从和无条件效忠是首要条件。所以，他面对着大陆人民怨声载道而默然无知，以致终于失势，这是主要原因之一。但他今天在台湾真的塑

造出适合自己需要的官像来了。这种官像的个性和人格被剥夺殆尽，只剩下一堆行尸走肉，任由权威颐指气使。

……

"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败。"台湾那位"伟大领袖"的权力没有对手，所以也没有办法阻止他腐败下去。国民党本身和台湾社会将来下场如何，目前还难以断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使台湾在未来变成模范社会的许多有生力量都给国民党糟蹋殆尽了。

……

在台湾，政治方面的冷漠地带阔得惊人，而自从国民党统治以来，更逐步扩展。舵手及其统治集团可以为所欲为，甚至"伟大领袖"眉头一皱也可取决政策。他运用权力时不须认真顾虑一般人民的反应，即使手下将尉也不放在眼内。他认为，除了盲从自己之外，别人是没有其他出路的。这是他心目中的绝对真理。他又认为，执行他的命令毋须公开搬弄强制性的措施。

今天在台湾，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清楚，忤逆这位"伟大舵手"的意愿会产生什么后果。在这个岛上，不论官方的法规多么扰民，但从没有人敢公开违抗。人民宁愿私下诉苦或不加理睬，绝不会装出公开的反对姿态。……像现在台湾这样什么决议都在小房子里面通过的情形，在欧洲极权国家里是找不到的。①

殷海光口述的此文共62页，约有3万多字，译成中文有4万字。此文写起来后，在台湾无法发表。殷海光考虑自己重病，妻子、女儿仍在台湾，弄到海外去发表，恐给妻子、女儿带来麻烦，决定暂

① 《殷海光书信集》，第306～330页。

不发表。

此文是殷海光在世时写的最后一篇批评国民党、蒋介石的文章。殷海光逝世后，夏君璐害怕国民党特务来抄家，特将此文带到香港，交给殷海光的学生何友晖、罗业宏保管。后又转到香港学者、殷海光的崇拜者卢苍先生手中。1975 年 6 月，卢苍将此文译成中文，并摘其中精要的 2 万字，作为"附录"收到《殷海光书信集》中，1988 年 5 月由台湾桂冠图书出版公司公开出版。

《剖析国民党》一文，是 60 年代台湾岛上唯一批判国民党、蒋介石的长篇政论文章，尽管此文迟了许多年面世，广大读者仍认为此文是一篇不朽的反蒋佳作，他对人民了解、认识、研究国民党、蒋介石极有参考价值。

后　记

我写完长篇传记文学《殷海光传》后，又陆续收到台湾朋友们帮助我搜集的新发现的殷海光的资料。看了这些资料，我感到十分珍贵，觉得很有必要再写一本殷海光的书。经过考虑、思索，决定这本书就叫《殷海光与蒋介石》，试图将书生殷海光从反蒋到拥蒋，后又反蒋的复杂内因写出来，供大家阅读与研究。此书从动笔到定稿，历时半年多。

这本书能顺利写成并公开出版，是海内外许多朋友帮助的结果。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居住在美国的殷夫人夏君璐女士，她为了支持我的学术研究和写作，向我赠送了许多殷先生的书和台湾的报刊资料、殷先生的照片。

热爱中华文化的台湾企业家陈宏正先生，不惜资金，不顾劳累，不怕麻烦，为我搜集了大量的台湾书刊。可以说，没有陈宏正先生的帮助、支持，我不可能写成这本书。

还有殷海光先生生前的朋友、年愈古稀的胡虚一先生，应在这里特记一笔。他在年迈体弱、视力很差，自己写作任务很重的情况下，到一些大学图书馆为我查阅30多年前的台湾报刊，去书店寻找我所要的书，既费力，又贴钱，助人为乐的精神，令人感动。胡虚一先生为我提供的资料，为此书增色不少。

原湖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陈奇文、省政协委员赵成伟、我的老师戴军先生，也给我诸多支持、帮助。

此外，还有湖北省委统战部宣传处汪梦军处长、原北京大学计

算机系马健、武汉大学杨桂文、南京东南大学林荣祖及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为此书的出版做了许多工作，我的夫人曹菊花也为这本书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此，我向他们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作　者

1999 年 5 月 8 日于黄州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殷海光与蒋介石
作者=汪幸福著
页数=317
SS号=10401111
出版日期=